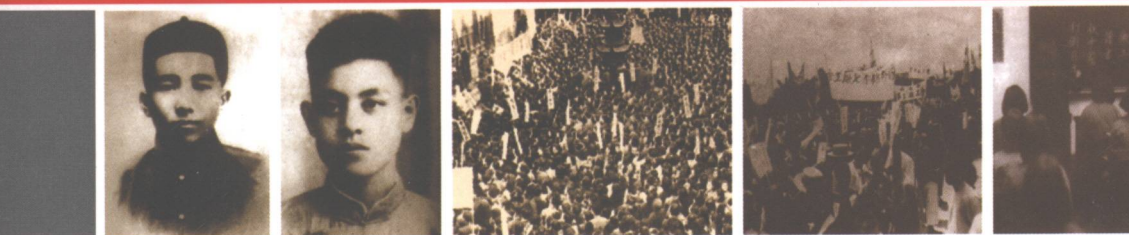


上海市普陀区历史回眸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沪西）历史 (1919年5月~1949年5月)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办公室 ◎ 编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海市普陀区历史回眸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沪西）历史

（1919年5月~1949年5月）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办公室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

◎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沪西)历史(1919.5 - 1949.5)

编 委 会

主 任：周国雄

副 主 任：张雄伟

主 编：张雄伟

副 主 编：吴自钧

编 辑：华校生 顾淦翔

袁彩根 陆伟杰

目 录

综述	1
----------	---

第 一 编

五四运动与沪西早期工人运动

(1919 年 5 月 - 1920 年 7 月)

第一章 沪西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发展	17
一、沪西工业区的形成	17
二、沪西工人阶级的来源	19
三、20 世纪初沪西工人生活状况	19
四、早期沪西工人的自发斗争	22
第二章 沪西工人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	24
一、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	24
二、沪西工人率先声援北京学生	25
三、沪西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崭露头角的历史意义	29

第 二 编

建党和大革命时期

(1920 年 8 月 - 1927 年 7 月)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在沪西的传播	33
一、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到沪西	33

二、中共发起组在沪西创办工人半日学校	34
三、沪西纺织工会的诞生	36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沪西的活动	38
一、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	38
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沪西开展工人运动	39
三、青年团上海地委在沪西发展团组织	41
四、中共中央指派工运领袖到沪西	43
五、创办沪西工人补习学校	44
第五章 革命摇篮沪西工友俱乐部	46
一、筹建沪西工友俱乐部	46
二、沪西工友俱乐部的革命活动	49
三、沪西地区最早的党组织	51
四、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沪西工人运动	52
第六章 日商纱厂的二月大罢工	56
一、沪西工友俱乐部发动二月罢工	56
二、沪西和沪东联动举行二月大罢工	58
三、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	60
四、在潭子湾欢庆大罢工胜利	61
五、罢工中沪西工会迅速发展壮大	63
六、二月罢工胜利的历史意义	64
第七章 伟大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66
一、沪西工人代表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66
二、顾正红惨遭日本资本家杀害	67
三、潭子湾公祭顾正红烈士	69
四、血腥的五月三十日	73
五、五卅反帝风暴席卷全市全国	76

六、沪西工人运动领袖刘华英勇牺牲	78
七、五卅周年和罢工浪潮	80
八、五卅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	83

第八章 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的沪西	85
一、武装起义前的革命形势	85
二、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中的沪西	87
三、上海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中的沪西	89
四、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的沪西	91
五、大革命由胜利转向失败	93

第 三 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 年 8 月 - 1937 年 7 月)

第九章 革命低潮时期的沪西	101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	101
二、沪西党团工会组织被打散	102
三、革命低潮时期的沪西工人	104
四、中共沪西区委在腥风血雨中重建	106
五、沪西革命运动的复苏	109

第十章 党内“左”倾错误路线在沪西的贯彻和危害 ...	112
一、“左”倾错误路线时期的沪西党团组织	112
二、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时期的沪西工人运动	117
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沪西革命带来的危害	120

第十一章 沪西抗日救亡的烽火	124
一、沪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奏	124

二、悲壮的淞沪抗战	128
三、刘少奇领导沪西人民反日大罢工	131
四、真如惨遭劫难	137
五、沪西共舞台事件	138

第十二章 沪西党团组织屡遭破坏后的斗争	142
一、沪西党团组织屡遭破坏	142
二、党团组织破坏后的沪西各种革命组织	146
三、沪西沪东爆发抗日大罢工	151
四、左翼革命文艺在沪西	155
五、沪西人民在革命道路中的探索	159

第 四 编

抗日战争时期

(1937 年 7 月 - 1945 年 8 月)

第十三章 抗战初的沪西	163
一、八一三抗战形势	163
二、抗战初重建沪西党组织	166

第十四章 “孤岛”时期人民的抗争	169
一、日寇在真如疯狂烧杀抢掠	169
二、奔赴前线,报效祖国	171
三、组织各界民众抗日团队	174
四、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辗转各地抗日	176
五、沪西民族工业的西迁	180
六、“孤岛”时期的沪西文化教育界斗争	183

第十五章 全面沦陷时期的沪西	187
-----------------------------	------------

一、上海沦陷后沪西百业凋敝、人民生活困苦	187
二、药水弄的封锁	190
三、汪伪反动政权在沪西的精神毒害	192

第十六章 “长期荫蔽,积蓄力量”

一、党组织在形势逆变时的大调整	196
二、沪西教育界的隐蔽斗争	198
三、铁蹄下的大隆机器厂工人斗争	201
四、勤学勤业交朋友	203

第十七章 里应外合,迎接抗战胜利

一、开展天亮运动	205
二、沪西地下军	208
三、沪西地下党智夺汉奸黄金	211
四、中止的武装起义	212

第 五 编

解放战争时期

(1945 年 8 月 - 1949 年 5 月)

第十八章 抗战胜利初期的沪西

一、抗战胜利初的沪西党组织	217
二、沪西工人为复工而斗争	219
三、检举汉奸和“欢迎马歇尔”的斗争	221

第十九章 求生存,反内战的斗争

一、纺织工人争取“二十一条”斗争	225
二、调整底薪和实行生活费指数的斗争	228
三、玉佛寺公祭昆明于再烈士	231

四、“六二三”反内战大示威	234
第二十章 第二战线的反抗斗争	238
一、反对冻结生活指数	238
二、反饥饿,反内战中的“五二〇”惨案	240
三、反抗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斗争	244
四、救饥救寒运动	246
第二十一章 沪西人民在国民党统治崩溃前的抗争 ...	249
一、国民党统治崩溃前的形势	249
二、申九“二二”斗争	251
三、疏散隐蔽、转移阵地、继续战斗	257
第二十二章 里应外合迎接解放	260
一、适应剧变的形势,新建中共沪西区委	260
二、反迁移 反破坏	264
三、黎明前战斗的沪西英烈	269
第二十三章 上海战役和沪西(普陀)解放	274
一、沪西解放的前奏曲	274
二、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血战真如	275
三、普陀区全境解放	276
四、上海解放,沪西(普陀)开始新的征程	283
后记	288

综 述

沪西区是上海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心城区之一，历史上的沪西区域大体上包括现今普陀区、静安区、长宁区和闸北区、徐汇区的一部分。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沪西涌现出许多爱国爱民的仁人志士，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鲜血，以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在中国革命史册上谱写了光辉篇章。普陀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沪西进行探索革命道路、英勇战斗的核心区域之一，现今普陀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这块红色热土上，承载着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正在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国富民安而继往开来。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了在世界上领先的古代文明，对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是，当历史步入近代时，中国却落伍了。

在近代中国，出现两个新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9世纪末，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这一新生的社会力量虽然还很弱小，却是新生产力的代表。

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开辟市场，扩展殖民地，开始武装侵略中国。在短短的十余年间，西方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同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辟出租界，使列强在中国获得了许多政治、经济特权。面对中国总是挨打的严酷现实，一些忧国忧民思想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这和中国的落后分不开。于是，一个以“中体西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出现了，一些清廷大员先后创办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以刺激中国近代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然而,它的宗旨是采用西方先进技术的“用”来维护已经完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腐朽的中国封建主义制度的“体”,其失败的必然趋势是不可扭转的。清军在甲午海战中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即资产阶级改良派)首先奋起,以“救亡图存”为号召,发动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变法维新运动,试图按照英、日等资本主义国家模式,在中国实行以建立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为最终目标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然而,史称戊戌变法的维新运动最终被封建顽固派所扼杀。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抱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遗恨,血洒京城菜市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早在19世纪末,几乎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发轫的同时,资产阶级革命家就开始从事以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为目标的革命斗争。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了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

但是,辛亥革命也有其明显的弱点。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提不出一个足以广泛动员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参加革命运动的纲领和路线,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力量异常强大,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3个月,就被窃国大盗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政府所取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没有彻底成功。

一批中国先进分子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力量。工人阶级虽然在人口上在全国占少数,但它有强大的组织性、纪律

性,是近代中国最有战斗力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是解救中国的未来希望。

20 世纪初叶,中国近代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中,外国资本占绝对优势,而民族资本发展缓慢。工人阶级是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技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全国工人阶级有 200 万人以上,日益成为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社会力量。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不但是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来的,而且首先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而来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格更老一些,社会基础也更广泛一些。

20 世纪初,上海近代产业最集中的区域是沪东和沪西。现今普陀行政区是上海沪西工业最集中的核心区域,境内苏州河两岸密布着许多近代工业,其中有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利用《马关条约》准许在华设厂和租界的特权,开办的大批纺织工业为主的外资企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实业家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也先后在此开设了许多民族工业。随着这些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沪西的工人阶级队伍也随之壮大和发展。他们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一般每天工作在 12 小时以上,有的长达 16 小时。沪西工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相比,工资更低、劳动条件更恶劣,而且缺乏人身自由和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同时,他们还要受封建性的剥削制度压榨和野蛮的管理,如包工制、监工制、包身工制、养成工制。他们人数虽少,但人员易集中,大机器生产容易使他们团结起来,具有特别的战斗力。

沪西的无产阶级,除了产业工人这一主体之外,还包括与产业工人处于同等或类似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并与产业工人所从事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各种非产业工人,如手工业工人、苦力运输工人、商业和金融业的普通职工等。

沪西无产阶级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使全人类由阶级社会过渡到没有阶

级、没有剥削的社会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从阶级性上说,它是最富于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的阶级。无产阶级也最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富于团结协作精神,最少保守思想,最具革新进取精神。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中,无产阶级无疑是一个最进步、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

1919 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卖国政策而爆发的。5 月 4 日,北京大学 1000 多名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学生集会并在天安门游行示威,遭到军阀政府当局镇压。就在大批学生被捕,眼看五四运动快要夭折时,一个重要的事件发生了,上海工人阶级发动强大的政治大罢工,斗争的烈火很快蔓延全国,扩展到 20 多个省区,100 多个城市。北洋军阀在人民群众的反帝怒火中,被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 3 个卖国贼职务,中国政府代表拒签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

五四运动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还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上海工人阶级发动强大的政治大罢工的源头在哪里?在沪西。1919 年 6 月 5 日上午 11 时,沪西日商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男女工人五六千人,率先在全市罢工,接着各区工人都起来加入大罢工的行列,不久又辐射到全国 20 多个省 100 多个城市,掀起全国性的抗议浪潮。上海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是前所未有的。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自此,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力量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工人运动的本身也逐步由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中国一批先进分子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一批先进分子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沪西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的战斗,也成了我区近代革命史的

开篇。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建立后,就派李启汉到沪西小沙渡开办工人半日学校,开始在沪西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沪西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上海工人运动的革命摇篮,在这块红色热土上,演绎了许多催人泪下的故事和彪炳中国革命史册的伟大事件。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在沪西生活、战斗和牺牲,许多幸存者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擦干自己身上的血迹后,又继续在沪西战斗,有的则走上新的革命征途。他们点燃的星星之火,在华夏大地燎原,在血与火的拼搏中,许多人成为党的杰出政治家、理论家、军事家、艺术家和革命活动家。

二

1924年至192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席卷全国,规模之宏伟、发动群众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前所未有,人们通常称它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这场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加紧压迫中国人民所激起的强烈反抗。“打倒列强,除军阀”,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强烈愿望,它是最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的政治口号。“二七”惨案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联合战线即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为大革命的到来作必要的准备。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革命的新局面迅速形成。

1924年5月中共中央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后,中央陆续从武汉等地调富有工运经验的李立三、项英等同志来上海,与原上海的工会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加强了对沪西工人运动的领导,从此开创了沪西革命的新篇章。

1924年至1927年,是中国的大革命时代,其中不少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重大事件发轫于沪西。

1925年2月在沪西和沪东联合发动的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二月大

罢工,成为五卅运动前哨战;以5月15日的顾正红反日抗暴斗争和顾正红英勇牺牲成为震惊上海和全国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导火线;5月30日的一场声势浩大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上海爆发,很快席卷全国,标志着中国大革命时代的到来。

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先后发动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沪西工人和全市工人一起战斗在前列。第一次起义,沪西工人领袖陶静轩英勇捐躯;第二次起义,大夏大学陈骏、陈亮两名学生被军阀斩杀于曹家渡;第三次起义,沪西工人在区委书记余立亚领导下,击溃军阀军队的顽抗,最后与全市工人武装胜利地会师闸北火车站,建立了上海第一个市民政府。在第三次起义中,沪西军事指挥家曾瑞等英勇牺牲。

但是,人民的革命胜利果实很快在1927年4月27日被国民党右派、新军阀所篡夺,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沪西英雄儿女、区委书记余立亚等相继被敌人杀害,上海陷入反革命的黑暗统治时期,革命从胜利转向失败,中国大革命也宣告失败。

大革命的失败,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还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经验。作为上海一个区域的地方党组织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沪西共产党人和沪西工人运动在强大的敌人面前,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和牺牲。但沪西的党和革命志士并没有停止战斗的步伐,在革命的烈火中,认真吸取教训,经受考验,继续战斗。

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从此,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亦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和许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的领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党外革命人士倒在血泊中,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大革命失败,沪西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没有被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所吓倒,沪西共产党人没有被杀绝。他们冲破反革命的高压,擦干战友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尸身,在黑暗中高举着革命的光辉旗帜,以鲜血和生命,继续在奋战。上级党的组织继续派员充实沪西的党团和工会组织,一批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沪西这块红色热土上继续进行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从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中国进入抗战爆发前的十年内战时期。沪西地区的革命活动跌宕起伏,沪西地方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继续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在这10年中,中国共产党党内出现三次“左”倾错误统治全党的局面,也全面影响着沪西地区的所有党团和工会的革命工作。

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淞沪抗战,沪西成为上海人民抗日战斗的大本营。时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长职务的刘少奇亲临沪西,直接领导沪西反日大罢工,声援十九路军前线抗战,在劳勃生路的梅芳里、樱华里(英华里)开办大锅饭运动,让罢工工人和家属有食物果腹,坚持罢工和抗日斗争,沪西一时有“赤色沪西”之称。

1932年沪西共舞台案件。7月17日在沪西劳勃生路共和大戏院(又名共舞台)正式召开“江苏省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当场被捕88人,最终13人被枪杀于南京雨花台,多人被判各种徒刑。沪西共舞台案件是这时期国民党政府对抗日革命进行最残暴的一次镇压,使抗日力量遭到重大的摧残。

党内三次“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得1934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也被敌人破坏得无法恢复,中共沪西区委也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不久就停止了活动,自此沪西区一级党组织不复存在。

但是,沪西的共产党人和许多革命志士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始终坚持斗争,以各种组织形式坚持领导人民斗争。当时的革命组织主要有中国革命人道互济会沪西分会、沪西教育工作者联盟、中共沪西国难教育社、共青团沪西区委。1936年11月,上海爆发有4万多

人参加的沪东沪西反日总同盟罢工,沉重打击了日本的侵略势力,再次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战斗力,显示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决抗日的决心和力量。

从1927年8月到1937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难曲折的斗争中发展并达到成熟的重要时期。许多同志通过革命实践,看到机械地模仿俄国城市中心论的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行不通的。在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没有解决土地问题,生产力没有得到发展之时,就想“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是脱离中国实际的主观主义的产物。工人阶级是先进的阶级,但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势力远远强于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光凭政治罢工以及工人武装暴动,是不足以推翻国内外的敌人的。

在这10年间,党经历了二次历史性的转折,即第一次的北伐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第二次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由于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从而胜利地完成长征,经西安事变、特别是全国抗战爆发最终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掀起了抗日民族战争的高潮。

在这10年内,沪西的党和人民在国民党统治区,历经了巨大的苦难和牺牲,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同时,曾在沪西革命的同志,有相当一批同志后来到农村去开辟革命根据地,走上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有的参加了南昌起义、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斗、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中如曾在沪西工友俱乐部任教的上海大学学生罗石冰、曾先后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的李硕勋、毛春芳(欧阳洛)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曾是共青团曹家渡部委书记的关向应,到湘、鄂、黔革命根据地从事农村游击战,后为贺龙的红二方面军团副政委,参加长征(后又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政委);曾是大夏大学学生、上海学联总务部长吴亮平,到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红军长征中的红一军

团地方工作部长、中央纵队秘书长。在这10年内,沪西有的同志在文化战线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中有原曹家渡区行委委员王任叔,即后来著名的作家巴人、作曲家孟波、理论家、翻译家吴黎平(吴亮平)、社会活动家帅孟奇等。他们的不懈奋斗,终于迎来了一场更为惊心动魄的全民抗日战争的新的历史时期。

四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帝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洗去了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从衰败到重新振兴起来的转折点,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战8年,也是沪西工人运动遵循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从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重新走向高潮,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克服弱点,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阶段。

抗战8年,沪西工人阶级在极其错综复杂、艰辛困苦的环境下,不畏暴敌,不怕困难,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韧不拔,团结战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从各方面去打击敌人,在斗争中扩展阵地,积聚力量,支援抗日武装,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37年7月初,党中央委派刘晓到上海,全面主持上海地方党的恢复和重建工作。从1938年6月开始,沪西先后按产业和职业建立中共上海杂厂委员会(简称杂委,又称沪西产业委员会)和中共沪西中国纱厂委员会(简称中纱或华纱),1939年下半年又建立中共沪西敌纱厂委员会(简称敌纱或日纱)。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沪西党的各级产业组织根据党的团结一切可团结力量的方针,以各种形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沪西开展了波澜壮阔的反日斗争。1940年初,省委副书记刘长胜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白区工作“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省委要求党的基层组织把主要力量放到有决定意义

的重要工厂、企业和学校,将超过10人以上的支部分成几个独立的彼此互不联系的平等支部,以便在遭受破坏时继续坚持工作。沪西地区的各级组织,积极贯彻省委的指示,积极实现党员干部社会化、职业化,隐蔽在群众之中,勤学、勤业、勤学交朋友,在工厂做工或当职员,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团结了广大工人和职员,实现“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策略。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全部租界,“孤岛”时期结束,抗战进入最艰难时期。年底,江苏省委奉中央命令转移至新四军淮南根据地,而所属工委等6个系统党组织仍坚持在上海斗争,配合能够长期隐蔽埋伏的主要领导人独立开展工作,互不联系。1943年1月,江苏省委撤销,上海地下党组织由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工作部(又称城市工作部)领导。此时,沪西因华商轻纺工业大批倒闭,党员大量流失,1942年底,工委决定撤销中纱、敌纱,合并成立中共沪西纱厂委员会(简称纱委),统一领导沪西纱厂基层党组织。

此刻沪西共产党人的抗日战争进入更加困难的时期,他们以更加隐蔽的方式,破坏敌人的军工生产,向群众宣传天快亮了。

抗战后期,在党中央和市委的领导下,沪西积极投入里应外合、迎接抗战胜利的准备,沪西地下军在沪西信义机器厂成立了起义指挥部,准备举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一切工作都已做好,就在准备起义的当天,在接到中共中央紧急中止起义命令后才停止。

这次武装起义虽然因计划改变而未实现,但它反映了沪西和上海的工人阶级不避艰险、勇于牺牲的优良品质,是上海人民为夺取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所作出的历史新贡献。

五

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这是充满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解放与奴役斗争的年代,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赶走日本侵略者后,中国又面临两种命运的决战:是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还是开创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光明的新

天地？沪西人民就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进入一个艰难而最终获得彻底解放的胜利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坚持了长达八年的艰苦地下斗争，坚守了沪西各条战线的革命阵地，建立和锻炼了党的各级组织，保存和发展了党的力量。

抗战胜利时，在敌后长期坚持与敌伪进行斗争的沪西人民，原来希望从此可过自由幸福的生活，建立人民大众的、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可是，就在上海战后还处在千疮百孔、百废待兴、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时候，突然从地面冒出许多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他们不顾人民死活，依仗权势，强取豪夺，浑水摸鱼，大捞一把，变接收为劫收，让原本已气息奄奄的上海经济更加衰败。工厂不开工，设备被盗卖，使许多工人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陷入“接收关工厂，胜利饿肚皮”的悲惨境地。愤怒的工人被迫组织起来，以棉纺业和机器业为主的沪西工人在上海率先发动为了生存而爆发的复工斗争，在平民村成立沪西失业工人联合会，为争取工厂早日复工而四处奔波。沪西工人的怒吼，很快在沪东得到响应，在全市掀起了复工的怒潮。

1945年11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又大肆屠杀和压迫爱国学生、职工和民主人士，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昆明“一二·一”惨案。1946年1月，1万余人到玉佛寺公祭于再等四烈士，揭开了上海争取和平、民主群众运动的序幕。

1947年5月20日，沪西青年学生参加了上海学生代表赴南京的“反饥饿，反内战”请愿活动，遭到军警密集的血腥镇压，酿成震惊中外的“五二〇”惨案，全国许多城市掀起罢工、罢课、罢市的抗议浪潮，形成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革命风暴。

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战争即将逼近敌人“心脏”的南京和上海，国民党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再次举起屠刀，向反抗的工人、学生砍去。不久上海爆发了沪西申九“二二”大罢工，反击了敌人的疯狂的进攻。面对全副武装的敌人，沪西申九工人的斗争和牺牲，表现了上海工人阶级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和奋起反击的英

勇壮举,极大鼓舞了全市人民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敲响了反动统治者的丧钟。

1948年末,全国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共上海市委为把工作重心转为迎接上海解放的中心任务,为有利于统一领导地区内各系统党的工作,避免敌人分割击破,决定对党的领导形式作一次重大调整,把按系统垂直领导的方式改为按地区实行分区领导的体制。是年12月,在市委领导的主持下,中共沪西区委员会正式成立。原本区各系统的党组织先后统一归属区委领导,下设中共中纺系统分区委、中共民营棉纺第一分区委、中共民营棉纺第二分区委、中共沪西杂纺委员会、中共沪西机器业分区委、中共沪西卷烟面粉分区委、中共沪西劳工教育分区委、中共学生分区委和中共沪西地区分区委。

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斗争中,沪西各级党的组织很快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成立护厂队和纠察队,开展“反破坏、反屠杀、反迁移”的护厂、护校斗争。

在黎明前的战斗中,沪西的一批优秀儿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他们中有钱凤岐、刘家栋、孙方璟、张如松、李阶平、徐海峰、郭莽西、陈仲信等。

沪西的革命先烈和广大地下党员以及革命群众的浴血奋斗和牺牲,最终迎来了人民的解放。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极大的牺牲代价,解放了苏州河南岸的沪西(普陀),26日,苏州河北岸的沪西(普陀)全境解放,27日,全上海解放。自此,从1919年五四运动沪西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来,沪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30年浴血奋战,终于站起来了,成为国家主人,迎来了一个新生的、伟大的新时代。

六

翻开普陀区的党史,我们发现,沪西的许多革命活动家大都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他们有的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毅然辞别亲人,远离故乡,到上海、到沪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投入革命的洪

流；有的不堪帝国主义、资本家残酷压迫与剥削，胸中燃烧着反抗怒火而在沪西参加革命的斗争；也有的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受到新思潮的影响，立志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而到沪西投身革命。总之，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为实现崇高的革命理想，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抛头颅、洒热血，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沪西英雄儿女。

从1921年到1949年的上海解放，沪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性探索中，进行反抗黑暗势力的斗争从未间断。他们一次战斗尚未结束，另一次战斗的火焰又燃烧起来；一次斗争失败不久，另一次斗争又接踵爆发；一批先行者刚刚倒下去，又有仁人志士站了出来。毛泽东对中国人民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曾作了这样的描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普陀（沪西）区从1924年沪西工友俱乐部里的8个党员的星星之火，发展到大革命时期的几百个党员，在市委、区委领导下，成千上万的沪西工人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浴血奋斗，并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当他们遭到国内外敌人残酷镇压和打击时，没有对前途灰心失望；当自己的亲密战友倒下，他们是掩埋好自己的战友尸体，高举先烈未竟事业的旗帜，继续奋战，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去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革命道路。

他们为什么对自己的革命事业如此执著，甚至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而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总书记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是这样解释的：“当年创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家们，首先都是最忠诚的爱国志士。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经历千难万险，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信奉马克思主义、追求科学社会主义，同勇敢地承担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紧紧联结在一起。应当说，我们党这样的特点和优点，从创党那一天起，就内在的蕴涵在党的肌体和灵魂之中了。”

中华民族有一个朴素的情怀，叫中华魂。这是中国古人想象人

的精神能离开形体而存在,这种精神叫做魂。宋朝大诗人苏轼有诗云:“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将晶莹剔透的冰凝为魂。清代大文豪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七十六回写有一句“冷月葬诗魂”,以诗歌形式表达人们精神世界的想象,将感情归纳为诗魂,这里是表达作者以悲泣的冷月心境,怀念复杂、丰富、充沛的内心精神世界。我们共产党人有着更高的精神境界,在顾正红烈士追悼会上,工人运动领袖刘华亲笔书写“先生虽死,精神不死”,表达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烈士壮烈牺牲的追忆,颂扬顾正红的革命精神永存人间。

普陀(沪西)区有无数革命先烈和志士,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在沪西这块红色热土上,以他们的模范行动表现了革命者追求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不怕牺牲的共产主义精神;依靠群众,为人民谋解放的奉献精神;严明纪律,万众一心的团结战斗精神;自强不息,前仆后继的拚搏精神。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屈不挠、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表现了中国人民在危难中开辟新路、敢于探索、民族自强、民族创新的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沪西魂”。

第 一 编

五四运动与沪西早期工人运动

(1919 年 5 月 - 1920 年 7 月)

第一章

沪西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发展

一、沪西工业区的形成

上海地处东海之滨,长江、吴淞江和黄浦江在这里汇合,交通便利,通达海外和国内各地。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上海等 5 个城市成为西方的通商口岸,沦为西方列强入侵之地,从此,外国资本主义商品源源而来,中国大量的廉价原料被掠夺出口,上海成了全国进出口贸易的中心。1899 年,腐朽的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又接受帝国主义扩充租界的无理要求,将苏州河的小沙渡以东等大片地段扩充为租界,为帝国主义在华扩大势力范围准备了物质条件。

小沙渡原是吴淞江(苏州河)的一个渡口,渡口北岸有朱家湾、太浜巷等村落市集,南岸有草鞋浜、蔡家宅等村落,村民为方便来往而设置船渡,该地习称小沙,乃称小沙渡。随着公共租界的扩展,渡口南岸的公共租界地段开始辟筑小沙渡路等道路,同时铺设水电管线,吴淞江船埠码头建造后,渡口两岸纷纷建厂、造房,开始日益繁荣,成为商埠的天然集聚点和生产基地。吴淞江南岸最早建厂的是清光绪十五年(1889 年)间由民族资本开设的半机械化的大有榨油厂。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已成为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时代特征。凭借《马关条约》准许外国在华设厂的特权,英、美、德、日等国竞相在小沙渡开厂。从 19 世纪末开始,

特别是 20 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民族实业家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先后在此建立榨油、面粉、纺织、造纸、印刷、橡胶、搪瓷、烟草、机器制造等工业。但是民族工业基础十分脆弱,其生产规模和资本无法与外资匹敌,生产规模不大,时而被外国列强吞并,日本则是最大的饕餮者。

内外棉纺织株式会社,是日本在上海的最著名工业垄断企业之一,1888 年创办于大阪。1910 年在宜昌路廉价购地建造内外棉三厂,次年开工,正式建厂,商标为“水月”,人称水月纱厂。时值辛亥革命期间,市场混乱,日纱乘虚而入,获得巨利。



20 世纪 20 ~ 30 年代沪西地区工业分布图

在这期间,他们利用特权,在租界和越界筑路地区圈划了 60 多万平方米土地(占当时区域面积的 22%),先后开设钟渊公大第三厂,内外棉一厂、二厂、三厂、四厂、五厂、六厂、七厂、八厂、十二厂、十五厂,日华三厂、四厂、五厂、六厂、七厂,同兴纺织株式会社。其中,日华五厂、六厂、七厂的前身为我国民族资本宝成一厂、二厂,1926 年,日商喜多买进,改名喜和一厂、二厂,后又并入日华系统。日本资方所以如此疯狂在华扩张,是因中国有廉价的物资和劳动力。日商棉纺织厂在中国内地可以大量收购廉价和低税棉花原料,雇佣的中国工人工资只相当于日本国内工人工资的 40%,包身工、童工的工资更低,他们用获取的超额利润,以“滚雪球”方式连续建厂。从 1911 年建立第一家厂仅纱锭 1.8 万枚,到 1937 年扩大到拥有纱锭 46.96 万枚,织机 5299 台,纱线锭和织机数都超过区内民族棉纺织业。

二、沪西工人阶级的来源

沪西工人阶级的前身,主要来源是被外国资本侵略和本国地主阶级剥削而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主要是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省区,其中又以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如对纺织工人的调查,据《新青年》七卷六号“上海劳动状况”载,来自三种人:一是当地“乡民”。二是外县“乡民”,三是通、崇、海“客民”。上海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在以后的战斗中和农民结成亲密的城乡联盟和工农联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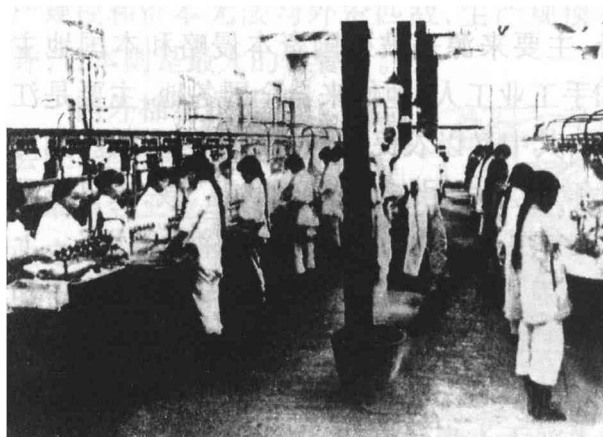
但是,由于旧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落后,上海工人阶级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弱点和缺陷。上海工人来源复杂,由于封建习俗的影响,这些工人以同乡关系结成各种地方帮会,会对工人运动产生一些影响。这种影响的积极一面,可以互通声气,联合斗争。消极的一面,各个帮派之间的利益不同,在工人斗争中会因利益的矛盾,使工人斗争力量产生抵牾。

沪西工人是上海工人阶级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但和全国工人一样,有着三个特点:“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同资产阶级比较)。因此,中国工人阶级要改造旧社会,就不能不与自身的弱点进行斗争,不断学习马列主义,不断提高觉悟,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三、20 世纪初沪西工人生活状况

上海是中国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沪西的小沙渡、曹家渡则是上海工人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其中又以纺织行业为主。由于外国雄厚资本开设的沪西工厂规模一般都很大,而中国民族资本为与外资竞争,不被其并吞,亦尽力扩大其规模。故而沪西工厂密集和工人高度集

中的特点,使他们富有组织性、纪律性,易于团结一致,形成强大的战斗力,这些客观的条件使沪西成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灌输的一片沃土。



缫丝女工在监工头监视下做工

早期的沪西工人阶级状况:

首先,工作时间特别长。工厂工人每天劳动时间大多是12小时,多的乃至16小时,工作两周才能休息一天,有的工人很少有休息的日子,全年工作日高达300至320天。许多纱厂

不许因吃饭而停车,“工人们只是在最饿时才吃饭,一边看着织布机或者守着纡车或纱锭时,一边吃一两口饭”。1916年3月30日上海《民国日报》载:“董家浜乡民周金富,有童养媳名全瑛,年14岁,向在戈登路第四纱厂做工,日前进厂做夜工,至次晨放工出厂,在附近宜昌路顾顺泰木作内略事休息,忽然倒地身死……该厂工作时间甚长,无论日夜工均以12小时为限,未免劳苦。”

第二,劳动环境恶劣,生命无保障。工人劳动条件极差。当时中外资本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不顾工人的死活,以最低的成本,榨取工人高额的剩余价值,故而工人经常是在车间空气污浊、劳动条件极差、事故频繁、疫病流行的环境中劳动。当时,有关工人在沪西工厂地狱般劳动的悲惨情景时有报道。如《劳动周报》报道,沪西的内外棉四厂女工杨阿娥,被机器轧死,厂方不仅抚恤金一文不给,还扣上“自不小心”帽子,把厂方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过了两星期,内外棉五厂清花间进厂未及3个月的女工张金兰又被轧死。那天是夜班,将要下班时,她被机车皮带卷进车内,半脸半臂及胸部被轧粉碎,顿时毙命。厂方只将尸体送验尸所掩埋了之。该女工家有80岁祖母,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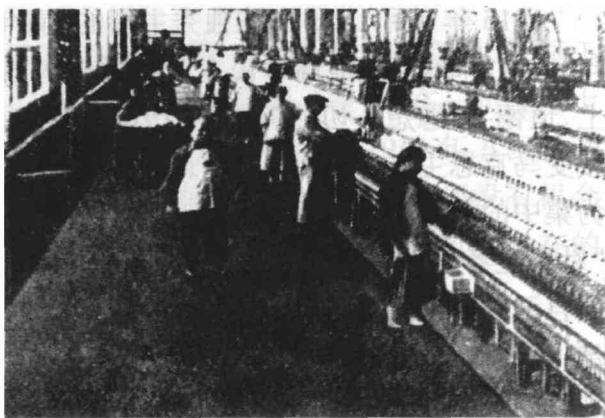
岁的母亲,从此生活失去了依靠,狠心的日本资本家同样不给一点抚恤金。

第三,工资低。工人拼死累活地为中外资本家干活,所得的工资却是非常微薄。纱厂男工每日工资0.18元至0.28元,女工0.07元至0.18元,童工就更低了。但外籍资本家却认为这工资太高了。而上海工人与同厂中做同样工作的外籍工人相比,工资只有外籍工人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1900年上海米价每市担为1.93元,到1910年,每市担4.14元。10年中上涨了1.4倍,而工人工资的收入却无法维持一家最低的生活。

第四,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在上海纱厂中流行着一种“存工”制度,即扣留初入工厂半月工资,以防止工人换厂,如果换厂,就没收工人半月工资。资本家还可任意减付工人工资。工厂还实行包工制,即包工头包揽工人的招雇、解雇及发放工资,工人工资经包工头从中克扣,自己所得无几,甚至包工头只给工人一日三餐,而无工资。这种包工制在外商纱厂普遍存在。

工人经济地位低下,政治上也没有任何权利和地位。无论是外资或民族资本经营的工厂,普遍都设有监工头,他们拿着木棒或鞭子,来回在厂内巡视,可以任意殴打工人。如内外棉五厂日人田路,因磅纱工陈某嫌工资少,要求略为增加,即打其耳光;内外棉七厂筒子间工人王小妹,因口生疮,欲请假,日人即拉住她的头发大打,并掷之于地;内外棉十二厂有一个工人要求请假回家,日人毫无道理将他捆绑痛打致伤,回家后卧病不起,不久死亡。

工人放工出厂被搜身更是比比皆是。



拿摩温(即工头)监督纺织女工和童工劳动

“工人放工的时候，一走到厂门，身上都要搜过……搜的法子，是在门口做起七弯八弯的栏杆来，工人出厂，要一个个从栏杆里出来，到出口的地方，就须站住听凭搜查，从头搜到脚，袋子里裤带上，都要摸得清清楚楚，才放你出来。”

中外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受到上海租界和中国反动当局保护。租界有工部局、巡捕房、会审公堂、监狱等一系列暴力统治机器，以对付敢于反抗的工人。封建统治者也把反抗视为犯罪。北洋军阀政府明令规定工人集会和罢工为非法。如1914年的《治安警察法》第一章中规定：“最高当局为维持社会秩序与安宁，……决定采用警察力量，制止一切工人之结合与行动。”此外，在《治安警察条例》和1912年颁布的《暂行新刑法》等反动法规中，还有许多禁止和镇压工人罢工的具体规定，如同盟罢工者，处30元至300元之罚金，乃至拘役和有期徒刑等等。

四、早期沪西工人的自发斗争

自1889年沪西大批地域被列为租界后，随着公共租界的扩展，出现许多工厂，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反抗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工人们不断自发地进行反抗斗争。

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他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提出要“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思想一切的黑暗”。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工人运动高度关注。陈独秀经常到工人最为集中的沪西小沙渡等地了解工人的罢工情况。他评价工人阶级是“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他希望工人赶快觉悟，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他认为世界劳动界的觉悟，可分两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改善待遇；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中国劳动者的觉悟还处于第一步，但要启发工人有第二步的觉悟。要把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话“倒转过来”说。

沪西工人为谋求自身待遇的改善，多次进行了自发的罢工斗争。

据统计,从1911年至1919年5月以前,上海工人共举行了百余次罢工,涉及面很广,既有近代工业各工厂,又有手工业系统的各行各业,还有服务、苦力等工人。在近代工业领域里,罢工最多、最激烈的是纺织、缫丝和五金机器、造船业。在这8年半的时间内,纺织工人罢工有15次之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15年的沪西小沙渡日商第五纱厂罢工。这次罢工属于自发的经济斗争性质。其内容是要求增加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反对克扣、减少和拖欠工资,反对开除工人,反抗中外资本家、封建势力的压迫和种种额外剥削。

早期工人的罢工斗争,在方法上比较简单和幼稚。往往罢工一哄而起,愤怒的工人把工厂和作坊的玻璃门窗捣毁,甚至打坏机器设备。罢工的发动者为使更多工人参加罢工,往往是一批罢工工人聚集在厂门口,阻挡一时还没有罢工的工人进厂上工。用这些办法来扩大罢工,往往引起工人内部的冲突,并容易招致租界巡捕房和中国警察局的镇压。辛亥革命后,上述斗争方式虽然继续使用,但随着斗争的发展,新的斗争方式也产生了,如比较多的采用散发传单的形式来团聚群众进行斗争。

上海工人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同时也受到资产阶级组织的各种工界团体活动的影响,因此也萌芽出现一些工会团体。在手工业工人的斗争中,则出现了一些秘密会社和行帮发动组织的罢工斗争。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以来,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工人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工人阶级也反复受到了锻炼,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觉悟,加强了组织,统一了步伐,这对于后来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的爱国大罢工起到很大的影响。但当时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机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从阶级觉悟和组织状况来看,尚处在自在的阶级这个阶段,有待于发展和提高。

第 二 章

沪西工人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

一、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

1915年9月以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集合在《新青年》杂志周围,提出了民主和科学口号,即“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的口号,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以所向披靡的战斗精神猛烈抨击中国的封建主义思想,从而使辛亥革命失败后死气沉沉的中国思想界发生巨大的震动,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新文化的启蒙运动,促使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盲从、蒙昧中解放出来。1917年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新型的革命,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之欢欣鼓舞。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分子,写了许多歌颂的文章,如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热情地宣传和歌颂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他指出,饱受帝国主义列强蹂躏的中国人民“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重,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

在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和科学思潮的启蒙下,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我国终于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1919年初,美英法等列强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分赃会



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

议。巴黎和会在列强的操纵下,竟然在通过的《凡尔赛和约》中,决定把战败国德国在我国山东的一切权利全部让给日本。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激起全国人民的莫大愤怒,成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和“还我青岛”等口号,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北洋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掀起了震撼海内外的五四爱国运动。

二、沪西工人率先声援北京学生

5月7日,上海各界2万余人集会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5月11日成立了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学联又单独组织中等以上学校2万余人举行罢课救国誓师典礼和平示威游行,并在上海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在学生的影响下,工人、店员等纷纷投入抵制日货的运动中。

反动的北洋政府当局强令要镇压学生运动。6月1日,北洋政府连下两道命令:一道命令“表彰”被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另一道命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更加激起学生的愤怒。他们从6月3日起重新走上街头演讲。北洋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当日有170多名学生被拘捕,第二天又有700多名学生被捕。但是,学生们并未屈服,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多达5000余人。

“六三”大逮捕的消息震动了上海各界人士。4日下午,各校学生和救国十人团成员纷纷上街演讲求援,并挨户动员商店罢市,甚至长跪求告店主关门停业,以救援被捕学生,罢斥卖国贼。在这样的形势下,商界于6月5日起开始罢市。

6月3日北洋政府对学生大肆逮捕,标志五四运动进入了新阶段。正当学生们顽强坚持斗争的时候,中国的无产阶级站了出来,以其强大的战斗力,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切望救國 告懸軍門二去高經下

一致進行云
▲設利機器廠 該廠工人以上海全埠商界罷市我
工界亦國民一份子故定於六月六日起全體罷工至
學生釋放日為止以盡國民之職
▲日商紗廠工人 昨日全體罷市之信流傳上午十
一時三十分曹家渡日人所設內外第三第四第五紗
廠男女工人五六千人亦全體罷工停作下午一時半
陸家嘴日華紗廠楊樹浦上海紗廠男女各工人亦相
繼停工罷作該三廠共有工人二萬餘人亦可見吾民
之愛國心熱矣
▲建幫威勸 昨日日本埠各商店因山東青島問題罷
市所有建幫威勸最為熱心鹹瓜街有某桂閣號等皆
有懸指血書白布懸掛門前英界鄭家木橋志成桂園
店懸白旗上血書舍身救國雖死榮也八字王宗瀚題

前省無公亦為萬被圖市一動已端界

1919年6月6日《申報》关于

内外棉三、四、五厂工人罢工的报道

首先揭开罢工序幕的是沪西日商纱厂。6月5日上午11时,沪西的日商纱厂全体工人罢工,他们高呼“不替仇人做工”的口号,一拥出厂,奔向街头。下午,浦东陆家嘴日华纱厂、杨树浦日商上海纱厂以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工人也继起罢工,第一天罢工工人数就达2万多人。以后几天,电车、电气、电话工人、码头工人、海员、铁路工人等约11万各业工人汇成政治大罢工的洪流,沪西是大罢工的洪流之一。6月8日,日商内外棉七、八、九厂工人加入大罢

工行列,走出工厂。内外棉五厂工人李凤池高呼:“我们罢工是为爱国,我们要坚持下去!”“要动员更多的工人罢工。”随即,工人们涌向日商严格控制而未能罢工的内外棉九厂,支援该厂工人罢工。他们冲破了巡捕的阻挠到达九厂门口,与前来镇压罢工的戈登路(今江宁路)巡捕房巡捕、中西探目、马队展开了激烈斗争,直到深夜。许多工人被打伤。九厂工人不顾日商厂主、拿摩温(即工头)的威吓,纷纷关车响应罢工。此时,沪西小沙渡内外棉各厂上万名工人在罢工时还举行了示威游行。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工人以石块击碎内外棉第三、四、五、六、七、八、九等厂窗玻璃,冲入厂内,“破坏机械

器具”，闯入办公室，“或打毁器具，或损坏电话机”；9日，罢工规模更加扩大。清晨，内外棉五、七、八厂和小沙渡、曹家渡一带纱厂工人1.5万余人参加示威游行，得到市民的广泛同情。此刻，连海员也加入大罢工行列，有12艘已经装好货物，办好海关手续的轮船仍停泊在码头上，开动不得；10日，沪西劳勃生路的美商奇异电灯厂女工70余人罢工。又袋角大有榨油厂工人约500人全体罢工。这天全市各业罢工工人达六七万。11日下午，各工界在东京路（昌化路）召开大会，1万余人参加。会议提出：①设共同机关，成立中华工界全体大会；②大家应严守秩序；③罢工后生计维持办法；④选举12名代表与各界接洽；⑤通电全国工界取得一致行动。大会选出代表12人。内外棉五厂工人李凤池为代表之一。上海参加罢工的队伍，还有外商上海电话公司约500名中国工人提出罢工期间，不替任何日本人接通电话。沪杭、沪宁两线铁路工人一齐罢工，至此，上海工厂不冒烟，机器停止转动，电话呼唤不应，海陆交通断绝，码头已无华工踪迹，成千上万的苦力走出了他们工作的工厂，上街抗议凡尔赛和会侵害中国主权，抗议白人侵害中国的权利。



五四运动期间的“六五”大罢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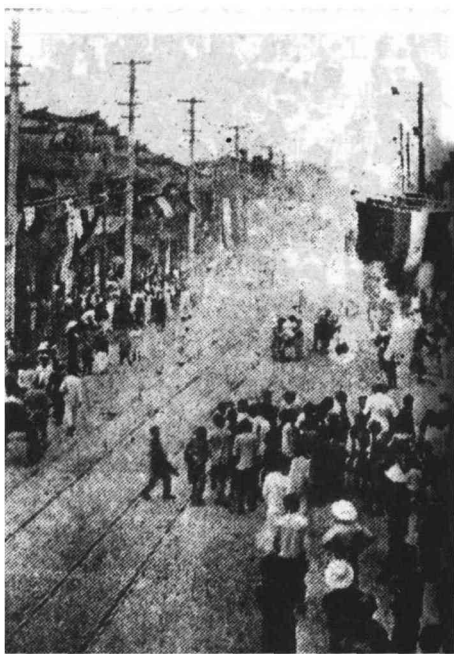
从6月5日至11日，约有11万上海各业工人汇成政治大罢工的洪流。据工运史专家姜沛南在《关于“六三”大罢工的几个问题》（“六五”罢工史称“六三”大罢工）论文中估算，参加“六三”大罢工的

纱厂、烟厂、船厂、铁厂、印刷厂工人及海员、铁路、电车、汽车等交通运输工人共计6.6万人,再加码头工人约2万人,另有参加罢工的漆业、水木业、理发业及清道夫等手工业工人约2.3万人,总计罢工人数达11万人(店员另计)。参加罢市的各业店主和店员,估计有7万多人。这次商人也参加了罢市,但是资产阶级中的不同层次,对罢市的态度是不相同的。中小商人出于爱国热情,罢市中表现较好,上层表现较差,罢市的第三天,大资本家就要求结束。

上海的“六五”大罢工震惊了北洋政府。上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会同沪海道尹沈宝昌联名于6月8日急电北洋政府,请罢去曹、章、陆之职,说是“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及,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爱国运动确如统治阶级所忧虑的那样迅猛向前发展。在上海的三罢斗争中,特别是“六五”大罢工的推动和影响下,天津、济南、武汉、长沙、南京、扬州、镇江、杭州、宁波、厦门、芜湖、安庆等地纷纷罢课、罢市和罢工。6月10日,天津总商会发给北洋政府的急电中说:“……查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迁延不决,演成事实,其危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

在上海三罢斗争和全国各地人民的抗争下,北洋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6月7日起,北京被捕学生陆续被释;10日,段祺瑞政府下令免除亲日派卖国贼曹、章、陆三人的职务。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胜利。

但是,军阀政府虽被迫释放学生,罢免3个卖国贼职务,但



上海市民庆祝“三罢”斗争胜利

山东青岛问题尚未解决,工人仍在继续斗争。6月13日,日本纱厂工人仍在罢工,沪西小沙渡、曹家渡一带纱厂9500余人签名,函知纱业公会竞智团等团体:为山东青岛尚未归还,坚持不为日人做工。17日,澳门路日商内外棉五厂约750人坚持罢工,麦根路(淮安路)内外棉九厂约20名工人拒绝进厂做工。18日,山东各界联合会派出代表80多人进京请愿;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群众继续开展坚决拒签和约的斗争;在巴黎的旅法华工、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数百人,于和约签字前一天的6月27日,包围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的住处,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和会的签字。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又一个胜利。

三、沪西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崭露头角的历史意义

五四爱国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尽管运动中还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斗争的目标是反对西方列强所强加的巴黎和约,所以它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这场群众运动遍及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在运动中,各地涌现出学生、教职员、工商界、妇女界等群众团体,并共同组成各界联合会。由于各界群众的联合行动,这场运动获得了胜利。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的先进分子。数十万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的前面,成为运动的先锋。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许多社团组织和进步青年密切联系,积极推动运动的发展,成为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

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虽然工人的罢工斗争是自发的,但工人阶级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在运动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沪西工人阶级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率先

第一编

五四运动与沪西早期工人运动

在上海上街示威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不仅是沪西光荣历史的开篇,也标志着沪西工人运动开始由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也标志着沪西工人运动开始了伟大的新时期。

第 二 编

建党和大革命时期

(1920 年 8 月 - 1927 年 7 月)

第 三 章

马克思主义在沪西的传播

一、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到沪西

五四时期是中国先进分子思想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有一批先进分子经过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与劳工为伍”的实践,相继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

陈独秀 1920 年初从北京回到上海,并把《新青年》编辑部也迁至上海,使其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在陈独秀周围,团聚了《新青年》、《觉悟》副刊、《星期评论》社的一些主要骨干,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

最早在上海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陈独秀。他深入到上海小沙渡和码头工人中间了解罢工情况,继而到中华工业协会等劳动团体去作调查。在调查活动中写下了不少称颂劳动者的文章,提出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还约请北大的进步学生和各地革命青年,深入工人开展调查,了解工人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新青年》第 7 卷第 6 号《劳动节纪念号》。1920 年 5 月 1 日,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上海各业 5000 多工人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此后,陈独秀又主持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启发工人的觉悟,组织真正的工会。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必然会产生无产阶级的政党。陈独秀在发动和组织工人,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积极开展建党工作,并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中发现建党的骨干。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陈公培等商议成立共产党事宜,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又称中共发起组,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先后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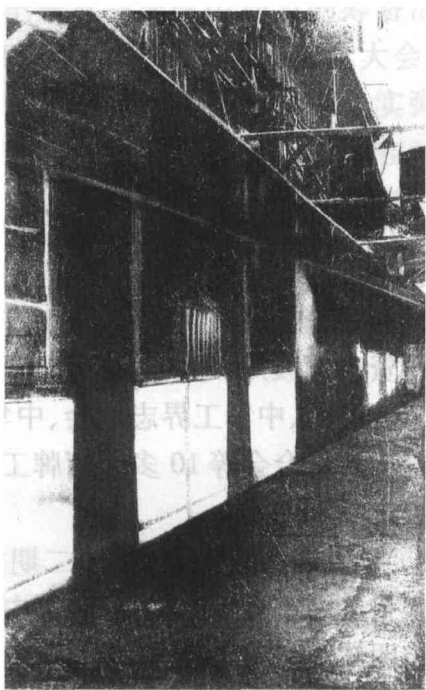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除了积极推动各地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外,还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展工人运动,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沪西小沙渡地区是上海有名的工业区。中共发起组成立前一年的6月,沪西曾爆发几万沪西日本纱厂工人参加的“六三”大罢工,显示了无产阶级的巨大威力。中共发起组深知,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真理带到沪西去,在改造旧世界斗争中可发挥工人的更大作用。

二、中共发起组在沪西创办工人半日学校

1920年10月,上海发起组成员李启汉奉陈独秀之命到纱厂集中的沪西小沙渡地区开办了一所工人半日学校,这是共产主义者在全国最早开办的一所工人学校。校址设在槟榔路锦绣里(今安远路62弄178、179、180号)。这是一幢两层楼房的房屋,有三间门面房子,原系日商内外棉九厂的工房。李启汉租下房子后,把房子分为教室和宿舍兼办公室,并备了一盏煤油灯和一台留声机,供学生学习之用。

工人半日学校是为沪西地区产业工人创办的文化补习学校,李启汉主持办学并兼任教学,外国语学社的学生陈为人、雷晋笙等为教员。他们从提高工人文化程度着手,进而开展马克思主义普及教育及宣传工作,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注意培养工人骨干,为成立工会组织打下了基础。最初,有近百人来学习,不久,学员逐渐减少。李启汉遇到挫折,没有气馁。他考虑工人劳动时间长、生活困苦,从实际出发,后来决定把“工人半日学校”暂时改为“上海工人游艺会”,通过开展文娱活动来吸引更多的工人。1920年12月19日,工人游艺会借白克路(今凤阳路)



沪西工人半日学校旧址
(新中国成立初拍摄)

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出席400多人。大会主席李启汉作主题报告,他说:我们工人“从前只是各人苦着、饿着;我们想要免去这些困苦,就要大家高高兴兴的联合起来,讨论办法”;对于“什么金钱万能,劳工无能,我们都要改革,打破!”杨明斋、邵力子、沈玄庐等都到会发表演讲,希望工人破除宿命论和迷信观念,努力学习,加强互助和团结,以集体力量抵御灾难的压迫。工人很喜欢游艺会的各项文娱活动,并接受了一些启蒙教育。

1921年春,半日学校重新开学,开了两个班级。李启汉等一面教工人识字,一面进行革命思想的启迪工作。孙良惠就是其中学生的代表之一,他在先进文化思想的熏染下,后来成为沪西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工人半日学校的进步活动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不久便被巡捕房封闭。

三、沪西纺织工会的诞生

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前后,在我国工人运动的阵地上,曾出现过形形色色的招牌工会。原来,在五四时期,一些政客、资本家已经觉察到工人阶级是一种新兴的政治力量,为了把工人控制在自己手中,他们纷纷组织“工会”。这些招牌工会声势很盛,主要由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客、工头等人物发起组织。他们组织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界志成会、中华工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电器工界联合会等 10 多个招牌工会,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进步工人组织。

陈独秀在《劳动界》第二期发表《真的工人团体》一文,就组织工人自己的工会发出了呼吁,文中指出:“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觉悟的工人啊!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正的工人团体啊!”



《新青年》月刊自第八卷第一号起,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

上海发起组加紧组织建立自己真正的工会组织。1920 年 10 月 3 日,正式筹备上海机器工会,11 月 21 日,借白克路(今凤阳路 207 号)上海公学举行成立大会,出席者达千余人。孙中山、陈独秀、杨明斋等到会祝贺。孙中山演讲说:“我人欲贯彻民生主义,非在官僚手中夺回民权不可,否则我国徒拥一专制变相之民主国号。”陈独秀演说中称:“工人团体,须完全由工人组织,万勿容资本家侧身其间,不然仅资本家式的假工会而已。”1921 年春,在李启汉帮助下,沪西纺织工会也建立起来,大家推选沪西工人孙良惠为负责人。沪西纺织工会成立后,孙良

惠积极组织参加由李启汉任主席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筹备活动。筹备会决定于是年5月1日在西门公共体育场召开纪念大会。但是,这天军阀当局在公共体育场及交通要道密布了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五一纪念大会无法进行,于是临时改变活动地点,分别在沪东的杨树浦和沪西的叉袋角进行。这天下午,由李启汉和孙良惠带领几千名沪西工人,沿着西苏州河路至宜昌路,然后过苏州河,一面散发传单,一面示威游行。沪西纺织工会的成立标志着沪西工人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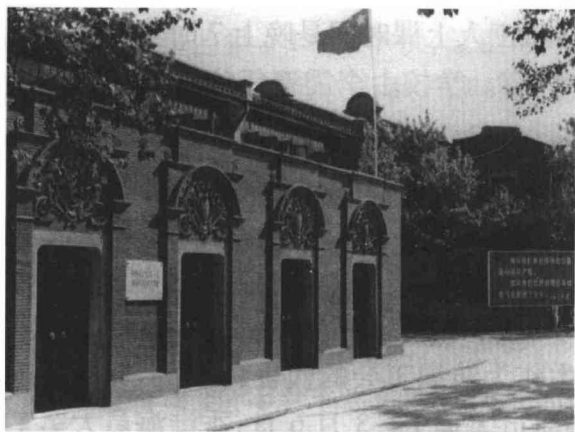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沪西的活动

一、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

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在 19 世纪末,中国的知识分子就知道了马克思的名字,将马克思学说作为西方的一个学派加以介绍,但仅仅在部分知识分子中流传,那时始终没有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指导理论。而工人阶级自诞生以来的一段时间里,只是自发地进行斗争。到了五四以后,由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出现,通过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桥梁,才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才成立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中国共产党,以领导中国革命。刘少奇说:“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

1920 年夏到 1921 年上半年,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作好了准备。为了创建中国共产党,各地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加强进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工作。1921 年 7 月 23 日,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 13 名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指定的包惠僧。他们代表着 50 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大会。时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和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均因事务繁忙,未能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上海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

出席会议。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才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才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中共一大召开前，曾经直接到沪西从事工人运动的陈独秀、包惠僧、李启

汉、杨明斋等早期共产主义者，他们不仅在沪西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进行了伟大的革命实践，还培养和锻炼了许多沪西的革命领袖和骨干。自此，工人阶级有了自己坚强的战斗司令部，沪西工人的革命运动也开始进入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沪西开展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尽快健全中央的组织机构，加强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和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8月11日，按照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的纲领精神，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下简称书记部），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书记部的主任为张特立（即张国焘），干事李启汉、李震瀛等。办事机构设在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路899号）。书记部建立后，随即创办了《劳动周刊》，作为推动上海工人运动的机关刊物。李启汉曾在沪西小沙渡办过工人半日学校，书记部成立后，便将小沙渡列为重点开展工人运动的地区，以原工人半日学校的经验，在小沙渡开办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报名学员200多人，其中，女生20余人。经常到校上课的约有30余人。上课分为两班。夜班工人

上课的时间是7时至9时,日班工人上课时间是晚上7时至9时。教学有政治常识和工会组织等内容。学校由李震瀛任校长,李启汉、李震瀛等同志轮流去学校授课。

1922年1月12日爆发了香港海员大罢工,揭开了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帷幕,上海立即响应。1月27日,上海各工团在书记部组织下,立即发动印刷工会、机器工会、纺织工会、中华工界协进会、中华工会等工团,联络了均安水手公所、焱盈社等海员团体,成立了香港海员后援会。孙良惠、韩荫生作为纺织工会的代表,出席了筹备和组织活动,积极募捐,声援香港海员大罢工。3月6日,香港海员大罢工胜利,鼓舞和推动了上海罢工运动的蓬勃发展。4月17日,浦东纺织工会发动了日华纱厂一、二两厂全体3800余工人的罢工,工会散发宣言和传单,计散发的宣言2万份,600张。在斗争中有4名工人被巡捕房拘捕,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组织了浦东纺织工人后援会,总共联合了30多个团体,特别在杨树浦和小沙渡纺织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两处共有纺织工人10余万),向纺织工人发了3000多张传单,号召他们组织工会支援浦东纺织工人。沪西工人纷纷响应,以捐款的实际行动声援浦东工人的斗争。最后,日本资本家不得不在三区警察署的调停下,同意工人复工的条件,达成协议。6月5日,工人在高呼“工人万岁”的口号声中全部复工。

李启汉在沪西领导工人运动,被租界当局列为重点侦查对象。在工部局警务处的情报档案里,记载着李启汉在沪西活动的许多线索。1921年4月21日、30日、5月2日,记载着五一劳动节庆祝筹备会主要发起人李启汉等活动内容,如他与跟随者约20人“从山东路工商友谊会出发……彼等首先搭电车至麦根路,大部分在该处分手,其中8人则沿西苏州河路步行至宜昌路,然后过苏州河进入闸北,在途中曾散发传单若干”。1922年6月1日,租界工部局以唆使中华邮局信差罢工,并在《劳动周报》上“登载激烈文告,扰乱治安”的罪名,将李启汉逮捕,书记部也被封闭。7月12日,工人补习学校亦被迫解散。书记部不得不迁往北京,上海改设为分部。是年8月,李启汉坐了3个月的监狱,期满后,被逐出租界,实际上引渡给军阀的官厅,关

进了龙华军事监狱。1924年秋,江浙战争爆发,军阀忙于内战,李启汉才于10月13日被营救出狱。李启汉出狱后,转往广州,投入新的战斗,直至1927年4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四一二政变中,惨遭杀害,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三、青年团上海地委在沪西发展团组织

1920年8月,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的同时,该小组派出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发起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5月,俞秀松、张秋人等代表上海青年团出席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选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大会后,上海正式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团上海地委),其职权和管辖范围为负责管理市区内团的组织和团的工作。团上海地委书记由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兼任,1923年3月改由张秋人任书记。



沪西最早的社会主义
青年团支部书记——
嵇直

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后,关注着沪西地区的工人运动,并在张秋人的主持下,将团员嵇直派入沪西开展团的工作。嵇直,江苏镇江人,1922年1月底,进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读书,在张秋人和施存统的介绍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又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原东南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把学校办成市俚式的学店,遭到师生的抗议,学生自治会秘密组织十人团,赶走校长,公推于右任接任校长,改校名为上海大学,李大钊推荐邓中夏任教务长。

自此,上海大学开始成为革命的摇篮。1922年秋的一天,张秋人找嵇直谈话,指出:“这次东南师范专科学校的问题解决得很好,真正成了进步青年自己的学校。党有了培养自己干部的基地。但是,中国革命的最后成功,必须把工人发动起来,所以,在搞好学生运动的同时,更要注意把工作转移工人当中去。沪东地区准备派蔡之华、吴先清

她们去,组织现在决定调你到沪西地区去,那里纱厂很多,工人受压迫严重,你要想办法深入工厂,直接和工人接触。”嵇直接受组织的安排,先进入在沪西的南方大学读书。为便于在沪西开展工作,他在劳勃生路上的一家安徽人开的木行楼上租了一处住所,这样就能经常到工人区活动。

嵇直到沪西时,李启汉已经被捕,沪西的工人补习学校也已停办,他只能以南方大学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他每天到附近的工厂转悠,寻找机会。他在戈登路(现江宁路)和劳勃生路(今长寿路)的十字路口上看到有一个露天邮筒。他机灵一动,便在这里设了个代写书信摊子,借机会与工人广泛接触。他考虑工人不识字的实际困难,便办了一个简易的工人识字班。由于参加读书的人越来越多,他请示了张秋人,在征得同意后,又办了一个补习班,并且商定,住在劳勃生路以北和宜昌路的工人,到徐玮那里上课;在劳勃生路以南及槟榔路(今安远路)、海防路的到嵇直这儿上课。徐玮原是嵇直在东吴大学的同学,这时与嵇直并肩在沪西从事工人运动。

青年工人孙良惠原是沪西纺织工会负责人,不久被日商开除,只能到一家银行当门警。有一天,他穿门警制服到补习班打听李启汉下落说:“以前李启汉在识字班给我们上课,后来不知为什么突然调走了。前两天我听说这里也办了补习班,所以我来看看,顺便打听一下他的下落。”嵇直答道,李启汉已经被巡捕房抓走了,我们正在想办法营救。这个青年说,“我叫孙良惠,原是同兴纱厂工人,现在临时在一家银行当门卫。”自此,经常到补习学校上课。嵇直经过一段时间对孙良惠和徐玮的考察,认为这两位觉悟高,可以发展入团,便向张秋人作了汇报。经组织的严格考核,于1923年1月,在劳勃生路嵇直的住所,张秋人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意嵇直的介绍,正式批准接纳孙良惠和徐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CY)。张秋人又接着说,根据团的章程规定,凡是有成员3人以上的均应成立支部,目前上海已经有了3个团支部,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在沪西地区成立上海CY的第四支部。支部由嵇直、徐玮、孙良惠3位同志组成,书记由你们选举决定。随即大家选举嵇直为书记,张秋人当即宣布批准。

徐玮和孙良惠加入 CY 后,革命积极性进一步提高,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他们在沪西和中国革命的沃土上,演出了悲壮的革命一页。

四、中共中央指派工运领袖到沪西

1923 年 10 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下,孙中山排除重重障碍,积极推进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自此,大多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根据党中央的精神,加入了国民党。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国民革命的影响很快从中国的南部扩大到中部和北部,从国共两党扩大到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和中小商人。这时,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从全国四面八方汇集起来,形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1924 年 5 月 14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就国共合作以来的形势与任务作了分析。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向大会提交《上海地方报告》,就加强上海的工人运动向中央请求说:“上海是最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地方,而工人群众又是这样庞大复杂。我们希望中央能在别处多调几个有经验的同志来,或者特别训练一般同志出来做这上海工人运动,这是我们上海地方急切的要求。”最后,中央通过了《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等文件,文中指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任务之一”;“劳动运动尤其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解散”;“纺织业工人的组织不能再缓了。这是数量最多的一种产业工人,尤其集中在上海,我们的党在纺织工人里曾经进行组织失败了。”中央还就党的发展工作存在着的关门主义问题作了激烈的讨论,决定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在工人中组织工会和俱乐部。不久,中共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李立三、项英等同志在中央的指派下,相继到

沪西开展工人运动。中共上海地委在这次会议后,也加快了党的组织建设的步伐,注意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

五、创办沪西工人补习学校

沪西团支部在1923年初建立不久,嵇直便在支部会上提出,我们在工人识字班里联系的工人愈来愈多,但规模不大,如何发动更多的工人来学习,以引起大家的关注。有一天,同兴纱厂发生“红头阿三”(印度巡捕)侮辱中国女工的事件。几个工人进行报复,痛打侮辱女工的印度巡捕,大家拍手称快。但是,很快有两名参与殴打巡捕的工人被捕,嵇直、徐玮等同志组织厂外声援、发动罢工,均告失败,而且被害女工也被开除。事后,大家认为,加强对工人组织的领导,团结战斗,已刻不容缓。嵇直代表团支部向团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指出,同兴纱厂的罢工斗争虽有个别补习班的工人参加,但没有自己的组织,影响力也有限。所以要扩大补习班规模,使更多的工人参加读书,这样,一旦发生事件时,就有一支整体力量的支持。提议可否合并两个工人补习班,成立一个大型的工人补习学校。不久,青年团上海地委委员长张秋人先后带着任弼时和邓中夏到沪西两个补习班调查,对团支部的工作作了肯定。此后不久,张秋人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根据出现的国共合作新形势,同意尽快实施扩大补习班的计划,在沪西地区成立规模较大的补习学校,以摸索经验,做出示范。

根据中央的指示,团支部决定由孙良惠出面在附近地区找新的校址。有一天,孙良惠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槟榔路(今安远路)拐角上,看到新建的一片平房,尚有一些空房,提议就在那里租房。嵇直和徐玮去现场察看,非常满意。他们一致认为,在平房活动,对周围环境影响小,有利于住在附近的工人活动,也便于和工人联系,当即就租下一套三间新的平房。

房子租下后,他们把其中的两间做教室,并各自设法借来或添置了黑板、课桌、课椅。另一间做办公室兼文娱活动室,还放了一张床,作为值班人员的休息之地。门前有一片空地,用篱笆圈起来,作为练

武健身的场地。当时,社会上普遍提倡推行平民学校,他们商量决定,不如利用这个机会,干脆名正言顺地挂牌。徐玮还没有等筹备工作做好,就在一张大纸上写了“小沙渡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几个大字,贴在一块木板上,等到举行开学仪式的那天,钉在左门框上,一个工人带来一串鞭炮,噼里啪啦一放,引来许多群众观看。

沪西工人补习学校成立后,分成日夜两班,具体由嵇直和徐玮负责管理兼上课,教学由上海大学的一些同学担任,孙良惠在工余时,也常来帮助做辅导工作。开学时,学生很多,后来稳定在40余人。学生课余时,除了能在小院子活动外,还能留在教室里聊天、下棋、游艺和武术,有的则和老师讨论时政问题。后来,孙良惠又回到同心纱厂和内外棉四厂等工厂串联,每个厂都发动了三四人,组成活动小组。此后又有几家工厂陆续成立了小组,顾正红、戴器吉等工人都是这时加入的活动积极分子。

沪西有了工人活动基地,一些工厂的活动积极分子经常到补习学校活动,协助学校做具体工作,他们经常参加团支部组织的散发传单和集会活动。为了适应学校出现的新形势,学校组织了一个新剧团,排练一些由嵇直和徐玮自编的双簧、小曲及文明戏。由于这些文娱活动都是反映工人生活和受到资本家和日本人压迫的内容,且又是工人自己演出的节目,感情投入,贴近生活,观众也是工人自己,很受大家的欢迎,渐渐地吸引了更多的工人观众。从此补习学校真正成了工人之家,并且发展成为当时上海地区最大的一所工人学校,发挥了党团组织在沪西领导工人进行斗争的一个“前沿指挥部”作用,在沪西工人中的声望也愈来愈高。

第五章

革命摇篮沪西工友俱乐部

一、筹建沪西工友俱乐部

1924年5月,中央扩大会议后,邓中夏、张秋人、恽代英、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多次到沪西工人补习学校指导工作和实地调查。是年夏天,张秋人相约嵇直到中央机关,见到由中央委派到沪西小沙渡指导工作的领导人项德隆,他就是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项英。项德隆热情地对嵇直说:“我一到上海就听说沪西工人夜校办得很好,张秋人已经向中央报告了你们办补习学校的经验。中央认为,根据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和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经验,只有把工人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团结起来,才能发挥阶级力量。因此在上海各区也应当建立工人俱乐部。在沪西,差不多有五万多工人,为了把他们进一步团结和发动起来,尽早在沪西建立工人运动基地是必要的。现在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尽早成立工友俱乐部,一天都不要拖延,以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项德隆要求嵇直参考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的章程先拟订一个章程,然后报中央。

嵇直根据党的指示,立即动手拟订了一个《沪西工友俱乐部章程》。章程由总纲、部员、组织、会议、规约、部务、经费以及附则等8章组成。在“总纲”上写明“本部由沪西工人组织之”,“本部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为宗旨”。在写“组织”一章时,



沪西工友俱乐部旧址(今安远路西
康路拐角处,新中国成立初摄)

他根据在工人生活中的体会特别强调“每厂有部员3人至10人者,即组织某厂基本小组,公推组长1人;有1小组以上者,即组织某厂支部”。“部务”计8种:“补习学校”、“讲演会”、“合作社”、“书报室”、“各种游艺会”、“储蓄会”、“部员救济会”以及“职业介绍所”等。还规定了部员的权利和义务,等等。沪西工友俱乐部的领导核心是执行委员会,它设委员长1人,其他会计、庶务、教育、交际及

游艺委员8人,秘书委员1人。俱乐部草章设有“经费”一项,考虑到工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会费是根据工资额计算的。例如,每月收入10元以内的,只交铜元10枚,15元以内小洋1毛,20元以内小洋2毛。草章也规定了由部员及外界捐助“特别捐”的制度和用途。这些条款注意俱乐部的组织和纪律,又考虑了斗争策略,为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过了几天,项英亲自到小沙渡实地考察,对沪西地区工作很满意,认为条件已成熟,不应等待。嵇直即将草章交给项英,请中央审查。为了筹备成立大会,嵇直和徐玮、孙良惠等人立即行动起来,在补习学校的工人中间仔细介绍建立俱乐部的好处,号召大家参加和支持工人自己的组织。又到工厂附近的工人居住区演讲,宣传工友俱乐部的基本宗旨,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

1924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沪西工友俱乐部举行成立大会。总共有30人左右参加。成立大会由孙良惠主持。他宣布开会后,首先由项英讲演,对俱乐部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接着说明成立工友俱乐部的目的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沪西工友俱乐部是“由沪西工人组织之”,是沪西工人兄弟自己的组织,欢迎大家参加,希望到会的人回去后动员更多的人参加,并希望通过俱

乐部能团结更多的工人群众,为争取工人权益做好工作。最后,他介绍了湖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情况,用事实说明成立工友俱乐部的重要性。项英报告后,是自由发言,有的提希望,有的提建议,都表示良好的祝愿和想法。嵇直做大会纪录,及时归纳总结,希望大家把俱乐部当成自己的家,共同支持,使它不断发展壮大。接着,嵇直把事先准备好的俱乐部草章逐条宣读、解释,经大家讨论和归纳修改



沪西工友俱乐部草章

后,大家一致举手通过。章程通过后,即照章公举工人孙良惠为俱乐部主任,即草章中的委员长。嵇直为秘书,徐玮、刘贯之、李瑞清为干事,其中刘贯之为失业工人。成立会快结束的时候,进行了募捐活动。嵇直脱下自己的帽子,倒放在桌上说:“今天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了,这是为工人办事的工人自己的组织。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随意捐助,但是失业工人可以免除,各位捐一毛不算少,捐一块钱不嫌多。”嵇直捐了一块大洋,项英捐了两块,到会的人便三毛五角地把钱投入帽子里,表示对俱乐部的支持。会后,项英用红纸将俱乐部的十六字宗旨“联络感情,交流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写成两个条幅,贴在墙上。事后,嵇直征得项英的同意,将俱乐部成立的情况写了一篇详细的通讯,发表在《民国日报》的“觉悟”专栏上,以期对其他各处的工友起到示范作用。

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建立和活动,影响越来越大。中共上海地委在《关于四月以来的工作报告》中,就沪西工友俱乐部作了总结:“关于工人运动,沪西方面,本有项英、良惠在彼处负责,后来又有兆秋去

共同办理。已组成一个俱乐部,人数达到 300 余人。其中纱厂工人 292 名,玻璃厂工人 11 名;白礼氏烛厂 7 名;油厂 3 名;牛皮厂 1 名;邮差 1 名;制麻厂 1 名;毛巾厂 1 名;失业者 8 名;有 3 个支部,30 个小组。俱乐部部员中有 5 名工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个小组,为该处活动的中心。”

二、沪西工友俱乐部的革命活动

沪西工友俱乐部创办后,不久便成为中国共产党从事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活动基地。

俱乐部内设有识字班、文化补习班、演讲会。工人来活动的络绎不绝,其中,要求参加识字班的工人为最多。到俱乐部上课的除了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外,主要是上海大学师生。

上海大学是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由国共两党共同举办,以共产党人为主持的大学。1924 年春,全校学生已达 400 多人,原在闸北的校舍不敷应用,乃迁至公共租界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南路口东首)新校舍,并把校本部对面时应里、甄库里、敦裕里等各处作



上海大学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旧址

为中学部与部分教室及宿舍。上大校长是于右任,因为于本人常在西北从事政治活动,不常到校,学校工作全由共产党人、教务长邓中夏主持。办得最有特色的是与现实社会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会学系。系主任先后是瞿秋白、施存统,教员有蔡和森、恽代英、安体诚、张太雷、萧朴生、萧楚女、董亦湘、韩觉民、李汉俊、周建人、李季等。来上课讲演的还有沈雁冰、陈望道、杨贤江、李大钊、郭沫若、沈泽民、杨杏佛、马君武、胡适等社会名流。邓中夏写的《中国劳工问题》也列入上大的教材,并亲自给同学讲课。1924 年 1 月,上海党员有 50 人,其中

上大占18人。同年10月,上海有团员130人,上大有90人。社会学系集中了许多共产党的教育家、理论家,社会学系又是党团员最为集中的地方,参加革命活动最为活跃,成为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堡垒。

上大学生在开展社会活动中,卓有成效的是开拓平民教育事业。1924年春,在教务长邓中夏的倡导下,开办上海平民学校。中共中央开拓平民学校的目的在于提高工人的文化与政治觉悟,进行革命宣传,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在工人中发展党团员。他们除了在上大办平民学校外,邓中夏还动员与组织上大学生到沪西小沙渡、沪东杨树浦工人最为集中区域开展工人运动。沪西工友俱乐部与上大都在沪西,两地相距很近,所以,有很多的上大学生到沪西工友俱乐部给工人上课,并直接参加了沪西的工人运动,刘华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刘华原系中华书局学徒工,1923年8月13日进入上大中学部半工半读。他求学心切,经常到大学部旁听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同志讲授的马列主义课,同时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因而被推选为上海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不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上大平民学校执行委员。同年11月22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夏,在邓中夏的带领下,刘华到沪西小沙渡给工人上课,协助项英开展工人运动。是年年底,沪西工友俱乐部秘书嵇直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学习,刘华接替嵇直的工作,全心投入俱乐部的战斗。

刘华教课文、讲故事、教唱歌,处处贯穿了阶级教育,联系工人实际生活,收到很大效果。比如,自编的歌曲有:

青工身体未长成,工资一二角,做工十二点;

做夜工、礼拜工,一刻不休停;

白相都没有,读书没铜钱,打骂又罚工,开除随他便,集会、结社、言论、罢工,一概不自由!

兄弟姐妹们,睁眼望望清:

帝国主义资本家,不做工来专门剥削人,拿我们当牛马,做活儿养他们。

青年工友们,我们要翻身,齐心协力,打倒他们,工厂归工人!

沪西工友俱乐部里的工人在学习了革命道理之后,打破了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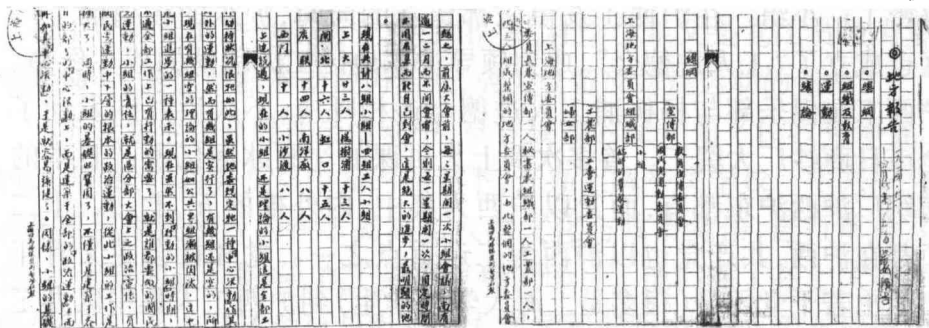
中的帮派观念,逐步加强了工人之间的团结和联系,在各工厂建立了秘密工厂小组。在沪西工友俱乐部建立的同时,沪东的杨树浦工厂区也成立了“工人进德会”,成为领导沪东地区工人运动的战斗堡垒。沪西工友俱乐部与杨树浦工人进德会遥相呼应,不久后共同发动了全市日商纱厂大罢工。曾多次到上大讲课的沈雁冰回忆说:“日本的纺织厂沪西沪东都有,而又以沪西为集中,内外棉的五、七、八、十二厂都在沪西,共产党也以沪西为工运重点之一。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出若干党团员(很多是上海大学的学生)到沪西工人集中区办工人补习班,与工人建立了感情;然后又扩大为工人补习学校;到1924年夏在补习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党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一些同志常去俱乐部讲演,邓中夏就是去得最多的一个。沪西工友俱乐部逐渐成为沪西工人运动的一个中心。”

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引起了租界当局的不安,对俱乐部进行种种威胁和破坏。1925年初,党组织为了更好地在小沙渡地区组织工人开展革命活动,决定将俱乐部迁至苏州河北岸的华界——潭子湾三德里,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的基地。

三、沪西地区最早的党组织

沪西地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阵地之一,他们积极在沪西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了工人的觉悟。俱乐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沪西工人运动的一个活动中心。俱乐部由于活动形式多样活泼,很受工人欢迎,革命的火种在这里得到传播。据1924年的统计,在“短短的3个多月时间内,有19个纱厂建立了俱乐部的秘密组织,俱乐部会员近千人”。党组织在发动、教育、组织工人的同时,注意从俱乐部会员中挑选一批骨干加以培养。俱乐部分批分组地集合骨干分子谈话、开会,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工人觉悟。同兴纱厂工人郭尘侠、李振西、韩阿四,内外棉三厂的陶静轩、孔燕南(女),内外棉五厂王有福,内外棉七厂顾正红等,他们都在俱乐部受

到革命思想的教育,后来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坚分子。



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关于建立小沙渡小组报告

沪西工友俱乐部诞生不久,中共上海地委加强在沪西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时有中共小沙渡小组8名党员,其中5名为工人党员(成员和组长名录逸失)。到了1925年初,沪西地区党组织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共上海地委根据党的四大通过的党章中的“三个党员以上可成立支部”的规定,对所辖的下级党组织在原来小组的基础上组建支部,是年的1月成立中共沪西支部。负责人为孙良惠,成员有:孙良惠、黄原昆、陶静轩、夏福生、李瑞清、马彦波、王定玉、邓中夏、蔡支华、胡先清、刘剑华、江源清、顾修、余小峰、刘月柱、徐晋珊、孔燕南(女)、郭尘侠、王瑞安、关明轩、松年、文巧云(女)、刘贯之、朱国平、李金生、姜维新、郭干贞、李剑如、曹正甫、孙杰三、郑永寿、李天涯等32人。上海的共产党组织正是从沪西工友俱乐部里培育了星星之火,不久便燃起中国革命的烈火。

四、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沪西工人运动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同年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提出共产党要努力站在国民党的中心地位,要在国民党内建立共产党的党团组织,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政治上需要接受本党的指挥,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要在即将成为统一战线组织的国民党内

发挥领导作用的思想。这次全会还提出,凡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要全部加入进去,凡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由共产党员帮助建立国民党组织。沪西地区的党组织坚决执行了这一方针。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决定以主要精力放在国民党的工作上。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决定,党组织积极推动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建立和发展国民党组织。据1924年的中共上海地委《关于四月以来的工作报告》,其中有沪西国共合作活动情况的报告,文中总结说:“沪西有一个国民党区分部,只有五六个工人,且停顿很久,现在拟将新加入共产党的工人介绍加入国民党,重新整顿区分部。”沪西工人党员孙良惠成为沪西地区积极参加上海国共两党合作活动的杰出工人代表。

1924年3月正式成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为胡汉民、叶楚傖、汪精卫。下设秘书文书科、会计庶务科、组织部、宣传部、工人农民部、青年妇女部、调查部。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恽代英、向警予、罗章龙、施存统、邓中夏等在执行部任职工作。不久,孙良惠作为沪西共产党员和工人代表的身份也参加国民党执行部的工作。同时到执行部工作的还有李立三、杨之华、张佐臣、刘重民等共产党人。在执行部中,除调查部外,实际负责各部工作的都是共产党人。

上海工人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但可以国民党的名义公开募款、宣传、慰问、集会,以支援工人运动。是年5月,执行部的工农部在组织工人参加“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声援工人罢工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为援助被压迫工人,贯彻扶助农工的政策,1925年的5月25日,工农部组织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有李成(李立三)、杨之华、张廷灏、张佐臣、孙良惠、郑复他、刘重民等共产党员15人。年末,孙良惠、恽代英、向警予、宣中华、俞秀松等共产党人和许多国民党人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运动。12月14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俞秀松等人起草的成立宣言,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保障人民民主自由权利,孙良惠等21人被选为促成会委员。

1925年,上海有9个国民党区党部,其中沪西有第四(小沙渡)区党部和第八(曹家渡和真如地区)区党部。第四区党部负责人为张超(中共党员),下设20多个区分部,除大夏大学、群治大学、沪西商联会等区分部外,多数为工厂区分部。第八区党部常务委员为曾培洪(中共党员),此后的常务委员为暨南大学学生林仲川,下设暨南大学、绢丝厂、达丰、振泰棉纺厂等8个区分部。国共合作时期进行了大量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教育,为五卅运动的兴起做了很好的思想准备。沪西工运领导人孙良惠、张佐臣在贯彻孙中山的扶助农工的政策和组织工人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也是孙中山晚年推进中国革命的一大历史功绩。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经过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国民革命的影响很快从中国的南部扩大到中部和北部,从国共两党扩大到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和中小商人。这时,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从全国四面八方汇集起来,形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但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内部已在发生分化,左右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明显,国民党右派正在全力排挤和打击共产党与左派力量。1924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执委会扩大会议时指出:“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会议改变了党的三大上要求产业工人全部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加强在产业工人中间发展中共的党团组织。1925年开始,国民党右派相继公开反对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纲领,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在孙中山病危期间,国民党右派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孙中山逝世后,他们于11月又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另立中央,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西山会议派”。1925年年底,上海执行部工作结束,停止了活动。



1924年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孙中山寓所(今中山故居)举行庆祝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活动。后排左二为毛泽东,左五为孙良惠,前排左一为邓中夏。

人拘禁3星期,余5人被训斥。日本资本家的蛮横,激起了工人们的义愤。一些积极分子纷纷要求沪西工友俱乐部为工人撑腰,发动日厂工人“大摇班”(即大罢工)。

沪西工友俱乐部获悉后,向中共上海地委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地委对内外棉八厂的事件非常重视,迅速派邓中夏、李立三、郭伯和、杨之华等人到沪西工友俱乐部了解情况,商量对策。中央迅即成立罢工委员会,指定邓中夏、李立三等负责,号召上海的全体党员起来支援日商纱厂工人的斗争。党组织通过沪西工友俱乐部,对斗争作了具体部署:一面劝告工人暂时忍耐几天,领了两周一次的工资再动手;一面派骨干联络各工厂小组的兄弟,加紧准备同盟罢工。



内外棉厂工人罢工宣言

这时的俱乐部已经从租界区搬到浜北潭子湾,与内外棉五、七、八、十二厂隔河相望。俱乐部设在几间破旧的矮平房里,由孙良惠、刘华等出面,日夜召开各厂活动分子会议。经多次酝酿,最后决定在2月8日、9日各厂工人领工资后,立即罢工。根据群众的愿望和党的指示,俱乐部代表内外棉工人向日本厂主提出六项条件,并印成传单在各厂散发,号召

工人罢工,争取所提条件的实现。

俱乐部署名散发的一份传单写道:

“我们在东洋人厂里做工,真是交关苦呀!……东洋人吃了我们的血,还要剥我们的皮,真是岂有此理!工友们,东洋人真是逼得我们没有路走了。只有大家齐心,一致罢工,反对东洋人的虐待,要求厂里承认我们的条件:

①以后不准打人;

- ②按照每人原有工钱加给 1/10,并不得无故克扣;
- ③恢复第八厂被开除之工友,并立即释放被拘押之工友;
- ④以后两星期发工资一次,不得延误;
- ⑤罢工期内的工钱,厂里须照常发给;
- ⑥以后不得无故开除工人。

工友们,大家齐心呀,一定要厂里承认我们的条件,我们才有生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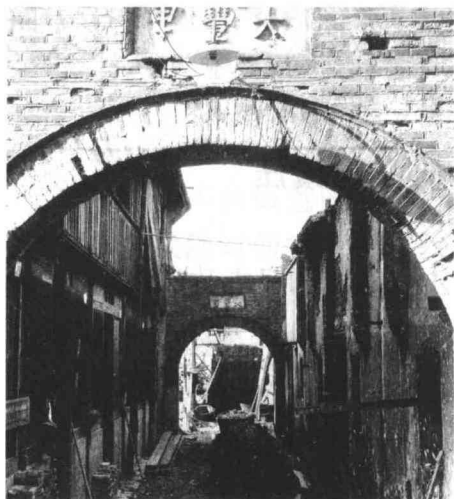
工友们,大家齐心呀,一致罢工,坚持到底,反对东洋人的虐待,达到最后胜利。”

内外棉厂主对工人的条件置之不理,并布置包探,继续拘捕工人活动分子。群众愈愤,在俱乐部发动下,2月9日下午,内外棉东西五厂和七、八、十二厂日班工人全体罢工,蜂拥而出,到苏州河对面的荒地上集合,开群众大会,各厂夜班工人闻讯也随同前往参加,到会者约万余人。会场土台上竖起一杆触目惊心的白布大旗:“反对东洋人打人!”站在大旗旁的刘华、李立三、邓中夏、杨之华等相继发表激昂的演说,鼓动工人齐心奋斗。群众情绪异常振奋,男工们纷纷把厂里发的小舌帽掷在地上,用双脚踏踏,恨恨地说:“我们中国人不戴东洋帽了!”女工们也激动地跟着演讲者高呼口号:“大家一条心,反对东洋人!”“大家一条心,反对资本家!”……在群情激昂中,当场成立了内外棉纱厂工会,并组织男女纠察队,在交通要道布置岗哨,维持罢工秩序,进一步发动其他各式工厂参加同盟罢工。

二、沪西和沪东联动举行二月大罢工

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的领导下,罢工浪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10日,内外棉九、十三、十四厂工人加入罢工;11、12日,罢工扩大到内外棉三、四、十五厂。这样,内外棉在沪西的11家工厂1.7万多工人,包括日本厂主认为最保险的养成工在内,全部卷进了罢工热潮。14日,罢工越出内外棉厂范围,沪西日华三、四厂和东亚麻袋厂等共5000余人也投入了罢工;15、16日,沪西丰田一、二厂及同兴厂的近6000人继起罢工。14日开始,工潮又蔓延至沪东日商纱厂,在杨树浦

工人进德会策动下,大康一、二厂 4000 余工人响应沪西罢工;18 日,裕丰一、二厂 2600 余人也加入大罢工行列。至此,日商的 6 个株式会社,即内外棉、日华、大日本、丰田、同兴和东洋纺,共 22 家纺织厂,约 3.5 万余工人投入了二月大罢工。



二月大罢工活动据点大丰里

大罢工实现后,中国共产党帮助各厂分别组成内外棉、日华、丰田、同兴、大康、裕丰等日商纱厂工会,又加上东亚麻袋厂工会,组成工会联合办事处,在潭子湾办公。荒芜冷落的潭子湾,一时成为喧嚣的罢工战斗指挥部,天天有工人群众在开会,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的革命师生轮流在这里演讲,散发传单、宣言和快报,鼓动大家团结一致,罢工到底。上大为声援工

人的大罢工,成立了“上海日纱厂罢工后援会”,帮助纱厂工会进行宣传与组织工作,向全市学校筹募捐款,支援罢工工人,上大成为学生支援工运的基地。

沪西工人大罢工气势如虹。内外棉工会印发的罢工宣言说:

“最亲爱的同胞呀!我们(工人)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你们也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现在我们受外国人的种种虐待,不得已而出于罢工。此事有关于国家的体面,同胞的人格,务求各界同胞竭力加以扶助呀!”“我们的目标,就是八个大字:‘反对东洋人的虐待’!这是我们为国家争体面,为同胞争人格的事。”“盼望军、商、学、工、农各界同胞之情,顾国家的体面,共同起来援助我们,为国家争光荣,为同胞争面子。”这些口号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自然而又巧妙地结合起来,成为这次大罢工斗争的主旋律,它拨动了千千万万日商纱厂工人的心弦,激发了他们的斗志,也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2月12日,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淞沪机械职工同志会、上海金银工人互助会、上海雕花业工会等组织发表通告,声援内外棉纱厂罢工工人。是日,上海国民会议促进会、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等40余个团体,90多名代表,在向警予主持下召开联席会议。会上,沪西工友俱乐部代表报告内外棉纱厂工人遭受日本资本家虐待、压迫、毒打、开除的种种事实和罢工情况。联席会议决定进一步开展斗争。

三、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

面对工人气势磅礴的大罢工,日本资本家和日本政府联合起来,千方百计想把这场罢工镇压下去。日本政府认为“罢工性质已非专为对资本家之单纯劳动争议,而带有排外之性质”,指令日本驻华使节向北京政府和上海地方官厅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赔偿罢工时期之各厂损失……制止工人之暴动”。日海军的“对马号”兵舰,“因形势紧急,急驶来沪”,“伏见号”兵舰也由汉口调来上海,妄图用甲午海战时的炮舰政策压服中国工人的正义斗争。

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社长阿部彦太郎于2月16日由日本专程来沪,召集各厂大班开会,策划对付罢工的各种办法。内外棉厂决定,凡罢工期内,工人愿到厂者,每日酌贴工资额三成,并用发给“红赏”等办法,引诱工人上工。工人不愿进厂报到,厂方就以开除相威胁。沪东大康纱厂厂方竟宣布,工人不愿上工者一律逐出工房。工部局派出巡捕,驻扎在日商工厂加以保护;与此同时,大肆拘捕工人领袖、罢工工人及援助工人的学生,一共抓了56人,加以拷打,继而送入会审公廨接受审判。工部局的喉舌《字林西报》叫嚷,要把罢工的领导人“从租界上和租界附近地区连根除”。《上海泰晤士报》指名攻击上海大学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温床”,工人是这些“煽动分子煽动起来的”,要对他们“采取有力行动,不再拖延”。

淞沪警察厅也积极参与镇压罢工活动,他们一再制止罢工工人在潭子湾集会,张贴布告胁迫工人“安分上工”。2月17日,大批警察拦阻结队游行的罢工工人,在冲突中一次拘捕就达29人,其中包括领

导罢工的邓中夏和戴器吉等。警厅搜查和封闭了沪西工友俱乐部，并一度把工人逐出会所，19日又拘捕了宣传坚持罢工的孙良惠等2人。

上海工团联合会的一些工贼，也乘机伸出黑手参与破坏罢工的勾当。他们以“调解”为名，组织所谓“上海维持日商纱厂工友罢工委员会”，公然与共产党人俞秀松、向警予等发动各界47个团体组成的“东洋纱厂罢工后援会”唱对台戏，妄图“引工人趋于正轨”，避免“风潮蔓延，影响治安”。他们与军阀官厅达成协议：“（一）官厅承认工团联合会为正当的诚意的调解，于必要时可酌量保护其进行；（二）工团联合会须随时侦察工潮之状况，向交涉署报告；（三）工团联合会须设法抑止工人之暴动。”该会头目王光辉，甚至向日方人员提供罢工情报。该会另一头目徐锡麟，竟纠集一些流氓自行成立上海纺织工会沪西部和沪东部，阴谋分裂罢工队伍。工贼穆志英等也窜到沪西进行反共宣传，诱骗工人“勿受利用”，早日复工。

四、在潭子湾欢庆大罢工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3.5万多名罢工工人一律“听工会的话”，不受威胁利诱，相互扶助，克服困难，坚持团结战斗。日本厂主天天在“日本纱业联合会”开会，再也商量不出对付罢工工人的新花招。而其时正值纱价上涨，厂里受到罢工的损失越来越大。单是内外棉11个工厂，罢工期间直接损失即达50万日元，加上间接的损失，将达百万日元以上。此刻，工人的罢工斗争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并进一步得到社会各界的有力的支持，日方无法忍受如此巨大的损失，被迫同意与工人代表举行对等谈判。

2月25日，各日商纱厂工会代表：同兴的刘贯之、大康的张佐臣、日华的李瑞清、裕丰的万金福、内外棉的朱国平和丰田的张应龙等6位代表，到上海总商会去谈判。日本资本家的谈判代表为内外棉会社董事长武居和该社上海支店经理岗山，调解人为上海总商会副秘书长方椒伯、会董王一亭等，以及曾经参与调解工作的各马路商会总



在潭子湾庆祝二月罢工胜利大会

联合会、五马路总商联合会、沪西四路商联合会的代表潘冬林等 10 余人。另外，淞沪警察厅长常之英和交涉使的代表也莅场“监视”。经过工会代表竭力争取和中间人的调停，日方对工会所提严禁殴打工人、被开除工人复职等八项条件部分接受

，于 26 日下午正式签订了协议：

- ①以后如有虐待，准告厂主办理；
- ②工人回厂照常工作；
- ③储蓄金满五年发还；
- ④工资准两星期发一次。

至于释放被捕工人问题，警厅方面由总商会保证解决，租界捕房方面由工会聘请的英籍律师克威交涉解决。

27 日下午，工会代表 10 余人前往警厅欢迎被捕工友出狱。这天，10 名出狱者在工会代表的陪同下，同乘马车至潭子湾工会办事处，受到数千名群众的热烈欢迎。潭子湾一片欢呼声、鼓掌声、鞭炮声，大家欢庆大罢工的胜利。至 3 月上旬，在警厅拘押的最后 3 人，即共产党员邓中夏、孙良惠和戴器吉，经工会交涉亦被释放，不久邓中夏、孙良惠被选为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离沪到广州去了。

但是，租界捕房当局却从中作梗。租界捕房硬是把被捕工人全部押送会审公廨审讯，该公廨均由日本领事陪审，其结果是“49 名于本月（3 月）被判处自罚金 5 元至徒刑 6 个月不等，另有 2 人交保释放，6 人撤销起诉，3 人仍在抵押中”。其中判得最重的是沪东蔡之华罚洋 200 元，如无力交洋改押西牢 6 个月；吴先清罚洋 100 元，无力交洋改押女牢 3 个月；陈竹山罚洋 100 元，无力交洋改押 2 个月又 10 天；沪西被捕工人季小四子等 2 人，被判 6 个月。凡是被判罚金的，均

由工会尽力筹款赎出,唯被判徒刑的季小四子等人,仍被关在西牢里受难。工人抗争无效,更加深了对日、英帝国主义的仇恨。

3月1日下午,工会分别在沪东、沪西召开群众大会,报告谈判经过,宣告复工。沪东大会在引翔港举行,由大康工会张佐臣和万金福主持。

沪西的大会在潭子湾的沪西工友俱乐部后面的空场上举行。到会的人数计有2000多人,并有各界来宾参加,会后还摄影留念,场面十分隆重。大会主席由俱乐部代表刘华担任,他在大会报告说:“我们这次罢工,虽说没有得到全胜,但必须指出,这是第一次打败日本人,面目为之一新,日本人也低下头来。……这都是由于我们工友抱有热情和义气的缘故。……各位要注意的是,我们工会已和从前不同,现在对中国官厅等于已经备案,在租界也得到了承认,已成为光明正大的工会了。今后只要各位对工会热心维持,我想就不愁得不到胜利!”他宣布,工会将“尽力为大家谋利”,如开办免费上学的平民学校,免费治病的诊所,以及养老院等等。学界代表杨之华登台演讲,希望女工们和男工们同心同德,继续奋斗。总商会和各马路商联总代表纷纷发言,均表示“赞成工会旨趣”,连警厅稽查也说,“今后大家要维护工会”。会场上还散发了工会负责制的传单,号召工人全体复工,坚决维护工会。各厂工人都赞成工会的建议,决定从3月2日起,一律进厂复工。

五、罢工中沪西工会迅速发展壮大

罢工后胜利后的第三天,李立三到潭子湾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工会组织问题。到会的有沪西工友俱乐部、各纱厂工会联合办事处以及各纱厂工会负责人项英、刘华、孙良惠、刘贯之等20余人,邓中夏、杨之华也参加。刘华主持会议,李立三作加强工会工作报告。经过讨论,作出四项决定:(一)各纱厂已成立工会的,一律组织工厂委员会,下设秘密的工厂小组;还未成立工会的纱厂,应设法成立。(二)准备成立上海纱厂总工会,在未成立前,用纱厂工会联合办事处的名

义负责领导工作。(三)推选工会联合办事处负责人,推举项英等7人为联合办事处委员,项英任办事处主任,刘华任办事处副主任兼宣传主任,孙良惠、李瑞清分别为组织主任、副主任,刘贯之为总务主任。(四)联合办事处设在潭子湾,刘华、刘贯之常驻办事处工作。

潭子湾会议后,各纱厂工会先后成立了工厂委员会,开展会务工作,进行会员登记。到3月下旬,小沙渡、曹家渡、杨树浦3个地区,共登记了2万余人。到4月,除浦东外的上海日本纱厂,以及麻纺厂、绢丝厂的工人绝大部分都登记为工会会员。工会组织逐步发展壮大,引起了敌人的恐慌,租界工部局惊呼:“闸北潭子湾工友俱乐部,原来是为主持二月罢工而组织的,现在却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机关,每天都在那里举行会议。”

二月罢工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工人斗争的信心,党领导的工会在工人中的威信迅速提高,工人纷纷加入工会。据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记述:数日之内加入工会的工人,沪西小沙渡一带由1000人,增加到6000人,沪东杨树浦一带增加到3000人。

二月罢工是工人群众反帝斗争的一次大演习,它为即将爆发的五卅运动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并且储备了相当可观的力量。二月罢工堪称五卅运动的前奏曲。

六、二月罢工胜利的历史意义

历时3周的大罢工胜利,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日商纱厂的范围,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有重要的地位。邓中夏对这次大罢工的经验作了详尽的总结,认为这次的罢工“确是‘二七’后一个空前的伟大运动。它不仅在中国劳动史上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

这次罢工的宝贵经验有:

(一)罢工队伍有严密组织。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地委根据历次罢工的经验,深知工人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才能战胜资本家。故在罢工酝酿期间,就秘密组成了以邓中夏和李立三为总负责的总指挥处,

在小沙渡和杨树浦各设一个分指挥处。总指挥处设有书记处(秘书处)、联络处、护卫团;分指挥部设有组织员、宣传员、交通员。通过层层网络,将数万工人组织成一个整体。所以在罢工后期,虽然邓中夏、孙良惠等工运领袖被捕,但是广大群众仍在有序的指挥部领导下,能继续坚持斗争,直到取得胜利。

(二)自觉运用民族联合战线的策略,争取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二月罢工的范围完全限于日商纱厂,斗争的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口号是“反对东洋人打人!”“反对东洋人的虐待”,强调了民族斗争。因此,不单是上海的工人、店员和学生团体热情支援罢工工人,就是一些文化教育团体和工商业团体也公开出面参加支援活动。2月15日,由向警予主持的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等发起组织的“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有47个团体,90余名代表参加。该会举行为期3天的募捐活动,沪西商界联合会领衔在报上刊登募捐启事。后援会发表的宣言警告了日本厂主,吁请全国各界支援被日人虐待的罢工工人。在募捐的竹筒上,贴有标语“请援助被东洋人压迫的工人!”历来受日本资本挤压的华商纱厂老板们也“居然用华厂工人的名义捐了1000元与罢工工人”。这个由社会各界组成的后援会,就是以后五卅反帝联合统一战线的雏形。

(三)在斗争策略上,审时度势,以巩固和发展革命力量为主旨。党组织在罢工中,反复向工人宣传工会的重要性,说明罢工不仅仅是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工人阶级应该建立自己的组织,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这次工人罢工未能增加工资,但显示了数万工人团结战斗的力量,迫使日本资本家承诺今后不得虐待工人,更可贵的是在斗争中成立了各厂工会,取得了工会的合法地位。从此,工人们相信团结的力量大,工人相信工会,加入工会的人越来越多。据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记述:二月罢工胜利后的数日内,沪西小沙渡加入工会的人数由原来1000人增加到6000人。

第 七 章

伟大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1925 年爆发的震撼世界的五卅运动,是以上海为中心、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遍及全国全民的波澜壮阔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它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继五四运动后一次规模更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是国共合作后出现在神州大地上的第一次大革命风暴的起点,从此展开了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 1925 年至 1927 年的大革命。

一、沪西工人代表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1924 年夏秋以后,全国工人运动开始复兴,工人运动更呈现高涨的趋势,特别上海沪西沪东日商二月大罢工,反映了行将到来的工人运动的新趋势。中国共产党决定抓紧时机,召开第二次劳动大会,以迎接新的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1925 年 5 月 1 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上海工人推派邓中夏、李启汉、孙良惠、张佐臣、陶静轩等,代表上海各日商纱厂工会、恒丰纱厂工会、印刷工人联合会、机器工人俱乐部、海员工会、英商电车工会、店员联合会、金银业工人互助会以及雕花业工会等数万会员(李立三和刘华因工作需要留守上海,未出席大会)。沪西工人代表孙良惠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以上海代表团的名义作大会发言。孙良惠还与刘少奇等主席团成员一起署名致电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中央局,正式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认真贯彻中共四大的精神,建立了中华

全国总工会。大会通过了全国总工会的章程,选出执行委员 25 人,上海当选的有邓中夏、李森(李启汉)、孙良惠和李成(李立三)。大会以后,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上,推举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刘文松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总部设于广州,并决定派刘少奇等同志去上海,设立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就近指挥长江流域和北方的工人运动。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中国工运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大会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应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担任急先锋”,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纲领;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这是组织上的一个重大收获。大会还通过“铲除工贼决议”,为纯洁工人运动的队伍,清除招牌工会的影响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顾正红惨遭日本资本家杀害



顾正红烈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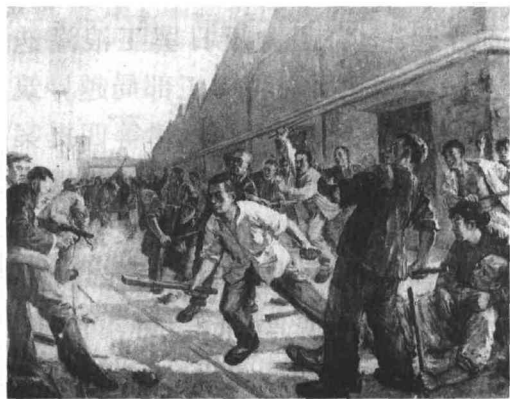
1925 年 2 月起,上海工人反日罢工浪潮迭起,各界人士也纷纷起来反对租界工部局越界筑路,反对工部局增加码头捐、印刷附律等四提案的斗争。这些斗争引起帝国主义极大的仇视和恐惧。他们妄图以高压手段把群众的反抗扼杀在摇篮里。

四五月间,正值棉价高、纱价低,纱市清淡,上海的日本资本家企图以此压缩生产,撕毁二月罢工的复工协议,克减工资,向工人反攻倒算。“日人监工入厂,皆携带铁棍手枪,工人偶一不慎,即遭棍击。罚款之苛,数倍于前”。5 月 7 日,上海日本纺织同业会开会,作出议决:“同业会不能承认此种工会”,如果“工会有唆使工人罢工之事,同业会坚决采取强硬态度,得断然处置,关闭工厂”。并将决定通知租界工部局和中国官厅,“以求充分取缔煽动者及工会的活动”。日本驻沪领事也致函淞沪警察厅,要其对工人罢工“事前厉行格外之取缔”。

工人群众对日本资本家的出尔反尔和变本加厉的压迫,义愤填

膺。5月上旬,沪西同兴一厂、日华四厂、内外棉三、四、八、十二、十五等厂工人相继罢工反抗。厂主拒不接受工会提出的改善待遇等条件,以关厂相威胁。工会鉴于时机不利,劝工人忍痛复工,改用怠工的办法对付厂主。各厂从9日开始无条件复工。但是,日本资本家气焰嚣张,在三天之内,借故开除工人代表30余人。14日,内外棉十二厂又有6人被开除,工人质问老板,再遭毒打。15日,除十二厂外,各厂工人照常上工,日本厂主借口十二厂停工无纱,将七厂(织布厂)锁闭,不许工人进厂,阴谋挑起工人内部矛盾,削弱工人斗争力量。

5月15日上午,日商纱厂工会在潭子湾召开各厂夜班工人代表紧急会议,工人代表情绪激昂,要求马上举行大罢工,打退日本资本家的进攻。刘华根据党的决定,开导大家:如果我们全面罢工,正中他们的诡计。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的办法是纱厂罢工,布厂不罢工而采用怠工和轮流罢工的方式来进行斗争。于是,日商各织布厂工人,相继举行怠工斗争。



顾正红带领工人在内外棉七厂与资方
搏斗的场景(油画)

内外棉七厂的棉纱得不到供应,资本家扬言要关厂。15日傍晚,七厂大门紧闭,张贴“因故停工”布告。夜班工人被阻门外。工人顾正红扯下布告,率领工人们冲进厂门交涉。这时,内外棉副总大班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带领一批爪牙打手赶到,疯狂地毒打工人,顾正红义愤填膺,带领工人冲进物料

间,拿了一批打梭棒,奋起自卫。川村面对工人,拔出手枪威胁,威吓再不出厂,就要开枪。顾正红大声责问:为什么关厂,不给工人上工?此刻,数百名工人也都围了上来,齐声责问,川村竟气急败坏地对顾正红连连开枪。顾正红中弹后,仍高喊:工友们,团结起来,斗争到底啊!敌人又丧心病狂地对顾正红开了两枪,还用刀在他头上猛砍,顾

正红倒下了，血流遍地。被激怒的几百名工人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同敌人厮打起来。此时大批巡捕赶来，用暴力驱散人群，多人受伤。顾正红身中四枪，被工人抢抱送医院救治，但因伤势太重，于5月17日晨，壮烈牺牲。



顾正红被害地点

顾正红，1905年生于江苏阜宁，1921年10月，随全家逃荒到上海进厂做工。次年在沪西日商内外棉九厂当扫地工，因反抗工头和资本家的剥削压迫，被开除出厂，后经工友介绍入内外棉七厂织布车间做盘头工。1924年秋参加沪西工友俱乐部学习和活动，接受党的

革命思想教育，同时回到厂里积极向工人宣传革命思想，在厂内组织俱乐部的秘密小组。1925年2月，沪西日商内外棉爆发“二月罢工”，顾正红作为俱乐部骨干成员，参加工人纠察队、宣传队，揭露日本资本家欺压工人的罪行，并在战斗中加入了共产党。5月15日，在内外棉七厂与工人一起反抗日本人镇压的斗争中英勇牺牲，年仅21岁。

三、潭子湾公祭顾正红烈士

顾正红血案发生时，工人们还将8名受伤工人用人力车送会所公廨，数百名工人随车护送，沿途高呼：东洋人打死人了！我们要报仇！路人不断加入，汇成浩浩荡荡的人流。但是会所公廨却将伤员、护送代表和人力车扣押，伤重者送医院监管。

顾正红被枪杀后，内外棉东五、七、八、十二等5个工厂8000多工人一致举行罢工，抗议日本资本家的罪行。这一天，中共上海地委正在研究沪西工人斗争的策略问题。傍晚突然接到顾正红被枪杀的报告，地委决议：立派李立三到小沙渡了解情况，指导斗争。同时，决

定：(一)控告东洋人打死工人，提起公诉。(二)发宣言，并立即发新闻。(三)不扩大罢工，先将东洋人屠杀工人罪行告诉给工人，要各群众团体援助，开展群众反东洋人运动。中共中央在5月16日、17日，连续发出第32、33号通告，紧急要求各地的党组织马上“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会社会团体一致援助”罢工工人。上海工学界35个团体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成立了“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发动群众投入斗争。5月16日下午，内外棉纱厂工会和沪西工友俱乐部召集沪西日商纱厂近千名工人在潭子湾集会，在刘华主持下，决定由内外棉工会出面，印发宣言和呼吁书，控诉日本厂主的残暴行为，提出惩凶、赔偿、日人不准携带武器进厂，恢复被开除工友工作，承认工会、工资一律发给大洋等8项条件。16日，工会和俱乐部开会，去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的工人代表孙良惠这时已返回上海，由他主持会议，具体研究贯彻落实中共上海地委的决定，成立一个临时委员会，下设纠察、交际、救济、募捐等队。第二天继续开会，推定委员会的临时职员。刘华、孙良惠、张佐臣为总主任，刘贯之、陶静轩负责外交（即交际），姜维新等负责纠察，吴先清、孔燕南等为女工办事员，孙良惠兼救济主任，张佐臣兼募捐主任。5月18日上午，顾正红的遗体运到潭子湾时，男女工人整队往迎，大家高呼：“要行凶的偿命！”“誓死坚持到底！”下午，又在灵柩前吊唁顾正红烈士，到会工人、学生4000余人，刘华手持一面“中国人惨遭日人残杀”的白旗，领着大家高呼：“坚持到底！”“不达目的誓不上工！”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工人的抗议斗争继续采用高压政策。工部局组成了全副武装的警备队，在戈登路巡捕房待命，随时准备出动镇压群众的斗争。他们控制了舆论界，严密地封锁消息，新闻界不敢刊登顾正红惨案的报道，学生会发了4次宣言，都未能登报。中共上海地委曾决定举行全市规模的公祭顾正红大会。19日，中共上海地委召集宣传联席会议，提出要联合学校、各团体统一行动。会议议决由俞秀松任指挥，负责国民党区党部召集联席会议，动员国民党党员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日，地委检查了发动群众的情况，感到“未能发动社会上一切小资产阶级之同情起来援助”。所以在22

日的地委会议上,对原定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决定取消。

24日下午,由内外棉工会出面,在潭子湾空场上举行悲壮激越的公祭顾正红大会。这天,潭子湾一片白色的海洋,四周挂满了挽联挽幛,中间的白布帷幕上悬着烈士遗像,两侧悬挂着刘华亲

米本埠新聞

◎ 内外紗廠工潮釀成血案

昨日傳奉七號警署通知云：上海內外棉紗廠工潮釀成血案。發生衝突，開槍傷人，死者十三名，傷者二十名。由警署派房派兵巡捕，車送公署公辦。當時該廠總辦事官同仁醫院，立購兩車到廠，將受傷人車送醫院救治。當經發生槍案，其中顧正紅（腹部及腿上一中一彈）、吳阿四（腹部受刀傷，被刺處）、周阿大（腹部受刀傷，被刺處）、周正紅等已由該廠醫生清理，傷者已送醫院，當經派夫一隊，搬出子彈，又搬工人方面消息云：近二星期，內外棉各廠，每天開除工會代表，昨晨十五（內外棉十）廠工人實行罷工，但其餘各廠均未罷工，所以昨晚各廠工人均照常前往工作，昨日人不要內外棉七廠工人，工人與之手槍打鬥，共打傷十餘人，顧正紅等三人受傷，即將顧正紅、周阿大等四人受傷比較嚴重，現由七人由醫院送入醫院，由軍士護送，云云。聞受傷人姓名：王福全、受傷較輕者，為周阿大、徐阿平、李小龍、婦女工，尚有五六人輕傷，不知姓名。

● 兵士帶土被獲幾釀衝突案續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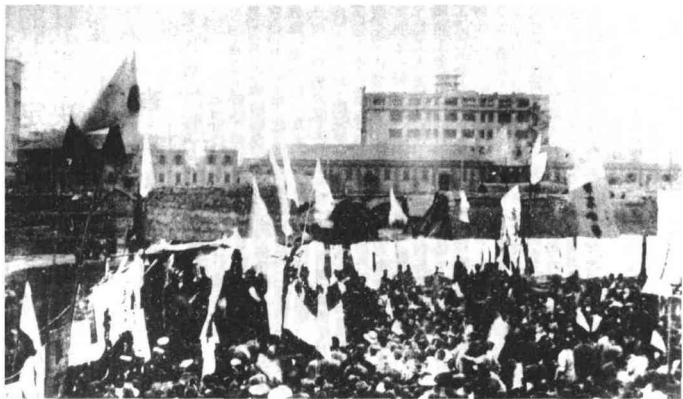
昨報云：昨晨十一號軍士輸送彈土，被駐軍巡邏兵查獲，拘獲八人，由駐軍警署送合德查處，長校判禁。

《申报》于1925年5月16日报道内外棉纱厂工潮酿成血案的情况

笔书写的挽联,上联为“先生虽死,精神不死”,下联为“凶手犹在,公理安在?”横额是“工人先锋”。帷幕后面安放烈士的灵柩,覆盖着一块洁白的绸子,书写“东洋人打死中国人!”会场中央的陈列台上放置苏联、日本等各国工人组织发来的唁电。日本工厂的工人、学生各界代表近6万人参加。大会主席孙良惠致开会词,总指挥刘华报告公祭程序。公祭毕,就分成五处讲台,由各团体、各学校代表分头演讲。恽代英、向警予、项英、刘华、杨之华等许多同志上台发表慷慨激昂的讲演,呼吁全体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会场上“为顾正红烈士报仇!”“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公祭大会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誓师大会。

日本资本家要上海的中国官厅派军警镇压,但军警赶到,大会已开成。日方又要英国领事馆帮忙,不准在租界里持旗成群结队行动。在租界的上海大学学生因集队去潭子湾参加公祭顾正红大会,许多人被捕。5月26、27日,中共上海地委、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分别酝酿到租界去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时间定于6月2日。5月27日,恽代英召开了上海大学、文治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代表会议。会议通过决议:“(一)用散发传单和发表露天演讲的方式来向公众阐明罢工事件真相;(二)筹款救济因停工而面临困境的工人;(三)如日前那些被拘捕学生至5月30日仍未被释,则应采取措施使其获释。”

租界当局以“扰乱治安”的罪名,要在5月30日审讯被捕学生;同时,工部局又准备通过“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和“取缔



1925年5月24日潭子湾顾正红烈士公祭大会现场

童工法案”四提案。中共上海地委为了针锋相对地开展斗争,提出行动时间要提前在5月30日举行。会议作出4项决议:“(一)分头向各校负责人谈话;(二)向学校宣传,并须派工人同志去;(三)印行传单——包括外人侵略一切事实;(四)因会审公堂定于30日‘审判’被捕学生,会议决定在这天下午到租界区演讲示威。”5月28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者有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蔡和森、恽代英、李立三等。陈独秀在会上指出,中国工人阶级不但要扩大及巩固自己阶级的联合阵线,且急需工农联合的成立,如此才能取得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上的初步胜利。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作为中心口号,使斗争表现出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会议还决定5月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反对公共租界提出的压迫华人的四项提案,援助罢工工人。中共中央同时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由李立三、刘华等主持。

学生积极行动起来,上街宣传和发动各阶层共同反帝的行动。上海学联连夜召集会议,作出具体安排:(一)组织不怕牺牲的演讲队向租界出发演讲;(二)联合各团体一致行动;(三)规定演讲队伍5至7人为1组。学联还规定了各校的活动范围,组织了先锋队、后备队,各设1名队长负责指挥。如果先锋队遭巡捕拘捕,后备队继续上前,前仆后继,演讲队员不断增加,使敌人捕不胜捕,以唤起民众。

29 日晨,恽代英召集国民党区分部宣传委员会紧急会议,要求他们分赴各校召开紧急会议,说明 5 月 30 日上街反帝宣传的意义和各自活动的地段,传达 8 点行动纲领。总指挥设于二马路孟渊旅社 3 楼 14 号,总指挥为恽代英。29 日上午,刘华向沪西工人代表传达了 5 月 30 日到南京路示威的计划,并派工人代表到学校宣传。

四、血腥的五月三十日

5 月 30 日各校学生按原计划陆续进入租界。上海大学学生在前一天晚上成立了 13 个决死队,于 30 日一早,直奔租界,与先期抵达租界的学生,组成“学生演讲队”。中午,老闸捕房开始抓捕演讲的学生。晌午后,各校演讲队越聚越多,内外棉罢工工人、邮局职工、铁厂工人、手工业工人、店员、中小学教员等也加入了学生行列。熙熙攘攘的南京路,到处是演讲的学生,到处是围观的群众。反帝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敌人害怕了,英国捕头爱泼生下令:“如有不服制止者,准予拘究。”一瞬间,一大批学生被捕。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带领下,广大学生继续前进。南京路“人如蚁聚,驱之不散”。爱泼生惊惶失措,指挥英捕和华捕,挥舞警棍殴打示威群众,而群众毫不畏缩,坚持一定要释放被捕学生。



南京路五卅惨案的现场

下午 3 时,老闸捕房门前已水泄不通。3 点 45 分,爱活生召集华捕、印捕及英捕在老闸捕房门口集中,突然爱活生下令:“准备!瞄准!开枪!”英国人臬威尔率先开枪,顷刻间子弹横飞,血流遍地,先后有 13 名中国同胞壮烈牺牲,数十人重伤,轻伤不计其数。英帝国主义



五卅惨案烈士照片

的子弹,点燃了上海人民愤怒的反抗烈火,正在按计划率领大夏大学学生队伍在霞飞路(淮海路)示威演讲的吴亮平,得悉南京路发生血案,立即率领队伍到南京路声援,这时南京路已是一片血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晚,中共中央举行紧急会议,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王一飞、罗亦农、张国焘等出席了会议,立即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发动全上海人民起来罢工、罢课、罢市。中共上海地委、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全国学联、上海学联、工会都紧急集会,商讨对策。31日上午,学生们再次到南京路,向各商店宣讲五卅惨案经过。但是总商会对下令总罢市犹豫不决。31日下午3时,成群结队的学生、工人和小商人涌向上海总商会,敦促总商会发布罢市令。内外棉工会代表在总商会楼开会时,强烈要求商人罢市,提出惩办凶手、赔偿损失、承认工会。沪西工友俱乐部的代表在会上“坚决主张上海所有商店和工人应全部宣布总罢业”。这时,各马路

商界总联合会已赞成总罢市,各路商会已签字,但是总商会仍不肯表态。晚上7时,楼下代表再次上楼请总商会下达罢市令,会长方椒伯听到楼下“声势汹涌,数千人聚着不散”,只得下楼向大家表示:同意罢市。

5月31日晚,各工会召开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次日下午,上海总工会建立后的第一道命令,是宣布上海工人为反抗帝国主义大屠杀实现总同盟大罢工。

《上海总工会六一宣言》指出:“外国帝国主义,压迫我国,横行无忌,视我如亡国奴。最近残暴的行为,更日甚一日!”“而增加码头捐、印刷附律、交易所注册等,如毒矢利箭向我们全埠市民进攻。”“我们上海全体工人,八十



内外棉等厂的罢工工人举行示威游行

年来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现在已忍无可忍了!我们于6月2日起宣布总同盟罢工!”于是,因五卅惨案而掀起的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犹如大海怒涛,汹涌澎湃,势不可挡。除了内外棉五、七、八、十二厂工人坚持罢工外,从6月1日开始,上海各厂各业工人也不断投入反帝大罢工。

在上海实行总罢工、总罢市的同时,帝国主义继续在上海施行高压政策。6月1日上午,工人、学生及市民继续聚集在南京路散发传单、讲演,又遭西捕开枪屠杀,死工人、学生等4人,伤20余人,造成五卅惨案后的第二次屠杀。公共租界从6月1日起宣布戒严,张贴和散发“治安章程”及禁止学生演说之布告。南京路及公共租界各交通道口,均布满铁甲车、炮甲、马巡队、海军陆战队、西捕和万国商团。帝国主义摆开了全副格杀不论的架势,屠杀一直持续到6月10日。

上海工人阶级针锋相对,响应总工会号召,总罢工的浪潮迅速高

涨。6月2日,小沙渡一带日商纱厂全部罢工,罢工工人从浜北华界摆渡至南岸时,日捕对工人进行搜身检查,污蔑打骂,阻止工人上岸,有2名工人当场被日本便衣开枪击毙,沉尸苏州河中。从5月30日至6月10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9次屠杀中国人,被枪杀者有60余名,重伤者70余名,轻伤者不计其数。从6月4日起,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先后占领沪西的上海大学、大夏大学、文治大学等学校。敌人的镇压没有吓倒上海人民,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风暴在上海掀起。

五、五卅反帝风暴席卷全市全国

6月1日晚,中共中央决定,由上海总工会联合全国学生联合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等组成联合战线性质的上海工商学子联合委员会,作为运动的公开指挥机关,并决定把斗争扩展到全国。6月4日,中共中央创办《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及时传达党指导运动的方针、政策。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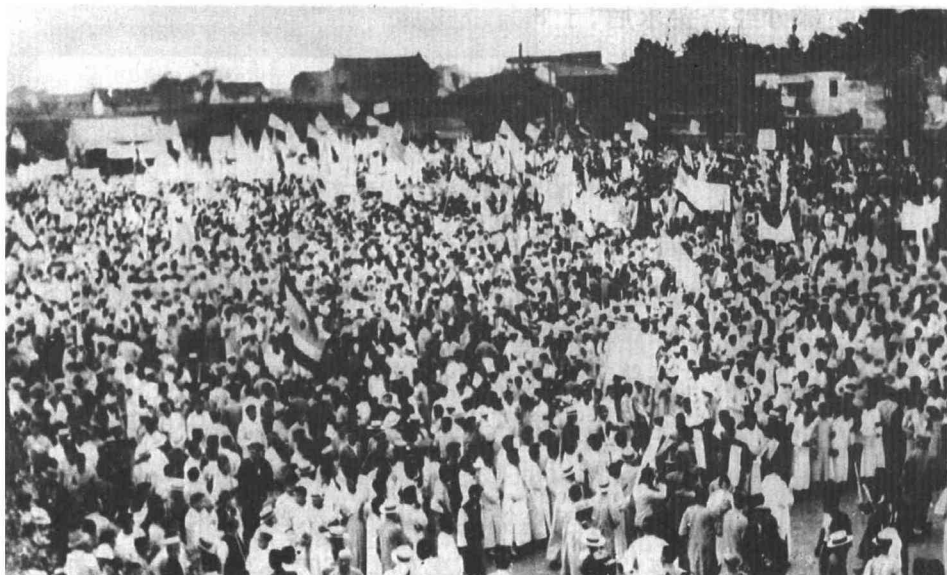
五卅运动期间,李立三在群众大会上演讲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各阶层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矿区,都举行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和罢工、罢市、罢课。6月2日,广州各界

群众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不久演绎为有10万人罢工、长达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维护社会秩序,以及准备北伐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6月11日,汉口参加游

行示威的群众行至公共租界时,英国水兵开枪射击,打死数十人,重伤30余人。汉口惨案进一步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怒。五卅运动期间,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运动,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声。

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得到国际革命组织的积极支持。共产国际发表文章驳斥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运动的种种歪曲,号召属下的所有机关募捐支援中国罢工工人,派遣代表来华参加运动。在莫斯科,有50万人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并为中国工人募捐,给五卅运动有力支持。6月7日,日本30多个工人团体举行盛大演讲会,决议一面援助中国的工人团体,一面向日本政府和资本家抗议。英国工人积极行动起来阻止船、舰、车辆运输军火到中国。五卅运动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1925年6月11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群众大会,近10万人参加。

受到极大震动的帝国主义者,采取威胁和利诱的两面手法来对付处于反帝斗争高潮的中国人民。一面表示可以商量解决“工部局增设华董”、“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一面又以停止借

款、汇兑和工业用电相威胁,甚至扬言要大规模出兵。中国的军阀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和帮凶,奉系军阀在上海、南京、天津、青岛、济南、奉天等地逮捕和杀害工人、学生领袖、殴打群众,封闭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6月22日,淞沪戒严司令部封闭了3个主要工会,并会同租界当局查封和袭击了120个工会组织和工人俱乐部。9月18日,又强行封闭上海总工会,通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10月16日,直系军阀孙传芳代替奉系军阀进占上海(租界除外),继续进行镇压活动。

尽管遇到重重困难,但是斗争没有停止。青年学生坚持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和抵制英货、日货的活动。小工商业者也纷纷参加罢市、抗议活动。上海总工会是上海工商学联会的核心,在它的领导下,工人坚持罢工斗争3个多月。8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斗争形势,决定改变斗争策略,要求工人有组织地上工。各厂工人在争得资本家接受部分经济要求后,于8月下旬陆续复工。

六、沪西工人运动领袖刘华英勇牺牲



沪西工人运动
领袖刘华

五卅运动爆发前,沪西相继成立了内外棉纱厂工会(刘华任主任)、各厂工会联合办事处(项英任主任、刘华任副主任)。1925年6月1日,上海总工会在五卅风暴中公开宣布成立,18日,决定在上海市区设立5个办事处,其中的沪西设有2个,即以原搬迁到潭子湾的沪西工友俱乐部为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小沙渡)和曹家渡的上海总工会第五办事处。第四办事处主任为刘华,副主任为陶静轩;第五办事处主任为张佐臣,副主任为龙大道。五卅运动中,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9月18日,上海总工会被奉系军阀命令封闭,李立三、刘少奇、刘华被通缉,同时命令各区办事处停止活动,办事处被迫转入秘密活动。



坐落于普陀区沪西工人文化宫内的刘华雕像

刘华是沪西工人运动的领袖。他是四川宜宾人,1920年8月到上海中华书局印刷所当工人,1923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从党组织安排他到沪西工友俱乐部从事工人运动后,他把自己的毕生奉献给沪西的工人运动。1925年7月,他四川老家遭到土匪抢劫,弟被打死,父被掳走,母受重伤,祖母病危,一家惨遭大祸。刘华接连收到家里的来信来电,催他速返故里。然而如火如荼的沪西战斗形势使他不能回乡。他回

信说:“国家衰弱,强邻欺侮,神圣劳工,辄为鱼肉。我亦民族一分子,我亦劳动一分子,身负重任,何以家为?须知有国方有家也。”刘华工作的潭子湾三德里条件简陋,住宿是草铺,饥饿啃大饼,他日夜奋战,积劳成疾,咯血不止。在李立三的催促下,才住进医院。叔父得悉刘华病重,又来信劝其回乡休养。他回信说:“虽我已累倒吐血,但我的心情是愉快的,我应该完成工人阶级交给我的任务,岂能在与敌人作白刃战时,为了私事而随便抽身回家。”“中华民族必须解放,工人必须斗争。时艰敌迫,革命是流血的事情,我处此,纵流到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惜。”信尾,写下了充满革命豪情的诗句:“愿拚热血如春雨,洒遍劳工神圣花。”刘华病体稍有好转,不顾淞沪戒严司令部对他的通缉,又立刻投入战斗。11月29日下午,刘华刚参加了西门公共体育场反段市民大会,傍晚返回至静安寺路时,被租界巡捕房包探秘密逮捕,很快又被引渡给淞沪戒严司令部军法处。刘华被捕后,党组织

多方营救,上海总工会向军阀孙传芳发出抗议书,要求立即释放刘华。12月9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决议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向戒严司令部要求释放刘华。在这次大会上,选举产生了上总新的执行委员会,刘华当选为上总副委员长。12月16日晚,上海总商会宴请军阀孙传芳,在座的日本商会要人和英国驻沪副领事向孙传芳进言:“刘华是中国劳工运动的领袖,上海屡次罢工皆为其煽动,如不重办,上海的秩序十分危险。”孙传芳秉承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意旨,叫副官打电话给淞沪戒严司令严春阳,命令将刘华“秘密枪决,灭尸不宣”。12月17日,淞沪戒严司令部军法处(设于南市蓬莱路上海县署内)将刘华押出狱外,在蓬莱路附近空地上将刘华秘密杀害。刘华时年26岁。

刘华壮烈牺牲后,全市工人无限悲痛,纷纷佩戴黑纱哀悼。中共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撰文、发通电悼念刘华,上海各界人士抗议军阀当局的暴行,1926年5月29日,全市人民纪念“五卅”一周年,在五卅公墓奠基礼上,全场高呼口号“不要忘记我们的刘华!”“为我们的领袖复仇!”“刘华不死!”

七、五卅周年和罢工浪潮

192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调来罗亦农、赵世炎负责上海党的工作。罗亦农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赵世炎任上海区委组织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5月18日发出“关于举行大规模五卅纪念运动”的通告,要使各阶级群众一致起来,共同合作,隆重纪念五卅周年,并组成了罗亦农、赵世炎等9人的五卅行动委员会,罗亦农、贺昌、汪寿华3人为总指挥。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上海区委要求以“和平”的方式游行和演讲,力求避免冲突。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发出关于五卅周年纪念的宣传大纲,指出五卅运动不独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上,并在且在世界革命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五卅事起,欧洲各国工人才普遍知道帝国主义者弱小民族中干些什么,才深信殖民地民众有很大反抗能力”。



五卅周年纪念大会会场

5月29日,5000余人在虹口方家木桥隆重举行五卅烈士公墓奠基礼。代表们沉痛地悼念五卅死难烈士和12月牺牲的刘华烈士。沪西工人代表上海总工会发表演说,会后举行了游行。

5月30日,全市统一罢工、罢课、罢市。当天上午,上海市民五卅周年纪念大会冲破敌人重重的封锁线,在西门公共体育场隆重举行,共有1000余团体,6万人参加。全国学生总会的李硕勋宣读了大会的宣言和通电。下午,500多支由工人、学生和妇女组成的演讲队,分路进入敌人戒备森严的公共租界,逐步向去年五卅惨案南京路流血处及附近两旁马路靠拢。中共小沙渡部委书记郭伯和中共曹家渡部委书记龙大道分别担任分区总指挥,各自率领工人队伍,向南京路进发。下午2时50分,小沙渡的1000多位工人,在南市举行游行后,进入公共租界,昂首阔步踏上南京路,最前面的旗手作引导。游行队伍拦下了英商电车,在其车厢上贴上“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大幅标语。租界怕事态闹大,不敢开枪,大都用警棍驱赶群众,并用水龙冲击群众。游行示威者手挽手、肩并肩,坚持斗争。



中共曹家渡部委
书记龙大道

纪念五卅周年活动后,上海的工人运动又开始高涨起来。在纪念活动后的20天里,棉纺工人在工会的统一领导下,有14家厂近1.5万人参加了棉纺工人的罢工,并取得了胜利。

率先罢工的是内外棉四厂。四厂工人为了反对工头诬陷工人,于6月24日发动罢工,内外棉三厂工人为援助四厂工人的罢工而罢工。帝国主义与军阀联合起来镇压,逮捕工人,开除大批工人。但内外棉各厂工人都起来罢工,声势越来越大,厂方被迫与工人进行了10次谈判,最终厂方被迫接受工人代表提出的条件,今后不得无故开除工人,不得用巡捕殴打和无故拘捕工人,7月24日工人开始复工。

8月份又爆发日商纱厂总同盟罢工。8月4日,日商轮船水手杀害小贩陈阿堂,事后,日本领事馆将凶手秘密送回日本。为此,上海日商纱厂工会联合发表宣言:“我日厂全体工人,誓为陈阿堂复仇,并坚决反对东洋厂主虐待工人,本日起,愿予日厂主以3日之考虑,各日厂主须于此限期内联名要求日领,引渡陈案凶犯,诚意解决工潮,否则吾全体工人,誓当站在一切民众之前线。”日本资方不予理睬。中共上海区委召开区委会议,决定组成特别委员会来领导日商纱厂的罢工斗争。20日上午,上海纱厂总工会发布第一次大罢工命令,宣布实行总同盟罢工。

当天下午,7000余罢工工人在潭子湾集合,召开追悼陈阿堂大会,同时宣读罢工命令,一致通过罢工宣言和罢工条件:解决陈阿堂案、改良工人待遇、增加工资、释放被捕工人、赔偿关厂期内工人之损失等。纱厂总工会多次发布命令,内外棉其他各厂以及同兴等厂也先后加入罢工,并相继成立罢工委员会和纠察队。总同盟罢工开始后,全上海各日厂工会举行代表会议,决议要求上海总工会发布上海反日总罢工令。会后,分别着手组织罢工委员



中共小沙渡部委
书记郭伯和

会,发表宣言、通电、告市民书等,派人向全上海各团体诉说工人被迫情况,请求各团体援助。

这次罢工上海总工会曾考虑发动全市日商厂罢工,以形成类似五卅大罢工的局面。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袖手旁观,工人陷入孤军奋斗的局面,总工会领导终因觉得时机不成熟而未敢贸然发动。这次罢工坚持了1个月,9月14日罢工委员会发出复工通告,没有形成新的斗争高潮。

八、五卅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它冲破了长期笼罩全国的沉闷的政治空气,大大促进了群众的觉醒,显示了各革命阶级、各阶层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给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瞿秋白写道:“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都有工会的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乌等处,都起来响应。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这岂不是革命运动深入普遍的群众之明证!”

中国4个月的五卅运动,是对帝国主义一次沉重的打击,也是上海人民的一次大觉醒。到了8月初,形势发生逆转,工人阶级陷于同帝国主义孤军作战的局面,坚持罢工的20多万工人,连同家属都处于饥饿状态。中国共产党决定有组织退却,相继复工,完整地将革命力量保存下来,同时还创立了一支有规模的工人纠察队,为日后举行工人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五卅运动对沪西革命力量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时全国有党员994人,经过五卅运动的10月,党员增加到3000人,年底更达到1万人,这期间,沪西地区的党团工会组织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1924年9月,沪西地区开始有第一个党小组(中共小沙渡小组),

时有党员 8 名。1925 年 1 月,成立沪西第一个党支部,党员 32 人。1925 年 9 月,中共上海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的规定,沪西地区在原小沙渡和曹家渡支联会的基础上,于 10 月份分别建立了中共小沙渡和曹家渡部委员会,区一级的党领导机构自此而始。其时小沙渡有支部 15 个,党员有 149 人;曹家渡有支部 8 个,党员 136 人,至 1926 年 4 月,沪西地区已建立支部 33 个,党员 666 人。

从沪西的共青团组织发展看,11 月小沙渡有工人支部 14 个,学生支部 4 个,团员 203 名;曹家渡有工人支部 7 个,团员 70 名,至 1926 年 2 月,支部有 12 个,团员有 143 人。7 月,小沙渡有支部 18 个,团员 354 名,曹家渡有支部 17 个,团员 146 名。同年 1 月,共青团发起组织童子团,全市五个工人区共有 1200 人参加,其中小沙渡就有 600 人。

沪西工会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1924 年 9 月建立沪西工友俱乐部,1925 年成立内外棉纱厂工会,3 月建立各厂联合办事处,五卅运动时的 6 月,建立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小沙渡)和第五办事处(曹家渡)。同年 9 月 22 日,上海总工会被反动军阀政府查封后,沪西地区的工会办事处亦相应遭当局破坏,12 月,上总改设组织员领导区的工人运动,1926 年将沪西区域的小沙渡和曹家渡合并为小曹区办事处,时有纱厂 28 个,工人 56270 人,加入工会的有 14353 人;在小沙渡发动罢工 17 次。8 月 20 日至 9 月 17 日,发动了小沙渡日商纱厂有 11 个工厂参加的的同盟罢工,人数达 17000 余人。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为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党组织派出许多党员到内地去,为原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党在斗争中也受到锻炼,提高了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扩大了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第八章

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的沪西

一、武装起义前的革命形势

五卅运动使中国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各阶层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憎恨更加强烈,渴望结束已有十多年之久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人民把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期待转向南方的广州国民政府。

1925年10月,控制浙江的直系军阀孙传芳纠合福建、江西、江苏等省的地方军阀,自任浙闽皖苏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发动反奉战争,很快把奉军驱赶出苏、皖两省。吴佩孚也东山再起,在汉口以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名义反奉。1926年初,奉系军阀张作霖同段祺瑞相勾结,取代直系,操纵北京政府,不仅排斥冯玉祥的国民军,而且将势力向南方扩张到长江流域的苏、皖等省,加剧了同直系军阀的利害冲突。

中国共产党决定利用反奉战争的有利形势,积极推动人民群众进行反奉倒段的斗争。1925年冬至1926年初,上海、北京、南京、汉口等地相继爆发反对奉系军阀和段祺瑞政府的群众示威活动。1926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提出党的现时政治任务是从各个方面准备北伐。

上海工人阶级在五卅后,举行了多次政治、经济斗争和罢工,逐渐成熟起来,提高了反帝、反封建的意识,加强了组织纪律性,这为上

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作好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并推动了全国的革命形势的到来。

这时,南方的广州国民政府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在增强,4月间,华北、华中的国民党地方党部和革命群众团体纷纷致电或派代表到广州,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和国民革命军总监的蒋介石,把北伐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看作扩大自己的势力、建立个人独裁统治的好机会,并把正在蓬勃发展的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视作实现个人野心的最大障碍,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提出《整理党务案》,排斥和打击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势力,蒋介石也因此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四届二次扩大会议,通过发动工农运动配合北伐战争的《军事运动议决案》,但是会议没有提出防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力量增长的有效对策。

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中正式开始。北伐战争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这是孙中山多年的愿望,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能够集中力量对敌。北伐将士英勇奋战,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北伐战争的辉煌战果。

北伐开始,中共中央和以罗亦农为书记的中共上海区委就密切注视战事的进展,为了以实际行动迎接北伐军进军上海,准备建立由民众选举、代表广大市民利益的、共产党员在其中起核心作用的上海市民政府,1926年至1927年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沪西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力之一。

二、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中的沪西

1926年10月24日凌晨,上海工人在中共上海区委领导下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的准备工作很不充分、时机极不成熟,大部分工人在没有组织起来的情况下仓促发动,所以很快遭到失败。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接见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和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老战士杨福林等。

10月16日,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接受国民军第十八军军长之职并进兵上海,上海区委原计划让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特派员钮永建领导的武装力量先动手,以接应起义的夏超部队。22日,夏超兵败,形势转为不利局面。由于消息不灵通,23日,上海区委仍发布起义决定。中共小沙渡部委接到起义命令,立即召开各工厂工人纠察队骨干会议。余立亚传达

区委举行起义的命令,部署起义事项。工人纠察大队长鲍孝良带领李毓书、杨福林、王四(王和生)等10余名纠察队按照部委部署带着3支枪和铁棍、斧头、木棍等武器埋伏在潭子湾北面靠近铁路边的一间草棚待命行动。但由于负责起义指挥的国民党钮永建队伍泄密,淞沪警察厅早就加强了防范。24日凌晨,原定的起义信号——黄浦江上的军舰的炮声迟迟未响,许多在夜间待命的工人纠察只得纷纷散去,上海区委得悉国民党夏超完全失败的消息,马上下令停止行动。在上海第一次起义时,上海区委已决定沪西工运领袖、上海总工会执行委员和码头工会副委员长陶静轩为浦东地区工人起义的负责人,起义的主要力量是上海码头工人。由于陶静轩等领导人没有及时接到区委停止行动的命令,所以,在斜桥、唐家湾、南洋大学附近的起义者仍向敌人发起了进攻,遭到军警开枪驱赶,而陶静轩所在的浦东吴家厅码头工人起义指挥所和南市沪军营亲贤里机关均遭敌人破获,

起义指挥所的陶静轩等7人和工人自卫团指挥、起义技术总指挥奚佐尧等4人被捕。11月16日,敌人杀害了陶静轩,陶时年38岁。这次起义的另一个领袖奚佐尧则在10月26日被敌人杀害。



陶静轩烈士生平
陶静轩，湖北江陵人，1890年生。1923年到上海，先在码头当装卸工，后进日商内外棉十五厂当工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与筹建沪西工友俱乐部，成为俱乐部的主要领导骨干之一（俱乐部第二届委员长）。1925年参与领导日商纱厂工人二月大罢工和五卅运动，被推选为总工会纱厂筹委会成员，上海总工会执行委员，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小沙渡）副主任。1926年7月，中共上海区委任命陶静轩为上海码头总工会副委员长，受命组建码头工人纠察队。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时被捕。16日临刑时，他面西而立，豪迈地说，“我战斗在沪西，死也要面向沪西的工人兄弟”。敌人罪恶的子弹从他的脑后射进，前额穿出，他壮烈地献出了宝贵生命。孙良惠向区委作了《关于陶静轩烈士遇难及善后料理经过的报告》，在党内发表《陶静轩烈士生平》一文。11月18日，中共上海区委发出《告同志书》，追悼陶静轩同志，书中沉痛宣告：“痛哉！上海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之一，五卅运动的领袖，我们最忠勇的同志陶静轩，又为敌人所杀害。”“痛哉！上海工人阶级失掉了一个觉悟的领袖！痛哉！我们失掉了一个好同志！”“同志们起来！为陶静轩同志致敬！武装起来，为陶静轩同志复仇！”

陶静轩纪念传单

陶静轩，湖北江陵人，1890年生。1923年到上海，先在码头当装卸工，后进日商内外棉十五厂当工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与筹建沪西工友俱乐部，成为俱乐部的主要领导骨干之一（俱乐部第二届委员长）。1925年参与领导日商纱厂工人二月大罢工和五卅运动，被推选为总工会纱厂筹委会成员，上海总工会执行委员，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小沙渡）副主任。1926年7月，中共上海区委任命陶静轩为上海码头总工会副委员长，受命组建码头工人纠察队。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时被捕。16日临刑时，他面西而立，豪迈地说，“我战斗在沪西，死也要面向沪西的工人兄弟”。敌人罪恶的子弹从他的脑后射进，前额穿出，他壮烈地献出了宝贵生命。孙良惠向区委作了《关于陶静轩烈士遇难及善后料理经过的报告》，在党内发表《陶静轩烈士生平》一文。11月18日，中共上海区委发出《告同志书》，追悼陶静轩同志，书中沉痛宣告：“痛哉！上海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之一，五卅运动的领袖，我们最忠勇的同志陶静轩，又为敌人所杀害。”“痛哉！上海工人阶级失掉了一个觉悟的领袖！痛哉！我们失掉了一个好同志！”“同志们起来！为陶静轩同志致敬！武装起来，为陶静轩同志复仇！”



湖北江陵建有陶静轩烈士纪念碑

三、上海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中的沪西

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社会上各种反动势力活动猖狂,工人运动屡遭破坏。1927年1月19日,中共曹家渡部委组织部主任孙民臣和职工部委员戴器吉在吴长茂家召开支部会议,突然遭国家主义派的枪击,孙民臣身中数弹,当场牺牲,戴器吉身中4弹,死于医院,吴长茂中弹受伤。

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共上海区委全体会议分析形势,大家看到帝国主义是在想造成所谓的稳健政府,国民党内部开始分裂,预计蒋介石到上海后会攻击共产党,将会发生直接冲突。决定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扩大反帝反军阀的联合战线,加紧训练军事人才,为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作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6年底,中共中央为加强上海工作,先后从广东调周恩来、湖南调颜昌颐到上海,加强党的军事工作的领导力量。2月11日,在上海区委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明确决定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第二次起义。

1927年2月初,北伐军东路军向杭州进兵,中共中央在2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北伐军到达松江的时候,上海宣布总罢工,并组织第二次武装起义。16日,上海区委举行会议,完全同意中央的决定,上海要有一个以工人为主体的武装暴动来迎接北伐军。会议讨论了沪西的形势,指出“小沙渡工人过去受压迫很厉害,现在走狗刘金荣已打死,工会可以大发展。未来应付时局,小沙渡工人特别强悍,可大用,因此小沙渡要建立特别强健的部委组织,部委应增人。”18日,东路军前锋抵达嘉兴。当天夜里,上海总工会作出“于本月19日起,举行全沪工人总罢工,援助北伐军”的决议。19日,总工会正式下达总同盟罢工令:“罢工响应北伐军!罢工打倒孙传芳!”这天清晨6时,小沙渡、曹家渡和杨树浦、引翔港、浦东等地区纱厂工人关车停机。轮船海员、邮电交通、店员、学生等都参加罢工、罢市、罢课。第一天全市罢工15万人,第二天27.5万人,第三天35万人,第四天36

万人。这次政治大罢工,发动范围广,投入人数多,组织领导严密,比之五卅时期又有了进步。

总同盟罢工开始后,上海总工会为及时报道和宣传罢工情况,激励罢工工人的斗争热情,专门出版了《罢工日刊》;同时又组织了宣讲队和宣传队。上海的学生,在学联的发动和组织下,为支援工人的罢工,“很多学生三五人一组,分队赴南市、闸北、公共租界、法租界讲演。”

上海数十万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引起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惊恐。英、法租界当局调遣中西探捕在华租交界处巡逻检查,军阀当局则开始实行白色恐怖,张贴布告,“遇有煽惑罢工者……格杀勿论”,并派出大刀队,沿街“专事搜查传单,查获者立予斩首示众。”从20日起,因发传单而被杀害者共计31人,被捕者计54人。



大夏大学牺牲烈士陈骏(左)、陈亮(右)

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后的20日下午1时,沪西大夏大学组织宣传队,在曹家渡一带边演讲、边发传单,支持工人罢工。下午3时多,学生陈亮、陈骏在归途中,忽遇军阀李宝章的大刀队,被强行逮捕,押回警察署。陈亮、陈骏不畏敌人的淫威,在警察大堂上

慷慨陈词:“你们专横无道,残害百姓,我们热血青年为了唤起民众,宣传演讲,何罪有之?”敌人恼羞成怒,以铁甲车开道,大刀队簇拥在后,将陈亮、陈骏押解到曹家渡五角场附近,抡起大刀,砍杀了两位烈士,并将头颅悬挂在电线杆上“示众”。

22日晚,原定以黄浦江上的“建威”号和“建康”号开炮攻击高昌庙兵工厂为信号,总同盟罢工便转入武装起义。但是军舰只发了几枚炮弹落入法租界,在法帝国主义的威迫下,起义海军匆匆撤离,起义的工人纠察队很快被镇压,合作的国民党方



烈士头颅被悬挂在电线杆上

面毫无实力,工人阶级陷于孤立,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在23日的联席会议上决定停止暴动,24日,上海总工会发布复工令。至此,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以持续总同盟罢工转入武装暴动失败而告终。

四、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沪西



周恩来,中共中央军
委书记,上海工人第
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

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虽然又一次遭到挫折,但是整个革命形势仍然在继续高涨。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作出了“扩大武装组织,准备(第三次)暴动”的决定。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这次会议决定成立领导和组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最高决策机构和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组成。下设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组成,宣传委员会由尹宽、郑超麟、高语罕、贺昌、徐伟组成。26日,陈独秀在特委会

提出,在总同盟罢工的基础上进行武装暴动,在暴动中夺取武装,武装暴动必须有广大群众参加。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整个行动,确定由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负责,紧急时则由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汪寿华四人负责。起义总指挥由周恩来担任。为了提高工人纠察队的战斗技术,周恩来在全市多处秘密训练点,派出黄埔军校毕业同志给工人纠察队队员上课,培养军事骨干。3月7日,上海区委为领导组织上海工人准备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决定对上海市的8个部委作部分调整,其中小沙渡部委和曹家渡部委合并成立了沪西部委,余立亚任书记。19日,发布《中共上海区委行动大纲》,拟订《各部作战计划》。此次武装起义的策略是:“罢工后立即暴动,夺取警察局;以纠察队维持治安,解除直鲁军败兵的武装;占领各公共机关,成立市政府,欢迎北伐军。”

这时,孙传芳部在北伐军的连续进击下,军心动摇,已无力支持,

只得投靠盘踞华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派遣鲁军毕庶澄部南下,到上海接防。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军事工作在3月初已大体就绪,部署了全市各区分头作战,最后集中力量攻占闸北的方案。周恩来在这期间,亲自到小沙渡、杨树浦、浦东、南市和商务印书馆等地视察,对工人纠察队进行军事训练指导。3月20日,北伐军进抵上海近郊龙华。是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产总联席会议,各部委汇报罢工准备情况。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特委领导当机立断,于3月21日清晨,决定举行第三次起义,并下令于12时举行全市总同盟罢工、罢课、罢市,并立即进入武装起义。下午1时,工人在南市、虹口、沪东、沪西、闸北、浦东、吴淞等区指定地点集合,全市共分11条线作战。



中共沪西部委书记、上总沪西工会
联合会主任余立亚

中共上海区委罢工令下达后,沪西有30余家工厂10多万工人罢工。罢工后,中共沪西部委按照中共上海区委计划,将工人纠察队和武装人员分为两路战斗队。一路目标是曹家渡的第六警察署,由部委书记余立亚率领。工人纠察队包围了曹家渡第六区警察署,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缴枪投降!”“打倒军阀!”的口号惊天动地。少数警察开枪抵抗,工人纠察队员发起冲击,申新一厂工人纠察队在缴获沿途岗警的枪支后赶来投入战斗,很快将60余名警察全部俘虏,缴获30多支枪。工人纠察队一鼓作气,渡过苏州河,迅速占领了潭子口警察局。

另一路目标是小沙渡第四警察署。队伍由沪西工人纠察大队长鲍孝良、副大队长曾瑞率领,从临时指挥所出发,沿途缴获岗警枪械,瓦解了共和路、恒丰路之间的二分所和巡逻队署,赶到小沙渡第四警察署。这里的警察有直鲁联军的支持,敌人武力顽抗,枪声大作。工人纠察队员冲击时,一些战士中弹倒地牺牲。此时,唯一受过黄埔军校训练的曾瑞下令隐蔽,停止攻击,重新调整战斗部署。工人们找来塌车,把装满泥土的麻袋堆在车上,当作“活动堡垒”冲向敌人防区。

敌人仗着有利地形和优势装备仍在顽抗。正在双方相持间,部委书记余立亚指挥下的一支凯旋而归的队伍赶到,两支队伍合拢一起发起猛攻,敌人招架不住,溃不成军,举白旗投降。但在激战中,曾瑞不幸中弹牺牲。在与军阀搏击中,国民党右派组织的流氓武装也来浑水摸鱼,威胁工人纠察队。在余立亚的领导下,坚决粉碎了流氓武装的挑战和捣乱。沪西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后,余立亚又率领队伍向北火车站进发,支援在闸北的决战。下午5时,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在闸北发起总攻击,闸北工人纠察队和沪西、沪东工人纠察队会合一起,以缴获的武器武装工人纠察队,多挺轻重机关枪架在前沿阵地上,并以北火车站的东南面为主攻方向,北火车站各支工人纠察队同时向敌人的最后据点发起总攻击。此刻,鲁军军长毕庶澄见大势已去,便扔下残军,只身溜进租界,白俄雇佣军也无心恋战,钻出装甲车,换上便衣,躲进租界逃命去了。北火车站的敌军失去了指挥,乱成了一团。一小时后,工人起义军占领了整个北火车站。敌军一部分逃进租界,一部分当了俘虏,傍晚6时多,北火车站的战斗胜利结束,至此,激战2天1夜共30小时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全胜。这次武装起义,一共消灭北洋军阀3000余人和武装警察2000余人,缴获5000多枝枪、若干门大炮和大量弹药、装备。占领了上海租界以外的所有地区。在激烈的战斗中,有300多工人和群众英勇牺牲,1000余人负伤。英勇的沪西工人阶级和全市人民一起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上海的解放,使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在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前的3月12日,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已举行成立大会,22日,闸北还在激战时,第二次市民代表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上海临时市政府委员19人,其中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占了10人。这个政府在组织领导和组织成分上都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她的成立,是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直接成果。

五、大革命由胜利转向失败

1925年的五卅运动拉开了人民大革命的序幕,掀起了大规模的



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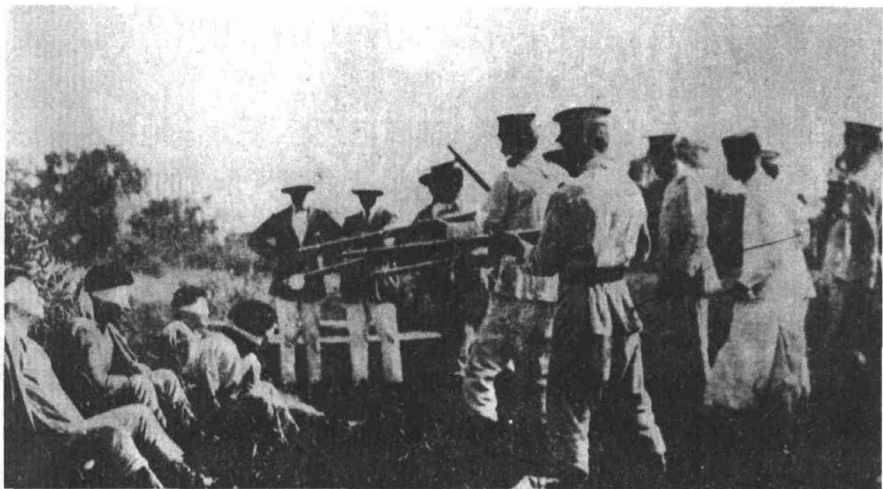
群众反帝斗争的浪潮。从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一直到北伐反对军阀的斗争,其间,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革命力量,向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猛烈冲击,形成了中国人民的大革命高潮。

1927年4月1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到会的有沪东、沪西、沪中、南市、闸北、浦东、法租界等7个部委,在汇报工作时,沪西汇报:“部委机关已建立,现有党员2200余人,支部44个,估计一星期内党员数可达4000人。”其他各区的情况类似,革命力量在起义中大大增强。然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面临着复杂的局面。中共中央、中共上海特委和上海区委在武装起义胜利后的4天里,集中讨论与部署武装起义胜利后的各项工作,从3月25日起,就集中讨论研究蒋介石到上海后的对策。

此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正在密谋反革命政变。是年三四月间,当北伐战争胜利发展时,蒋介石从南昌到上海,走一路杀一路,蓄意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暴行。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他一下船,看到共产党控制着上海临时市政府,共产党掌握着数千工人纠察队,北伐军的第一师、第二十一军军长倾向共产党,于是就与帝国主义勾结,与国民党政客、资产阶级、青红帮头子、倒戈的军阀军官密商“清

党”大计,并调换部队,部署策划反革命政变。4月9日蒋介石离开上海赴南京。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曾决定以工人武装与国民党右派军队决斗,但在接到从莫斯科发来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错误电报指令后,没有采取反击的斗争措施。4月11日晚,杜月笙设计骗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到杜公馆“赴宴”,共商机密大事,到了杜公馆,立刻威胁汪寿华交出工人纠察队,遭到拒绝后,就残忍地把汪寿华杀害。12日凌晨,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打手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一路奔向南市三山会馆和华商电车公司,另一路向闸北湖州会馆和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大批反动军队就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并和青红帮流氓一起疯狂屠杀工人。沪西的工人纠察队也同时遭到反动军队的武装袭击,被缴了械。在政变的当天,中共上海区委作出决定,要求全市工人一致起来罢工,同国民革命中的新军阀作斗争。12日上午,数万工人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大会,严正要求:交还工人纠察队枪械,保护上海总工会,严惩流氓,肃清反动分子,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中国济难会主持召开市民大会,参加的有闸北、沪东、沪西及公共租界的市民5万多人100余团体;南市西门公共体育场也举行了市民大会,50余万工人、学生、市民群众列队示威游行;沪西区各工会联合会所属120个工会,12万工人在潭子湾举行大会,各厂还派代表1名,持沪西工联会函去26军司令部质问其缴工人武装理由,表达沪西工人抗议解散工会和工人武装。4月13日上午,全市罢工工人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大会,到会者达到10万人以上。大会报告了新军阀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缴工纠队的枪械并屠杀工人的经过,沉痛宣布汪寿华已被反动派暗杀。大会通过决议后,列队游行,前往二十六军二师请愿。当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军队从弄堂内冲出,猛烈开火,机枪狂扫,死者尸体遍街,伤者不计其数,时值大雨倾盆,宝山路血流成河,沪西工人田浦龙、刘增等8人也惨遭枪杀。下午,反动军队和流氓武装再次强占湖州会馆,上海总工会被强令解散,上海特别市政府被封闭、国民党市党部被解散,上海学联也被解散。从12日至15日,上海有300多工人被

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整个上海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中。中共沪西部委书记、兼区工联委员长余立亚(又名王炎夏),纠察大队长鲍孝良、彭天保等同志相继在枫林桥被秘密杀害。



从4月12日至15日,上海300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杀害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光辉一页,虽然在起义胜利以后,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革命从胜利转为失败,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伟大的历史意义不容降低。起义胜利后产生的由民众团体选举的上海市民政府,虽然仅存在了24天,然而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领导上海人民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新政权的伟大尝试,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的第一个民主政权。

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同中共决裂,并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这场大革命是在阶级力量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的。帝国主义、军阀以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力量,比刚刚兴起的革命力量强大得多。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来不及也不可能从容做好各种准备,便匆忙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以沪西的党组织为例,虽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气,但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

虽在群众运动中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但缺少成熟的领导艺术;虽在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但因没有充裕时间培养干部,未能形成各个层次的骨干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后来,毛泽东总结了这段历史,指出:“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

尽管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惨重的损失,但是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并没有停止,沪西的革命优秀儿女并没有被敌人的血腥的屠杀吓倒,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第三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8月 - 1937年7月)

第九章

革命低潮时期的沪西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难的年代，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亦即十年内战时期。南京政府建立后的一段时间里，用法律、行政、特务、军事等手段残酷地镇压任何革命活动，集中一切反革命势力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攻。中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成为最大的“犯罪”。为了彻底消灭共产党，1928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制止共党阴谋案》，其中称：“凡经审察确为属于共党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者，均应积极铲除，或预为防范。”2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30次会议通过《暂行反革命治罪法》，规定对“意图颠覆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或破坏三民主义而起暴动者”，分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上述内容被写进同年3月的《中华民国刑法》。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的领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党外革命人士倒在血泊中，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据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人。

沪西地区党的组织完全处于“非法”的地位，不得不转入地下，党组织几经改名，沪西地区党、团、工会组织屡遭破坏，多人被捕，惨遭

杀害。1934年冬,江苏省委被破坏后,沪西一级党组织在失去上级党组织的领导情况下亦不复存在。

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的队伍中的一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陷入混乱状态,党内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消极情绪。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悲观,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有的甚至公开向敌人忏悔,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成了可耻的叛徒。据1927年11月统计,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

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所吓倒。他们冲破反革命的高压,在黑暗中高举着革命的光辉旗帜,继续战斗。但是,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已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反革命势力已经大大超过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革命形势转入低潮。沪西地区的革命亦进入极端的困难时期。

二、沪西党团工会组织被打散

蒋介石在四一二事变后的第6天就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建立了军政合一的反动政权,对革命力量进行血腥镇压。同年的7月15日,原披着革命外衣的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亦叛变革命,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

1927年6月26日,新的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施高塔路(今山阴路)恒丰里104号成立,当天下午省委机关即遭到破坏,省委书记陈延年、组织部长郭伯和(前任中共小沙渡部委书记)等人被捕,7月初英勇就义,代理省委书记赵世炎亦被捕杀。在这同时沪西的党团组织相继被破坏,7月,中共沪西部委书记、沪西区工会联合会委员长余立亚和其他许多干部被杀害,机关也被破坏。沪西的中共部委、共青团部委、工会联合会等组织也相继被敌人破坏,革命同志纷纷转入地下。

沪西部委书记余立亚的牺牲是沪西地区革命组织的重大损失。余立亚又名余利亚,化名王炎夏(?—1927),湖南长沙人。他出身在湖南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独生子,万贯家财等待他去继承。从小受



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旧址：施高塔路恒丰里
104号（今山阴路恒丰里90号）

到崇尚爱国的文化思想教育，看到祖国山河破碎、清王朝的腐朽、袁世凯和反动军阀的专制，幼小的心灵萌发强烈的爱国之情，向往西方文明，希望病弱的中国能复兴富强起来。湖南是新思潮之地，蔡和森和毛泽东在湖南发起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像磁石般吸引了余立亚。法国，这是西方“自由、平等、

博爱”的故乡，他毅然辞别妻儿和乡亲，响应号召，报名参加赴法勤工俭学。1919年在上海，与一批湖南青年共同踏上赴法国轮船，漂洋过海一个多月，在马赛上岸，最终抵法国巴黎。到了法国，让他很失望。法国工人和中国的工人一样也是深受压迫与剥削，他们和中国劳苦大众同样在水深火热之中。失望的不仅是余立亚，还有先后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王若飞、陈延年、赵世炎、李富春、陈毅、聂荣臻、邓小平等青年。在法国他们接触到一些先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深地打动了余立亚，余立亚和周恩来、赵世炎等18个青年在法国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邓小平也加入了这个组织。1922年，中共中央的陈独秀决定余立亚等12位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初，中国国内革命形势开始高涨，中央又决定将余立亚等青年从莫斯科调回中国，余立亚先后在湖北、上海参加第一线的战斗。1926年9月初，中共上海区委决定任命余立亚为中共小沙渡部委书记，整顿已涣散的党组织。1927年3月7日，中共上海区委领导和组织上海工人准备举行第三次起起义，决定对全市8个部委作部分调整，其中小沙渡部委和曹家渡部委合并为中共沪西部委，由余立亚任中共沪西部委书记，精心准备第三次起义。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余立亚率

领沪西工人起义的战斗队打垮了盘踞在沪西的军阀部队,并在周恩来的总指挥下,又投入火车站的总决战,终于取得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数万工人在闸北青云广场召开抗议大会,在沪西有12万工人在潭子湾举行大会,抗议解散工会和工人武装。但是,敌人疯狂镇压,大开杀戒,英勇善战的指挥者余立亚最后不幸在枫林桥被敌人腰斩杀害。

然而,英勇的沪西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没有被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所吓倒。他们冲破反革命的高压,在黑暗中高举着革命的光辉旗帜,以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的信念。这些英雄的后继者,擦干战友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尸身继续战斗。

被敌人杀害的何止余立亚等沪西一些英烈。沪西牺牲的人员除上述的外,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个岗位牺牲的还有:徐玮、龙大道、郭景仁、糜文浩、谢文锦、曾延生、胡南山、张佐臣、鲍孝良、陈怀璞、宗益寿、何孟雄、陈寿昌、李林、党维蓉、毛春芳、汤久芳、陈钧(陈之一)、夏采曦、了君、周朴农、胡阿林、孔昭辛、林一丰、陈同、吴玉书、何福林、陆根大、郭纲琳等等,还有更多没有留下姓名的无名烈士。

三、革命低潮时期的沪西工人

蒋介石集团在血腥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后,建立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开始加紧对工农大众的压迫和剥削,以维持其反动统治。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当局以东路军总司令部特务杨虎为上海警备司令,成立了“上海工人组织统一委员会”(简称“工统会”)这一御用工具,破坏革命工会,自封为“上海各工会最高机关,负责改造指导工会之责任”,叫嚷要“将前有之总工会抽皮换骨”。工统会的首要任务是帮助蒋介石清党,搜捕共产党工会干部、工人积极分子,上海总工会被迫转入地下,大批工会领袖被杀害。从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到这年12月初,上海工人和共产党员被杀害的计2000人以上,被

捕、遭监禁和遭开除的达万人。沪西地区被害的工会领袖除沪西工联委员长余立亚等外,还有上海总工会第五办事处(曹家渡)主任张佐臣、纠察大队长鲍孝良、彭天宝等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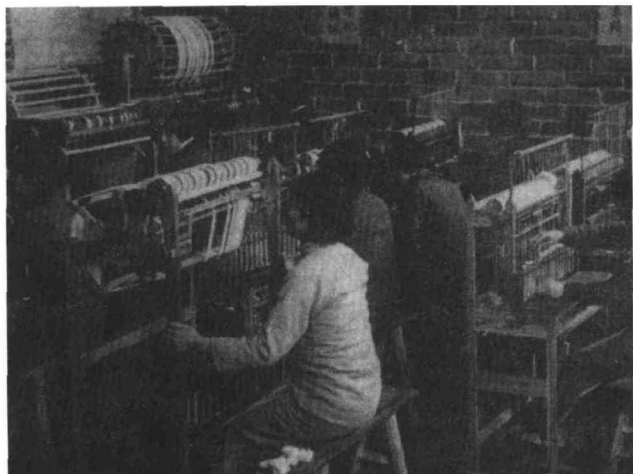
沪西工人纠察
队长彭天宝

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后,上海的中外资本家乘机向工人反攻倒算,推翻在市民政府时期曾经允诺工人的条件,使工人生活重新陷入痛苦之中。曾任沪西曹家渡地区团组织负责人的瞿景白曾对纱厂工人生活状况作了调查:1927年3月,各厂工会分别向厂方提出改善工人政治经济方面待遇的要求:承认工会有代表全体工人之权利;不准无故开除工人及罚工钱;增加工资10%~30%;每月发4天赏工,停一天工不得扣除;节

假日工资照发,阴历年底发双工,礼拜工以双工计算;病假工资照发,并酌给医药费;每天工作8小时,午饭关车一小时;女工产假60天,工资照发等等。当时这些条件大多为厂方接受,故有“纱厂工人黄金时期”之称。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资方不仅取消了过去承诺,而且加重了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以前在吃饭时有半小时停车,现在也取消了;原来车间里本来有椅子可以坐坐休息休息,也取消了;以前在放工前可以早停15分钟给工人穿衣服等,现在也取消了。对付童工是非常残酷,工头整天拿着竹鞭像打牛马似的打他们”。工资尾数由大洋改为小洋计算;取消热水供应,只有冷水泡饭;工人每天出厂时恢复搜身检查制度;工厂内驻军,防止工人罢工;许多工厂辞退成年男女工人,而以童工和农民代替。据杨之华在1929年统计,“上海租界和华界的童工总数,约占产业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

中外资本家还采取增加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来加重对工人的剥削。纺织厂原来每个工人管一二台车,现增加到每个工人管二三台车,甚至要管4台车。过去3~4个工人的工作量改由1~2个工人来承担。工厂每天工作时间,一般为9小时半,有的要做12小时,有的纺织厂工人要做16小时。工人终日劳动,却得不到温饱。工厂工人每天的工资,熟练工人最高为1元左右,最低的仅2角左右,多数

在五六角;手工业工人甚至只有1角5分。工资水平如此低下,而基本生活费用却不断增高。据统计,1926年六七月间,4口之家的生活费用,每月为21元。1927年9月,2个人的生活费要22元,1个人的最低生活费就要12.5元。以上折算,按6角一天,月收入18元,也难以维持2口之家,可见当年的工人生活之贫困。



纺织女工为了生存,拼命加班,以求多挣钱,养家糊口

中外资本家不仅取消了以前的承诺,并且以种种借口,大批开除工人。1927年夏,中华书局资方借口“营业不振”,陆续开除工人360人;日商内外棉五厂两次解雇所谓“煽动罢工嫌疑”的工人120人。

尽管中外资本家以各种方式加紧压迫和开除工人,但工人并没有停止反抗。1927年四一二至12月的近9个月中,上海各业工人罢工仍有96次,其中政治性罢工19次,经济斗争的罢工77次,参加罢工的有14万多人。

经过大革命锤炼的上海工会干部和沪西工人阶级,面对资本家的反扑,进行了积极的反抗,他们坚决表示,“投红不投白!”“扯了红旗不扯白旗!”坚决拥护革命的老工会,反对反动的工统会。他们不避艰险,勇往直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沪西的党团组织继续战斗,广大沪西工人阶级又开始了新的战斗征程。

四、中共沪西区委在腥风血雨中重建

1927年4月和7月,国民党的蒋介石和汪精卫两个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大肆屠杀,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统

治。但革命者没有被杀绝,中国共产党在此严峻的形势下,没有被分化瓦解,而是在腥风血雨中坚强地挺了过来。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成立时,决定了三件大事:一、举行南昌起义;二、发动秋收起义;三、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曾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给工人上课的上海大学学生李硕勋参加了南昌起义;曾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给工人上课的上海大学社会系教授瞿秋白在汉口参加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确立了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上瞿秋白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政治局负责人。曾是中共沪西支部成员、领导沪西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领袖邓中夏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党在上海地方的秘密领导机构——中共江苏省委 1927 年 6 月成立。中共五大后,中共中央根据新的党章,对各地组织机构作了一些调整,决定撤销中共上海区委,分别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浙江省委,并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规定,江苏省委同时兼上海市委,直接领导上海各区委。新组建的江苏省委书记为陈延年,6 月 25 日因叛徒告密,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陈延年等 3 人牺牲;代理省委书记赵世炎上任没几天,又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1927 年 8 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组建江苏临时省委,政治局候补委员王若飞兼任江苏省委书记,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配备各区领导干部,将上海原有的 8 个部委改建为区委。1927 年 10 月,中央常委和中央机关迁回上海。上海这座中国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城市,有较好的工作基础,中央决定机关设在租界,以便进行秘密活动。

11 月 9 日至 10 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决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重心放在组织各地农民暴动方面。

中共沪西部委书记余立亚牺牲后,江苏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迅速建立党秘密工作和党的秘密工作机关,决定中共南市部委组织部主任陈怀璞为中共沪西区委书记,但很快王若飞又将中共沪东部委书记张永和调入为沪西区委书记。是年 9 月,张永和调省委工作,决定省委候补委员、省军委书记何孟雄(廖慕群)兼任沪西区委书记。1928 年 1 月,省委决定赵容出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赵容又名张文清、桂生、康生。在任职的 5 个月内,设立职工运动委员会,重点抓基



中共沪西区委
书记何孟雄

层工厂,建立儿童团、姐妹团和同义会等党的外围组织。是年5月省委决定区委设置常委,陈怀璞任书记,他任职20多天就不幸被捕。

陈怀璞不久牺牲。省委决定任李林为沪西区委委员、代理区委书记。同年7月,省委任命省委委员陈寿昌出任沪西区委书记,同时省委批准成立沪西反日大同盟行动委员会。9月,陈寿昌调中共中央特科四科科长,省委任命党维蓉为区委书记。冬,相继任沪西区委书记的还有黄文

蓉、赵秀生、于林等3人。

在这期间,沪西共青团组织与中共党的组织进行着同样艰辛的奋斗。沪西共青团组织机构与党的区委建制相一致的,团的区委属共青团江苏省委领导。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青团组织也转入地下。1927年8月上旬,沪西团的基层支部有21个,团员267人。1928年8月,团省委派出工作组到曹家渡地区整顿和发展地区组织,决定沪西地区分为小沙渡和曹家渡两个区委,至11月,在工作走上正轨后,团省委又决定把两个区委合并恢复为沪西区委。在此期间,团的干部调动十分频繁,从1927年8月至1930年7月,可以查实的团区委书记先后有黄临川、匡梦苏、周扑农、赵和、赵启屏、周了君、胡均鹤、王影棠。1930年9月27日,伍豪(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三次全会上作的组织报告批评说“上海共青团沪西区3个月之内换了11次人”。

在革命时期成立的沪西工联会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破坏,国民党的上海工统会乘机打入沪西一些工厂。1927年8月,上海总工会派特派员易国杞、董锄平来沪西恢复工会。这期间,先后有工会组织:沪西工会联合会、上海总工会沪西工人代表会等。

上海总工会沪西工会联合会成立,9月区委决定设职工运动委员会领导工会,区委委员易国杞为分管领导。1928年2月,上海总工会机关被敌人破坏,区工联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后区委为加强工会工作,相继建立了赤色秘密工会和兄弟团、姐妹团和同义会等组织。同年8月统计,工会人数有560人,在20个工厂中建立了类似工代会的组织。

五、沪西革命运动的复苏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中国革命进入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新时期。此刻,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愤怒,党内普遍存在着一种急躁拼命情绪,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犯了“左”倾盲动错误,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要求各地举行武装起义,党的任务在于“创造总暴动的局面”、“党的工作都应以准备或发展暴动为其重心”。

沪西工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了多次罢工斗争,1927年8月22日,内外棉五厂工人2000余人,以反对厂主无理解雇120名工人为名,举行大罢工,提出要恢复工会、被开除工人复工和增加工资的要求。内外棉七、八、九等厂约4000人为支援五厂工人而发动了声援大罢工,党员则在罢工中散发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册子。9月8日,同兴纱厂1600名工人又发动了反日大罢工,发出抗争的呼声。为此,11月11日,中共江苏省委指示“沪西区委群众斗争经验好,”要加紧发动大罢工;11月17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告内外棉工友书》,发出“暴动是我们目前唯一的任务,只有暴动这一手段,才可以取得我们工人阶级的利益。”号召工人以工会组织为武器,进而为自身的利益奋斗。党内“左”倾盲动错误后来虽有纠正,但复仇情绪始终没有减弱。1928年的沪西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的进行,8月25日,沪西工人代表会主办的《沪西工人报》创刊,相继发表《告沪西工友书》、《致保卫团团员书》、《为反对开除工人告内外棉工友书》、《反对东洋资本家压迫,再告沪西工友书》,号召“男女工友一致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剥削的资本家,反对开除工人,反对罚停工,反对加重女工工作,男女童工团结起来。”沪西区委出版的《无产阶级》册子,以加入共产党后的责任为主题,加强对党员的教育。

大革命失败后,沪西的党组织没有被全部打垮,有些党组织继续在坚持战斗。中共沪西区委组织部高骏向省委组织部报告时写道:1927年9月同志共295人,其中女同志54人,男同志241人。支部可以经常开会,能起作用的有内外棉三、四、五、七、九、十二、十四、十五厂、同兴、

日华三厂、喜和二厂、溥益一、二厂、统益、崇信、福新等 16 个厂和大夏大学共 17 个支部,其中比较能够单独开会解决问题的,只有同兴、十五厂 2 个支部。有党员但未能开会的有中孚、手工业、民生、鸿章、振泰、申新二厂、公益、喜和一厂、日华四厂、西五厂、八厂等 11 个厂。

1927 年 9 月任沪西区委书记的何孟雄立刻对沪西的党组织进行整顿,他指出:“沪西工厂最多,而我们有组织的太少,有组织之支部,又多不健全,所以改良所有支部发展新支部,是十分必要的工作。”于是起草了《沪西十月份工作大纲》和《沪西整顿支部计划》,沪西地区的党组织的活动开始有了新起色。

汤久芳是沪西估衣业工人总干事。区内有许多估衣业的小店,抗争力量分散。汤久芳不辞辛苦,奔走于各店之间,将工人团结起来,为工人的自身利益而奋斗。1928 年,7 月,资方再次撕毁劳务协定,汤久芳组织罢工委员会,与资方坚决斗争,取得全市各业工会和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翌年 4 月,估衣业工人的罢工斗争再次掀起,上海总工会发表了《估衣业工友惨被长期暴压告上海工友书》,在全市各业掀起抗议浪潮,震惊了国民党当局,当局勾结了帝国主义巡捕房,通缉汤久芳等一批工会干部。7 月 19 日,估衣业工会召集石路区代表开会,汤久芳亲临会所现场指导工作。由于资本家发现告密,国民党与捕房合谋将会场包围,将一份伪造的密信塞进汤久芳的口袋内,并将与会的一行人全部押进捕房,最后移交龙华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施以各种酷刑,逼其招供是暗杀犯。汤久芳坚贞不屈,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卑劣行径。7 月 31 日,汤久芳等 4 人被枪杀于龙华,8 月 9 日,上海工会等联合发表《为国民党杀害工友书》、《为追悼汤久芳、李有臣等罢工领袖的宣言》,指出:“国民党当局以暗杀党的罪名,嫁诬汤久芳、李有臣、黄福生、陈雨生等四名罢工工人领袖”,“他们为工人利益,阶级生存一再与敌人决斗!他们不但是工人的领袖,民众的先锋,而且还是冲锋陷阵的革命健将,无产阶级的英勇战士。”192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1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思想上、组织上有了新的统一认识,认识到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中国现阶段革命依然

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工作重心由组织暴动转为争取群众,准备起义,并提出发展红军,发展根据地的问题,但党的领导中心仍在城市,着眼点是城市武装暴动。

中共六大后,中央高度重视以上海为中心的江苏党的工作,积极传达党的六大会议精神,省委常委分工联系和参加区委会议,提出上海工人运动尽可能利用分开机会,将反帝运动与工人日常斗争结合,防止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在组织上,建立坚固的产业无产阶级的基础,健全支部作用,使支部能独立工作。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维汉、项英、罗登贤等组成巡视组巡视上海党和工会的工作。

中共沪西区委积极贯彻六大路线,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多样形式,开展群众工作,领导群众日常斗争,从组织暴动转到争取群众,领导日常斗争的策略上来。区委创办了一些面向基层党员和工人群众的通俗刊物和工人小报,其中有《无产阶级》、《工人之路》,这些刊物的文章大多短小精悍,资料丰富,内容通俗易懂,写出了工人的痛苦生活,揭露了资本家压迫工人的罪恶,深受党员和群众的欢迎。工人的读书班和工人学校又办了起来。1928年8月,上海总工会沪西工人代表会成立,上总派刘裕光为特派员,帮助日商内外棉纱厂召开职工代表会(区工代会),刘裕光被选为区工代会主任。沪西工人代表大会为法租界电车工友罢工发表《告沪西工友》,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一致打倒帝国主义。

1928年12月1日至9日,李维汉(化名镜松)巡视了沪西区委。他先后参加沪西区委会议、区委宣传会议、活动分子会议及崇新、绢丝、内外棉四厂、统益纱厂等支部,与工会特派员刘裕光等人谈话。

1929年7月1日,沪西工会联合会(工联会)成立,4日,建立沪西工人俱乐部。30日成立沪西纱厂工联会。区工联会成立后,积极组织和支援各厂工人的经济斗争。1928年的五卅运动三周年来临之际,省委决定以开展纪念活动为契机,推动群众运动的发展,组织5月30日的万人游行和罢工。

第十章

党内“左”倾错误路线在沪西的贯彻和危害

一、“左”倾错误路线时期的沪西党团组织

从1929年到1930年,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国内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爆发蒋介石对桂系李宗仁的蒋桂战争,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三派的剧烈斗争,张发奎和唐生智、石友三的反蒋斗争;在国际上,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的经济危机,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有了较大发展,形成世界范围的革命高潮。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看到有利形势的变化,又受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开始发热,逐渐在党内形成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部长李立三提出的左倾错误,史称“立三路线”。沪西的党团组织积极贯彻中央的盲动路线,给地区的革命带来惨重的损失。

中共六大后,中央将上海列为全国革命斗争的前哨阵地,加强对上海和各区委党组织的领导,充实工人干部到党组织的领导岗位上来。1929年1月24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江苏省委,原省委部分成员调任区委以加强区的工作。25日,省委任命林育英(张浩)任沪西区委书记,常委8人,原江苏省委常委何孟雄下放沪西区委,以加强区委工作。后省委又将李硕勋调沪西



中共沪西区委
书记李硕勋

任书记。

1929年初,沪西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的斗争成为上海工人斗争的中心。内外棉纱厂资方借口销路减少,以停工关厂相威胁,普遍扣发工人工资,大批开除工人,激起工人强烈不满,内外棉七厂工人举行罢工反对开除工人。中共沪西区委决定发动女工中心分子到内外棉五、八、十二厂中去向群众宣传七厂的斗争,以发动整个内外棉纱厂工人起来斗争。中共江苏省委关注七厂罢工斗争,决定发动上海工人开展年关斗争。2月4日,内外棉四厂工人为补发工钱,恢复工作,发表《告工友书》,痛斥东洋资本家在年关之际,克扣工人工钱,大批开除工人的卑劣行径。2月6日,沪西日商麻袋厂工人为要求年关增加工资发表《告工友书》,指出:“工人辛苦一年,厂里赚了40万块钱,我们工人只落得两手空空。要求厂里发给每个工人5块过年钱;承认增加的工资要马上发给;新年发双工。”“号召”工友大家抱义气,团结起来向厂里交涉。”2月17日,省委发布《关于沪西内外棉纱厂斗争决议案》,指出“内外棉纱厂工人反对扣罚工资和关厂停工的罢工斗争,不仅开创沪西群众斗争的新局面,而且推动整个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省委指示全市各级工会和党团组织要在这场斗争中,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力量。

是年3月19日至23日,沪西区委书记林育英参加省委召开的扩大会议,省委针对各区不同特点,分别制定了各区的工作中心和重点。但会议过分强调反对改良主义而使新的“左”倾产生,把党内原来正确利用合法斗争的策略也当作改良主义批判。

4月15日,省常委会决定开展红五月活动,中央、省委、上总等代表组成总行动委员会,李立三、项英、周恩来参加总行委,以林育英为首的沪西区五卅纪念筹备会成立,组织了宣传队,飞行集会演讲队。

筹备红五月活动期间,沪西发生了张学良事件。5月19日晚,沪西新加坡路(今余姚路)一老虎灶灶主张学良在胶州路英国兵营外遭英国兵殴打致死,引起公愤。各界纷纷成立后援会,要求惩凶抚恤。中共江苏省委决定以张学良血案扩大反帝斗争。22日,上海总工会为英兵殴毙张学良发表《告同胞书》,号召同胞们起来为张学良复仇,

反抗帝国主义屠杀政策，一致起来纪念五卅惨案。25日，上海各界张案后援会在邮务工会召开代表大会，到会百余团体，1000多人集会抗议，决议要在5月30日公祭张学良，在全市掀起反英帝国主义的高潮。29日，中华人道互济会及上海分会为“张学良惨案”发表《告民众书》，号召全市人民奋起反抗英帝国主义，夺取张案交涉胜利。沪西的示威队伍在中共沪西区委张浩（林育英、林春山）带领下，抬着张学良尸棺示威，抗议浪潮被推向高潮。

“张学良惨案”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沪西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一场斗争。该斗争一直坚持到8月底，在8月30日，英帝国主义的军营军事法庭被迫宣判英国水兵凶犯徒刑1年，付丧殓费500元、抚恤费4500元。

1929年5月30日是中共江苏省委计划进行的“五卅”四周年纪念活动日。省委在计划四周年纪念活动时提出：“目前革命形势是反动统治内部矛盾激化，工农斗争开始复兴。我党总的策略是争取公开活动”，并提出“飞行集会”是发动群众的一种策略。”要求各工会组织工人群众在“五卅”纪念中，运用飞行集会斗争形式，进行示威活动。



中共沪西区委
书记张浩

5月30日，上海示威群众从清晨起就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南京路两旁，10时，人山人海的示威者在南京路示威、呼口号、散传单，群情激昂。沪西队伍携手并肩前进，冲破反动军警一道又一道封锁线，在南京路上高昂向前。正在行进中，突然挥舞警棍的巡捕如潮水般冲进队伍，见人就打。见有两位妇女被巡捕揪住头发，往死里猛打，区委书记张浩奋不顾身与巡捕搏斗，两位妇女摆脱了敌人魔掌，而张浩被打得遍体鳞伤，尤其脑袋被猛击重伤被捕。是日，在劳勃生路、槟榔路等马路都有学生在散发纪念五卅惨案四周年传单，巡捕到处追捕散传单的学生，一批学生被逮捕入狱。

1929年的五卅示威，是大革命失败以来党在上海组织的一次规模很大的示威活动，表明中共六大争取群众路线的贯彻获得了初步

的成绩,党组织有了恢复发展,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但是这种斗争在白色恐怖统治条件下,极易遭到敌人的镇压,不利革命力量的保存,在斗争中,沪西区委书记和多名沪西干部和群众相继被捕。张浩被捕后,省委决定毛春芳接任沪西区委书记。

1929年8月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5周年纪念日,共产国际号召在这一天举行全世界的总示威,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5月19日的政治局会上决定在南京路组织群众举行纪念五卅四周年的示威活动,并成立了由中央、省委、上总等组成的总行动委员会,指挥这次活动,李立三、项英、周恩来等都参加总行委。中共江苏省委亦开始筹备八一示威。7月7日,沪西工会联合会成立。14日江苏省总行委在小沙渡路召开反帝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沪西及各区的工人、学生等600余人。会上,省委宣传部长任弼时出席大会,并通过“八一”罢工、罢课、罢市示威决议。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参加的群众近千人。当游行开始后,有大批西捕和华捕出动镇压,群众奋起反抗,这次行动有27人被捕,被捕的大多是学生。7月15日,省委决定成立“八一”行动委员会,周恩来、江钧(项英)、罗登贤组成主席团,罗登贤为书记。并决定各区的主席团,沪西主席团成员为毛春芳,周荣生、胡均鹤、刘抱一,后刘抱一被捕,补王咏为委员。区委书记毛春芳兼行委书记。在这同时,省委加紧筹建反帝大同盟,推举工联、张案后援会等5个团体代表组成常委,将反帝大同盟活动与八一示威结合起来进行活动。7月21日开始,沪西工联会发表告沪西工友书,号召沪西工人团结起来,募捐支持东亚麻袋厂千余工人的罢工斗争。26日,上海反帝大同盟、沪西工联会、华南大学、群治大学、大夏大学等20余团体2000余人,在小沙渡、澳门路口空地举行群众大会,大会分组进行宣传、发传单;31日,沪西工联会再次举行有20多工厂参加的集会活动。

8月1日,是省委计划中的重大示威活动。在反帝大同盟等团体领导下,全市的工人学生集中到南京路示威。沪西工人、学生群众冲破军警警戒,到南京路、福州路、外白渡等处举行游行示威,共持续4个多小时,20多名群众被捕。

“八一”行动委员会的活动结束后,总行委机构也结束,恢复省委工作,8月3日,中共沪西区委也恢复工作。

从1929年5月以来,党在上海举行了多次示威活动,“八一”示威后,又举行了“九一”、“九五”、“九七”、十月革命节、广州暴动等纪念活动,集会示威。

8月下旬起,工会、团、反帝大同盟、互济会等组织进行筹备,决定自9月1日至7日为反白色恐怖行动周。”沪西青年为发动“九一”示威,8月27日,在东京路、澳门路集会,散发传单5000多份。28日在大自鸣钟、29日在麦根路叉袋角、康脑脱路(康定路)集会、散发传单。嗣后沪西又组织了“九七”、十月革命节等纪念活动,集会示威。12月11日,为纪念广州暴动2周年,在沪西工会总指挥下,5个团体分别在东京路澳门路,劳勃生路举行飞行集会。25日,圣诞节下午5时,近百名工人学生在劳勃生路、东京路一带举行露天演讲会,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我国的阴谋,散发反基督教大同盟宣言和传单,高呼口号。听众充塞于途,交通断绝。

1930年1月13日,地处苏州河畔的美商安迪生灯泡厂千余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释放11日被资本家逮捕的王大昌等3名工人,国民党军警开枪镇压,当场打死女工王阿四,重伤10余人。工人与军警搏斗中,将国民党六区区长扣留。大批美国水兵和巡捕介入镇压队伍,并用武力抢夺了区长。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相继向全国、江苏、上海发出通告,全国声援沪西安迪生灯泡厂工人的抗暴斗争。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关于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屠杀电泡厂工人宣传大纲》、《为国民党、帝国主义、资本家屠杀安迪生电器厂工人告全上海革命群众书》,号召成立后援会,举行举行同盟罢工、罢市、罢课,反对屠杀压迫,举行募捐援助被难工友。为指导安迪生电泡厂的斗争,决定建立沪西区行动委员会,负责人周荣生,后赵容(康生)为书记,5人组成主席团。公开指挥为胡均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方局书记罗登贤亲临沪西指导安迪生灯泡厂斗争。2月7日,安迪生灯泡厂被捕工人王大昌等无罪释放。

二、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时期的沪西工人运动

中共六大以来,党内一些高级干部认为世界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国内的统治阶级也一天天走向崩溃,中国革命也已进入“成熟复兴”和“直接革命形势”。1929年11月,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就革命新的高潮与直接革命发生激烈争论。原沪西区委书记、时任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抵制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以1926年沪西工人争取米贴斗争为例,反对冒进,要大家记住斗争失败的教训。4月15日,何孟雄又提出“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的占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恽代英、陈云等在会上反对李立三的城市中心论。但是,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得到大会的认同,通过了关于政治、组织、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共青团工作及武装保护苏联、反对党内取消主义与取消派等决议,“左”倾错误思想开始表露。1930年3月初,中共中央组织局改由李立三参加,从此李立三成为六届党中央的实际领导人,开始部署一些“左”的政策和行动。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部署,发出通告,号召全省党团组织发动政治罢工、同盟罢工,扩大游击战争、发动兵变,使群众斗争汇合成总暴动。3月中旬,江苏省委制定了上海三八示威走向五一总罢工的工作大纲。3月22日,又成立李立三任书记的上海总行动委员会。李立三提出:上海党应准备“在‘五一’组织一万二万人的罢工运动”。强调说,上海有80万工人,能靠自己的力量,举行暴动,夺取政权。3月27日,沪西根据省委指示,成立了五月斗争行动委员会和主席团,省委特派夏采曦任委员会书记。沪西行动委员会训练30个工人纠察队,准备参与上海总暴动;组织发动政治同盟罢工;举行飞行集会和示威。4月4日,沪西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在大夏大学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内外棉九厂、喜和、崇信、溥益、永安、申新、同兴等20余厂代表,大夏、南洋、亚陆、国华建南等学校代表,沪西工联会,纱厂工会沪西办事处,革命学生会筹备会等团体代表及工人纠察队200余人。会议通过五项提案:①“五一”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示威;②拥护全国

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出席代表;③通过同盟罢工条件14条;④通过“五一”纪念筹备会名单;⑤通过“四一二”示威。11日,沪西工人集会追悼沪西纠察队长刘义清烈士,表彰他在8日声援南京“四三”惨案中遭巡捕枪杀的英勇抗争精神。20日,沪西派出纠察队到杨树浦参加上海市工人纠察队第一次大检阅,向敌人示威,很快暴露了革命力量。4月27日,沪西派出250名代表到东新桥参加上海五一纪念筹备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一次被捕104人。在纪念五一的行动之前,就有400余人被捕。5月1日,沪西工人、学生到南京路参加了全市数万人的五一纪念示威游行,人们高唱“国际歌”,全场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口号,散发了大量传单。当天许多人被捕。5月18日,又在总行委的部署下,沪西发动和训练女工妇女参加纠察队,准备罢工时执行罢工纪律,为武装暴动奠定基础。5月30日,是五卅5周年纪念日,沪西组织队伍到南京路参加全市的游行和示威,沿途高喊“推翻国民党政府,中国苏维埃万岁”“推翻帝国主义,全世界无产阶级劳苦群众联合起来”等口号。一路上,遭到军警镇压,多人再次被捕。

一系列的五月斗争行动失败后,区的行委撤销,并恢复区委建制,6月3日,省委重新决定区委人员,赵和为沪西区委书记。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它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又一次在党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中央决定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南京进行兵暴;上海组织总同盟罢工与准备武装暴动;广州、香港、哈尔滨、大连、抚顺准备暴动;陕西、甘肃、新疆打通苏联通道;红军集中攻打长沙、武汉、南昌,并向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为了实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中央决定“党的组织在武装暴动时,完全要军事化”,将共产党、共青团、工会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一切正常工作停顿下来。

7月14日,中共江苏省委改组为江苏省总行委,李立三任书记,积极准备上海、南京暴动,并加强京(宁)沪铁路沿线城市 and 各县工

作,准备以各地的红军游击武装进攻中心城市,配合中心城市暴动。沪西区由江苏省总行委任命赵和为沪西区行动委员会书记,9人组成沪西主席团,省委派夏采曦出席沪西行委会议指导。鉴于沪西区幅员广阔,总行委又决定在周家桥设立分区行委,任命赵健为分区行委书记,后由胡阿林任书记。沪西区行委积极贯彻中央的精神,作武装暴动准备。到16日,沪西丝厂和大夏大学、暨南大学等工人学生和上海其他人员到西藏路、南京路飞行集会,示威、散传单,历时半小时,沿途被捕32人。17日召开沪西各纱厂工人代表大会,布置“八一”罢工示威事宜,很快被国民党警察侦破,并逮捕27人,其中有3名区行委干部,省总行委立刻补充区行委领导成员。

8月1日,李立三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南京兵暴、武汉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在组织上,将共产党、共青团和工会合并,停止正常活动,撤销何孟雄领导职务,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北方局、长江局、南方局、江苏省委也都成立了总行动委员会,集中一切力量搞武装暴动。在中央的雷厉风行的指令下,全国都行动进来了。

在上海,李立三不顾条件许可,凡是碰到个别的经济罢工,总是要把它推向全市总同盟罢工。法商水电公司工人为改善经济罢工,遭到租界巡捕镇压,省行委发出第一号通令,援助法电罢工,要组织上海80万工人总同盟罢工,沪西派出大批人员到英商电站散发传单,声援法商工人;英商老怡和丝厂和闸北丝厂罢工,省行委立刻组织声援,高喊“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革命!”“消灭军阀混战!”“建立苏维埃政权!”“拥护红军!”“庆祝工农红军二次占领长沙!”9月7日是国际青年斗争日,又是庚子义和团事变后,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辛丑条约的国耻纪念日,中央号召九七大示威。这些活动中,沪西行委都积极组织工人学生参与斗争,但都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许多人员被捕。总行委许多指示都是脱离中国实际的,不少决议和命令最后成了一纸空文。在湖北,沪西原工人领袖孙良惠这时已奉命出任湖北省总工会主席,他在奉命执行李立三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决策时,组织薄弱的革命力量进行暴动

革命活动,被敌人捕获枪杀。

9月14日,省总行委宣布,上海东西北南4个边区正式分为8个区,沪西成立小沙渡区和曹家渡两个行委区,小沙渡行委区书记为赵和,曹家渡行委区书记为胡阿林,省委夏采曦负责指导两个行委区的工作。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于上海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全会批评李立三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决议李立三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撤销江苏省总行委和上海各区行委,恢复党团工会各自独立的领导机关和组织系统,小沙渡和曹家渡分别恢复改为区委,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沪西革命带来的危害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左”的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正常工作。但不久,在共产国际米夫的扶植下,在中国党内又出现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严重危害了中国共产党,也给沪西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

王明原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因拥护副校长米夫(后任校长),深得米夫器重,掌握了中大支部领导权,搞宗派活动,打击迫害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邓中夏及吴亮平等一批正直学生。1929年中国革命形势发展,需要一批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学生回国参加革命,其中有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王明。这时的王明已是共产国际米夫的得意门生,是中山大学中国支部局的负责人。米夫急于要将王明安插到中共中央工作,就在王明3月中旬回国之前,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要中央妥然安排王明工作。但是,中共中央在当时有个规定,刚从苏联回国的学生都因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一般不直接安排到中央工作。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秘书长恽代英等同志虽已接到米夫的电报,但仍坚持中央的人事安排原则,经研究,决定将王明安排到上海沪西区委工作。时任区委书记的张浩决定安排王明在宣传部任干事。在宣传

部工作期间,他能积极完成组织上交办的宣传工作,并能多次参加秘密散发传单标语工作,直到7月27日离任到沪东区委工作。他离任时,还写了一首七绝诗:“见空就投飞似箭,背人即贴快如风;莫言此道学无用,手足机灵耳目聪”。沪西革命工作应该对他有所教育。但是,由于王明在莫斯科已与共产国际米夫沆瀣一气搞宗派主义活动,刚回国在沪西区委工作时,尚能服从组织分配的工作,但离开沪西后,到沪东区委、《红旗》编辑部、中宣部等部门工作不久,其宗派活动的野心便暴露无遗。他刚到中宣部任秘书职时,发现比他早回国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吴亮平也在中宣部工作,立刻以中宣部秘书身份,对吴亮平罗织莫须有罪名将其驱逐出中宣部,下放到基层批判,以泄没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整垮吴亮平之恨。之后又借机打击与他观点不一的何孟雄等许多同志,在党内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派主义活动。后来,王明因搞宗派活动受到党内处分。可是在米夫的压力下,中共中央又撤销了对王明搞宗派活动处分的决议。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以共产国际名义和不正常的组织手段控制会议,强行将王明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王明便以反对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为旗号,宣布“六三路线”的实质“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际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一个新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并在反“右倾”的口号下,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对怀疑、不满意或者不支持他们的同志,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原沪西区委书记何孟雄在党内受到王明残酷斗争,1月17日,被叛徒出卖入狱。王明获得情报也不予营救,坐视同志的被捕,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24位同志不幸于2月7日被敌人集体枪杀于龙华。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党中央取得领导地位,统治长达四年,给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给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中央机关和领导人迅速转移,周恩来等撤到中央苏区,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王明到莫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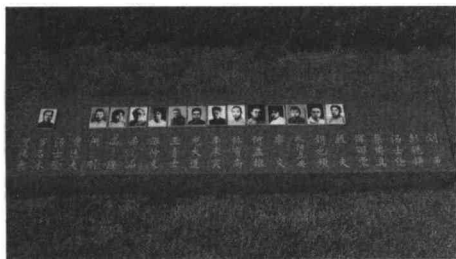
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
在此处发掘出烈士的遗骸

方针,鼓动不惜一切代价,将所有的活动和斗争要与拥护苏联、推翻国民党政府挂起钩来。贯彻“左”倾冒险主义路线,3月17日,沪西区委与沪南、沪北区区委签订革命工作竞赛合同,提出用一个月时间突击发展60名党员、新建5个支部、30名工人到红军等许多不合实际的目标和任务,18日,区工联发表宣言,号召学习巴黎公社经验,组织赤色工会、纠察队,实行总同盟罢工,以武装暴动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

1931年1月,由原中共江南省委改组为江苏省委后,原沪西的小沙渡和曹家渡两个区合并为中共沪西区委,小阮(阮锦云)为书记。5月12日统计,沪西能正常开会活动的只有5个支部。省委强行命令,要与不能搞飞行集

会、不能公开散发传单的观点作斗争,强调区委要大规模组织飞行集会,对不执行指令的组织和同志扣上“机会主义”帽子予以批判。6月29日,省委作出“八一”工作的决议,规定沪西区的申一、统益、公共汽车、面粉等单位成立筹备会或其他名义的斗争委员会,建立纠察队、自

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负责中国事务,遥控中国共产党。由于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6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责。这个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随后得到共产国际批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方



龙华烈士陵园内二十四烈士墓

卫队、拳术社等武装组织,随时发动武装起义。

在王明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路线指导下,沪西工人运动屡遭挫折,1934年美亚绸厂大罢工的失败是典型的案例。美亚绸厂是上海有革命传统的工厂,除有总厂外,在全市还有14个分厂,工人有4500余名,其中在沪西有美亚二厂、四厂。在法租界马浪路(马当路)美亚绸厂总厂当工人的邢子陶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领导美亚十厂罢工,并联系和发动各厂罢工和怠工,成立总罢委,任主席。但斗争失败被开除出厂。之后他任共青团法南区委组织部长,10月任沪西共青团区委书记,在美亚各厂建立团组织,领导了美亚绸厂工人的革命斗争,为1934年初的美亚绸厂大罢工打下了基础。2月11日邢子陶被捕,但美亚绸厂的斗争没有停止。3月7日,为反对资方工资打七折,在共青团美亚六厂支部领导下,工人举行大罢工。各厂成立罢工委员会,组织工人纠察队,出版《罢工日报》。3月11日,千余工人包围美亚绸厂总厂,资方勾结法租界巡捕房,出动大批巡捕镇压,80余人被打伤,3人生命垂危。国民党社会局和国民党市党部出面调解复工,提出工人先复工,成立工会,再与资方谈判。但中共上海局认为上海大规模的政治斗争时机已到,要以美亚绸厂的斗争掀起更大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中央和全总决定,要江苏省委以美亚绸厂罢工为旗帜,推动整个上海的罢工斗争。这是脱离美亚绸厂罢工斗争的实际和上海的实际,要将经济斗争变政治斗争,排斥利用合法斗争的可能。于是,在不顾革命力量的大暴露的前提下,在4月11日,罢委会又发动了4000余名工人包围社会局,造成重伤20余人,轻伤百余人,接着又有许多同情、声援美亚绸厂的工厂罢工被镇压下去,最终美亚工人斗争的要求没有达到,4月21日被迫复工,先后坚持近50天的罢工斗争宣告失败,罢工中的积极分子被开除,从此,上海工人运动走入低谷。

第十一章

沪西抗日救亡的烽火

一、沪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奏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政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坚持要继续“围剿”工农红军、镇压抗日爱国力量和排除内部异己力量。他的攘外,主要是谋求同日本侵略者的妥协。由于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者在事变发生后的4个月零18天的时间内,就占领了我东北三省和一个特区,使东北3000万同胞沦为亡国奴。日军侵占我东北大片领土时,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抢掠,对我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到国土迅速沦丧,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要求国民政府抗日。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沪西工人、学生、商人都行动起来,掀起了沪西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

沪西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区域,工人、学生得悉日本侵略军攻打沈阳时,立刻掀起抗议风暴,举行反日大罢工、抑制日货、集会抗日。沪西的青年学生更是勇敢地走在爱国运动的前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3天,即1931年9月21日,沪西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召开

国难紧急大会,成立救国会。24日,沪西大同大学附中等37所中学学生代表集会,决定28日起,停课3天,上街宣传抗日,同时男生参加军训、女生练习救护,为参加抗日作准备。25日,暨南等26所大学派56名代表赴南京请愿。26日,向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请愿提出5点要求:①集中兵力,驱逐日兵出境;②惩办不力外交官;③令张学良迅速出兵;④发给军械,使全国学生武装起来;⑤实行革命外交,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蒋介石被迫接见,但托词搪塞,学生不满。28日,上海请愿团代表与中央大学学生数百人冲入外交部,当面责问外交部长王正廷。同日,暨南大学等上海19所大学3000余学生组成上海学生第二批赴南京请愿团,29日抵南京,见蒋介石,重申5项请愿要求。11月24日,大学生抗日救国会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再次组织8000余同学带着“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为督促政府出兵呈蒋主席文”晋京。为支援赴京同学,表示上海学生抗日救国会的决心和力量,全市大学生都行动起来,分路作欢送晋京的示威游行。从闸北青云路体育场出发的3000余人由暨南、复旦、法学院同学组成,总指挥是暨南大学陈镇和、复旦大学朱祖舜,路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声援晋京同学!”等口号。到达南京的请愿团与全国各地请愿团一起冒风顶雪伫立在国府门前请愿,要求政府出兵,坚持要蒋介石出见,终夜不散。27日下午,蒋介石只得接见,无奈地表示“三日之内作出,不出兵收复失地,杀我蒋某的头以谢国人。”并在同学的压力下,写下“对于诸生请愿,自可接受”手谕。

蒋介石对这次请愿,认为是受共产党操纵,其实那时共产党组织根本不寄希望于蒋介石,不主张请愿活动。但队伍中有共产党员,是各校共产党人自行决定的行动。12月14日,暨南大学等上海院校2000余名同学,再次分两批乘火车抵南京,与南京、北平、济南、武汉、安庆无锡、苏州、太仓等地学生代表举行总示威。17日万余人联合示威,中国公学女同学、共青团员郭纲琳率先一拳砸破中央日报社玻璃橱窗,挥着血手,指挥同学冲击,捣毁中央日报报社。埋伏的国民党军警用刺刀、木棍镇压,在珍珠桥附近学生死伤30余人,被捕60余人,是为震惊全国的“一二一七”南京珍珠桥惨案。珍珠桥惨案的第



1931年11月24日,上海大中学生抗日救国会赴京督促政府出兵请愿代表团;27日下午,蒋介石被迫接见学生。

二天,宋庆龄发表宣言,谴责国民党政府对爱国学生的血腥暴行;鲁迅发表了《“友邦惊诧”论》,针对国民政府说“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的论调反驳道:“友邦人士”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兵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学生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在学生赴南京请愿的同时,上海商界、工界、学界都行动起来,集会抗议。26日,沪西各纱厂停工一天,部分工人参加上海公共体育场抗日救国市民大会。沪西内外棉、日华、同兴等23家日商纱厂工人代表集会,成立日商纱厂工人抗日救国会。27日,沪西200余工人在劳勃生路游行示威,抗议日本侵略东北。30日,真如镇农工商学各界万余人在镇北召开各界市民抗日救国大会。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东南大学等校代表相继致词,大会通过电请政府对日宣战等提案,宣布成立真如各界抗日救国会。会后游行。10月15日,日商纱厂工人救国会发表抗日宣言,呼吁“政府对日绝交与暴日决一死战。”“本会8万工友愿全体加入义勇军,为讨日最前锋。”18日,学生演讲团,在劳勃生路大自鸣钟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千余群众听讲。日本巡捕暴力干涉,后又开来日本海军铁甲车4辆进行镇压,群众掷石块回击。11月

1日,日商第二纱厂2000余工人集会,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一致表决即日退厂,不为日本资本家做工,工人全部转入申新六厂做工。接着,日商公大纱厂千余工人亦退厂,分别转入华商厂做工。21日,沪西一黄包车工人因拒绝替日军拉运枪械子弹,被日军殴打致重伤无救死亡,上海工联会发表特别公报,组织全市工友参加追悼会,筹备公葬,表彰沪西黄包车工人爱国之情,团结一切反日力量,进一步掀起反日高潮。12月20日,沪西失业工人反日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号召失业工人向政府要工作、要吃饭,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1932年1月8日,27家日商工人5万余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日商资本家取消每月的4天赏钱,实行同盟罢工。10日,沪西学生参加上海大学生抗日救国会与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在公共体育场举行追悼南京“一二·一七”死难反帝战士市民大会,会上通过没收、拍卖已检查的日货,抚恤死难烈士家属,实行全市罢工、罢课、罢市决议。会后抬着杨桐恒烈士的灵柩,高呼口号,到南京路游行示威。17日,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等30团体,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反对国民党政府投降卖国、屠杀民众的市民大会,会后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卖国的国民党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国苏维埃政府!”口号,并包围了市政府。

1932年1月初的前后,上海人民的抗日激情越来越高涨,中共江苏省委通过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在沪西反日罢工工人、闸北失业工人和一部分学生及知识分子中建立了民众反日会义勇军。不久,在民众反日会总部内设立义勇军委员会,规定民众反日会义勇军由中共上海民众



1932年,1月17日,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与30余团体,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市民大会,催促国民政府出兵抗击日本。

反日会党团和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民众反日会义勇军内设立党团组织,由季苏任党团书记。中央军委派了曾在苏联学习军事技术的孙小保(原沪西同兴纱厂工人)担任军事指导员。此刻,沪西相应成立了沪西义勇军分部。

二、悲壮的淞沪抗战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对上海的进攻,这是日军炮兵正在向闸北轰炸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在积极筹建伪满洲国的同时,加紧策划对上海和长江流域的侵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指令上海公使馆武官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务必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武官通过女特务川岛芳子制造日僧死亡事件,策动袭击上海三友实业毛巾厂为肇事地,唆使日侨集会游行抗议,日军借此为由,于1932年1月28日夜,在闸北分3路向中国守军突然攻击。驻守上海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违抗蒋介石的指示,奋起反击,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以优势兵力向闸北、吴淞、江湾、庙行等地狂轰猛攻,日军盐泽少将扬言可在4小时内完全占领闸北,想重演沈阳事变,但遭到驻防闸北的第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第六团的英勇回击,



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日

经过一昼夜浴血奋战，毙敌数百人，把日军赶到海宁路租界地段。盐泽在部队溃败后被撤职。十九路军军部驻地系在南京，日军突击上海，为坚持战斗，决定将临时军部移到真如镇范庄。

淞沪抗战爆发第三天，宋庆龄、何香凝不顾个人安危，顶风冒雪，赶赴十九路军临时军部范庄，慰问抗战将士。宋庆龄一行看到沪西通向真如临时军部的沿线，工人、学生高昂的抗战精神和同仇敌忾的气概，深为感动。到达真如附近的临时军部，与军长蔡廷锴亲切交谈。蔡军长向宋庆龄、何香凝报告说，过去我们打了很多年内战，坐视东北沦陷，人民遭难，实在对不起国家。今天对外作战，民心、士气都不一样。我们一定要打出中国军人的威风来，为中华民族争人格。我们准备同日军打大仗。宋庆龄鼓励大家说：你们不愧为军队的模范，革命武力反帝国主义的先锋。宋庆龄和何香凝在慰问抗战将士时发现将士军衣服单薄，难以抵御刺骨的寒流，受伤的士兵缺少药物治疗，医疗设备严重短缺，忧心如焚。她们回到市区后，立刻组织募捐，致电海内外，呼吁爱国民众和海外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仇敌忾，援助正在浴血奋战中的十九路军将士。市民积极响应宋庆龄、何香凝的呼唤，纷纷将一批批的慰问物资送到何香凝家中，各种日用

品、食物、纱布堆积如山,再由自愿服务的汽车队,浩浩荡荡送到范庄军部和伤病医院。



宋庆龄慰问十九路军抗日将士，
与蔡廷锴摄于真如范庄军部

上海市妇女成立“妇女界捐助军用服装会”，通宵达旦赶制御寒棉衣，5天内，数万件绣有红色“胜”字的丝棉背心和3万套棉衣送到战士手中。前线战火纷飞时，宋庆龄再次又偕同宋子文夫人等一行携带大批慰劳品赴真如犒军。在巡视战地时，宋庆龄特与蔡廷锴合影留念。宋庆龄还特地手捧前线士兵缴获的一个日本炮弹留影，表达她抗战的坚定决心。这些照片在上海报刊刊登，极大鼓舞了上海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念。2月7日，蔡廷锴在范庄面对堆积如山的棉衣和物品，心情激动地对记者说：“家庭妇

女赶制的棉衣，千针万线寄托着同胞的爱国热忱。战士们穿着它，知道了它的来源，不仅感到身体热乎乎的，而且还会觉得热血沸腾，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就在蔡廷锴答记者问的这天，日军新任指挥官第三舰队司令、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命令在沪的海陆空军主力会攻吴淞，企图包抄闸北十九路军后方。十九路军誓死抵抗，击退日军10余次冲锋，日军伤亡千余人。嗣后，日军又调来陆军第九师团近2万人来沪参战，并由新上任指挥官远东陆军总司令植田谦吉中将指挥，此刻，由张治中率领的国民党第五军亦到沪与十九路军共同作战。2月21日，日军猛攻江湾、庙行，日军伤亡3000余人，日本失利。日军大为震动，改派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接替植田总司令职，军方命令白川“竭力迅速地解决上海事件”。白川率11师团先遣队抵沪，日军在沪兵力达到6万余人，要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此刻，十九路军已伤亡惨重，急电求援，但蒋介石答复“趁着这几次战役胜利的时机，赶快收手，与日方谋求停战。”当各地不少将领请命来沪增援时，蒋介石断然阻止，竟说“决定无须援助。各军将士未得军政部命令而

自由动作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3月1日日军以海陆空军发动全面进攻,十九路军在浏河血战,由于孤军无援,侧背受敌,只能撤退至嘉定、黄渡第二防线。当十九路被迫撤出市区时,国民党当局反而指使保卫团对民众反日会义勇军镇压,于当天(3月1日)下午,突然包围了反日会义勇军前方办事处,正在开会的领导人被捕,3人就地枪决,1人虎口脱险。2日,反日会义勇军军事指导员孙小保正在部署群众武装占领闸北,准备开展游击战,突然会场被保卫团包围,10人被捕,孙小保遇害。

3月4日,国际联盟开会讨论中日战争,日本政府害怕西方列强插手干预侵沪战争而对日本不利,而发表所谓的“和平解决”的停战声明,以求得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国民党蒋介石如获至宝,立刻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壮烈的淞沪抗战以中国军队撤出市区宣告结束。但中国军民联合抗战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抗战三日亡国”,“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中国守军坚强抵抗,日军遭受重创,四易主帅,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占领上海的迷梦,迫使日军不得不暂时放弃吞并上海华界的计划,十九路军临时军部范庄已成为上海和沪西人民反日大本营的光辉历史永载在中国抗战史册中。

三、刘少奇领导沪西人民反日大罢工

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将抗战军部设在沪西真如范庄,沪西遂成为上海人民抗战的红色区域。中共江苏省委在发动群众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同时,领导和组织上海各业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

1月30日,江苏省委通过上海工会联合会,在东新桥召开上海各业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上海工人抗日总同盟罢工委员会。沪西日商纱厂大罢工时建立了工人纠察队,从31日起举行总同盟罢工。1月31日,根据沪西区委的指示,沪西各厂工人纠察队都改组和扩大成立沪西反日会义勇军,沪西许多失业工人、平民、市民以及学生、自由职



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刘少奇
领导沪西反日大罢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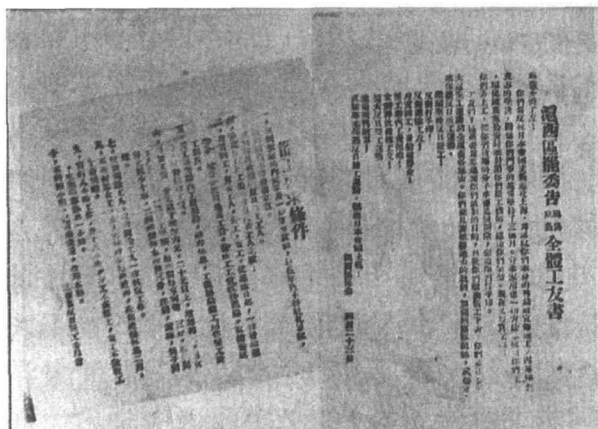
业者立即响应,报名参加沪西反日会议义勇军,成为上海反日会的中坚力量。2月中旬,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刘少奇领导了在沪西召开的上海各业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上海各业工人反日救国联合会,刘少奇为工人反日会起草了章程,它直接成为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的团体会员。大会号召上海工人阶级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前线,各厂工人成立日货检查队,没收日货;封锁对于日本军队、机关及资本家的一切供给;设法截断对于日

本军队、机关及资本家的水电供给。

沪西是上海日商纱厂最为集中区域,当时全市34家日商纱厂6万余工人,有17家、3万余工人在沪西地区。他们长期受日本资本家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富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斗争精神。1月28日下午,在沪西日商纺织同业会,从日本军方获悉日军将于当夜进攻上海,于是宣布即日起关厂停业,并派日本海军陆战队驻厂,把工人全部赶出工厂和工房。沪西日商纱厂这些被迫离厂的工人纷纷加入以同兴、喜和为核心的罢工行列。中共江苏省委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号召举行总同盟罢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后,在中共沪西区委领导下,先后建立了沪西区罢委会和各日商纱厂罢委会,具体组织和领导沪西工人反日罢工斗争,把原先取消月赏和反对关厂停工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的抗日总同盟罢工。刘少奇十分关心沪西工人抗日总同盟罢工,他认为“像这样数万人的大规模罢工、停业斗争,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是多年未有的,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对工人进行一次政治训练,让工人群众经受一次锻炼,也是给日本帝国主义一次沉重的打击”。

刘少奇、罗登贤、张浩、饶漱石、帅孟奇等中央和省委领导经常到沪西地区为罢委会同志分析形势和指导工作。省委为了使沪西日商纱厂抗日总同盟罢工深入持久地坚持下去,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发动各抗日团体和群众组织声援沪西工人的斗争。民众反日的团体

员、左联、社联、剧联以及大中学联等团体不仅给罢工工人送去慰问金、食品、衣被等御寒用品,而且派出人员在罢工工人中讲解抗日形势,开办识字班,教唱抗日歌曲,排练抗日话剧,进一步激发罢工工人的抗日爱国热情。沪西罢工工人反日情绪十分高涨,除了组织义勇军活跃在抗日前线,积极帮助十九路军运输枪炮弹药、挖战壕、筑工事和抢救伤员以外,留在后方的罢工工人组织了纠察队、宣传队。纠察队成为维持沪西地区罢工秩序,防止敌人破坏的一支重要力量。宣传队进行抗日形势宣传的鼓动,组织抗日集会和游行示威,反日气氛弥漫了沪西地区,使汉奸和国民党势力不敢涉足,一时有“赤色沪西”之称。



沪西罢工委员会告麻袋业全体工友书

沪西工人在反日罢工中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本来就一无所有靠低微工资度日,罢工以后更是毫无分文收入。3万余罢工工人,连同家属近10万人,吃饭、住房都是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刘少奇在领导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反日

大罢工中,及时地纠正了罢工初期沪西区工人斗争委员会空喊武装斗争、武装工人,热衷于飞行集会,忽视群众生活问题的倾向,指示沪西区罢委会要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并十分重视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沪西区罢委会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一方面组织罢工工人向社会局、地方维持会要求发放救济米,经过斗争迫使社会局和地方维持会拿出救济款大洋3000元和救济米600担;另一方面组织宣传队、募捐队,走向街头,开展反日罢工宣传和募捐活动。

宋庆龄获悉数万工人坚持反日罢工斗争,吃饭住房十分困难,就亲自筹措了2万元经费,直接将支票交给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党



社会各界声援沪西大锅饭运动的报道

团书记,请他转交沪西罢委会,并嘱咐转达她对反日罢工工人的支持和敬意。但是,党内有人不同意接受宋庆龄的捐款。刘少奇获悉后,坚决阻止这种错误做法,刘少奇说:宋庆龄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她为了声援上海工

人的抗日行动而捐款,这表现了她的一片爱国之心,也是对上海工人群众寄予的厚望。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组织,我们应该接受这笔捐款。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接受刘少奇的意见,收下宋庆龄的捐款,在社会上产生很好的反响。宋庆龄后来还订购了沪西一家米号的粮食,专做罢工工人的救济米。上海各业工人反日救国联合会募捐启事在报上发表后,宋庆龄又带头捐助大洋1500元。何香凝从《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的义卖收入中拿出大洋300元捐助。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官兵也被上海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他们从民众捐助的慰劳金中提取部分款项资助沪西罢工。远在江西的苏维埃政府也汇款帮助沪西罢工工人。沪西罢委会把救济米和社会各界的捐款,通过各厂按月份发给罢工工人和家属,并利用募捐助款在石灰窑一带盖起了一批简易草房,让无家可归的工人和家属有家可住,为反日大罢工创造了物质条件,鼓舞了上海人民。

一二八淞沪抗战以来,形势复杂多变,而刘少奇始终在把握沪西工人运动的斗争大方向,并及时向党中央反映工人们开展斗争的形势和发展情况。2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许多同志认为上海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了,要把工人

运动看成是进攻性的,要把这次罢工的斗争变成大规模的总同盟的武装暴动。刘少奇出席会议,在讨论工人斗争的形势时,刘少奇坦然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说:目前举行武装暴动,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条件不成熟。武装暴动与支持第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是不同性质的问题。现在上海工人既没有武装,工人的力量也没有成熟到可以举行武装暴动的那一步。

3月1日,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驱使下,十九路军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下,面对强大的日军重压,被迫撤出市区。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成为上海人民反日斗争的中心,因此中外反动派集中力量向沪西工人发动进攻。他们除调动武装军警严密监视和镇压工人反日斗争外,还千方百计地破坏罢工阵线,派出工头挨家挨户诱骗工人复工,企图先开一厂或一部分车间以动摇整个罢工阵线。他们还从大批难民和失业工人中招收新工,以挑拨工人群众内部的团结。沪西区罢委会根据上述新情况,妥协提出复工条件,但日本资本家采取强硬态度拒绝,内外棉各厂发出通告,“如到时工人再不上工,将另雇新工”,部分工人被迫进厂复工,尽管复工人数不到二成,但是罢工阵线开始被冲破。沪西区罢委会针对新情况,一方面组织力量进厂向复工工人宣传和散发传单揭露厂方复工阴谋,并派出工人纠察队警告和打击工贼破坏活动;另一方面在英华里、梅芳里、富来里等罢工工人聚居的地方开办大锅饭,免费供应罢工伙食,以抑制资方引诱工人复工,当时称“大锅饭运动”。

罢委会的工作开始出现成效,罢工工人情绪逐步稳定,内外棉各厂复工工人开始减少,工人们唱起了反日罢工歌:“反日罢工上海滩,罢下工人二十万,二十万人一条心,一心来吃大锅饭,要国民党撤兵很容易,要僱工人进厂复工难上难。”4月下旬,资方勾结国民党政府和租界捕房,派出军警没收大锅饭餐具,捣毁炉灶,封闭各级罢委会,逮捕罢工领袖,巡捕、包探进驻各厂监视工人动态。即使如此,各厂还是有相当多的工人坚持罢工。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一直坚持到5月初才告结束,历时4个月。

这次沪西反日大罢工,连同上海各业工人的斗争,使日商工场、



西大锅饭运动时所用的铁锅(藏上海档案馆)

银行、商店等营业损失达9100万银两,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这次反日大罢工使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在政治上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沪西日商纱厂建立了赤色工会和青工赤色小组等组织,并扩大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发展了革命力量。“在党领导沪

西大罢工中创造了内外棉各厂9个支部,由于纱厂罢工的推动,党在中国纱厂中如申一、申六等厂创造了将近百人的支部。”

刘少奇在领导沪西反日大罢工期间的正确战略,却遭到临时中央的指责。3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又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会工作问题,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之一卢福坦转达了共产国际的一条指示:“刘湘(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工作。”那时,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虽然远离中国,但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临时中央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会上,对刘少奇进行批判,认为中央职工部、全总党团在领导职工运动中不能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路线,存在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方式。刘少奇领导罢工的方针是“取消派”的方针。认为,工人斗争应当采取进攻战略,要把沪西大罢工搞成“大规模的总同盟武装暴动”。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刘少奇的中央职工部长职务,调到上海工联任党团书记。临时中央决定派康生到沪西检查并指导工作,指责领导沪西大罢工的同志“只是天天注意要米、要救济、募捐、分米……这样发展下去,必然要走到经济主义、工团主义的机会主义道路”,强调党的目前主要任务是“用极大的努力,武装工人”,“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在康生的指示下,沪西罢工工人开始转轨了,“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和传单在罢工工人中满天飞,为租界巡捕房镇压沪西罢工找到了借口。十九路军被迫退出市区后,形势和群众的情绪发生不利的情况,临时中央仍强

调所谓的“进攻路线”，要沪西工人坚持罢工，把罢工推向“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的武装斗争。是年冬，刘少奇被调离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四、真如惨遭劫难

真如镇历来被视为“编氓鳞比，商贾麋聚”之地，号称巨镇，为上海嘉定出入要道。明嘉靖年间，倭寇来犯，境内民众自组乡勇捍卫乡里，击退日本倭寇侵犯。清咸丰十年夏，真如为清军与太平军拉锯地区，多次在镇内和镇外四周激战。1924年10月军阀齐卢战争，军阀相继占领真如。次年奉系军阀又进军真如。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对上海的血腥炮轰，上海爆发一·二八淞沪抗战。蔡廷锴发出总动员令，蒋光鼐、戴戟从市区步行至真如范庄临时军部，拂晓始到。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五旅第三团进驻真如。六十师自苏州、无锡、常州、丹阳一线援沪，先头第一团抵真如。原驻真如宪兵第六团第一营赴北火车站增援；12时，参谋处长率部分总部人员抵范庄。2月1日，蒋光鼐在南翔设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军部仍设在范庄。4日，中国空军第六、七两中队由南京到上海，先在沪西上空巡逻一周。5日，日本空军在闸北投弹后复飞真如，谋炸真如发讯台。十九路军地面火力猛烈还击，中国空军战机7架旋到，并抢占制高点，配合地面炮火，对日机发动俯冲射击。11时30分，日机1架被十九路军军部警卫连步枪击中，油箱爆炸，机身着火，急速坠地，落于真如车站西南空地。不久，又2架日机尾冒青烟，向西北逃去，另有几架日机亦狼狈而逃。坠地的日机已粉碎，机师3人皆脑裂肚穿，其中一人为海军大尉。这是中国空军首次御外空战。次日，空军再战，黄毓全牺牲，为中国空军御外献身第一人。7日，十九路军主力及张治中的第五军集结真如、大场等一带警戒。2日至26日，许多爱国志士组成义勇军，纷纷集中于真如，参加抗战。他们中有中国青年反日救国团援沪讨日义勇军、南京中国抗日救国义勇军铁血军、救国决死军、救国义勇军、上海市民联合义勇军、上海市民抗

日决死三大队等 29 个组织。何香凝、杨杏佛的国难救济会等民众组织都在真如设有医疗所、战地医院。各界人士捐赠的大量粮食、衣物等慰劳品送至真如,存放于暨南大学。到 11 月,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电令“放弃闸北,以杨行、大场、真如、虹桥为前线”,蒋光鼐、蔡廷锴回电反对,与张治中在南翔研究部署,将主力隐于真如、大场间,待机出击。3 月 1 日 23 时,十九路军及第五军退出真如防区,留守的梁佐勋团在真如车站阻击日军,战斗酷烈,伤亡惨重,后退至江桥,侵华日军于 3 月 2 日侵占真如。



1932 年,真如地区被炸毁的民房

一二八战争中,侵华日军对真如狂轰滥炸,据不完全统计,至 2 月 28 日真如地区的居民和暨南大学学生死亡 25 人、受伤 73 人。镇内的东南医科大学校舍全部被毁。十九路军转移后,日军进占真如,当天抵押青壮年数十人,指为中国士兵而枪杀;仅因家中院落有遗弃军

服而被杀的镇民达 40 余人;日军在梨园浜一带纵火焚屋,奸淫妇女;又以暨南大学为据点,派出便衣队,散往邻近四乡,搜捕烧杀。真如地区无家可归者达 2600 户,受害者 1.8 万人以上。

五、沪西共舞台事件

1932 年 5 月,蒋介石与日本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又叫《淞沪停战协定》,这是国民党当局的丧权辱国的协定。协定规定我国正规军队不得调驻上海市区,而日本侵略军可以在上海驻军,其对公共租界的海军陆战队,可以没有数量上的限制。国民党政府承诺取缔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激起上海各界人民反对停战协定的浪潮,各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声明、宣言,对停战协定誓

死反对。中共江苏省委通过上海反帝大同盟、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大中学联、文化抗日会等数十个抗日团体,发起成立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定援助东北义勇义军联合会(简称民联),领导上海人民抗日斗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

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投降帝国主义与出卖民族利益是更加无耻与露骨的进行。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签订了所谓停战协定。这个协定是完全的出卖中国无产阶级中心的上海。在协定中允许日本兵船在上海屯驻无数的海陆空军,而上海周围永远不驻中国军队,实际上这是无耻的扩大了上海租界区域,这是实现上海为国际共管自由市场的具体的步骤。这种无耻的投降与公开的卖国,更明白的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内奸,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而同时国民党政府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集中一切力量,进攻早已得到了解放与脱离帝国主义统治的苏区,与企图妨碍阻止工农红军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进行。在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中间,更明白地和露骨地证明了国际联盟是瓜分中国的组织者,而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同样是日帝国主义的助手与瓜分中国的帮凶。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苏中国劳动者面前宣言:他代表全中国的劳苦群众,否認反革命的国民党与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谈判与密约,否認五月五日卖国的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停战协定。号召全中国劳苦群众坚决的起来进行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与清道夫——国民党政府,来保障中国的领土的完整求得中国的完全独立与解放。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中国劳动群众起来斗争,武装起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发表反对国民党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的通电

停战协定签订后,抗日运动被当局取缔,上海各界人民便以追悼淞沪抗战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的形式继续进行抗日宣传。6月间,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关于掀起新的反帝斗争高潮的指示,作出进一步扩大和统一全省反帝大同盟,为成立全国反帝大同盟作准备的决定,定于7月间召开全省范围的代表大会。省委责成上海反帝大同盟和民联负责建立召开全国和江苏省代表大会筹备处,动员和组织全省各反日团体选派“勇敢的积极的工人、女工、青工和一切革命战士”参加。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于7月17日上午8时,江苏省

反帝代表大会在沪西劳勃生路(今长寿路)共和大戏院(又名共舞台)正式召开。大会的公开名义是“江苏省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会议参加者除全市数十个反日团体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反日积极分子外,还有南京、无锡、南通和崇明等地反日团体的代表,共100余人。

清晨,大会筹备处,民联青年部长温济泽和曹顺标等10余人,带来了传单和文件,主要是大会告全国同胞书、致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电。致中国工农红军电等。他们到会场时,发现戏院周围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在监视,于是,温济泽和曹顺标等把传单塞进墙洞,建议采取紧急疏散措施。大会主持人不同意,认为会议是公

开援助东北义勇军没有问题,并派出暨南大学代表武翰章等3人去附近的国民党公安局要求保护,争取合法权利。3人去后就被扣留。8时许,100余名代表按预先规定的暗号陆续进入会场。9时许,大批武装警察将会场包围,除少数代表越墙脱身外,当场被捕88人。他们经上海市公安总局和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初审后,被押解到南京警备司令部。在审讯进程中,又有7人在上海被捕,全案共95人。9月27日,南京警备司令部对共舞台案件作出判决,13人被判处死刑,26人被判10年到无期徒刑,其余绝大多数被判6年徒刑,有个童工代表张毛宝,才13岁,也被判3年徒刑。



1932年7月17日共和戏院(又名沪西共舞台)事件的报道



沪西共舞台事件中肖万才(左)、
曹顺标(右)烈士

13位牺牲的烈士是:萧万才、柳日均、王德盛、陈山、崔阿二、许金标、徐阿三、杨小二子,他们是共产党员;曹顺标、邱文治、许清如是共青团员;陈士生、钟明友是反日斗争中的积极分子。

10月1日清晨,这13位烈士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烈士们无论在审讯时,在狱中、在刑场上都表现出坚强不屈的英勇气概。

肖万才是被枪杀的最年长的老者,这次他一家4口都从上海被抓,肖万才被判死刑,女儿判18年,儿子判12年,老伴是双目失明,没有暴露,被交释放,出狱后就下落不明。曹顺标烈士是一位有革命思想、有作为的青年,因叛徒指认曹顺标是共青团员、民联青年部长而

被敌人锁定为重点对象。但是，曹顺标并不是民联青年部长，真正的民联青年部长是温济泽，但叛徒不认识温济泽，只说他是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叛徒供出曹顺标的当晚，温济泽就对曹顺标说，“我去承认我是青年部长吧。”曹顺标严肃地说：“这怎么行，你的身份没有完全暴露，自己不应当向敌人承认什么。何况你承认了，也挽救不了我呀。”之后，敌人又对曹顺标等多次审讯，没有审出什么新的东西。在狱中，曹顺标和温济泽关押在一个号子，他们合盖一条薄被。有一天，曹顺标对温济泽说，我有两件事：一件事，为革命做的事太少；还有一件事，我曾爱过一个姑娘。这时，曹顺标轻轻地背诵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句：“生命诚可爱，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现在我只有二者皆抛了。”10

月1日的凌晨，肖万才是第一个走向刑场；第二个是曹顺标，他是从被窝里叫出来，只穿汗衫和短裤，从容地走向刑场，在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中壮烈就义。每个烈士面对



沪西共舞台事件幸存者杨超旧地重访

敌人的枪弹都毫不畏惧，据押送他们去刑场的看守回来说，这些人真有种！个个不怕死，有的身上中了几枪还在大声喊口号，还在唱什么“打得落花流水”（国际歌）。

沪西共舞台案件是国民党政府对这时期抗日运动最严重、最残暴的镇压，致使抗日力量遭到重大的摧残。

第十二章

沪西党团组织屡遭破坏后的斗争

一、沪西党团组织屡遭破坏

国民党蒋介石为消灭共产党,采取了极为险恶的办法。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科的前身,简称“中统”),以众多的特务人员,到处搜捕共产党人。1932年,蒋介石又建立了复兴社,其核心组织“力行社”,专门设置了由特务头子戴笠主持的特务处来对付共产党和抗日民主力量,并采用“拉出去”、“打进去”的办法,实行“叛徒政策”,利用叛徒作为“黑色种子”又派回到共产党组织中来进行破坏。这时,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中央的领导下,沪西地区党团工会组织执行一条错误的路线,革命组织一再遭到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与破坏。自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以来,国民党利用这些叛徒和国民党特务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和机关。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后立刻叛变,供出周恩来在沪西小沙渡路的住处,但周恩来已经转移,幸免于难。上海的环境越来越险恶,问题还在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留下了许多缺口,方便敌人的进攻和破坏。

1932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将环境日益恶化的沪西区委划分为沪西区委和沪西特区委两个并列机构,在沪西区委下再设立中共周家桥区委。沪西特区委主要工作对象是日商纱厂的基层党组织,机关设在靠近日商纱厂的槟榔路,这是隐蔽在居民住宅区内的特



在槟榔路（今安远路）乾庆坊
32 号的中共沪西特区委旧址

区委机关，便于开展秘密活动。是年 9 月 22 日，在中共沪西区委书记李荣生的安排组织下，在乾庆坊 32 号的灶披间，召开特区委成立会议，部署工作，中央组织部长老饶（饶志雄）和省委妇女部长帅孟奇亲自出席指导。出席会议的有沪西区委书记李荣生（李小五子、李哲民、王槐柏）、特区委书记嵇维才（“红头鬼子”）、组织部长朱秋白（苏正海、莫飞）、宣传部长郝仲溪（郝连容、涟如、吴俊臣）、职工部长陈善甫（陈树椿、陈麻子）、妇女部长孙启玉、省委代表小李。会议进行到中途，突然英租界巡警包围了乾庆坊 32 号，冲进

灶披间，将与会的人员全部逮捕，巡警正欲将“人犯”押出时，突然省委干部刘抱一走进会场，也一同被押到租界捕房，半个月后，又被引渡到国民党南市公安局，嗣后又被押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国民党当局对被抓捕的人采用分化打击的办法，妄图彻底瓦解共产党的革命力量。在敌人的屠刀威吓面前，革命营垒出现了裂痕分化。沪西区委书记李荣生、组织部长朱秋白、宣传部长郝仲溪、职工部长陈善甫、妇女部长孙启玉和省委干部刘抱一在大叛徒顾顺章的威逼利诱下，一个个自首叛党，并相继在中统特务机关工作，四处搜捕仍在战斗的革命者。而视死如归的中央组织部长老饶（饶志雄）和省委妇女部长帅孟奇、特区委书记嵇维才则被拖进地狱般的刑讯室，受

尽酷刑。帅孟奇原是中共沪西区常委、妇女部长，这次以省委妇女部长身份参加沪西特区委会议幸免于难，但仍于 10 月 10 日在闸北被



被捕后，英勇不屈，
后在党内尊称为帅
大姐的帅孟奇

捕。敌人初以各种利诱妄图迫使其变节,这些伎俩破产后,便施以最为残酷的酷刑要撬开帅孟奇的嘴。但她以自己残弱的身躯面对了人间难以承受的酷刑,夹棍、烙铁、灌辣椒水、竹钉刺指头、直到大口吐血、左眼打瞎,仍没有屈服,最后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937年5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继续为党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后,她一直被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尊称为我们的“帅大姐”。特区委书记嵇维才后来出狱,于1938年3月在率领江苏启东抗日义勇军与日寇战斗中牺牲。

这个时期的沪西党团工会组织屡遭敌人的破坏,许多同志被捕、牺牲,有的叛变投敌。



李干成,共青团沪西区委书记、团省委巡视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副市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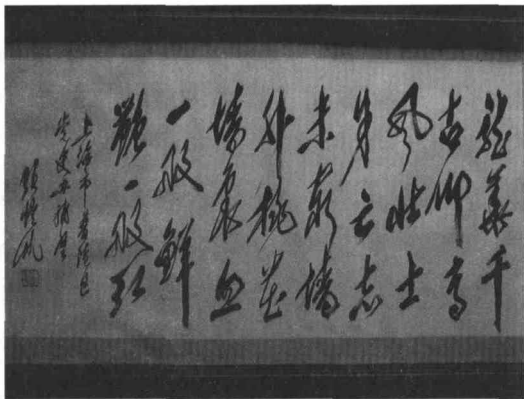
1930年7月30日,沪西召开代表会议时,区行委成员王达、孟容、洪连生及内外棉纱厂的干部和工人27人被捕。1932年10月27日,由于叛徒出卖,正在区委机关开会的省委巡视员张文卿、区委书记周福根、常委陈伯明、胡云山和团区委书记林一丰被捕,张文卿遭枪决,周福根被折磨死于南京雨花台狱中。同年11月1日,刚接任共青团沪西区委书记的陈同在自己家中召开团区委会议,出席的有原共青团沪西区委书记,时任共青团省委巡视员李慈(李干成)、组织部长何福林(骆何民)、宣传部长吴玉书(荷兰籍华人)和中共沪西区委书记孔昭辛,同样在叛徒的告密下被捕。同日,康脑脱路生生里12号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机关被敌人破获,4人被捕。1933年2月28日,共青团省委组织部长胡兰生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国民里召开沪西3个区的团干部会议,因叛徒告密,出席会议的5人全部被捕,他们是共青团沪西区委书记袁执中、共青团沪西特区委书记李伟、共青团周家桥区委书记小魏(刘雪苇)、团省委组织部秘书小王(王锡均,印尼华侨)和团省委组织部长胡兰生。

4月10日,中共沪西区委为研究永豫纱厂罢工,约定在曹家渡顺园茶楼开会研究方案时,突然被包围,区委书记金城等5人被捕。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6月份工作总结报告中特别指出沪西的团组织

被破坏尤为严重：“沪西特区委遭4次破坏，2名书记被捕、1名军委、1名发行员、1名斗争委员被捕。共青团周家桥工作委员会遭破坏1次，1名书记，1名宣传被捕。共青团沪西区委遭破坏1次，书记1人被捕”。沪西党团组织相继被破坏后，同年10月，省委特派中共吴淞区委书记张恺帆到沪西任区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但任职仅半个月又被敌人逮捕。领导人员的不断被捕，区委一时无法恢复，只能设立一个临时工作委员会，年底才恢复区委。但这一时期，党内的叛徒、内奸活动特别猖獗，区委机关虽只能以家庭形式作掩护，采取单线联系开展工作，但党团组织仍然不断遭到破坏。

自从沪西1932年的反日大罢工最后阶段受到沉重打击后，上海的工人运动开始沉寂下来。但是，沪西的革命运动并没有停止。4月14日，共青团沪西区委提出要成立沪西武装自卫委员会，8月1日，沪西工人、学生上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国民党出卖中国及拥护红军北上抗日等示威游行。9月11日，为纪念九一八，沪西的鸿章，内外棉三、四厂，麻袋，溥益、永安、同兴等厂及小沙渡车夫、石匠人员等到大自鸣钟、海防路、宜昌路、澳门路、樱华里及苏州河沿岸散发传单，有的还到市中心的永安、先施、大世界等去散发传单，许多人因此被捕。

据中共江苏省委九月组织报告统计，省委下，还只有东、西、法南3个区委，一个黄包车工作委员会和东、西纱总，东、西区自卫会等组织。沪西区委还有18个支部，2个单位，共118名党员，纱总沪西分会有18个单位，共156名成员。1934年10月下旬后，省委



张恺帆为普陀区委党史办书写的龙华诗

组织部、宣传部领导人受到叛徒的出卖和敌特盯梢捕捉，党组织被破坏严重，无法开展工作。1934年11月和1935年1月上旬，省委再三遭到破坏，最后连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全部被捕，省委机关已无

法恢复。至此,10年内战时期的中共江苏省委活动终止,而沪西地区的党组织在1934年11月以后,也失去上级的领导和联系,不久就停止了活动,自此沪西区一级的党组织也不复存在。

二、党团组织破坏后的沪西各种革命组织

左倾路线使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3年前,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都设在上海,到1934年,临时中央在上海已无法立足,撤退到苏区,江苏省委以及所属区委几乎都被破坏,沪西的党组织也不复存在。但是,沪西的共产党人和许多革命志士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始终坚持斗争,以各种组织形式坚持坚持领导人民斗争。其时,坚持斗争有如下一些组织。

(一)中国革命人道互济会沪西分会

五卅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时,为救济革命被难者而先后设立“中国济难会”、“中国革命互济会”革命群众组织。1928年11月7日,江苏救济会根据中共中央第72号通告精神进行改组,建立中国人道互济会江苏省总会和上海人道互济会,在工厂、学校、商店和社团开展募捐活动,对罢工工人进行慰问和开展宣传活动。1929年5月,为声援沪西张学良被英国士兵杀害事件,发表了“为张学良惨案告民众书”,组织示威抗议活动。1930年下半年,中国革命人道互济会沪西分会(沪西区总)成立,区总主任兼党团书记是黄剑津,全国互济会总会(济总)主任兼党团书记黄励直接指导沪西的工作。在指导沪西大夏大学互济会工作期间,培养进步大学生,使许多互济会会员加入了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黄浩(黄静汶)、左仲勋(左洪涛)、刁春仁、尹之初等都在互济会沪西分会工作。革命人道互济会沪西分会成立后,多次组织对被捕人员的营救工作。1932年沪西共舞台事件中88人被捕,沪西分会曾设法营救被捕人员,到监狱探访被捕人员。沪西分会还介绍会员加入民权保障同盟、工会、反日救国团体和其他群众组织。



全国互济会主任兼党团书记邓中夏(化名施义)在上海被捕,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人道互济会沪西分会是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相互勾结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形势异常复杂,时有内部成员叛变投敌,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1932年林月英和“小湖北”两人在沪西区任干事,不久“小湖北”被捕叛变。1933年5月,时任全国济总主任兼党团书记邓中夏在济总援救部干事林月英家中被捕,林月英亦被捕。邓中夏被捕后没有暴露身份,济总积极设法营救。但是,叛徒“小湖北”获悉其妻林月英被捕,从南京赶到上海,诱使林叛变,林相继供出全国济总主任兼党团书记邓中夏、互济会负责干部何宝珍(刘少奇爱人)、团中央委员杨铎等人,使他们均遭敌人的枪杀。

(二) 沪西教育工作者联盟

1932年2月,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决定刘季平负责筹备成立一个教育界左翼群众团体中国教育工作者联盟(简称教联),4月17日教联成立,主要任务是发展革命势力,在教育界开展革命活动,批判反动统治阶级教育制度,研讨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教联设党组,由文委总领导,教联负责人为刘季平,刘被捕后由丁华担任。领导成员先后有徐明清、张敬人、王洞若、郑伯克等。教联成立后,由中共江苏省委通知各区介绍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教联,有盟员100余人。7月,沪西教联成立,属沪西区委领导,不久,组织关系转到教联。负责人为徐明清、王洞若,后为郑伯克,任沪西教联区



徐明清,女青年会女工夜校教师、沪西教育工作者联盟负责人

委书记。

教联与陶行知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教联的负责人和骨干大都是陶行知早年的优秀学生。教联把陶行知创办的山海工学团作为活动基地,与中央出版系统的组织——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协同作战。教联利用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普及平民教育”的口号,大张旗鼓地办起了晨更工学团。沪西教联成立后,负责人徐明清以沪西为阵地开展革命活动。时北新泾的周家桥地区党团组织由中共沪西区委领导,不久归由教联党组织领导。徐明清和王洞若主持晨更工学团工作,以工学团为阵地,组织附近的工人、农民和店员到工学团学习和活动,培养工人小先生,让工人自己教育自己,结合上海一二八的十九路军抗日斗争形势,启发学员觉悟,发展党员。晨更工学团办学条件简陋,黑板、桌椅、板凳大多借来,不够用砖块替代,费用由陶行知、黄警顽资助和募捐而来。按照不同文化程度的教育对象,工学团内设幼儿园、小学、特别班、农民识字班、工人识字班、店员识字班,编写教材,因材施教,探索教育面向工农、为工农大众服务与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支援沪西女工夜校教学工作

1933年夏,在陶行知支持下,由孙铭勋帮助,在沪西劳勃生路明德里租借了一幢房子,开办了一个劳工幼儿园,免费招收工人子女入学,其中有项英的女儿项素芸。沪西教联除了工学活动外,还通过陈望道等人关系,与基督教女青年会建立关系,通过青年会,在各女工学校建立组织,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

基督教女青年会是19世纪末从美国传来的国际性基督教妇女团体。1926年,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在上海闸北开始创办平民女工教育。1930年基督教女青年会决定在沪西小沙渡路(西康路910弄21-23号)三和里开办女工夜校,师生积极投入抗日的革命洪流。自从沪西教联与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建立关系后,相继有一批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到女工夜校

任教和工作。教联负责人张劲夫、郑伯克等同志直接到女工夜校联系工作。他们从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错误领导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团结女青年会的爱国人士,支持女工夜校工作,将抗日与进步的教育思想输送到女工夜校的教育中去。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自身进步改革和发展则顺应了全民抗日救亡的潮流,在共产党人和所有进步人士的影响、支持下,女工夜校遂成为劳工运动和培养抗日救亡女工干部的摇篮,而共产党人充实到夜校任教,为夜校教学内容和办学方向的革故鼎新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徐明清 1934 年 1 月离开沪西到沪东,王洞若分管联系山海工学团、沪西小沙渡女工夜校。

(三)中共沪西国难教育社

1935 年“一二九”运动到 1937 年“七七”事变间,在中共中央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一批爱国领袖和进步人士纷纷组织以救国会为主要形式的救亡团体,陶行知组织国难教育社,把原来教联的革命力量转到国难教育社,国难教育社的党团成员先后有丁华、张劲夫、王洞若等。



职业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和工人救国会出版的会刊及成立大会特刊

1936 年 6 月,国难教育社沪西区分社建立,有 100 多个会员单

位,指导沪西工作的是区指导员李亚群(李群夫),国难教育社沪西区分社支部书记吴新稼(吴莆生),对外是国难教育社沪西分社筹备主任,支部成员陈蔚清为组织委员、林琼为宣传委员。支部设在康脑脱路赫德路的一间亭子间。借沪西的一个中学办了工人讲习班,来上课的有章汉夫、邹韬奋、薛暮桥等人。沪西、沪东工人 1936 年大罢工,上海各界救国会内设一个总指挥部,属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成员有邓发、胡乔木、王翰等,各界救国会各派一人参加,国难教育社为郑伯克、文化界救国会为孙克定、职业救国会为雍文涛、妇女界救国会为林立、学生界救国会陈家康。另积极参与组织工人大罢工,发动募捐,募集的款项通过女工夜校发到罢工工人手中。在罢工期间,国难教育社沪西区分社支部租用了 3 间亭子间,一个是上级国难教育社党组书记郑伯



救国会宣传员在街头散发传单,宣传五卅精神

克和支部成员之间联系研究工作;一个是专用于宣传编写“沪西罢工动态”,编写刊物《老百姓》,及时印发到罢工工人中去;还有一个是发动工人罢工斗争的群众组织十三姐妹活动阵地。中间的以工人夜校为主开展活动。1937 年八一三事变前夕,吴新稼在沈钧儒家召开的联席会,会议主持人提出,抗日救国会的宗旨是促进政府抗战,现在蒋介石已明确表态全面抗战。政府抗战了,救国会的任务也完成了,决定自动宣布结束工作。吴新稼根据会议精神,也决定沪西分社自行解散。

(四) 沪西共青团区委

沪西共青团组织一直是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青年组织。但在党内“左”倾路线影响下,团组织屡遭敌人破坏,许多领导被捕、被枪杀,团区委工作陷于停顿。随着上海党的各系统都失去党中央的领导,省区委党组织的瘫痪,而由于共青团和党的系统是分开的,听说团省委



沪西共青团区委书记胡瑞英，后参加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任地下党支部书记（前排左一）

被破坏后，在与中央失掉联系后，留下的同志自己成立团省委，坚持斗争。许亚、陈国栋是留下的团省委负责人。沪西共青团组织被破坏后，留下的共青团员坚持在工厂、女工夜校战斗。青年女工胡瑞英在日商公大纱厂做工，在女工夜校加入共青团，1934年3月到共青团沪西区委（团纱厂区委）

工作，周林任书记、胡瑞英组织，邹泽沛宣传，上级领导为陈国栋，组织反日斗争、发动工人罢工。周林调动工作后，胡瑞英接任书记。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做工维持生计，依靠团员、群众筹集活动经费，有的团员以自己的手饰交组织。最后连机关也无法维持，干脆都去做工，坚持团的活动。并直接参与领导了1936年10月的上海沪西、沪东反日大罢工。11月，共青团沪西区委的工作被迫中止。

三、沪西沪东爆发抗日大罢工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九一八事变、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事变、1935年北平一二九抗日运动，无论大江南北，还是黄河两岸，团结抗日、救亡图存成为广大群众一致的呼声，各地党的组织也在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积极奋战。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沪西人民的抗日救国情绪日趋高涨。

1936年，日本资本家为了扩充其经济实力，抢占市场、排挤打击华商纱厂，加紧对工人的压榨。当时日商纱厂在全市纱厂中的比例达46%，雇佣工人5万左右。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最低日工资仅大洋一角多。厂方禁止工人的一切活动，动辄处罚、开除。工人



纱委、共青团、国难教育社等组织发动全市日商纱厂4万余人大罢工，这是日商纱厂联合罢工的公开信

直接面对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家仇国恨聚于一身，反抗情绪日益增强，不少工人加入各个救国会、赤色工会，赤色工会系统的地下党员在日商纱厂中组织纱厂救国会，会员达3000余人。是年2月，全总白区执行局为了加强对日商纱厂工人斗争的领导，成立了日本纱厂工作委员会（纱委），由陈之一、张维桢、韩念龙、周林组成。这个月，沪东大康纱厂工人梅世钧上工时，随身携带过去在十九路军服役时身着军装照片，惨遭多名日本人毒打致死。

上海工联以夜校工人为核心，酝酿发动抗议梅世钧惨案的斗争，遭到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受挫。3月，纱委组织日商裕丰等5个纱厂工人坐厂罢工，大批工人被开除，罢工失败。5月，全总白区执行局又多次要求纱委组织飞行集会，也未成功。领导罢工的纱委从实际工作中体会到，过去的套路行不通。这时，刘少奇《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传到上海，《提纲》强调，必须彻底肃清实际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我们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地联系与组织工人群众”，“暂时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过去那些秘密的赤色工会即行取消”，“要在各城市中设法联合一切工人的团体与各厂工人，建立工人的抗日救国会”。这样，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从“左”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明确了斗争方向，决心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把工人运动与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团结民族资本家，集中力量打击日本资本家。

1935年时任共青团沪西区委书记的胡瑞英在工厂坚持领导斗争，自调沪东烟厂区委书记后，于11月8日，她率先发动日商纱厂上

海四厂罢工,很快在沪东各日商传开,当天沪东7个厂的1.5万工人罢工,次日,沪东其他工厂亦全部罢工,爆发了1936年的日商大罢工。这次罢工发动在发薪之前,工人未领到当月工资,工人罢工后生活陷于极度的困难。罢工指挥部决定组织已发薪后的沪西工人再次举行规模空前的大罢工。11月16日,内外棉十七、十八厂率先罢工,17日丰田纱厂亦开始罢工,整个沪西的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即将掀起罢工浪潮。气急败坏的日本资本家紧急调动日本海军陆战队包围厂区,用机枪封锁厂门,工人则占领厂内写字间,将厂内日本人全部包围,逼使资方撤退了海军陆战队。工人随即冲出厂门,通知新厂工人一致行动,新厂工人立即关车罢工。早晨,英租界巡捕房竟然派两辆装甲车越界闯入罢工工人集结的中国地界进行威胁,并抓了两个罢工工人。工人一拥而上,围住装甲车。后经中国警察局调解,英国巡捕被迫释放了工人。

内外棉纱厂、丰田新老两厂5000工人的罢工,迅速带动了沪西日商纱厂的罢工,沪西的罢工又引起全市各纱厂的呼应。19日起,沪东已复工的工人已因资方未履行条件而再度罢工,形成全市范围的日商纱厂大罢工,参加罢工工人人数达4万多人。

日商纱厂大罢工声势猛烈,仅沪西丰田纱厂17日、18日两天罢工,日方就损失40万元以上,日商哀叹“纱业前途几将动摇”,直接影响日本在华的经济利益,日本朝野为之震惊。日本当局派出专员抵沪,调查罢工情况,并恳求上海地方协会会长杜月笙和国民党上海市总工会主席朱学范出面调解。工人罢工指挥部的领导者审时度势,认为这正是利用合法斗争形式,与国民党工会建立统一战线的有利时机,可以谈判,提出释放被捕工人和以罢工工人提出的5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后经杜月笙调解,于11月25日达成7条协议:①工资增加5%;②每月赏工改为奖励制,成绩优良者,酌量升级加工资;③不得无故开除工人;④不得打骂工人;⑤每天工作12小时,星期日做14小时,其多做的2小时工作,另加工资;⑥吃饭停工30分钟;⑦各厂工人即日复工。日方基本同意工人所提的条件,至27日结束罢工,持续20天的日商纱厂反日大罢工胜利结束。



日商纱厂联合罢工时,女工们退出工厂的情形

沪西沪东反日大罢工是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爆发,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才取得胜利的。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募捐和向罢工工人发放募捐款,上海学生界救国会发表《为日纱厂华工人联合罢工宣言》,组织大夏大学等院校学生到罢工工厂慰问、赠送食品。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等上海社会名流坚决支持工

人大罢工,他们纷纷起来发表演说,控诉日本资本家的残暴,号召同胞援助日商纱厂大罢工,在全国产生巨大反响。对此,中外反动派联合起来,要坚决镇压。

就在沪西沪东反日大罢工进入最艰巨的抗争之际的11月23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挟下,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串通租界巡捕房以“危害民国”罪秘密逮捕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等七人,并引渡到上海公安局,随后又移解到苏州,关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史良另外单独关押)。由于他们七人是为了抗日救国而遭迫害,故被人们誉为“七君子”。“七君子”等人被捕后,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联名通电全国所提出的八项主张之一就是“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中共中央毛泽东及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等都积极参与营救活动。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国内外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全国团结抗战的形势已经形成,国民党当局对“七君子”案件已难以继续迫害审理,不得不于1937年7月31日将他们交保释放。爱国民主人士与沪西沪东工人阶级同战斗、共命运的抗日救国事迹,已永载史册。

这次反日大罢工是大革命失败后沪西沪东纱厂工人斗争规模最大并取得成功的一次罢工,打破了近年来罢工斗争屡遭失败的沉闷局面,在全国工人运动中产生积极影响。此后,青岛日商纱厂亦掀起了2万多人的大罢工,再次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战斗力,显示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



1936年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悍然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等7人。

抗日的决心和力量。这次大罢工是多方发动的,没有市和区级党组织统一领导。它雄辩地说明,在白色恐怖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没有被杀绝,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在摆脱“左”倾路线的影响,仍用其他各种组织形式争取群众,积蓄力量,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利用合法形式,适可而止,使罢工胜利结束。毛泽东在延安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将这一时期的上海工人运动列为中国重大事变之一,指出:“这些事变,统统都是围绕着中国和日本对立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历史要求的。”

四、左翼革命文艺在沪西

自1927年10月起,一批党和党所影响的左翼文化工作者陆续从北伐前线、从武装起义的战场、从海外汇集上海。他们分别组织社团、创造刊物、开设书店,响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开辟了左翼文化运动的新天地。这些社团中,最有名的是创造社和太阳社。1930年3月2日,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后,立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投入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斗

争。此外还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左翼戏剧组织联盟(剧联)、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记联)。



沪西左翼作家联盟负责人王尧山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王尧山、张士曼、王尘无、叶紫、苏华等青年,成立了沪西左翼作家联盟,负责人王尧山,后来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部长。叶紫发表短篇小说《丰收》、中篇小说《星》、短篇小说集《山村一夜》。张士曼编辑一个《红叶》的灰色文艺刊物。沪西左翼作家联盟活动范围包括现今的普陀、长宁、静安区和西郊地区。盟员除了原有的青年文学研究会(“青文”)外,还有大夏大学“左联”小组,盟员有10多个,

在各系学生中组织了好几个学生团体,大都以文艺组织形式,取××社、××会、××小组等名称。他们搞了很多墙报,以手抄刊物油印刊物等作为活动方式。他们在学生中推动阅读左翼作品,并从事诗歌、小说创作,写标语,以及发动学生进行斗争等活动。沪西的许多盟员还分布在纱厂、玻璃厂、印刷厂、中小学中,他们搞了许多读书会、识字班、夜校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公开群众组织,在周围团结了许多群众,形成了“左联”外围组织。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后,广大民众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而担忧,关心时局的变化,迫切希望随时了解有关战争的消息。以真人真事为内容,运用文学手法写成的新闻通讯报道兴盛一时。各类报纸发表的上海军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通讯大量涌现。夏衍到沪西等地的工厂实地观察,收集了有关包身工的大量翔实资料和可靠的统计数据,将日商纱厂资本家与包工头沆瀣一气,用极端野蛮、原始的手段对包身工进行压榨剥削揭露得淋漓尽致。田汉等作家创作赶写了反映学生抗日斗争的独幕剧《乱钟》、《解放》、《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由大道剧社公演。暨南、大夏等剧社举行反日联合公演,上演了《血衣》、《活路》、《工场夜景》、《决心》等短剧。1932年1月28日,正当大道、暨南剧社在暨南大学演出《乱钟》,剧情进行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东北大学学生冲出寝室集合于操场

时,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闸北的炮声响起,日军飞机空袭上海,投掷炸弹,全体演剧人员和暨南大学生涌向大操场集合,高唱抗日歌曲,表达奔赴前线抗敌的决心。暨南大学学生很快就随剧联盟员到前线 and 医院为战士伤员演出,以活报剧、歌咏为武器,鼓励前线将士的士气。

一二八淞沪抗战激起全国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抗日热情空前高涨。人们争相观看在前线拍摄的抗战纪录片:《十九路抗敌战史》、《上海之战》、《上海浩劫记》、《十九路军光荣史》、《上海抗战血战史》等。沪西左联的王尘无等以影评小组为基础,在《申报》、《晨报》发表评论文章,办了《无名文学》,主编一期《电影评论》,对国产片大加赞扬,田汉、聂耳作词作曲的主题歌《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的公映,扩大了左翼电影的影响。

1935年11月,鲁迅收到左联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给左联的信》,这封信是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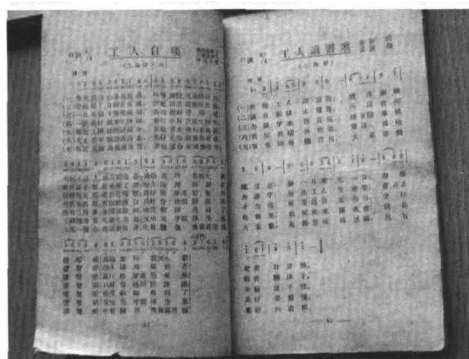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已出现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在瓦窑堡召开中央会议,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领导左联的上海中央文委学习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联名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了解到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并征得鲁迅同意后,遂于年底,左联等各左翼团体相继解散,上海文艺界开始集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齐心协力,用他们的作品向着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发出愤怒的吼声,擂响了全民族抗战的战鼓,此刻,群众性救亡歌咏活动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潮。

上海词曲作者联谊会的成员,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创作了一批表现民族解放斗争的歌曲。青年词曲家孟波到沪西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给女工教唱革命歌曲,同行的有麦新、郑君里、崔嵬、徐韬、丁里、姚时晓等。小沙渡路(西康路)、劳勃生路(长寿路)的三和里和余庆里女工夜校读书的大都是附近内外棉厂的纺织女工,每天12小时以上劳动后,还坚持来上课,孟波等怀着崇敬的心情,为女工教唱反映工人真实生活的《新生活》、《女工歌》、《工人歌》,女工在学唱中,以自己



1935年至1937年出版的部分抗日救亡刊物

血泪的歌声,对黑社会进行控诉,发出震撼旧世界的怒吼。1936年孟波与麦新开始为工人创作一些新的歌曲。9月,孟波为女工教唱《新编“九一八”小调》,到是年11月,爆发了震动全市的沪西沪东抗日大罢工,沪西纱厂工人集体创作《工人自叹歌》,孟波为其配上词曲,很快在罢工工人中高唱起来,唤起劳苦大众要为自身的解放而奋起罢工、斗争:



孟波、洪生创作的工人自叹歌

勿曾开口心里真难过,叫声诸位兄弟搭姐妹;我佢是好人,既没犯啥罪,为啥要叫我佢吃亏? 哎哎哟! 为啥要叫我佢吃亏?

登啦乡下日脚苦勿过,拼死拼活总归肚皮饿,既没法子想,跑来寻工做,啥人晓得格能苦,哎哎哟! 啥人晓得格能苦!

一日要做十几个钟头,做得腰酸骨头痛,眼睛红又肿,勿敢打瞌充,为仔拿摩温邪气凶,哎哎哟! 为仔拿摩温邪气凶!

一眼勿好就要吃牌头，要打要骂还要挪工钿扣，有苦处说，有话难开口，只好背后头眼泪流，哎哟！只好背后头眼泪流！

挪起工钿越来越减少，买柴买米勿够来开销，还有二房东，来挪房钿讨，呒没铜钿勿得了，哎哟！呒没铜钿勿得了。

太太平平已经过勿去，生仔毛病更加勿来事，工钿拿不着，吃药吃勿起，又怕写字间停生意，哎哟！又怕写字间停生意。

格能日脚实在过勿落，要想活命拳头要捏牢，大家一条心，造个新世界，吃着困觉勿再苦恼，哎哟！吃着困觉勿再苦恼！

革命歌曲在工人中传唱，不仅让工人在歌唱中学习文化知识，还宣传了进步思想和抗日救亡的激情，许多工人在斗争实践中逐步成长为群众运动和革命斗争的骨干。

五、沪西人民在革命道路中的探索

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到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这是十年内战时期。沪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战歌，无数的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最后，革命又失败了，连沪西党的组织也不复存在。

痛定思痛，从主观上分析，这是与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在这10年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分不开的。自从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激发起极大的复仇和愤怒心态，由此出现第一次“左”倾错误，急于要用群众的暴风骤雨般的铁拳回击反动派；在党的中共六大纠正了第一次“左”倾错误后，党的组织有了恢复和发展，党内实际负责同志骄傲情绪滋长，头脑发热，脱离中国实际，要掀起世界革命，引发了第二次“左”倾错误。第三次“左”倾错误在批判第二次“左”倾错误时已形成，它的特点是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三次“左”倾错误都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有关，尤其第三次的“左”倾错误与共产国际直接关系，王明冒险主义路线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给党带来严重危害，上海的中央局、江苏省委和各个区委都遭到极大的破坏。连在

江西的中央苏区,也造成丢失中央革命根据地而被迫进行长征。

中国革命是仿效俄国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革命实践证明,机械地模仿俄国城市中心论的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行不通的。在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没有解决土地问题,生产力没有得到发展之时,就想“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是脱离中国实际的主观主义的产物。

在中国,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有用革命的武装来反抗反革命的武装。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就是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十年内战时期的中国革命接连遭到失败,以广大革命者的鲜血和生命,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曾在沪西革命的同志,有相当一批同志后来到农村去开辟革命根据地,走上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在上海沪西继续战斗的同志和后来者,在上海的白区也开始走上新的隐蔽战斗,开创了新的斗争局面。

第 四 编

抗日战争时期

(1937 年 7 月 - 1945 年 8 月)

第十三章

抗战初的沪西

一、八一三抗战形势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日本法西斯发动武装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件,同年11月12日国民党兵败撤退淞沪地区,上海除法租界和部分公共租界外,南市、闸北、虹口、沪西、杨树浦、浦东和市郊各县,都被日军占领,租界地区成为日军包围下的“孤岛”。

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同复杂的国际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意、日等国发展很快,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又尖锐起来。为了适应对外扩张和争夺霸权的需要,德、意、日奉行法西斯主义和疯狂的扩军备战政策,不惜通过战争手段改变世界格局,企图建立由他们主宰世界的新秩序,因而成为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策源地。1936年11月,德国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意大利随后也加入这个协定。这个协定的主要矛头针对苏联,同时也是对英、法、美等国的示威。它的签订,表明东西方三个法西斯国家以反苏反共为纽带,在瓜分世界、划分势力范围方面达成默契,结成了威胁整个世界和平的侵略集团。日本一方面利用反苏反共的口号,另一方面对英、美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企图排斥英、美在中国的势力,并进一步把英、美、法、荷等国支配下的东南亚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英、美等国虽然

同日本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仍企求妥协,因为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德、意引起的欧洲紧张局势和本国的问题,他们害怕日本配合德、意在东方对他们实行攻击,同时也敌视社会主义苏联,害怕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兴起危及自己的殖民利益,因而不但不制止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反而对日本实行绥靖怂恿政策,甚至阴谋以牺牲中国的部分领土为代价来缓和同日本之间的矛盾,还指望把日本军国主义这股祸水引向苏联。苏联政府虽然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日,但因为担心日本和德国东西两面夹攻而不愿过早地卷入与日本的直接冲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挑起了卢沟桥事变。



抗日战争爆发地——北平郊区宛平县卢沟桥

日本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1936年4月,经天皇批准,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扩大编制,兵力增加近三倍,形成一个有5700多人、多兵种的军事集团。9月,日军强占北平西南门户丰台,严重威胁当地中国驻军,加剧华北的紧

张局势。同时,日本军部制定了1937年度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在华北,拟用八个师团占领北平、天津为中心的华北五省;在华中,拟用五个师团,一部进攻上海,一部从杭州湾登陆,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在华南,拟用五个师团占领广州地区。同时以海军控制中国沿海及长江水域,协助陆军占领各战略要地。按此计划,日军准备用于侵华战争的兵力,由1936年的9个师团增加到14个。

为了保证这个侵略计划的顺利执行,日本1937年度的国家预算支出比上年度增加30%,总数达30.4亿日元,其中军费预算占整个预算的将近一半。维持这样巨大支出的主要手段是大量发行公债和增加税收,造成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时值1937年开始的新一轮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的所谓准战时经济体制面临困境。



中央造币厂被日军炮弹击中

日本人民深受扩军备战所带来的痛苦,对受军部操纵的政府表示不满。是年1月,广田内阁因军部同政党官僚之间的矛盾激化,被迫总辞职。经过几度内阁危机后,由少壮派近卫文磨出任内阁首相,采用了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的主张:鉴于西安事变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渐形成,应立即扩大侵华战争。日本国内大肆鼓吹对华作战,对外在“和平外交”的烟幕下,大量在华北增兵,强占丰台,大批军舰开到青岛、上海和长江流域。在其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军事上全面部署后,就在1937年7月7日夜,借军事演习之名,在华北制造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战开始。

这时,国民党政府处在动摇状态,还在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7月13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向日本大使馆提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幻

想寻求外交方式来解决,把卢沟桥事变看作局部事件;但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定下吞并中国,占领东亚的方针,卢沟桥之战只是全面侵华的一个开端,对国民党政府的提议不予理睬。7月下旬,日本增调10万兵力到华北,7月26日攻占廊坊,30日占领北平、天津,全面侵华从计划变为行动,不久战火烧到上海。

二、抗战初重建沪西党组织

抗战前夕,为适应即将到来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任务,中共中央在白区党代表工作会议结束后,陆续抽调和委派一批有城市工作经验的高级干部,到国统重要省市恢复重建党的领导机构,加强城市工作的领导。二三十年代曾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的刘晓同志被确定为负责上海和江苏、浙江地区中共党组织恢复重建工作的领导人。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由刘晓、冯雪峰和王尧山组成中共上海三人团,刘晓全面主持上海秘密党的工作,王尧山协助工作,冯雪峰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中共上海办事处,协助潘汉年开展统一战线和文化工作。

正当上海地下党抓紧恢复重建时,全国形势突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七七、八一三抗战相继爆发。日本野蛮侵略,激起了上海人民强烈的愤怒,沪西的工人和全市人民都自发地行动起来,群众的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8月中旬,据《申报》不完全统计,上海成立的救亡团体有170余个。上海掀起了抗日救亡、支援前线的热潮。但是,由于中共上海党团组织刚刚整顿,力量单薄,国民党仍旧限制群众运动,因此,抗战初期的救亡运动存在着散漫零乱、自发性的状况。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的号召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根据全民抗战的总任务,党的“一切地方工作,以争取抗战胜利为基本原则”的总方针,刚刚建立的中共上海三人团,立即转变工作重点:“从单纯整理党的组织转向领导群众运

动”，确定了把秘密党组织的重建工作与领导群众运动结合起来的工作方针，把发展党的主观力量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



冯雪峰(左) 刘晓(右)

为加强对群众运动的领导，7月中旬，刘晓决定在中共上海三人团下建立群众运动团体工作委员会（简称群委）和工人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群委：书记先是沙文汉，后因病改由王尧山兼任，委员沙文汉、彭柏山、王洞若、王翰、陈修良，分别领导职

业界、妇女界、学生界、街道里弄的党群工作。工委书记林枫。委员吴仲超、马纯古，重点负责工厂产业系统救亡团体的党群工作。在群委、工委直接领导下，以已确认党籍的党员为核心，按系统建立支部干事会，在救亡团体中建立党团。支部干事会负责基层组织工作，党团在同级组织领导下负责救亡团体与公开的群众工作，尤其是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从组织上保证党的秘密工作与公开的群众工作既严格分开又密切结合。群委、工委要求各系统正在接受党组织审查和寻找党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迅速行动起来，深入到周围的群众中去，在组织和领导群众抗日救亡斗争的实际工作中，接受党组织审查。重建上海党的组织，明确不能把原有的组织系统合并起来或整套班子接收过来，而要遵循严格又谨慎的“逐个审查，逐个确认其党籍”的重建方针，把上海地下党建立在政治上可靠，能在上海长期隐蔽的党员基础上。

刘晓确定了“党员能在哪里发展即在哪里发展，能有多少即做多少的办法，最大限度地团结大多数群众到党的周围来”的工作目标。各系统的党员、积极分子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在艰苦的环境中，担负起推动广大群众组织起来的工作。纱厂工人救亡协会等组织相继成立，协会中也建立了秘密党团，沪西的纱厂、绸厂也有党的组织建立。

同年9月底，党中央又派长期从事职工运动领导工作的刘长胜到上海，配合刘晓加强工人运动的领导。11月初，经中共中央批准，中

共江苏省委正式成立,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组织部长王尧山、宣传部长沙文汉、军委书记张爱萍。省委以上海市为中心,同时领导江苏、浙江两省京沪、沪杭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地下党的工作,还担负江浙敌后农村抗日武装游击战争的开辟工作。省委直属中央领导,同时受南京中共代表团领导。

根据中央确定的白区中心城市党组织的建立和恢复,不以地区而以产业与职业划分工作的有关指示精神,省委成立后,不再按地区建立区委,而按照不同系统设立党的委员会,实行垂直单线领导。省委成立后,设立了6个系统党委,即:军事运动委员会、工人运动委员会、职员运动委员会、学生运动委员会、教育界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文化界运动委员会。此外,省委还直属领导巡警特支和海关特支两个特别支部。12月,又建立难民运动委员会。1938年春,因军委撤离上海,为加强苏浙敌后农村党组织重建和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省委又设立外县工作委员会。

1938年6月,中共上海市工委决定建立以谭宝莲为书记的中共上海杂厂委员会(简称杂委),重点在沪西,又称沪西产业委员会,由工委刘长胜、马纯古、刘宁一、张祺领导,干事高骏联系。杂委所属基层单位行业庞杂分散,除属工委垂直领导的工交、邮电和属沪西敌纱、中纱领导的纱厂外,管辖沪西丝绸、棉织、针织、内衣、毛纺、机器、灯泡、卷烟、面粉、啤酒和化工等行业的16个基层支部和7个直属党组织,共有党员41名。1940年9月前后,工委又将西南地区工人委员会部分成员及基层党组织陆续划归杂委领导,并建立了丝绸棉织工委的分委机构。是年,谭宝莲以沪西国民战时服务团为阵地,举办游击战事学习班,军委派出专职干部对80多名青年积极分子授课和进行军训。

1938年8月,刘贞为书记的中共沪西中国纱厂委员会建立。1939年下半年,又建立以朱伟倩为书记的中共沪西敌纱厂委员会。至1941年底,三个机构先后建立24个党支部,8个直属党组织,共有党员240名。

第十四章

“孤岛”时期人民的抗争

一、日寇在真如疯狂烧杀抢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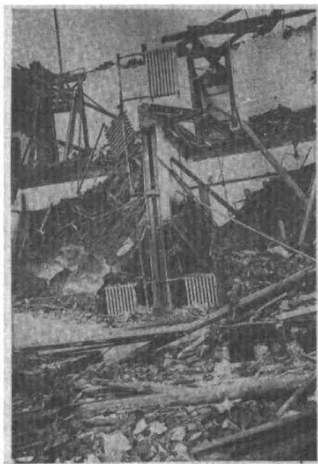
“八一三”日军轰炸上海北火车站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炮击闸北,海军陆战队从汇山码头登陆,向闸北、虹口进犯,八一三事变就此发生。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下令还击,中国军队对杨浦以西至虹口的日军发动反击。日军不断增援,入侵兵力前后达30万。

中国方面也陆续调集6个军

70余万人参加会战。双方百万大军的激战,是中国反侵略战争史上空前规模的一场大战。8月22日,日军偷袭罗店得手。从8月23日起,日军相继在罗泾小川沙、吴淞张华浜登陆,战事中心转至宝山、罗店一线,9月7日,宝山沦陷。中国军队分左、中、右三翼抵抗,中央作战军指挥部设在真如。9月30日,日军强渡蕴藻浜,向大场、真如进犯。中国军队以造币厂、真如、江桥至南翔布防阻击,并以彭浦为中心,东南至潭子湾,西至暨南新村,进行固守。10月26日日军,攻占庙行、大场,进攻真如发讯台、真如车站;下午,日军被阻长浜一线。

日军便投入数百架次飞机,以13辆坦克为先导,进行强攻,遭到中国守军的坚决抵抗。27日,真如发讯台被占领,日军沿桃浦南进,至放家桥、吴家厍、横港一线再遭阻击。日军又出动百余架次飞机,对真如车站滥炸,被中国军队击落一架,坠落于中山路桥处。当晚21时30分,中国军队发起反冲锋,战斗胶着于横港、侯家宅一线。28日6时,东路日军沿沪宁铁路、交通路、中山北路,分3股向真如进攻,上有数十架飞机,下有数十辆坦克开道;守军以民宅为堡垒,各自为战,顽强抵抗,全镇火焰冲天,建筑多成废墟;下午,真如车站被占。17时30分,中国守军突出重围,抵达吴淞江南岸,完成了掩护大部队撤退的任务。而北线战斗至10月30日仍在战斗,是日凌晨3时半,日军以5000兵力,20辆坦克,进攻徐家宅、季家厍,激战3小时,在中国军队正面反击、两翼策应的顽强抵抗下始退。31日,北线守军退至南翔。在此战役中,侵华日军出动200多架次飞机,付出了死伤2000余人的代价,才夺取真如。11月5日拂晓,日军利用大雾、大潮,从杭州湾北岸金山嘴登陆,中国军队背腹受敌,被迫撤退,11月12日,淞沪陷落。



1937年八一三时期遭日军
轰炸的暨南大学变为废墟

八一三战争中,日机对真如地区进行了狂轰滥炸,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据不完全统计:

8月18日,清晨6时30分左右,有日机3架,从东海洋面飞出,经闸北飞至真如镇及附近上空,盘旋飞行窥察,滥施投弹轰炸,历时1小时余,先后投掷炸弹13枚,10枚落于东南医学院伤病医院内,医院房屋全部被炸毁殆尽,变成一片焦土。医院内住院之华军伤兵,不及躲避,全部惨遭非命。惨不忍睹。

8月19日至10月17日,日军出动80余架次飞机,投弹150多枚,将包括真如寺在内的真如镇炸为废墟,真如国际无线电台、沪西铁路西站瘫痪,更有无数的地区民房被彻底炸毁,无数百姓死于日军飞机的轰炸。

据统计,在八一三战争中,真如区境及附近一带被日军炸死、烧死、杀死和失踪的农民以及被炸毁烧毁的农舍计有:五星村内太东太西等11个村落共33人,房屋697.5间,红旗村内孟家桥、童家桥等14个村落共22人,房屋884.5间;新星村内赵巷、北弄等8个村落共22人,房屋315间,真北村内徐家宅等4个村落共14人,房屋190.5间;四中村内杨家宅等6个村落共191人,房屋502间;曹杨村内虬江等4个村落共16人,房屋478.5间;朝新村内,管家宅、横浜等7个村落共4人,房屋379.5间;俞赵宅、郑家宅等6个村落共8人,房屋479间。总计炸毁烧毁60个村落,房屋3926.5间,死31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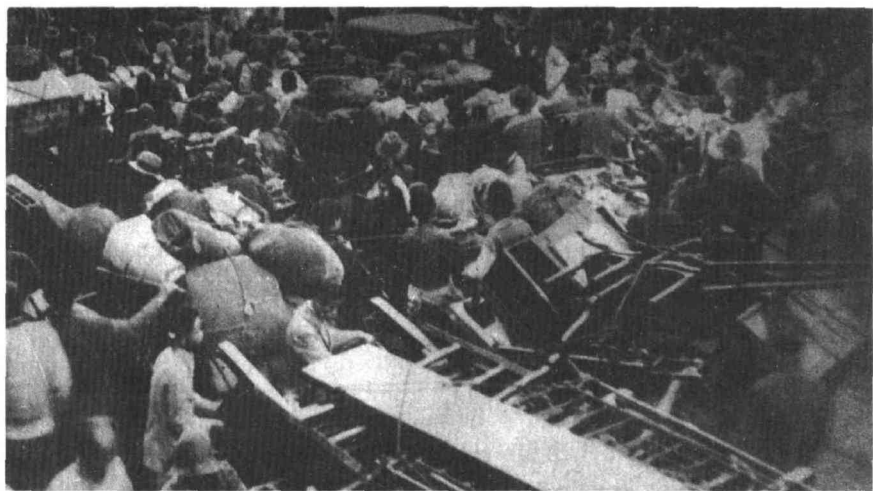
又据不完全统计,在战争中,仅真如镇民有70余人被炸死,120余人受伤;全镇被毁房屋2485间,外出逃难的镇民被杀20人,失踪9人。

二、奔赴前线 报效祖国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受到侵略战争严重摧残,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大量难民从战区涌向包括沪西在内的租界,最多时达70万人,大多是工人、店职员、农民和他们的家属。上海各慈善团体紧急行动起来,成立200多个临时收容所,开展救济、遣送难民工作。上海沦陷后,仍有难民25万,一些临时收容所经合并调整,建立50多个有相当规模的收容所。

日寇侵犯上海,全市各界纷纷以团体会员名义加入救亡协会,原上海各界救国会也扩大了组织,改组成立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以各个救亡协会理事会代表联席会议的形式,作为组织全市性群众抗日救亡活动机构,各界救亡协会成为上海党组织领导各界民众抗日的组织形式。八一三事变后,沪西日商工厂的工人不愿为日本商人做工,不顾失业和饥饿威胁,有4万多工人离厂。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发动各业工人投入抗日、支援前线,在沪西纱厂工人中建立救亡协会、丝厂工人救亡协会和国民战时服务团,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新四军建立于1937年12月25日,是国共合作期间,由第二次国



日军炮击下,大批流离失所的市民涌入租界避难

内革命战争时期活跃于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初创时的新四军,武器不足、粮饷困难,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军饷也随之取消。因此新四军从成立之日起,就面临人、财、物的多重困难。为帮助新四军克服困难,承担起抗击华中日军的神圣使命,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江苏省委“要动员城市工人、学生、知识分子下乡”,支援新四军。中共江苏省委决定采用公开、半公开、秘密三种不同的方法,或三者相互配合方式支援新四军。沪西是上海的重要工业基地,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条件在人力、物力方面支援新四军。

抗战中,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后,专门成立了难民运动委员会,组织发动数十名党员和百名积极分子到各收容所工作,同时加强对各慈善团体和社会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各方力量的支持。沪西许多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进入难民收容所里。大批失业工人积极分子,热望奔赴前线,报效祖国。难民委员会在安顿难民生活的同时,还向难民进行抗日救亡教育,燃起他们心中的抗日怒火。在难民所,开设识字班、文化班,同时开展读报、演讲、歌咏、演剧等活动,团结一批积极分子,使之成为上海支援皖南新四军的新鲜血液。省委副书记刘长胜派谭宝莲到沪西战时服务团任总干事,到工厂做

群众工作,成立救护训练班、军事训练班。省委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马纯古和谭宝莲到阜丰面粉厂开办夜校,团结进步青年工人陈太忠等,先后发展共产党员4人。参加服务团活动的工厂,有面粉、丝织、纺织、煤气、五金、机器、毛纺、制药等各行业。服务团最多时有3000多人,其中有80多个积极分子,成立了党团支部,谭宝莲任书记。服务团采用建立互助会、同济会和办夜校等形式团结群众,帮助失业工人进难民收容所,组织抗日救亡募捐队,举办游击战争学习班,而后又成立游击大队,王继光任大队长,赴松江、青浦一带活动。

在沪西难民收容所里,有一本课文的“难民的话”:“我们是八月十四日逃难出来的,现在家也烧光了,带出来的东西当光的当光,卖的卖光,几天尝不到饭的味道,肚子饿得咕咕叫。最可怜的是小孩,跟着我们受冻挨饿,书也没有读。我们不怨天,不尤人,这都是东洋人害的。”课文讲的是大家的亲身经历,容易理解,易于引起共鸣,你一言我一语,用血泪斑斑的事实揭露、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振奋了民众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民族精神,难民既学习了文化,又受到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中共杂厂委员会深入沪西的面粉、机器、橡胶、花边等工厂企业,动员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新四军。慈联会赵朴初在上层活动,得到仁济堂上层人士赞同,决定组织一批失业人员“移民垦荒”。对此,租界当局亦欣然同意,以此可减轻租界压力,并答应资助路费、服装和发放通行证。他们在闯过日军的吴淞口的盘查关后,由地下党组织暗中接送,并与日伪军队和国民党管区周旋,最终抵达新四军军部,成为新四军战士。与此同时,有的人还到浦东、嘉定和苏常太等上海市郊、苏南、苏中抗日游击区战斗。

沪西的大中学校师生是一支抗日的生力军,大夏大学、暨南大学、法学院等发起成立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筹备委员会,不到一周,报名参加的大中学校就有20余所。沪西区中小学教师救亡协会,还积极训练民众,开展战时普及教育,深入到劳动人民聚居的里弄、难民收容所,开展抗日宣传。

三、组织各界民众抗日团队

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中共江苏省委在抗战一开始就重视武装民众,强调武装民众的工作与号召,要求使这一工作成为一种广大群众运动,成立军事或半军事性的组织。

中共上海工委号召各地区、行业的党员发动周围的积极分子,广泛组织各阶层群众参加战时服务,支援抗战。在上海抗战的3个月中,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上海各界救亡协会建立起的各种抗战支前团体,冲破国民党限制,奔赴前线,参加战地服务工作。仅由各行业工人组织的战时服务团就有100多个。上海纱厂工人救亡协会成立了救护训练班、军事训练班,组织工人学习战地救护知识,进行军事训练,先后发动了4000多工人参加战地服务,动员了500多名青年工人参加抗日军队。

沪西国民战时服务团主要由纱厂、绸厂、铁厂、面粉厂等失业工人为主体组成,成立于8月9日,团址在星加坡路219号,后迁小沙渡路鸿寿坊40号。沪西国民战时服务团曾以团体会员资格,加入文化界救亡协会。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通过沪西国民战时服务团发起要求政府当局领导并分配抗敌工作、参加国防生产建设和救济失业工人的签名运动。10月17日起,该团出版油印救亡刊物《火焰》。《火焰》创刊号开场白声言:“我们没有整齐的装订,美丽的词句以及学者的论文,这里只有我们工人的话,我们工人的希望,我们工人的生活,我们工人爱护祖国的情。”《火焰》创刊号发表《悼念鲁迅先生》诗,寓意深长地写道:

一声呐喊过夜空,
黑暗的深处起了回响;
原来你是解放的战士,
在向世界高呼反抗!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当天,原在沪东纱厂工作的中共地下党

员周林等人,在外白渡桥南堍拉了一条横幅,上书“日商纱厂工人登记处”,想把涌进租界避难的沪东地区日商纱厂工人组织起来。岂料群众误认为他们是为日本人做事的汉奸,工人围上去将他们揍了一顿。与此同时,沪东、沪西日商纱厂工人推选代表到国民党市总工会要求领导全体纺织工人参加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分配前方工作。要求数次,均无结果。于是,地下党员深入群众,发动一批青年工人分途向各厂工人联络,帮助各厂工人建立组织,而流散在街头的失业工人,更是主要的联络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9月23日,在劳勃生路福兴村24号,成立了上海市纱厂工友救亡协会。参加的有日商国内外棉、日华、同兴、公大、喜和及华商一些纱厂的工人约1300人,下设组织、宣传、募捐、戏剧、壁报、学校、前方工作和失业登记等8个组。在沪西的阜丰、福新面粉厂、美亚等绸厂、申二、申九等纱厂以及其他一些工厂中,开展救亡活动,发动和教育职工群众。该组织一时成为上海纱厂工人统一运动的中心。国民党市社会局和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分别派出驻会代表,企图控制操纵,分裂工人团体。纱厂工友救亡协会便在这种极为复杂的环境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确定方针是:“坚持工人阶级统一抗日的必要,反对任何分裂的罪恶,加强工人的政治认识,批评任何把抗日与生活分离的阴谋”,号召以“工厂为单位,组织分会,尽可能产生工人自己的代表去参加领导机关或执行委员会,以树立该组织的民主力量。”10月10日,在小沙渡路三和里37号,设立了沪东区分会,参加的有沪东地区纱厂工人800余人。在一些会员较集中的大厂也成立了分会,纱厂工友救亡协会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工人救亡协会之一。

沪西的战时服务团中的中华书局也是不容小视的组织,中华书局职工发起组织《沪西印刷界同人战时服务团》,团址在哈同路(铜仁路)慈厚南里85号,进行宣传、募捐、慰问难民等活动,并有团员多人参加抗日武装队伍奔赴前线。

1937年,抗日高潮兴起,佛教爱国人士在上海“慈联会”的领导下,决定成立僧侣救护队,紧急通知南京、上海地区各寺庙派出僧徒青年200人,到上海玉佛寺报到集训。全队共分为3个大队,分队长、



中国佛教会组织的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

队副、队员全部是僧侣和佛教徒。下设有总务、队务、救护3组。队员待遇微薄,总队长尽义务,副队长每月津贴20元,队员8元。队员中三分之一是知识分子,是全国各地佛教学院的优秀人才。训练月余,八一三战事爆发,僧侣救护队立即奔赴前线,昼夜奋斗。沪战中,他们

冒着生命危险,出入吴淞、大场、刘行一带战区,救护受伤官兵和难民。据“慈联会”1938年报告书称:在沪战3个月中,共救护伤兵、难民8272人。当年冬,上海除租界外全部沦陷,四郊战场尸体遍地,中国的士兵及难民的遗骸无人过问,上海佛教界组织玉佛寺、法藏寺、关帝庙等寺庙的僧侣和香工,建立掩埋队,从1938年2月开始到5月结束,总共掩埋尸体1万多具。

江南地区诗人组织陶社,其成员在抗战期间,避难于上海。玉佛寺的主持、诗僧震华法师于1944年应陶社成员陈季鸣等人所请,借寺内精舍数楹作为陶社社址,于当年浴佛节在寺内复社,出刊物《槟榔浴佛集》等诗集。

8月23日,一支由丝织厂工人组成的小分队,埋伏在曹家渡日商公大三厂工房内,乘日本人给工头和翻译发工资时,进行袭击,当场打死山口等3个日本人,缴获3支手枪,500元银元。事后,队员撤退租界,有的参加了八路军。

四、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辗转各地抗日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是由何香凝领导的以全国妇女抗敌慰劳总会上海分会名义组织的一支随军战地服务队。

1937年9月中旬,何香凝委派胡兰畦女士与上海基督教女青年

会劳工部夜校联系,挑选10名学员组成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工作。在校学生、共产党员任秀棠和原共青团沪西区委书记胡瑞英各自向上级组织汇报,夜校党支部支持任秀棠报名,共青团省委临委书记陈国栋指示胡瑞英,挑选一批思想觉悟高、不怕苦、不怕死的共青团员组建战地服务团,胡瑞英自告奋勇地配合学校组队。9月底,由1名教师、9名纺织女工组成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成立了,这支队伍平均年龄不足19岁,其中有1名共产党员、7名共青团员,她们大多来自沪西等地的工厂女工。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出征前合影

何香凝指派胡兰畦为战地服务团团长,出发前,胡兰畦团长率领全体服务团团员到何香凝寓所辞行。上海妇女界的知名人士史良、沈兹九、罗叔章等为服务团开了欢送会。10月5日出发时,上海《妇女生活》杂志和上海各报都发表了消息,并登载照片表示欢送。

10月6日清晨,10名姑娘身穿戎装,在团长胡兰畦的率领下,正式到嘉定前线国民党十八军罗卓英部队工作,她们的任务是:唤起民众,侦查汉奸,慰劳战士,纠正军纪,查考地方公务人员工作实况。这批特殊的女兵以出色的工作赢得了部队官兵和战区民众的欢迎和信任。1个月后,上海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第二批队员前来报到,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扩大到18人。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所到的前线战事十分激烈。她们经常

冒着敌机轰炸、机枪扫射的危险,在青竹林的掩护下,演战戏、唱抗战歌,慰问抗日将士,激励军民同仇敌忾打鬼子,向士兵宣传抗日就是保国卫民,切莫违反军纪的道理,消除老百姓对军队的恐惧心理。沿途,她们还起早摸黑到老百姓家中,宣传抗日,在稻谷收获时期,帮助群众抢收抢种,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抬伤员、运弹药、送粮草。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在前线服务中,里面的共青团员都是归胡瑞英单线联系。每个党员、团员都十分清楚自己的职责,在前线工作主动、积极,队伍团结、纪律严明。



服务团演习救护伤兵

11月中旬,前线战事吃紧,淞沪前线国民党军队全线撤退。服务团的党团领导遵循党团组织的指示,在团长胡兰畦的带领下,随罗卓英部撤退。沿途屡遭敌机轰炸、扫射。她们忍饥挨饿,跋涉千里,双脚磨出

血泡,双肩被压得红肿,但没有一个叫苦,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为了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绝不能辜负党和团组织的嘱托,一定要抗战到底。她们一路随军撤退,一路宣传,沿途唤起民众抗日救国,鼓动大家万众一心抗敌。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行军,大家终于到达南昌。

此刻的南昌,已集中有南方八省的红军部队。叶挺、项英、陈毅等都在南昌筹备成立新四军。陈毅与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团长江兰畦早年都是北伐时的战友,曾有共学习、同战斗的深厚友谊。当陈毅获悉阔别十多年的胡兰畦已到南昌时,立刻到服务团与胡兰畦会面。陈毅在胡兰畦的请求下,给全体服务团成员作了一个报告,讲述抗战形势与八路军平型大捷,要求服务团全体成员进一步宣传抗战必胜、敌人必败的形势。共产党员任秀棠和共青团员胡瑞英各自找了个空,悄悄地向陈毅要求,“我们有个要事向您个人报告,请告诉地点。”陈毅心领神会地说:“好!来月宫饭店。”这天晚上,任秀棠和胡瑞英又相约团员郑惠珍一起到了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所谓“饭

店宾馆”与陈毅会面。任秀棠说：“到南昌后，我们心急如焚地找党组织，找不到组织，像失掉了娘的孩子，都快急死了。”接着，将服务团内的党团员名字及工作表现向陈毅作了汇报。“好！，把党团员名单留下。”陈毅鼓励大家说：“你们服务团工作做得很好嘛！现在国共合作打日本，国民党地区的广大民众需要我们去发动，你们能在友军里工作很重要，很有意义，要很好地工作下去。”过了2天，陈毅派李志高参谋到服务团，再请3人到月宫饭店。陈毅出来接待，高兴地宣布：“我同上海党组织联系过了，你们的组织关系问题解决了，10名共青团员都可以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成立一个党支部，支部可以设支委3人，经党组织研究决定，提名支书由胡瑞英担任，任秀棠任组织委员、郑惠珍任宣传委员。因为你们是在罗卓英部队工作，不宜与地方党发生关系。”接着又说：“当前我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党要求共产党员站在抗日的前线，你们就是在前线！你们工作的对象是士兵与民众。在友军中工作，会遇到很多困难的，共产党员是不怕困难的。你们要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党所提出的争取胜利而坚决奋斗。”临别，陈毅又说：“新四军就要成立了，不久我们要去皖南。我们已得悉，罗卓英部也要去皖南。你们的事可直接找我联系。”服务团正式建立了党组织，党支部直接由陈毅领导。1938年初，服务团随部队到皖南歙县，驻城外棠樾村。1月底，在城东饭店正式秘密召开了支部成立大会，选举了支委会，传达了陈毅的指示。由于服务团需要做的工作太多，人员不够，团长胡兰畦去上海、武汉，充实了两批团员，到1938年3月，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已扩大到36名女战士，随罗卓英部队辗转于皖、浙、赣三省10多个县开展工作。她们白天行军，夜晚为战士和老百姓演出。她们从演独幕剧到演出多幕话剧，从唱歌到舞蹈，编演歌颂抗日英雄的京剧《大战东林寺》，深受士兵和群众的欢迎，她们的演出，有时来观看的群众达几千人，每次演出，都在当地点燃了抗日的烈火。1939年7月中旬，胡兰畦去重庆担任了党政委员会第三、第九战区少将指导员，是年10月初才回服务团。为加强领导，服务团在团长之下设立了一个队长，胡瑞英被选为队长。1940年春，胡兰畦团长因患有恶性疟疾去重庆治病，后没有再

回服务团,该团便在队长胡瑞英的领导下继续战斗。



劳动战地服务团

李亚芬烈士

1939年以后,由于国民党越来越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服务团的抗日宣传受到限制,民众工作遭到监视。1940年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国民党特务企图把服务团溶化掉为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地下党支部认为再留在罗部工作已毫无意义,大家认为到延安或新四军工作才有革命意义。要撤出罗部,必须先请示上级党组织批准。可是领导她们的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黄道已在战斗中牺牲,中断了党的联系,团部决定由任秀棠以治病为由,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请示。经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批准,命支部率领党员和积极分子、老团员安然撤出。同年6月任秀棠根据党的“妥善撤离”的指示,党支部决定采取老团员战地服务工作已3年,集体请假回沪探亲的办法,撤离了罗卓英部队,分批奔赴皖南新四军和革命圣地延安。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在3年中跨越苏、浙、皖、赣、湘、鄂、豫、闽8省,行程2万里,李亚芬(里希)在山东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英勇牺牲,为抗战献出了火红的青春。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是上海抗战初期涌现的一支抗日战斗队、宣传队、救护队,她们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走向抗日的大江南北,是中国新生产力工人阶级妇女的代表,她们以先进文化观念武装自己,成为新女性的战士,她们在中国的抗战史上留下了中国劳动妇女抗战的光辉足迹。

五、沪西民族工业的西迁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上海的民族企业家为了救亡图存,也在进行一场不太被人们注意的内迁运动。上海的民族工业,根据1935年在国民党政府实业登记的资料,上海各类工业占全国同类工厂的31.39%;资本额占全国总资本的39.73%;工人占全国同类工厂工人

总数的31.78%，也就是全国的现代工业，三分之一以上是集中在上海。这些企业如果毁于炮火，对于基础薄弱的中国民族工业无疑是雪上加霜，大大削弱抗战实力，如落到日本军方手中，势必增强日本侵华战争的经济实力。

中国民族工业的资本家在反抗日本侵略方面，态度是积极坚决的。沪西民族工业发轫于1889年的大有榨油厂。20世纪初，随着公共租界的扩展，道路的辟筑，水电煤气管线的铺设，吴淞江船埠码头的建立，又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空隙，民族实业家先后在沪西开设面粉、榨油、纺织、造纸、印刷等工厂。据统计，1937年，沪西有大小工厂777家，职工8.14万人，其中民族资本企业有750家，职工5.47万人（外资企业26家，职工2.67万人；官僚资本企业1家，职工100人）。民族资本企业中，30人以上工厂98家（榨油业12家，面粉业12家，纺织业47家，轻工业13家，机电业9家，化工业5家）；1000人以上大厂有申新二厂，申新九厂、溥益一厂、溥益二厂、统益纱厂、振泰纺织公司、永豫纺织公司、大丰纺织公司、崇信纺织公司、大隆机器厂等10家。500人左右有阜丰面粉厂、福新面粉厂、立德油厂、美亚绸厂、江南造纸厂、中华书局上海印刷所等。这些工业，在全市占有重要地位。当时境内纺织、面粉、榨油生产设备能力在全市民族工业中所占的比重是：棉纺纱锭共41万余枚，占全市108.21万枚的38%；织机3270台，占全市7238台的45.1%；面粉日产能力9.39万包，占全市日产能力10.11万包的93%；榨油年产能能力20.94万担，占全市年产能能力25.44万担的82%。可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沪西民族工业遭受严重损失。

上海“八一三事变”前夕，上海民族工业的一些代表人物和同业公会先后呈文国民政府，提出政府协助工厂迁往内地的要求。国民党政府召开实业部、军政部、经济委员会、交通部、铁道部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沿海工业内迁的问题，但无法形成共识。在沪西经办“天字号”的大企业家吴蕴初和申新纱厂的荣宗敬等也纷纷要求内迁。工厂内迁是一件十分繁重的任务。内迁要解决迁达地点、经费、交通等一系列的问题。上海民族工业家所组成的迁移委员会做了许多实际

有益工作,但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信任,各级机构各行其道,推诿拖延,横一个调查,竖一个方案,造成内迁工作的极度混乱。当时战火已起,装箱、运输等费用都在水涨船高,财政部的内迁经费还未落实,动弹不得。在如此重重的困难情况下,许多民族企业家,为了祖国,为了民族工业生存,仍然踊跃报名要求内迁。



1937年8月,上海成立工人联合迁移委员会,先后内迁民营工厂146家,2500人,几万吨物资

八一三抗战爆发,中国味精大王吴蕴初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是爱国。”吴蕴初的“天字号”企业,在申请时,不等批复,就派妻子赴香港办天厨分厂,并连夜将工厂的重要机件,拆卸装箱。天利氮气厂、天原电化厂虽地处沪西尚未波及战火,但四周都已驻满军队,运送机器几次被水警、军队扣压。天原厂的一条内迁船只,被日军轰炸击沉在苏州河里。天原厂从1937年10月开始内迁,到1939年春,带领职工将天利、天原、天厨3厂的机器设备内迁到重庆,3个工厂先后在重庆复工,机件才陆续地运到重庆,在宜宾还建了天原分厂。由于沿途损失严重,加上新厂址征地建造,到1940年才开始生产。天利氮气厂的设备在内迁中全部损失,因此没有独立生产的能力,就作为天原厂的一部分,生产耐火砖及高压电瓷。吴蕴初在工厂内迁中遭受巨大损失,但不气馁,为在后方建立化工厂作出了很大努力,是主张抗日、反对妥协的实业家,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中共代表抵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

商谈国共合作时,曾派王若飞、邓颖超专程访问吴蕴初。9月7日下午,在曾家岩由吴蕴初和王若飞联名邀请,毛泽东亲自主持茶会,与刘鸿生、胡西园、吴羹梅等工商界人士会面。抗战胜利后,又将这些厂搬回沪西。

号称中国面粉大王的荣宗敬、荣德生在沪西拥有大量的面粉、纺织产业。抗日战争爆发后,荣宗敬留守上海,他联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当前进行总动员计划时,首先应恢复一般生产事业,以蓄国家实力。工厂为生产事业之基础,目前尤应加紧制造,设法流通,以应全国需要。可迁移者应该从速迁移,可复工者应该从速复工。”后避居香港,1938年2月10日病逝。荣德生从汉口回上海主持工作,拒绝了日商“合作”经营申新三厂和茂新二厂的企图。

沪西的美亚织绸厂、商务印书馆、天原化工厂、申新纱厂等都自愿内迁。振华造漆厂等几家小厂,在炮火中抢出生产设备,往租界地区转移。

六、“孤岛”时期的沪西文化教育界斗争

全面抗战爆发后,迫切需要动员广大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把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发挥出来,同时还需要扫除十年内战期间国民党反共宣传在群众中留下的阴影。因此,加强文化战线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原中共沪西地区的曹家渡区行动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王任叔在抗战期间,出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秘书长,参与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的《救亡日报》编委工作,进行全面抗战的宣传。八一三抗战期间,不论白天黑夜,全市每个角落都能听到慷慨激昂的救亡播音和雄壮的救亡歌声。沪西更是沉浸在抗日救亡的声浪中。在于伶的领导下,组建了13个救亡演剧队,其中一支由石凌鹤和于伶分任队长,暨南大学的暨南剧社成员组成,他们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同心合力打东洋》、《为自由和平而战》等节目,深受民众的欢迎,在广大群众中播下抗日救亡的火种。

原中共国难教育社沪西分社书记吴新稼(吴莆生)积极从事沪西



女工夜校学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

导演徐韬,化妆崔嵬

救亡团体活动,并领导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地下党活动。青年会女工夜校教师陈维清在“教联”的领导下,从事夜校的工作。八一三事变后,沪西分社自行解散,党组织安排她到沪东继续从事救亡活动,并组织了由难

童组成的孩子剧团,《救亡日报》发表了孩子剧团成立宣言,宣言写道:“我们是一群流浪儿……在从前我们就相信抗日战争一定要爆发。我们曾经发过誓:不逃,不躲,要同日本鬼子拼。现在抗日战争真的开始了,我们虽没有了爹妈,没有了家庭,成了流离无靠的孤儿,但是我们没有哭,没有伤心。……我们知道不能上前线去与鬼子拼,不能作大规模的事情,我们只有以我们所有的力量,团结起来,以过去所爱好的工作来为国家服务,为民族尽力。”孩子剧团成立后,到包括沪西在内的上海各难民收容所、伤兵医院和工厂、学校、里弄演出。11月18日,在吴新稼等教师带领下,辗转8个省市,一路宣传、一路演出,1938年4月,到达武汉,受到周恩来、邓颖超热情的欢迎,茅盾撰文赞叹道:它是“抗战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现今普陀区长风公园中心地带大草坪东部,树立了一座“地下少先队群雕”,即是以“孩子剧团”等原型故事为题材的革命纪念地,成为上海全市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阵地。

沪西是上海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区域,历来是革命文艺工作者重要的活动阵地。左联业余合唱团的党员积极分子孟波、麦新等经常到沪西从事宣传抗日歌咏活动,相继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国际歌》等歌曲。

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及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有在工厂区创办女工夜校的传统。1938年春,在工委成员马纯古、刘宁一的



坐落于普陀区长风公园内的
地下少先队群雕

领导下,通过女青年会劳工部主任干事张淑义,开展女青年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争取恢复因战事停止的夜校,得到钟韶琴、邓裕志等先期负责劳工教育的爱国基督教人士的积极支持,以劳工部的名义,四处游说,寻找校址,去工部局登记注册,先后在小沙渡路(西康路)三和里、曹家渡、七浦路、杨树浦路等地陆续加强和恢复5所女工夜校,校长由张淑义担任,同时,建立了女工夜校党支部,学生最多时,达1000人。

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时期,女工夜校教材经时任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同意,选用

世界书局出版的语文、算术、常识、平民识字课本。在刘宁一的主持下,夜校委员会组织党员教师编写出版了一套工人夜校通俗课本,其中有《什么叫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史话》、《中国地理》等辅导教材。在特级班里,依旧沿用了《大众哲学》、《帝国主义论》等作教材。

由张淑义、梁思懿等女青年会干事辅导的女工夜校“友光团”发挥着学生自治组织的作用,通过歌咏、演剧、演讲会等各种活动,锻炼同学的活动能力和自治能力。请沈体兰来“友光团”讲时事,郁风、徐韬等来教唱歌、指导演剧。同学们学会了《打东洋》、《募寒衣》等新歌,再回到工厂教车间小姐妹学唱。同学们积极为前线将士捐募寒衣,支持抗日。开展“资本家养活工人,还是工人养活资本家”等社会问题的讨论会,组织“劳资合作、团结抗日”的演讲会。1938年,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工委女工委员会,派李淑英负责领导女工集中的沪西

工厂和女工夜校的工作。纺织女工刘贞在夜校经过教育和锻炼,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1月代表上海工人党员和其他各界代表一起长途跋涉赴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于1945年6月正式出席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抗战初,有3位女工同学与延安来的红军干部分别在敌人的鼻尖下,架设了3座秘密电台,她们是裘惠英与李白,卢云林与郑执忠,张根妹(化名张瑛)与杨建生,分别以假夫妻名义组成地下电台活动小组,领导人是龚饮冰。其中两对假夫妻后由组织批准结为革命伴侣,李白则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张根妹与杨建生的秘密电台,因形势剧变而撤回延安。裘惠英和卢云林也相继被捕。沪西统益纱厂女工汤桂芬在夜校老师的教育和培养下,摒弃了宿命论思想,转变成有高度觉悟的共产主义战士,日后成为上海有影响的工人运动领袖。

1939年冬,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刘晓、刘长胜赴重庆向南方局领导周恩来汇报工作。1940年初,刘长胜又随周恩来到延安向中央汇报江苏省委的工作,当毛泽东听到上海女青年会办的女工夜校有千把学生,加上其他各方面夜校,共有五六千工人读书时,高兴地赞扬说:“在敌伪统治地区,一个工厂办一所学校,组织几百工人读书学文化、求进步,就等于办了一个工会。夜校工作值得提倡和推广,要继续办好它。”同年3月,中央书记处又来指示再次肯定了举办职工夜校的做法,并指出:“工人中的主要工作方针,是教育和团结积极分子。”,

第十五章

全面沦陷时期的沪西

一、上海沦陷后沪西百业凋蔽、人民生活困苦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国主义继德国法西斯对苏联进攻之后,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向美、英宣战,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当天凌晨日军炮击停泊在黄浦江上的美、英军舰,英军舰被击沉,美炮舰投降,接着日军在上午10时,由苏州河各桥梁分路开进公共租界,在街口贴出上海方面日本陆海军最高指挥官署名的布告,宣称日军进驻租界是为确保租界治安,而法租界因法国维希政府已向德国投降,日军暂不采取军事行动。“孤岛”时期从此结束,整个上海处于日本侵略军的统治之下,抗战进入艰难时期。

日军占领租界后,立即在上海全境掀起了经济掠夺的狂潮。太平洋战争,使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空前扩大,战线拉长,开支激增,日本国内战略物资日益枯竭,为了解决战争扩大化与物资短缺的矛盾,日本政府企图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和物资供应站。因此,日本政府在太平洋战争前后制定了一系列对华经济掠夺政策,强调“目前对华经济政策,以增加获得战争所必须的物资为主,并重点开发与取得在占领地区的紧要物资以及积极获取敌方物资。”根据日本政府的战略原则,日军侵占租界后,首先把美、英、荷、比等国所谓“敌国”的工商企业、银行、仓库劫为已有。据统计,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翌年3月,就有83家“敌国”企业、15家“敌国”银行被日

本侵略军强占。“孤岛”时期,一些民族资本家为了保存企业,挂上英、美商招牌,这时也被作为“敌国”财产实行军管。一些没有挂上“敌国”招牌的华商企业,则被强迫实行“中日合营”。至1942年2月止,租界内有90家华商企业被“委托经营”,有66家被迫“中日合营”,33家被迫“租赁”,16家被收买。华人在洋行存款和寄存洋商仓库里的贷物全部被冻结。

沪西是上海重要的工业基地,地区的工商业被日军严重的侵吞与盘剥。苏州河两岸的中央造币厂和大隆机器厂,相继被日军占领。统益纱厂、信和纱厂、申新九厂,被日军作为“敌国”财产实行军管。大隆机器厂被改为生产迫击炮、机枪架和炮弹。1938年至1940年间,沪西有45家企业为躲避战火迁入租界,其中300人以上的有广勤纺织厂、华阳纺织染厂、新生棉纺厂、丽新纺织厂、信和纱厂、华成帆布厂、大诚绸厂、中孚绢丝厂、庆济绢丝、寅丰毛纺厂、华生电器厂、国华烟厂等。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苏州河以南的沪西公共租界,所有日商工厂均要为日军提供军需服务,民族工业的物资和机器设备均被掠夺。鼎新纱厂被改为东洋纱厂,福新面粉三厂、六厂被改为三兴面粉厂,立德油厂改为日本油脂株式会社上海榨油工场,江南造纸厂、国华造纸厂被改为日商株式会社江南制纸工场等。1942年3月27日,上海日本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发出布告,规定钢铁、非铁金属、矿石、棉制品、羊毛及羊毛制品、麻及麻制品、皮革、橡胶及其制品、木材石油、煤炭、工业药品及油漆颜料、油脂及树胶、医药品及医药材料、机器及其附属品、米与小麦、杂粮、面粉及其他食粮品、铁桶、纸张等18种物资为统制物资,并规定上述18种统制物资的库存,非经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发给许可证,禁止移动和使用。由于侵华日军对粮食、棉花、纱布、五金原料等严格统制或强制廉价收购,包括沪西在内的上海一批工厂既无原料,又不能生产自由销售。民族工业中的阜丰面粉厂、申新二厂、申新九厂、新裕二厂、统益纱厂、华生电器厂等一批大中型企业纷纷关闭。如沪西申新九厂,这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一家大厂,因棉花供应不足,处于半开工状态。1944年棉纱生产量只有1941年的4.9%,最后只能关门倒闭。外商的英商白礼氏洋

烛厂、美商奇异安迪生电器公司等也关闭停产。

日本侵略军对经济全面掠夺,使上海百业凋敝、市面萧条,物资奇缺,物价暴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1942年6月30日,日伪上海市政府对市民实行计口授粮配给办法:上海市民“大口每日配米六合,小口三合”,但实行一个月后,又借口“食米来源不畅,拟自八月份起大小口一律以三合计算配给”。市民称这种计口授粮为“户口粮”。户口粮最初以米为主,1943年1月后又改为杂粮——糙米、玉米、六谷粉等,这种杂粮掺有许多砂子和泥土。质量极差的粮食也经常停配、断档,市民为了维持生机,经常要排队几个小时,市民称“轧户口米”。“户口粮”每人每月仅有9升,市民经常忍饥挨饿,不得不到市场去买黑市米。由于米源紧缺,供不应求,黑市米价暴涨。1942年底,一石米的黑市价突破千元大关,1943年1月,涨到1500元,1944年竟涨到55000元,最高价为70000元,相当于战前的6000倍。其他的物资如煤球等同样价格飞涨。



在日军统治下,民不聊生,市场上粮食紧缺,市民挤购户口米。

上海全面沦陷前的

1939年,沪西租界人口激增,面粉价格上涨,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当时市场粮价猛增,一般工人月薪只有2元,还不够买一石米。是年9月,阜丰面粉厂经办的食堂,竟将好米拿到黑市出卖以牟暴利,而把劣质米供职工作伙食,激起全厂工人的抗议,发动罢工斗争,资方开除9名工人代表,并勾结巡捕逮捕其中10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工人罢工最后取得胜利,释放被捕工人,增加工人工资5元,不无故开除工人,准许工人成立自己的组织。但是,上海全面沦陷后,工人生活陷入更加的困苦的险境。

沪西人民中生活最为困苦的是工人。由于工厂停工,商业凋敝,

大批工人失业,生活无着,一部分回乡谋生,一部分只得做小贩,踏三轮车,有的因饥寒交迫,只能铤而走险去跑单帮,带一点工业品到苏北等地贩卖,换回一点粮食糊口。当时轮船火车上随时有日伪军警搜查,碰上搜查,不但货物被没收,而且常常遭到毒打以至遭到枪杀。在业的工人,也因物价无止境的上漲和货币的贬值,实际工资不断下降,难以维持生活。这一时期,一般工人每月的工资收入只能买一、二斗米,维持本人生活尚感困难,况且还要供养父母儿女,许多工人只好放工后,再拖着疲倦的身体去跑单帮贩米、做杂工、拉黄包车,在困苦饥饿中挣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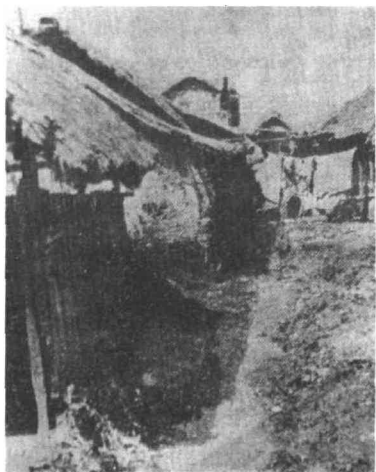
二、药水弄的封锁

日本侵略军对上海人民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日军进租界第二天,就通过它控制的工部局,发布所谓“取缔政治恐怖办法”八条,规定每一地区发生“恐怖事件”(指抗日运动),该地区就将被日军封锁,禁止出入,该地区的住户代表将遭日本宪兵队审查或惩处。

1942年2月14日下午5时许^①,3个日本人路过普陀路草鞋浜小路(今陕西北路澳门路)附近,被人伏击杀死。日军宪兵队长竺田得普陀路巡捕房的报告,即率领大批宪兵查勘现场,并会同普陀路巡捕房捕探对附近地区实行紧急封锁。南至槟榔路(今安远路),东北沿苏州河、西迄樱华里(新华里)和华界交界的铁门处,为第一封锁线,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过。苏州河沿岸的所有轮渡一律禁止通航,造币厂桥(江宁路桥)上架设铁丝网等障碍物,水陆交通要道口,都有日军宪兵和捕房捕探站岗放哨,日军巡逻队日夜巡逻。在这个圈子里的工人和市民,一律不准外出,否则格杀勿论。日军派出大批宪兵、特务、暗探,监视公共场所,到处突击搜查,认为有抗日嫌疑的立即加以绑架、拘捕。捕人大都在夜间进行,多少人被捕,因何事被捕,外界

^① 据《普陀区志》1994年9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第985页:药水弄封锁日期为民国31年3月5日(1942年3月5日)。

无从知晓。被捕者受到坐老虎凳、火烙、电刑、狼狗咬、刮刀刺杀逼供,种种折磨、酷刑,少有活着出来,即使生还,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已受到重创。



解放前,破烂草棚的药水弄
是沪西棚户区的人间地狱

药水弄是一个有名的棚户区,住在这里的劳动人民做一天活,糊一天口,升斗小民家无隔宿之粮,全靠一点工资买粮活命。一旦封锁,生活来源断绝,生命垂危。在封锁期间,没有东西可吃,有的只能吃猫狗,喝水充饥,个个饿得皮包骨头,日子一长,天天都有死人丢在垃圾堆上,老人小孩的尸体最多。居民顾义民已饿得奄奄一息,他儿子冒险泅渡苏州河,想去对岸求索米食,却在泅渡时被巡逻日军发现,用船篙铁尖刺中腋下,鲜血喷流,偷渡未成,结果他的父亲和小女儿都

活活饿死。以拉黄包车为生的吴积山,妻子身患重病,命危旦夕,为了赚钱治病,仍拼命奔波在大街小巷,当他惊闻药水弄被日军封锁时,拉着空车飞奔回家,却被铁门阻隔在外。他苦苦哀求,反被痛打一顿,险些丧命,只得流浪街头,等到解除封锁后,急奔回家,妻子已僵死多日,悲痛欲绝。药水弄封锁后,居民一连多日断炊,人们饥饿难熬,听说石灰窑附近面粉厂里有地脚麸皮,饥民们竞相取食,因麸皮已发霉变质,许多人吃了中毒、高热,有的不治身亡。纺织女工苏小妹,家中丈夫失业,没钱没粮,还有4个月的婴儿待哺,她因封锁半个月不能回家,待封锁撤销回到家中,丈夫病倒在床奄奄一息,孩子早已活活饿死。苏小妹面对夫病子亡,伤心至极得了精神病。工人谭福海的父亲因爬过铁丝网买米,被日军抓住活活钉死在小沙渡路(西康路)的电灯杆上。苏州河岸边和草棚边空旷地方,生长一种有毒的“牛舌头”草,饥民们挖来充饥,吃后头重脚轻,四肢无力,全身浮肿,以致死亡。有的青壮年男子,饿得难受,铤而走险,从封锁点攀墙

外逃,以求生路。被日军发现抓获捆绑,有的手掌钉在电线木杆上,脚背钉在地上,鲜血直流;有的被绑在电线杆上,皮鞭抽打,皮开肉绽,遍体鳞伤。

药水弄被封锁后,垃圾粪便,狼藉满地,秽气蔓延、疾病流行,老弱病幼无医无药,不少人相继死亡。普善山庄收尸车经常来封锁区装运尸体,每次有二三具。

日寇与地痞流氓在封锁时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镇压。药水弄封锁后,日本宪兵队扶持药水弄流氓朱启祯组织“自警团”,挑选居民和店员充当自警团员,地痞流氓便仗势日夜轮流到日军指定的封锁点站岗,根据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布的编组保甲暂行条例规定,实施保甲制度,逐家、逐户编造户口名册,然后由日军宪兵会同联保长按册逐一详细审查,至3月20日,下午6时,才宣布解除封锁,恢复交通。后有统计,药水弄在15天的封锁期间,饿死、病死、打死的约有200人。

从日军占领租界到抗日战争胜利的3年多时间里,上海成了一个极端恐怖的世界,人民生活处于绝境,民主自由被剥夺殆尽,人身安全毫无保障,上海人民称这是一个上海历史最黑暗、最艰难困苦时期。

三、汪伪反动政权在沪西的精神毒害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到11月,中国军队全线撤退,日军占领除租界外的上海大部,租界成了“孤岛”,大量难民和工商界人士涌入租界,租界人口由战前的165.8万剧增到450万,工厂由400家,增至4709家。租界成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与日伪势力的争斗,有国民党与日伪之间的特工战的特殊地区。英、美、法租界当局在1937年1月13日宣告对中、日双方保持“中立”,到1939年下半年取缔政治团体,禁止抗日行动。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租界直到日本投降,沪西是双方角逐的重要地区。

1937年11月20日,日驻沪陆军武官原田与总领事冈本分别拜访公共租界总董,向租界当局提出5项条件,其中第一条是:“弹压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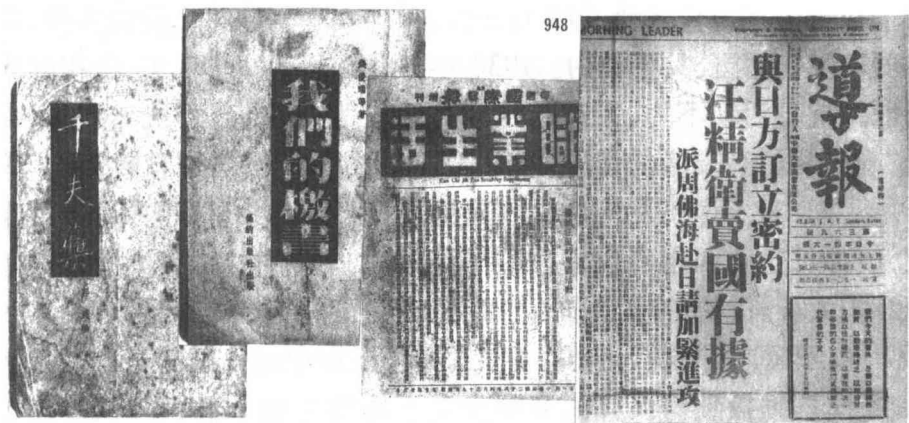
内一切抗日宣传和行动。”12月3日,派出6000名士兵,荷枪实弹,由沪西出发,进驻公共租界内。1938年1月4日,又以英、美、法租界当局取缔抗日活动不力,无法维持地方治安为由,照会两租界当局,提出“对于租界行政增加参加,添用日籍特别副处长、增加日籍董事”等4项要求。此后争夺租界和沪西越界筑路警权,“共享”租界行政管理权,成为日伪和两租界当局激烈争夺的焦点。日本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和扩大汉奸特务组织。同年12月,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1939年2月,日军侵华头目土肥原贤二,为了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决定资助投敌为汉奸的原国民党中统特务李士群、丁默邨,建立特工总部,总部设在沪西极司非尔路76号(万航渡路)。5月,汪精卫潜入上海,开展所谓的“和平、反共、救国”运动,积极招降纳叛,筹建汪伪政权,上海成为汪伪集团活动中心和日本贯彻“以华制华”的基地。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战爆发,日本气焰更加嚣张。9月9日、15日,10月20日、22日,连续在沪西越界筑路地区挑起流血冲突,伪警察局公开在沪西驱逐工部局巡捕,宣布接收沪西警权。工部局被迫作出让步,于1940年2月双方达成协议,成立沪西特别警察总署,名为“共同管理”,实际重要职务均由日伪人员承担。沪西警权的出让,标志着公共租界的势力范围被压缩到静安寺路海格路(南京路华山路)以东。

汪伪76号特工总部建立后,成为汪伪政权制止租界反日活动的重要据点,特别上海全面沦陷后,上海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国民党军统、中统与汪伪反动政权进行激烈斗争错综复杂的战斗阵地。

日本侵略者为了进一步麻痹上海人民,在上海及沪西地区大搞烟、赌、娼等毒化活动,通过鸦片毒害人民,还要通过毒品毒害人们的心灵。

在日军占领区及日伪势力渗透到沪西越界筑路地段后,贩毒、吸毒公开进行,烟窟土行到处皆是。一般烟馆外高悬招牌,楼下买卖毒品,楼上供人吸食。日伪也设立一些装门面的“鸦片稽征所”、“禁烟局”机构,实际是垄断贩运、销售毒品。除鸦片外,毒品中还有白粉、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反动的汪伪政权，上海人民予以严厉声讨。
图为当时的反汪报刊、书籍

红丸，因其价廉，对贫苦百姓诱惑力更大。不少人为寻求刺激而上钩，久之成瘾，结果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甚至露尸街头。日军占领区是赌场林立，赌风盛行。赌博形式五花八门，麻将、牌九、掷骨子、轮盘赌。较大的赌场还供应鸦片、酒菜，甚至娼妓，全天24小时营业。一些小赌摊则无孔不入，遍布劳动人民聚居的各个角落，对职工和市民最具腐蚀性。

有些苦难的工人或失业工人，被这种赌博投机心理迷惑而不能自律。有个工人在报上写：“我们这烟厂里工人，男女合算起来也有3000多人。但是近来一般青年工人，十分之三都赌，‘打花会’、‘斗牌’，每天早晨一走进厂里的坑棚间（厕所），什么也听不见，只是‘你做了什么梦？八杠筒杠的张九宫啦！求神求的关云长啦！’全是这类迷信话，叫人听了真要发呕。”日伪在沪西越筑路地段梅芳里附近新开张了“娱乐社”，因输赢太大，一般工人很少涉足，而工厂职员去的不少。如新裕纱厂的一位职员，到“娱乐社”去赌博，不但把领到的薪水全部输掉，还将毛线衫作价8元输掉。1938年《文献》杂志曾刊登《十月的沦陷区》一文，对当时的沪西一带作了记述：“自华军西移后，伪组织特辟该区为烟赌区，露天赌台，触目皆是，皆是食鸦片所。”

日本侵略者还利用黄色书报、下流文艺和色情勾当毒化上海人民。他们印发各种黄色小报，播放《支那之夜》、《满洲姑娘》等反动下

流歌曲,出版各类淫秽书刊,毒害百姓。

日本侵略者以险恶卑劣手段来毒害人民,并没有达到他们的全部目的。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人民在思想文化阵地上同日伪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举办职工夜校、女工夜校,出版各种进步书报刊物,演出爱国戏剧等活动,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动组织群众,运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坚持抗日救亡运动,直至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

第十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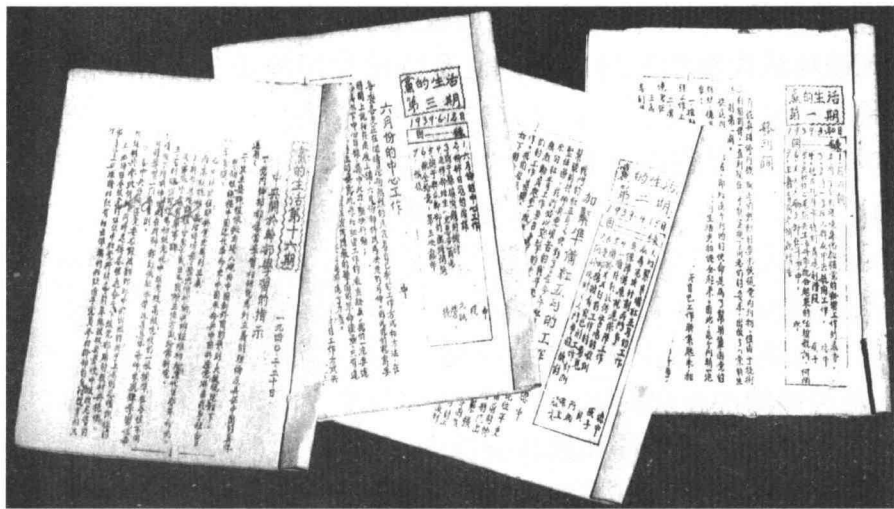
“长期荫蔽,积蓄力量”

一、党组织在形势逆变时的大调整

1939年半年后,日军加紧策划以华制华阴谋,汪伪集团对日投降活动加剧,鼓吹建立反共统一战线。1939年5月,上海成为汪伪反共救国和平运动的活动中心,租界当局在欧战爆发和日本压力下步步退让,同时,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由全面进攻转向重点巩固占领区,国民党的政策重心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国内存在着分裂的危险。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形势。

为避免革命力量不必要的损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9年8月15日作出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对日投降与国内分裂是存在与发展着,严重的问题放在党的面前,因此,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全党同志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要求“各级党组织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中心任务”。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政治局的精神和租界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及时转变工作方针,确定“以巩固为主的组织路线”,工委开展巩固党的教育和检查运动,对党员进行阶级教育和气节教育。

1939年10月底,省委对全市党员的状况作了一次全面调查和分析指出,在全市1610名党员中,有三分之二的党员深入生产部门,“党员绝大部分分布于各生产部门中,和广大生产群众具有自然的联系,经过不断的斗争,他们更能起核心作用,党员干部通过群众组织,



中共江苏省委于1939年3月20日创办的秘密油印刊物《党的生活》,及时传达党的指示

进行各种运动。党员单枪匹马、冲锋陷阵,脱离群众的现象已经没有了。”但是,上海的党存在弱点,在1610名党员中,党龄不满1年半的党员为309人,党龄不满1年的党员379人,党龄在半年以下的党员为689人,三者共占党员总数的86%,而党龄超过5年以上的党员只有12人,仅占党员总数的0.7%。各级统计数字表明:上海地下党绝大部分同志党龄短,都是在国共合作抗日处于高潮的政治条件下,在孤岛尚未沦陷的环境中加入党的组织的,他们没有经历过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残酷斗争的考验,他们还缺乏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和顽强独立作战的能力。因此,省委认为要使上海党适应环境变化,成为艰苦环境中不可摧毁的战斗堡垒,为此,省委作出了《上海党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的决定》,确定“巩固党的工作应成为目前工作的中心”,并从思想上、组织上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①开展巩固党的教育运动和党员干部审查运动;②着手整理、严密、巩固党组织;③加强省委和各级党组织的保卫工作。

1940年初,省委副书记刘长胜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白区工作“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省委要求党的基层组织把主要力量放到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工厂、企业和学校,将超

过10人以上的支部分成几个独立的彼此互不联系的平行支部,以便在遭到破坏后能继续坚持工作。使系统的党组织更加严密巩固,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

1941年底,中共江苏省委奉中央命令,转移至新四军淮南根据地,而所属工委等六个系统党组织仍然坚持在上海斗争,以配置能够长期隐蔽埋伏的主要领导人独立开展工作,互不联系。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租界,实行纱布统制,棉纺织厂陆续停产。沪西的华商纱厂和针织袜厂等纷纷倒闭,党组织也大量减少,至1942年底,在沪西的产业部门中,党支部减少为9个直属党组织,至1942年底,工委决定撤销华纱和敌纱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共沪西纱厂委员会。1943年1月,中共江苏省委撤销,4月初,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工作部又称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成立,负责领导上海、江苏敌占大城市地下党工作和群众运动。这一时期,沪西的杂委和纱委及基层党组织,在华中城工部下设的工委领导下,认真执行党的“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指示,深入工厂,密切联系群众,加强抗战必胜的宣传,指导党员在群众中广泛组织姐妹团、兄弟会和各种互助的团体,解决群众困难,指派党员打入敌军工企业,采取若隐若现隐蔽和灵活的方法,破坏敌人的军需生产。杂委和纱委分批输送党员和积极分子及技术工人去根据地,支援新四军的部队建设。在1944年初,在敌纱、机器、面粉等行业中,新建和重建了3个支部和6个直属党组织,其时沪西杂委和纱委两个机构,有支部12个,党组织10个,共有党员188名。10月后,因一些工厂经营困难关闭,至抗战胜利前夕,还有支部8个,党组织9个,党员161个。

二、沪西教育界的隐蔽斗争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上海全部租界,“孤岛”时期结束,抗日进入最困难时期,沪西余庆里、曹家渡女工夜校被迫停办,沪西只剩下三和里(今西康路)女工夜校。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频繁的戒严、封锁、灯火管制、断电,几乎使三和里女工夜校无法上

课。上海女青年会代理总干事张志学在困难时刻仍旧坚持工作,支持女工学习;中共地下党员钱琴、黄纫秋等克服一切困难,点着油灯给学生上课,用编结毛衣的收入弥补菲薄的工资,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坚持将学校办下去。而女工学员则是忍着饥饿坚持上课。三和里女工夜校已成为上海黑夜中工人教育的一盏明灯。



三和里女工夜校旧址

沪西三和里女工夜校是在基督教女青年会保护下坚持给青年女工上课的。外面是汪伪白色统治区,校内是抗日宣传的大课堂。钱琴老师给学生讲爱国志士的故事,使学生知道,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民族,中国人民是硬骨头,决不甘心做亡国奴。她在黑板上画了一幅中国地图,说中国的领土好象是一片桑叶,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腐败昏庸,招来帝国主义的侵略,领土一块块丧失,桑叶被蚕食得越来越小。这让没有文化的女工打开了视野,唤起了许多女工的觉悟,有些女工

不久就参加了新四军,投入抗日的第一线。

华童公学是沪西一家著名的学校,它创办于1904年,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中,学校师生高举爱国革命旗帜,进行反帝爱国斗争,在中国教育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1938年迁至沪西马白路(新会路),后改名为模范中学,学校继承该校的光荣革命传统,师生仰慕抗日志士,投入抗日的革命浪潮。

1938年,上海爆发八一三淞沪抗战,抗战名将谢晋元接任五二四团团副,在宝山路一线首先抵抗日军侵略,率部驻防北火车站坚守阵地达2个月之久,给敌人以沉重打击。10月27日率该团第三营进驻四行仓库,构筑防御工事,准备与日军血战到底。在谢晋元团长的指挥下,该团400名官兵(号称八百壮士),激战四昼夜,毙敌200余人,打退敌人10余次疯狂进攻,坚守仓库大楼,用生命和热血奏响了一曲



谢晋元殡葬仪式现场

反抗外敌入侵的壮丽凯歌,大大鼓舞了全市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念和斗志。但是,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唯恐战争危及租界安全,乃电请国民政府下令孤军撤退。谢晋元被迫于10月31日,率部撤离四行仓库,被租界当局羁禁在公共租界的沪西星加坡路(余姚路)的转角处,四周拉起电网,占地约46.66亩,营地用芦席盖起了营房。将士们不得外出,成了孤军,受到种种非理与凌辱。但谢晋元等率孤军,不从诱降,不畏胁迫,拒绝收买,发扬正气,坚持抗日,在艰难的环境中创造自己的生活。不久,谢晋元被叛徒杀害。1941年12月,日军包围了孤军营,将孤军壮士全部押往日军基地和南洋当劳工。自此,孤军营也不再存在,但谢晋元的英雄业绩在上海人民心中长存。华童公学(模范中学)师生为了永远纪念谢晋元等抗战将士,遂于1945年将校名更改为晋元中学,从此以后,晋元中学校址虽历多次变迁,但谢晋元的光辉爱国革命精神永远在历代师生中薪火相传。

三、铁蹄下的大隆机器厂工人斗争

大隆机器厂原是民营企业,1937年被日军占领,沦为日军的军工厂,大隆机器厂工人开始了隐蔽的反抗斗争。

大隆机器厂创办于1902年,最初先后设厂在杨树浦平凉路、大连湾路,1926年迁到光复西路5号,开始为大隆机器厂发展的顶峰时期。该厂由最初作坊式的修理业务逐步发展为给外轮修理、大型纺机设备生产,迁至光复西路后,开始整套棉纺机制造与棉纺业联营的“铁棉联营”,逐步发展为有中国近代工业水平的机器厂,资本达到100万元法币,各类机床多达500余台,各种厂房增建到大小470余间,工人则稳定在1300人左右。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大隆机器厂奉国民党政府迁厂委员会的命令,着手内迁。抢运工作尚未完成,日军很快占领包括大隆机器厂在内的苏州河北岸,除部分机器材料已运入租界外,大隆厂为日军占领,由日军交内外棉株式会社接管,并改名为大陆铁厂(大陆重工业株式会社)。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日军1627部队对大陆铁厂实行军事管制,要大陆铁厂为日军生产榴弹壳、喷焰枪、手枪零件、迫击炮弹壳和迫击炮炮筒等军火产品。这期间工人人数从初期的400人增加到1000多人。

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大隆厂(大陆铁厂),工人似亡国奴般地做工,每天至少做10小时工,上下班都要抄身,连工人的饭盒子也要彻底搜查。当时,上海与人民生活相关的粮食和其他物资都被日本侵略军掠夺一空,上海租界成了孤岛,工人只能以配给的劣质米和六谷粉充饥。工人上班带来的是劣质米饭和苞米饭,只能在食堂里的两只约3米长、50公分宽的热水槽里热一下后就餐。工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不愿做奴隶的中国工人,在敌人的刺刀威逼下坚持进行多种形式的自发的斗争。日军1627部队接管工厂后,工人们为了不给日本侵略军生产杀害自己同胞的武器,开展各种活动以破坏敌人的军火生产。铸铁车间工

人把浇好的迫击炮弹壳重新扔进炉子里；金加工车间工人在镗床上加工迫击炮炮筒时，采用了在炮筒的两头自动进刀，而在炮筒中间则手工进刀的方式，使炮筒中间拉毛，变成废品；在制造手榴弹弹壳时，有意把弹壳后盖拧紧，成为废品；制造柴油机汽缸时，故意把紧固螺丝断在螺丝孔内，使之漏气；将生产用机油、火油和肥皂油往下水道里倾倒、故意开空车等。

日本侵略军在工厂实行“以华治华”的奴化教育，招收了一批青少年进厂做养成工，他们以半工半读的形式，强迫青年人背日语，工人以记不住抵制。1943年的一天，钳工工段一位工人因生产需要，拿了一根长约40公分的2英寸自来水管，到车床工段砂轮机加工。加工时，被车床工段的日本领班摔了一跤。该工人狠狠回敬了过去，砸到日本领班的后脚跟，顿时鲜血直流，其他工人见状，也一拥而上，打得日本领班钻进车床底下不敢出来。

工人的自发斗争，遭到敌人的疯狂镇压。1944年4月，中共上海工委下属杂厂委员会先后派遣中共党员周辛吾、居启元等进厂，会同厂地下党员黄金柱组建了党的核心小组，1945年2月，又派遣周信业、陈正泉等进厂，组成第二个党的小组。党的地下组织直接领导工人斗争，在党员中，坚持“生产武器不打共产党军队”，在工人中间，秘密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打抗日队伍”。总的目标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既要解决工人生活问题，又要达到破坏武器生产的目的。在生产中进行破坏，形式有：一是将产品以少报多：改写每日进库上报数字，如1字改为7字、9字、10字等；二是以坏充好：把有砂眼的零件作正品装配；三是日班入库产品，由晚班拿出，作第二天日班上交数；四是车间有日本监工来查工时，工人间互相暗示。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布置工人进行护厂斗争，同时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布置，准备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上海解放的武装斗争。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但驻扎该厂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还是很嚣张，强行将厂内1000余名工人赶出工厂。在中共沪西杂厂委员会领导下，组织大陆铁厂工人对工厂内的日伪进行清算，最终迫使日商把厂内的配给米、布、油、煤等物资分给工人。

四、勤学勤业交朋友

日军侵占租界后形势骤变,工人运动直接面对凶残的日本法西斯统治。在严酷的环境下,针对国民党统治区和日本帝国主义敌占区破坏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特定情况,遵循周恩来关于敌占区地下工作者要“勤学勤业交朋友”和中央关于“支部及每个党员的任务是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指示,按照“躲过敌人打击,就算胜利”的原则,采用更加深入隐蔽的方针:停止一切公开、半公开以及易于暴露的救亡活动;凡能取得合法地位保存下来的社团,公开活动均以生活福利、文化娱乐为主要内容。同时明确,深入隐蔽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要善于利用社会公认的习惯和活动方式,有领导地开展无组织形式的斗争;在隐蔽中了解环境,研究敌人活动规律,寻找适合于环境的新的工作方式;在不被敌人破坏的条件下,发展自己的力量。



范小凤,中共沪西纱厂委员会书记,组织秘密的地下党活动

日商内外棉一厂、二厂,在日军侵占租界前,还没有重建共产党地下组织,也没有一个共产党党员。之后,鸿章纱厂地下党员杭惠兰、杭佩兰姐妹俩进入内外棉一厂;1943年刘长胜在淮南根据地布置在根据地学习的同兴纱厂工人范小凤进入内外棉一、二厂开展工作。范小凤按照组织上要求,没有找熟人推荐进厂,而是凭自己娴熟的技术,在工厂招工时前去应考,结果通过开车、接头、拆坏布三项考试,成绩优良,日方当场开给她布机挡车最高一档工资。范小凤原名冯勇,为了能在上海落脚,就寄居在厂对面工人聚居的梅芳里小姐妹家里。那个女工叫范立芳,为了报户口,以范的妹妹身份改名范爱芳。但范立芳总叫她为小冯。日子一久,大家就以小冯的谐音叫她范小凤。范小凤进厂后,在“先站稳脚跟”上下工夫,干活比谁都卖力,发烧也不请假停工,平时注意与工人搞好关系。后来又有些共产党员经过招工考试,进入

内外棉一、二厂,开始组织秘密的地下党支部,书记范小凤。支部要求每个党员交10个朋友。党员放工后就经常到小姐妹家串门,拖地板、洗衣服、剪头发、抱小孩,样样都干。谁家有病人、有难事,大家就去帮助,忧乐与共,受到工人家属的欢迎,觉得与这样的热心人在一起放心。这样,逐渐形成了以党员为核心的团结的群众集体。到抗战胜利前夕,这个厂的地下党党员共有35人,成为沪西地区的一个重要据点。

当时任何组织和集会都为日本当局严禁之列,但日本人对中国人结姐妹等社会习俗,却不予干涉。地下党组织就利用“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同工人结拜姐妹,使自己能隐蔽在群众中进行活动。生活艰难困苦,是当时群众的主要话题。党员利用工间吃饭、上厕所或排队买户口米等各种机会,宣传抗日道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共产党抗日道理,新四军的敌后抗战,以及苏联工人当家作主的新生活,借以启发和鼓舞工人,扩大了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分子的队伍也不断壮大,打下了同日本厂方开展斗争的群众基础。

原在统益纱厂活动的地下党员汤桂芬,在工厂被日军封闭解散后,进入沪东日商大康纱厂做工。在那里,她以熟练的摇纱技术和真诚的阶级感情,赢得女工群众的爱戴,称她是自己最知心的姐妹。后来,为了开辟新的据点,汤桂芬又带领一批失业女工考入日军同兴军服厂。经过刻苦学习,她迅速掌握了快速上领、上袖子、开袋等技术要领,学会了排除缝纫机故障的技术,使日本领班不得不另眼相看,提升她当了班长。从此,更有利于她团结群众、培养积极分子的活动。

勤学勤业交朋友开展后,不仅隐蔽保护了自己,而且扩大了自己的队伍,争取了群众,使沪西党组织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坚持斗争,迎来了抗日的胜利。

第十七章

里应外合,迎接抗战胜利

一、开展天亮运动

1944年夏至1945秋的一年间,国际国内战争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在欧洲战场上,德国法西斯遭到苏联红军的致命打击,英美军队在法国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光复巴黎,并攻入德国境内。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宣布投降,欧洲战争以德国彻底失败告终。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侵略军在中、美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抗击下,节节败退,海、陆军精锐消耗严重,战略物资枯竭,美国飞机不断空袭日本本土以及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区如上海等地区,日本侵略者彻底失败已成定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开始了战略上的反攻,收复了大片国土,迫使日军龟缩到交通沿线和大城市里。上海郊区的新四军淞沪支队,也在此时加强活动,准备配合新四军主力解放上海。

黎明前的黑暗令人焦急。生活在敌人统治下的上海人民的思想情绪正在转变。从前一时期比较低沉、压抑,逐渐转向活跃、振奋。人们原来觉得“长期抗战,遥遥无期”,现在看到“胜利曙光,就在前头”;原来对共产党、新四军不很了解、不大相信,现在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力量。总之,在广大人民心中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天快亮了。”黎明前既是振奋人心、充满希望的时刻,又是最黑暗、最艰难的时候。日本侵略者为了挽救败局,正在作垂死挣扎。他们在上海加强特务统治,进行穷凶极恶的掠夺和搜刮,造成物资奇缺,经济更加

恶化,物价日夜飞涨,伪币急剧贬值,人民生活困难达到极点。

此时,中共上海地下党开展了迎接抗战胜利的最后冲刺:

1. 破坏日本的军工生产。中共上海地下党工委提出,破坏敌人军工生产的斗争,既要予敌人以打击,又要不暴露自己的政治目的和组织力量,必须讲究策略性,运用灵活多样的斗争方式。提出:“斗争策略是采取有组织的斗争和无组织的形式结合起来的方法,使敌人找不到破坏线索,方式要灵活多样,切记刻板、一律,积小胜为大胜,‘得到风,就转蓬’,一点一滴地积累和发展力量”。这种称之为“无头斗争”很快在沪西工厂地区展开。

沪西许多棉纺厂被日军改为生产军布、防雨帆布、降落伞布等军用布匹厂。地下党党员和积极分子以各种方式向工人宣传:“厂里生产的军用布,日本人穿了打中国人,大家不要卖力做,拖生产后腿。”在工人抗日激情鼓动下,沪西涌动着一股破坏敌人产业生产的潮流。内外棉一、二厂的棉纺工人,上班开车后,“出工不出力,干活慢吞吞”,日本领班来时,大家装模作样,领班一走大家就慢的慢、歇的歇。做夜班,轮流关车休息,有人望风,看到有日本人来了,立即发信号,大伙立刻把机台全部开出来,日本人看工人都在操作,没有异样,但就是产量上不去,只能嚎叫干着急。日人催逼工人加快车速,工人暗中将烂山芋、肥皂头涂在皮带盘上,使其打滑,产量仍是上不去。内外棉五厂生产的帆布、皮鞋均是供应日军前线的军用品,工人进行破坏性的生产,将燃油偷偷地倒在阴沟里,使机器“吃不到油”,加大摩擦起火烧毁。皮鞋车间工人用一百度的开水烫牛皮,使牛皮纤维失去韧性,加工时,表面光洁,穿到脚上,很快穿孔断裂。工人开心地说:“让鬼子穿上熟皮鞋,跑不远,走不长,统统陷死在中国的土地上。”内外棉六、七厂工人在机油里掺水,加油变加水。挡车工发现车坏,不发信号牌,发现机器故障故意不修理,或者边修边坏。布机间产量降到一半左右,日本人就是找不到原因,查不出为首的人。

2. “逃警报”斗争与印发“贺年片”。沪西工厂工人破坏敌人军工生产的斗争,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高涨。临到美国飞机轰炸上海时,党组织发动工人开展“逃警报”的斗争。1944年,9月,上海电力公司工人

率先掀起“逃警报”斗争。一天,美机轰炸杨树浦发电厂,两名锅炉工人不幸被炸死,11名工人炸伤。日方竟然紧闭大门,封锁消息,工人愤愤不平。市委工委书记张祺获悉,决定领导工厂党组织发起“逃警报”斗争,通过领班向厂方提出:给被炸遇难者发抚恤金;空袭警报一响,应立即打开大门,让工人离厂避险;每月给工人发危险费。工人代表提出的意见厂方不予理会。一次美国飞机又来轰炸,工人不顾厂门口荷枪实弹的日军士兵的阻拦,全厂工人全部冲出大门。警报解除后,工人根据党支部(通过工人积极分子)指示,全厂工人拒绝上班。电厂停工,将影响全局,厂方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逃警报”的斗争,很快传到沪西日本人的日商纱厂。各纱厂工人纷纷起来向厂方提出:空袭警报一响,立即放工人出厂,离厂期间工资照发。发生伤亡事故,厂方负责抚恤。同兴军服厂厂方强迫工人在空袭时到清花车间地洞躲避,不许工人出厂。工人奋起反抗,迫使厂方答应工人的避难条件。频频的空袭和各厂的逃警报斗争,使日本侵略军的军工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计划长期无法完成,而且产品次品累累,从一个侧面起到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目的。

1944年冬,中共上海工委、学委决定趁圣诞节、元旦、春节来临之际,采用寄发贺年卡、贺年信的形式,开展一场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向各界人士宣传时局和抗战即将胜利的形势。如贺年片正面印有抗日三字经:“东洋人,顶混蛋,抢我土,谋我财。物价高,死勿关,黄糙米,一眼眼,黑市货,卖五万。幸亏得,苏美英,把德国,打下台,矮东洋,阎王催。新四军,四周在,救同胞,打上海,他领头,敲脑袋,我把那,后脚扳。里通外,做比赛,杀鬼子,大家来。从此后,上海滩,享太平,万万代。”大批贺年片发出后,产生很大政治影响,拥护抗战的人收到后,兴高采烈、互相传阅,纷纷议论“天快亮了”,“新四军要进城啦”。伪方人员接到后,忧心忡忡,惴惴不安,有的想“洗个澡”,想与新四军建立关系,以洗掉汉奸罪名。敌特机关获悉后,惊恐万状,严加追查。

1945年初,日军战败已成定局,但厂里的日本人仍在吹嘘他们的“成果”。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统益纱厂地下党支部书记汤桂

享從殺裡我他救新修把幸黑黃物搶東
太此鬼通把領同四東德虧市糙價我洋
平後手外那頭胞軍海國得貨米高土人
萬上大海家比後蘇打四打蘇買一死謀頂
萬海灘來賽扳襪上海週下英五眼勿我混
代灘來賽扳襪上海週下英五眼關財蛋
新三字經

上海地下党组织印发宣传资料,向群众宣传日伪的末日即将来临

芬决定开展一场政治攻势。她要求参加战斗的党员,既能收到宣传效果,又不被敌人侦破。当时,工人都把日本侵略者称之为“矮东洋、萝卜头”。汤桂芬就暗中带了一只红萝卜头进厂,放工时,汤桂芬等3人,溜进女厕所,把红萝卜挂在板壁上,还在萝卜旁边用粉笔写了两行大字:“天快亮了,大家快起来,磨刀切萝卜!”第二天清晨,这实物和标语的宣传很快传开了。人们压抑在心中的怨气一下子倾吐出来,到处在交头接耳低语:“切萝卜!知道了吗?”“日本鬼子快完了!”日本厂方气得直跺脚,急命女监工把壁上的“红萝卜”拿下来,可是,切萝卜的消息已传遍全厂,传到厂外。这种宣传方式很快为很多工厂效仿,“起来切萝卜头”,一时成为群众相互激励向侵略者作斗争、迎接天亮到来的行动口号。

二、沪西地下军

1944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一年,日本侵略军在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沉重打击下,全线崩溃已成

定局。为了配合新四军粉碎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的阴谋,解放我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上海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里应外合,组织城市人民武装起义。10月,高骏在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城工部参加整风学习后,接到城工部部长刘长胜、城工部秘书兼干部科科长张承宗的指示,决定其回沪后,参加组织上海地下军,配合新四军内外夹攻,解放上海。城工部领导指示,进入上海,紧紧依靠上海地下党,在一些要害部门如铁路系统、警察机构中建立关系,同时不能与组织发生公开联系,避免暴露地下党力量。



沪西地下军
负责人高骏

接受任务的第二天,高骏脱下军装,换上布衫,打扮成工人模样,从苏北六圩渡江,跟着跑单帮的人群,回到离开半年之多的上海。当天下午,到沪西工人集中之地的朱品芳(后任中共沪西纱厂委员会委员)家中,与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张祺接上关系。组织决定高骏在朱品芳家中住下,熟悉情况,再开展工作。不久,地下党安排高骏到铁路局上海麦根路火车站(原上海铁路局东站、现上海火车站)当上扛煤工,并开始在工人中

以“新四军之友”的名义,团结工人,秘密集会,发展工人加入“新四军之友”。1945年2月,工委张祺在沪西召开地下军会议,张祺以“新四军驻沪代表”身份,向与会人员介绍抗日战争形势和解放区的情况,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建立地下军,以配合新四军打垮敌伪,为接管上海出力。高骏以“新四军特派员”的身份参与组建地下军,会上决定由日商内外棉五厂老工人倪宏胜在澳门路西康路口开设茶馆,利用喝茶聊天,发展组织沪西地下军,开始最初的活动。他住家周围都是些三轮车、黄包车、塌车工人和失业工人。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苦人民,为了养家活口,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日军和汉奸设置的重重关卡,从郊区背米进城贩卖。地下军通过开设茶馆,在这些贫苦人中发展了30多个队员,又在他们周围团结了四五百人的基本群众。不久,倪由于频繁活动引起日军注意而被捕,茶馆不得不停止营业,地下军成员转入更加隐蔽的活动。倪宏胜被捕后,遭到日本

宪兵的严刑拷打,关了3个月后,敌人一无所获,只能释放。出监狱后,组织决定他去淮南解放区休养。此时的沪西地下军在高骏、张树人、刘志荣等人的领导下,继续工作。



沪西地下军领导成员倪宏胜
(新中国成立后摄)

沪西地下军主要分布在西康路、澳门路一带,同时还有几处分散的活动地方。蒋家弄有20多个队员和二三百群众;石灰窑有10个队员和一二百个群众,出没在郊区的有20多个队员,总共有地下军骨干有60多人,团结周围群众几百人。高骏与工委负责人张祺研究商量,

一旦上海发动起义,沪西将以60多名骨干为第一线的突击队,以周围群众和一些“新四军之友”的成员为第二线,在夺取敌人据点和打巷战时投入战斗;其余一些同情和支持我方的群众,可以担任救护、后勤工作。

组织建立,但没有武器和子弹是当务之急。经讨论,决定虎口智取武器。队员小湖北胡凯成,只身潜入麦根路火车站存放军用物资的中转仓库,趁日本看守酣睡之际,抱起两捆稻草包扎的枪械就走,一直送到高骏住处,打开一看,原来是2挺崭新的轻机枪。后又买到一支“白朗宁”破枪。不久,从张承宗处领到2支手枪,弄到8颗手榴弹,这就是沪西地下军的武器装备。为了使地下军队员学会使用武器,采用专人负责、定点学习办法,解决枪少人多的矛盾,轮流进行训练。在敌人眼皮底下转运训练的枪支,比较危险,于是便让女同志化装掩护,任务交由杭惠兰、毛家华两人担任。她们两人为了出色完成任务,先在白天穿街走巷、熟悉地形,一般是早晨五六点钟,利用晨间买菜,将手枪放在篮底,高峻护送,两个女同志挎篮相随,相间20米左右。如果发现情况,高峻两手一背示意,后面两位立刻绕道而行。有时混在工人放工的间隙,将手枪带出。队员们在安全的地方试练射

击,但子弹珍贵,没有进行过一次实弹射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里应外合解放上海的时机到来,根据上级指示,沪西地下军积极制定方案,准备一旦条件成熟,立即攻占沪西地区日伪警察局。当时沪西地区有沪西、普陀、静安三个警察分局,拥有长短枪2000多支,武装起义,首要任务是夺取武器。计划起义先占领一个工厂据点,再行扩大起义区域。刚从解放区养伤回来的倪宏胜组织了300多辆三轮车、塌车、黄包车,准备起义那天堆集在马路上,作为堵截敌人增援的障碍物。后因形势变化,中央决定中止这次起义。

三、沪西地下党智夺汉奸黄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大东亚共荣”的迷梦彻底破灭,宣布无条件投降。上海滩上那些为虎作伥的汉奸也因此惶恐不可终日。他们纷纷在暗中把搜刮来的财物转移或隐藏起来,准备在国民党接收大员到来之际,用重金贿赂,求得庇护。当时有个日本财团派驻上海的代表,伙同一个沈姓的汉奸,秘密把2500两巨额黄金秘密转移到一个姓王的奸商家中,准备在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到达上海时作见面礼。后又怕不安全,偷偷地把这批黄金转移到一个认为最可靠朋友的嫂嫂家里隐藏起来。事有凑巧,这“万无一失”的藏金窟,偏偏是我地下党员浦作之家。他当机立断,立将内情报告吴学谦。吴学谦时任中共上海学委委员,深感事关重大,立刻转报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民的财产,理当回归人民,机不可失,时间紧迫。市委委员张承宗立刻找到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张祺,要他组织地下军,采取果断行动,夺回这笔人民的财产。张祺没有丝毫迟疑,亲自把这个任务交给沪西地下军负责人高骏。高骏原是新四军的干部,他以军人的特有气质和阅历,深知这任务的分量,当即与提供情报的学委地下党员浦作,在新乐路襄阳路口东正教堂附近接头,商定行动方案。然后,高骏又亲临现场勘察,仔细分析情况。他认为单靠地下军队员,恐难以叫开大门,时间一长,事易败露,要求党组织增加两个女

同志作配合。张祺采纳高骏的建议,又亲自找到中共沪西纱厂委员会书记范小凤,要中共沪西地下党配合行动。

沪西地下军在上海学委和沪西地下党的配合下,一个智取黄金的行动计划迅速形成。在行动的前夜,他们又统一了行动的具体细节,作好充分准备。

8月27日的黎明,驱散了黑夜对上海城市的笼罩。在晨曦中,市民们已经拎篮推车,开始一天的生计活动。就在这时,沪西地下军分成4个战斗小组出现在新乐路永利村附近。范小凤、毛家华两位同志,乌黑入时的烫发,身穿旗袍,脚着高跟皮鞋,手拎提包,酷似阔小姐走亲访友,来到一户人家,上前敲门,说是找三楼人家有事,房主人一听婉转的女人声音,自然解除了警觉。里面作内应的浦作就把住在三楼的人叫下来开门。房门一开,范小凤、毛家华两位进门,高骏和丁祖宪以及刘志荣和黄金玉两组人以迅雷之势,先后闪入房内,门外留下朱品芳、顾文丰,守卫望风和接应。他们进门后,先控制了电话机,切断内外联系,同时上楼封锁制高点,然后捷步下二楼,把作内应的浦作和他舅父一家人赶进底层房间,反锁房内。接着按浦作的暗示,在二楼的保险壁橱里如数取出了这批黄金。这次行动前后总共20分钟。但是敌人发觉后,立刻进行侦察,不久,沪西地下军成员丁祖宪便被国民党当局抓获,敌人施以酷刑,妄图追回2500两黄金。丁祖宪坚强不屈,受尽酷刑折磨,没有吐露任何党的秘密。为此,他被关进提篮桥监狱,一关就是几年,直到上海解放前夕,党组织设法把他营救出狱,而这批黄金,则成为支援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活动经费。

四、中止的武装起义

1945年8月23日的清晨,在沪西莫干山路僻静的街道,突然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街头,高呼“我们要饭吃”、“我们要上工”的口号,还有许多人涌进附近的信义机器厂,此时厂内厂外人头攒动,人们都在等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可是到了傍晚,人们又突然像水银

泻地一般,向四处散去,片刻间,这里又回复到往常一样的平静。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已被载入史册,这就是惊心动魄而又被临时紧急中止的沪西工人武装起义。

1944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一年,日本侵略军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军民打击下,全线崩溃已成定局。为配合新四军粉碎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的阴谋,解放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已经摆在党中央的议事日程上。上海地下党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学习法国和意大利搞地下军的经验,决定由中共上海地下党工委书记张祺在上海筹建一支工人地下军。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0日,中共中央电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告各区党委,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迅速占领所有被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华中局接电后,立即部署、发动群众,准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迎接新四军。新华社华中分社公布了刘长胜为上海市长的任命。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敌人还未放

AA 8.5.21 发出

1 匡医军民国海泰

已抄给

第2局：奇思甚，浦东动列上海有被消灭危险，不如仍在浦东，围困，即可逼浦东。已抄给

时强陈保的即样策在，下南石已变化上海花去，在此所管上海出不美万有对陈台石，必被压下去，宜以美众但成种

图体清查日美印中常，而不宜到好。中央大正

（立即建立不信任及财务口组上核）

（陈此却在所。）陶美核，

416 已方

上海文大书局出版

毛泽东起草中止上海武装起义的电文原稿

下武器,地下党决定在工人、职员、教师、学生以及各界人士中,成立庆祝抗日胜利筹委会,很多工厂已贴出“欢迎刘长胜任市长”、“欢迎新四军”的标语。17日,在中共沪西“纱委”、“杂委”的组织下,以纺织、机器等业为中心,在中山北路朱家湾平民村召开庆祝抗日胜利大

会,并成立工会的筹备机构——庆祝抗日胜利筹备委员会。19日,上海地下党“工委”根据华中局关于占领一二个工厂区,再推广到全市,形成全市武装起义的电令,决定沪西信义机器厂为起义指挥部。该厂是一家为日本军工生产提供原料的工厂,附近有戈登路警察分局,起义时,可以在内应的配合下夺取枪械库2000支枪武装工人。21日,华中局命令上海组织现有力量,占领工人区,武装群众,举行武装起义。23日,清晨,沪西地下军60余人奉命集合,带着武器,按照预定方案守候在信义机器厂附近待命行动。沪西纱厂、机器厂和其他各厂的党员、群众约7000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包围了工厂,阻断了交通。在“没收汉奸财产”、“我们要吃饭”的口号声中,地下军带领群众冲进工厂,设立了起义指挥部。占领工厂的起义群众秩序井然,集中在厂内外,等待下一步行动的命令。时间在一秒一分地移动,正式起义的命令迟迟未下达。下午4时左右,上海起义总指挥张祺才赶到信义机器厂,向沪西起义指挥部领导成员宣布,“刚才接到中央命令,决定改变计划,暂不占领上海,你们赶快把队伍撤走,群众分批撤离。”全体在场的指战员愣住了,但命令如山倒,立刻执行,突击队先撤,群众排成队,高呼“我们要吃饭”、“我们要上工”口号,转为上街示威游行散去。

这次中止的武装起义事出有因。原来,上海起义总指挥张祺也是当天午后才接到中央停止起义的命令。中央下达停止起义命令在21日已发出,并连发3次急电。电报往来都通过青浦淞沪支队电台转发,由于交通的阻塞和时局的变幻,所以中央的急电才迟迟到达上海。

这次起义的计划虽然改变了,但沪西地下党和革命群众经受了一次极好的锻炼和教育,也使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沪西工人阶级受到一次力量的检验,也为沪西人民在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能够立即转入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潮,并最后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上海武装起义中止不久,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上,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均告胜利结束。

第五编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 - 1949年5月)

第十八章

抗战胜利初期的沪西

一、抗战胜利初的沪西党组织

抗日战争胜利之时,中国共产党上海的组织按系统划分有6个专业委员会和一个直属总支,即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近郊工作委员会和中共警察工作委员会。为确保安全,各个党委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由华中局城工部派联络员与各个党委联系。刘长胜抵沪后,即总负责上海地下党工作。

沪西各产业区级党的机构直属市委工人运动委员会领导,市工委是通过市的各个系统单线垂直领导沪西党的各级组织。

沪西是上海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区域之一,抗战胜利后,要抢先将工会组织起来,已成为上海地方党组织的一项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抗战胜利前及胜利后,中央曾要求上海组织起全市性的工会组织——上海总工会,还曾以上海总工会筹备会的名义发动广大工人及各阶层人民召开抗战胜利庆祝大会。但是,抗战胜利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原国民党御用的上海市总工会宣布复员办公,并在沪西和沪东设了办事处。在这种情况下,再成立共产党领导的全市性工会组织,势必会形成与恢复的国民党上海市总工会对立,分散工人运动的力量。因此,中共上海工委决定从抓基层工会与地区性的联合工会、产业工会着手,将工人组织起来。尽管共产党没有全市性的工会组织名义,但基层工会的领导权大多掌握在中共地下党组织手中。

沪西地区的党组织,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工委的指示,继续按产业系统实行垂直领导,特别是在轻纺民族工业资本有一定恢复的基础上,加强民族资本企业的党组织发展,1945年底,在原中共沪西杂厂委员会所属领导的系统中,逐渐将毛纺、染织、丝绸、机器等业党组织划出单独建立新的行业委员会。1947年初撤销中共沪西纱厂委员会(书记范小凤,委员朱品芳、卢离棠),下建中纺和民棉两个委员会。1947年初,沪西按产业系统建立的区级党组织,总计有中共杂厂委员会(书记顾松盛,委员郑允业、周信业、周辛吾、何其友)、中纺(书记夏明芳,后为王定中、副书记杭惠兰,委员孙雪珍、郑阿彩,后增加孙贤德、徐仙玲,下辖9个支部)、民棉(书记周小鼎,委员钱希均、黄河、施惠珍,下辖12个支部)、杂纺(书记先后是朱品芳、沈正光,委员安中坚,下辖19个支部)、机器(书记史桂昌,委员吴开寿、杨公保、黄金柱,下辖14个支部)、绸委(书记先后是沈默、放荣甫,委员卢瑞花、潘月英、万文华、王文娟、万芝妹,下辖7个支部)。

1947年夏,为与国民党争夺工会领导权,又建立中共三区(沪西)工会党团秘密组织,中共三区棉纺工会党团书记范小凤、副书记吴开寿,委员何彩东、汤桂芬、戚怀琼;中共三区机器工会核心小组负责人陶云山,成员沈默、放荣甫,陆荣章、罗志浩、王明远、王奇伟;中共三区毛纺工会核心小组负责人安中坚,成员惠根宝、朱斌、周志根;中共三区染织工会党团书记王菊秀,委员孙居汉、李拜禹;中共三区针织工会核心小组负责人杨杏轩,成员李爱珠、蔡金囡。

沪西地区党组织在非敌产的民营或外商工厂里,大多是先组织庆祝抗日胜利筹备委员会,以后转为工会组织。在地下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各厂之间迅速形成地区性的组织。8月下旬,沪西以纺织、钢铁业为中心的35家工厂工会在朱家湾平民村建立了联合办事处。

三区工会秘密党团建立后,同反动势力展开了争取工会合法权益和争夺领导权的激烈斗争。1948年3月前后,由于国民党对三区工会的破坏,秘密党团成员相继被捕或撤退,三区工会秘密党团后来也就自行撤销。

二、沪西工人为复工而斗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浴血抗战,历尽艰难困苦,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代价,终于赢得了8年抗战胜利。但是,胜利的这天,上海各日本工厂几乎全部贴出布告,以“因战争关系,工厂停工3天”或者5天、6天不等,有的干脆宣布工厂已经停办,工人不要再来上班,宣布“遣散全部工人”。在这同时,有的日本厂主正在伺机携带资金、物资出逃,转眼间工厂大门紧闭,日夜盼望胜利到来的广大工人眼见胜利来临,自己却反而要失业了,尤其对那些做一天算一天,家无隔夜粮的工人家庭,生活顷刻陷入困境。沪西地下党组织洞悉日本资本家的反动伎俩和工人遭到突然的打击,果断地提出“不能让日本人一句话,要解散就解散,我们要和日本人评理,要他们发给解散费”。一场紧密筹划的要求发放生活维持费的斗争由此展开。

要求生活维持费的斗争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是自发阶段。以日本投降至信义铁工厂事件发生,要求发生活维持费的斗争多数是各厂自发进行。第二个是有组织领导的阶段。信义铁工厂事件发生后,党组织通过各系统有组织的大规模发动斗争。斗争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沪西的日本纱厂中。最初是沪东的日商大康纱厂开始发动,斗争极为激烈和坚决。紧接着沪西开始爆发以要求复工为主要形式的大规模斗争。

沪西地区工人要求发放生活维持费的斗争,主要先在内外棉一、二厂进行,后联络了日华、公大、内外棉五、九厂等工厂一起参加斗争。在内外棉一、二厂,遇到日本资方的强烈抵制,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工人们干脆将纱厂总大班扣押到车间进行谈判,在工人的强大攻势下,日本资方节节败退,有条件地接受工人开出的一些条件,工人取得了初步胜利,争取到一些生活维持费。

但是,上海工人真正复工斗争序幕是在沪西信义铁工厂事件之后。8月23日,沪西中止武装起义后的撤退过程中,有21人被警察

抓走。不少工人随车追至警察局,要求放人,直至深夜仍无结果。沪西地下党通知各级组织领导者和工人次日集中到玉佛寺计议。第二天早晨,工人们赶到玉佛寺时,发现周围已布满了铁丝网和军警,大门已被封锁,在玉佛寺讨论已经不可能。有人提议立刻到苏州河北岸的平民村开会,大家赞同,立刻北上朱家湾平民村。平民村地处朱家湾的一个村落,在战争中大部分房屋毁于炮火,只剩几间空关的平房和一所小学,是个不易被人注意的集会好场所。沪西党组织领导人赞同一些工人的提议,趁势支持和鼓动大家到平民村去开会。到了平民村,先开展失业工人登记,建立“沪西失业工人联合会”,一方面组织营救被捕工人,一方面派代表为争取早日复工而奔走。经过反复周旋,被捕工人在一周后获释,但复工毫无进展。正在双方斗争交织的时候,突然接到国民党上海市总工会的通知,要沪西组织工人队伍去外滩欢迎美国海军上将金开得率舰来沪访问。通知“联合会”组织200人去参加欢迎仪式。上海地下党工委领导获悉此消息,决定组织沪西2000多工人,到外滩欢迎美国海军上将金开得,将欢迎变为复工要求的示威。9月19日下午,“联合会”组织了2000余工人浩浩荡荡游行向外滩进发。队伍快到达黄浦江边时,将隐藏的“我们要复工,要吃饭”的大字横幅展示开来,工人们高呼“要工作、要吃饭”,这时,沪东地区工人也集会赶到外滩,两路工人队伍汇集外滩,庞大的“欢迎”队伍,立刻由欢迎变成大示威。在场的国民党官员见状立刻阻拦,但浩荡队伍已无法阻拦,大小特务都狼狈不堪。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官员责问工人:“我们布置的口号不喊,你们想干什么?”工人回答:“我们要复工,要饭吃!”一个官员使劲高喊:“复工今天不谈,欢迎美国第七舰队要紧”。工人回话:“欢迎也要吃饱肚皮,今天非解决不可!”双方僵持,事态越来越严重,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等候在江边码头的上海市总工会的头目周学湘等人慌忙赶来打圆场,将队伍阻拦在海关附近,答应第二天带工人代表到国民党市党部,找主任委员吴绍澍谈判。工人斗争初战告捷。次日,“联合会”推选9名代表到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却躲藏避而不见。在平民村等候消息的几千名工人闻讯后,再次集队赶来声援,夜幕下的市党部已是人声

鼎沸。深夜2时许,国民党当局又派出大批军警、宪兵、特务包围工人队伍,一面散布“条件已基本谈好,明天可以听回音”的谣言,一面动用马队、警棍、枪托等武器,将工人队伍驱散。在混战中,国民党军警开始抓捕工人代表。第二天(21日)御用报纸大量刊载“捣乱分子冒充工人代表与有关当局谈判”的消息,更加激怒了广大工人。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决定组织力量反击,通过周密安排,在9月22日,再次组织1.5万人的请愿队,从沪西赶到设在南市蓬莱路的上海市总工会。沿途工人们高举着“被当局扣留之代表是我们失业工人的真正代表!”“请求各报为了正义报道确实消息,不要歪曲事实真相!”“请求各界了解我们是要工做,要饭吃的工人!”“请求当局口头的同情,成为实际的营救!”等标语,高呼“劳工神圣”等口号,得到沿途市民的声援和支持,队伍越走越庞大,到了晚上7时半左右,国民党当局领导被迫出来接见。工人代表气宇轩昂地向当局提出释放被扣代表,要求发给补助救济费,早日复工的三项要求。周学湘一脸苦相,被迫表示接受工人条件,表示负责呈报上级办理。这次示威游行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文汇报》、《大公报》连续发表新闻和评论,高度评价工人团结战斗的精神。《世界知识》、《联合日报》和苏联塔斯社驻上海记者纷纷到平民村采访,表示同情与支持,有的还捐款支援。在工人的强大压力下,被捕工人代表也很快获释。从1945年10月起,上海纺织业的许多工厂开始陆续复工,工人在团结战斗中看到革命的进步力量在壮大,隐蔽在群众中的共产党人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

三、检举汉奸和“欢迎马歇尔”的斗争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实施残暴统治,要依靠一批卖身投靠的汉奸。而大大小小的汉奸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广大人民对他们更是恨之入骨。在赶走日本侵略者,清算日本人罪行的同时,人民很自然地要求严惩这批民族败类。上海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上海人民的强烈愿望,在日本投降后,及时提出了“庆祝胜利,惩办汉奸”的口号,并组织各界群众进行检举汉奸的斗争。

这场斗争首先在大学里展开,突破点是沪西的圣约翰大学。该校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于1879年创建的一所教会学校,学生大多出身于当时社会的中上层家庭。约大校长沈嗣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投靠日伪,公开发表叛国演说,出任汪伪市府咨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上海特别市体育协会理事长等伪职。日本投降后,沈嗣良并未受到惩处,仍然担任校长。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布置约大党总支举行“庆胜利,锄汉奸”的宣传集会。8月22日,在约大钟楼草坪上,举行集会,遭到学校三青团阻挠,沈嗣良勾结宪兵队,逮捕集会演说的3位学生,并以“行为不检违犯校规”的罪名,开除8名学生,同时宣布提前放假,以瓦解团结战斗的学生。约大党总支团结广大学生,高举锄奸大旗,提出“反对汉奸校长开除爱国学生”,掀起反沈护校运动高潮。这场斗争得到全校师生和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同情,学校成立被开除同学后援会,揭露沈嗣良的汉奸罪行和扣发师生户口米、囤积居奇、用学费放高利贷等丑行。约大的斗争,《时代日报》、《文汇报》、《联合日报》等报刊纷纷予以报道,对校方的倒行逆施进行强烈的谴责。约大后援会还出版了油印刊物《约翰呼声》,向社会各界散发,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9月底,国民党参政会公布《处置汉奸条例》,后援会当机立断,立即整理出沈嗣良的十大罪状,正式呈文向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检举,同时将副本印成传单,广为传播。在社会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迫使沈嗣良下台,被捕的和被开除学生也在全校师生热烈欢迎的爆竹声中先后返校。约大的锄奸斗争,鼓舞了许多学校、商场、工厂的反奸斗争。

检举汉奸斗争的矛头是直接对着日伪汉奸。但是,国民党当局对汉奸是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害怕群众的检举斗争,因为他们怕这场检举会引火烧身,害怕群众在检举汉奸罪行时,会揭露国民党当局压制群众检举和包庇汉奸的丑行,更害怕斗争的矛头会转向国民党当局。

国民党当局设法转移群众斗争的目标。首先是对群众的检举设置许多障碍,对惩处汉奸消极应付,而对战争期间留沪的职工、学生,却不问青红皂白,动辄扣上“伪职工”、“伪学生”的帽子,不仅要甄别,



圣约翰大学开展惩办汉奸校长沈嗣良的斗争,这是该校约翰呼声社编印的揭露沈嗣良罪行的宣传品

还要予以经济制裁甚至开除。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根据斗争出现的新情况、新形势,针锋相对地在发起检举汉奸斗争的同时,在各个系统领导群众进行“反甄别”的斗争。

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并派遣已退休的陆军参谋长、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冲突,要

他促成国民党按照美国式的民主进行改革,将中共及其他党派纳入政府之中,通过“和平”的方法,使中国实现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马歇尔来华的第一站是上海。中共上海地下党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以“迎接马歇尔来华调停”的名义,组织大中学生举行全市性的请愿,要求马歇尔公正调停,促进中国国内和平。在中共上海学委的领导下,由沪西圣约翰大学等院校学生团体牵头联络,成立了上海市大中学生欢迎马歇尔特使筹委会,由最初的32所学校参加,很快发展到43所学校,起草了《给马歇尔特使的公开信》,并布置在学生中广泛开展联合签名和每人写一封信的和平宣传活动。短短几天内,签名、写信者达5000余人。国民党当局面对爱国学生的签名活动如临大敌,两次派人前往会场捣乱。共产党员、进步学生与捣乱者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公开揭露事实真相。

12月20日,马歇尔抵达上海。下午,43所学校的4000名大中学生汇集在离外滩不远的中央路广场(今中央商场)。就在学生队伍正要出发前往马歇尔下榻的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时,预伏在周围的数十名暴徒用木棒毒打学生,冲散队伍。学生们不畏强敌的高压,奋起反抗,抓住几个暴徒,进行控诉。目睹国民党暴行的美国总统私人代表、世界基督教学生联合会总干事罗伦·艾利奥特答应学生当晚将公开信交给马歇尔。赶到现场的国民党黄浦分局警察在学生的严

正交涉下也被迫答应惩办暴徒,共产党人领导学生斗争的目的已基本达到,在现场指挥的中共上海学委负责人指出,公开信已由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转交,再坚持见马歇尔已经没有必要,即使再坚持下去也不会有结果,因此决定游行队伍适时撤离中央广场。

“欢迎马歇尔”是抗战胜利后上海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的第一次全市性的政治斗争,也是学生力量的显示。由于利用了合法的名义,已经揭露了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发动内战的反动独裁面目,已经达到了锻炼学生群众的目的,便及时结束了这场斗争。

第十九章

求生存,反内战的斗争

一、纺织工人争取“二十一条”斗争

1946 年春节前后,在取得清算日伪和复工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上海地下党又领导上海的广大职工开展要求改善生活待遇、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这场斗争以争取年奖,要求调整工资底薪和实行以生活费指数计薪为主要内容,被称为战后上海的第一次经济斗争。

1946 年 1 月中旬,国民党对上海棉纺织业接收结束。原日营的几十家棉纺织、毛纺织、印染行业的大型工厂被国民党接收后组成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简称中纺公司),属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国营企业,其余的均为民营企业。

这场斗争首先是从民营厂开始。以往每年春节前,资方都要给工人发放年赏。但 1946 年的春节将临,资方同业公会以“要汇报政府”为由,对发年赏一拖再拖,引起工人的普遍不满。最大的民营纱厂——申新九厂工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率先起来罢工。接着新生纱厂、新裕二厂、崇信纱厂、鸿章纱厂、永安纱厂及申新二、五、七厂也先后发生工人罢工事件。中共沪西棉纺织委员会负责人召集各厂工会负责人开会,将各厂工人提出的要求统一起来,汇成统一要求。这时,中纺公司系统的十厂、十二厂、十五厂、十六厂、十七厂、十九厂等 10 余家工厂工人也于 1 月中旬联合向国民党经济部提出发年奖的要求,但都被拒绝,不予理睬。

中共上海工委对广大工人要求发年奖的呼声十分重视,指示沪西和沪东区委棉纺业的党组织一定要利用工会的合法身份,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怠工斗争,迫使厂方发放年奖。沪东区委以中纺十二厂(原大康纱厂)向厂方提出13条要求,很快就成为全市纺织工人一致的斗争要求。工人的要求除有发放年奖之外,还提出要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底薪,拒绝留用日本职员等等条款。沪西棉纺工会紧密配合,致函国民党社会局,要求迅速加以解决,否则沪西将发动更大规模的大罢工。社会局害怕事态扩大,急忙与同业公会协商,被迫答应按中纺各厂提出的要求办理。

年奖问题解决时,已快到年关,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考虑到广大工人急切想过个安稳胜利年的愿望,决定将下一步的斗争目标暂时放一放,留待春节过后提出。

春节过后,上海却立刻又遭遇严重通货膨胀,工人生活又陷入困境,工资等问题再次成为工人关心的焦点。中共上海工委不失时机地与沪东、沪西两区棉纺业党委及东西两区棉纺业工会研究了这些问题。经多次讨论,东西两区棉纺工会达成共识,将大家提出的近五十项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的要求,经整理归并后为21条要求,并指示沪西、沪东棉纺业工会以合法的地位和身份,组织工人在年奖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争取依照物价指数追加工资,调整底薪和改善工人福利。纺织女工是特殊群体,大家特别关注纺织厂女工多、童工多的情况,要为女工争取更多一些福利条件。汤桂芬是沪西工人运动的领袖,她以沪西棉纺业工会理事的合法身份领导了这场斗争。工委负责人马纯古、张祺很快单线与沪西党组织取得联系,布置了要配合汤桂芬的合法斗争方略,要求各厂地下党负责人以及在工会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在斗争的第一线与汤桂芬的合法斗争互动。

汤桂芬通过要求谈判的合法斗争形式,迫使国民党当局不敢小瞧工人的要求。国民党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最初接到棉纺工人谈判条件的书面要求后,认为机会来了,如果处理好全市棉纺业的大问题就可向上级邀功请赏,以猎取一个好名声,便信心十足地亲自处理。2月12日,沪西、沪东两区50多家工厂、70多名工人代表与国民党社

会局局长吴开先会谈。吴开先越听越感到不对劲,这并不是他原先认为的要耍手腕就能解决的问题。此刻他又怕事情闹大,便半途溜之大吉,将处理问题推给下属。谈判时,中纺公司代表和资方也介入谈判,他们的态度十分蛮横,根本不把工人代表放在眼中。国民党当局一再制造障碍,最后以工人代表没有权威性为由,宣布谈判破裂。如此几次谈判,几次会谈破裂。此刻,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在两条战线进行。第一条战线,即公开的派出代表与国民党当局面对面的谈判。另一条是打入敌人营垒内部的共产党人暗中相助工人的斗争。当时,中共秘密打入国民党社会局内部担任劳工处长的李剑华,以其特殊的身份,多次抓住时机巧妙地分化资方,帮助工人将21条要求压缩为更合理的16条,让工人代表能更加有理有节地谈判。但是,中纺公司代表自恃后台强硬,对谈判拖延蛮不在乎,连参加谈判的民营厂资方也表示不满。谈判一再受挫,场外的纺织工人已从局部工厂的陆续罢工,很快波及到全市,上海许多工厂也宣布罢工,双方谈判已到决裂阶段。

国民党当局认为,工人罢工已到了无法维持下去的境地,中纺公司代表正在等待最后胜利的时刻。地下党领导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如果不给反动当局以一次致命反击,纺织工人争取“二十一条”斗争就可能以失败告终。是年2月21日,又一轮谈判开始,这时,工人代表宣布,如果明天谈判仍没有结果,将实施全市纺织工人总罢工24小时。出席谈判的国民党当局头子闻言吃惊不小,但立刻脑子一闪,机会来了,断定工人代表在说大活,冷笑说“你们做得到!我们同意”。工人代表从会场退出,立刻回到沪西,与汤桂芬等连夜作了具体安排。第二天(22日),工人代表又来到会场,谈判仍然失败。这天,国民党当局派出的人分外多,都在等着看好戏。中午12时,工人代表当即命令全市纺织厂总同盟罢工!不多时,传来全市沪西、沪东47家工厂13万工人同时关车,宣布上海纺织工人总同盟大罢工。此刻的大罢工会给各个工厂带来巨大的损失,急坏了各厂的资本家,急电打进会场,向国民党社会局求援。中纺公司代表见状不妙,便放下架子,想通过软硬兼施的骗术,要求工人先开车,细则可以慢慢讨论。

此刻的工人代表为了显示一下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宣布下午2时开工。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都在紧盯时钟。2时到,很快外面传来全市各纺织厂机器开动的消息。此刻国民党当局惊呼,不行,这是共党搞的鬼,但是,他们抓不到任何证据。

经过如此多的工人反复斗争,最终迫使资方中纺公司答应工人代表提出的16条要求,但中纺公司资方提出了附加的2条限制条件。工人代表在没有充分协商的情况下,也就在协议上签字了,但却在工人内部产生了分歧。中共地下党领导从全局考虑,为避免谈判代表中的中共党员政治身份的暴露和防止已经通过的协议再度搁浅,便提议将原资方和中纺公司提出的“厂方对于雇佣工人有自由选择权”、“劳方今后不得罢工、怠工,否则工资一律不给”条款改为“劳方保证,今后非经合法程序,不得无故再有罢工、怠工之行为,罢工、怠工无论局部还是全部,工资不给”。经过双方一些妥协,2月28日,中纺公司被迫与工人代表签订“十八条”协议,其中16条是从工资福利、工作时间、劳动保障等方面反映了工人的利益,其余2条,反映了资方的权益和国民党官方意在束缚工人手脚。

历来受中外资本家残酷压榨的广大纺织工人从经过斗争达成的“十八条”协议,看到了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强大力量,认识到自己的利益要靠斗争才能获得,进一步看到成立自己工会的重要性,很快原来没有建立工会的工厂纷纷建起了工会。

这是上海纺织工人从1925年五卅运动时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能够在反动派的统治下,达到的部分实现;这是党领导的上海纺织工运史上的一次大的突破,这充分说明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力量的强大。工人斗争的胜利,震惊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层领导,如国民党的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看到这个协议时大为恼火,连声斥责上海社会局无能、软弱、顶不住。

二、调整底薪和实行生活费指数的斗争

要求年奖、胜利金等经济斗争只能改善工人一时的生活,物价飞

涨却仍然是严重的威胁,要想少受物价上涨、工资贬值的影响,上海地下党提出必须设法提高工资及在计薪方法上有所突破。

1946年2月26日,沪西等区的丝织业工会联名就物价上涨、工资贬值问题,向资方同业公会递交了书面请求。资方则以“近来物价高涨系受无稽谰言影响一时波动”,“关于丝织工资应暂维现状”作答复,拒绝工人要求实行生活费指数的请求。工人派出代表,多次谈判,资方不仅不同意工人要求,还推翻以前的有关协议。工人决定反击,3月18日,美亚绸厂、大诚绸厂及沪西其他绸厂相继罢工。次日,全市其他各绸厂也陆续怠工。地下党组织及时研究了形势,决定继续由工会出面揭露和抗议资方的阴谋,将斗争规模扩大。3月28日,全市丝织业工人同时罢工。午后,300余家厂的一二万名丝织工人迎着狂风暴雨前往社会局请愿,直至深夜,与资方达成9项协议。之后,社会局背着工人删改协议。广大丝绸工人于4月2日后再次进行罢工、请愿、示威游行。国民党当局准备镇压。党组织根据当时的形势,特别考虑到罢工工人生活困难的实际,决定收缩斗争,说服工人于4月15日先行复工,同时向社会局申请仲裁。

复工斗争过程中,源通绸厂资方以停止供膳挑起事端,并勾结警方逮捕8名工人。沪东300多名丝织工人向警察局请愿,要求释放工人又遭镇压。上海地下党发动全市丝织工人支援这一斗争。沪西等丝织工人再次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橡胶、电力、棉纺等其他行业的工人也纷纷前往表示慰问。国民党当局深感棘手。中共上海工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设法约请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出面斡旋。5月22日,双方达成了协议。经过3个月的艰苦斗争,丝织工人的生活待遇终于得到了一些改善。

上海妇女界是这次斗争的又一领域。3月8日清晨,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沪西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的大草坪汇集了上海棉纺、丝织、染漂、橡胶、卷烟、制药等产业的女工和圣约翰、大同、大夏等大学及其他各界2万多人,集会纪念三八妇女节。许广平在演讲中,号召妇女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胜利;罗叔章希望上海妇女带头站起来,求得自身的解放。游行队伍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大光明电



上海各界妇女集会庆祝三八妇女节

影院门口，巧遇国民党派系领导的上海妇女百余人三八游行队伍，双方开始对峙。上海妇女界3万多人的游行队伍团结一致，高呼“妇女们不要受蒙蔽！”“不做花瓶！”“参加人民队伍中来！”，上海妇女界的游行队伍遭

到埋伏在高楼上的国民党特务的石块抛击，二层楼有人将开水往下面人群浇泼，有点燃的鞭炮向人群袭击，途中，还受到国民党马队的践踏和吉普车的冲撞，但上海妇女界队伍仍昂首阔步地向外滩广场进发，向国民党当局示威。

1946年3月、4月间，物价的猛涨，使广大教师的生活也陷入严重的困境。3月22日，全市的市立中学教师全面怠教，私立学校即起响应。沪西的大夏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同大学等校师生在地下党领导下，都投入了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



沪西工人在五一游行时使用的横幅

是年5月1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工委组织下，原计划在虹口公园召开全市性的工人集会和游行，由于大雨临时改为分散进行活动。沪西数千工人，

冒雨举行游行。沿途，游行的高呼：“纪念五一、保障职业”、“改善职工生活”、“实行民主”等口号。下午，以沪西纺织业、丝织业为主的数千工人在胶州公园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中共地下党员汤桂芬、朱俊欣等以工人代表的身份发表演说，要求保障工人生活和自由，要求早日实现民主。大会通过了要求保障工人生活、停止东北内

战等9项提案。

沪西工人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在调整底薪和实行生活费指数的斗争中,迎来了反内战的新的斗争。

三、玉佛寺公祭昆明于再烈士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就12个问题阐明了国共双方见解,其中有些问题达成协议,共产党同意退出浙东、苏南、湖南、湖北、河南(除豫北)和广东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表示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实行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的社会贤达共同协商国家大事;另有些问题未达成协议,如军队问题,解放区政府问题,对日受降问题等。毛泽东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周恩来等留在重庆就悬而未决的问题继续同国民党谈判。由于无法取得进展,周恩来于11月25日也返回延安。国共谈判陷入僵持状态。

国民党一面与共产党谈判,蒋介石一面下密令:“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势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同时,印发其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纂的反共文件《剿匪手册》,继续进攻解放区。

是年11月25日,昆明6000余大中学生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大会,钱端升、费孝通等爱国进步教授在会上作反内战讲演。第二天,昆明30余大中学校的3万余名学生宣布总罢课,并发表宣言,提出立即制止内战,要求和平;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等。12月1日,反动当局组织大批特务和军警闯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学校,残暴殴打师生,有人扔手榴弹,致使于再(共产党员)、潘琰(共产党员)、李鲁连、张华昌4人身亡,20多人受伤,酿成震惊全国的昆明“一二一惨案”。

昆明“一二一惨案”消息很快传到上海,首先在上海沪西的圣约翰大学传开。当时,上海圣约翰和之江、沪江、东沪等院校牵头,正在组织以欢迎来中国调停内战的马歇尔特使机会,组织大中學生举行全市性的请愿活动,起草《给马歇尔特使的公开信》,各校学生广泛开展联合签名活动。国民党当局闻讯惊恐万状,上海市市长钱大钧电告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称:“圣约翰大学学生受奸党鼓动,欲鼓动学潮以响应昆明学潮”,“已飭青年团(指三青团)秘密派人参加并命军警戒备”。



上海各界群众在玉佛寺公祭于再烈士

上海出现“迎马事件”后,中共上海学委领导获悉昆明“一二一惨案”牺牲的烈士于再的胞妹打算在沪西玉佛寺对其兄举行家祭。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刘长胜和张承宗决定借纪念昆明“一二一惨

案”牺牲烈士的活动,发动向国民党当局的示威斗争。这次斗争由圣约翰大学党总支负责联络,发动大中學生、教师、工人、店员等各界群众代表参加,同时邀请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组成主席团,在1月13日,于玉佛寺举行对昆明“一二一惨案”中牺牲的于再四烈士祭奠活动。是日清晨,上海大、中学校、教师及工人万余人陆续来到玉佛寺,很快寺内挤满人群,寺外同样是人山人海。学生们唱着自己新编的歌:“西风凄凄,大地在叹息,朋友,你死不瞑目,为了祖国的独立民主自由,你们的血,照亮了路,我们会继续前进。”主祭团由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郑振铎、许广平、金仲华7人组成。当时,宋庆龄未出席公祭大会,但送了“为民前驱”的挽联。

上午11时,祭奠仪式开始,柳亚子向于再遗像献花圈后,马叙伦朗读祭文:“呜呼先生!不死于抗战之前,而死于抗战之后。呜呼先生!机关枪、手榴弹,不用于杀敌人而于杀同胞、杀志士、杀青年



宋庆龄送的“为民前驱”挽联

……”这是血和泪水交织的控诉!是声讨反动当局的檄文。接着是知名人士及各界代表致词。柳亚子在会上激动地

说:“今天到会的人这样多,可见人心并没有死。今天双方停战令已经下了,但这是10年内战、8年抗战和于再先生等流血牺牲争取来的,是全国人民竭力争取民主自由的结果。中国必须建立联合政府,真正实行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民主政治是要争取的,不是恩赐的,我们要为争取民主政治而努力,完成于先生的遗志,踏着他的血迹前进!”马叙伦演讲说:“现在我们的口号是争民主、争民主、非争民主不可!”此时会场上立刻迸发出“不民主毋宁死!”大同大学、圣约翰大学和纺织女工等代表也分别发言。公祭大会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电,提出了8项要求:1.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 重选国民大会代表;3. 立即实行蒋介石的四项诺言;4. 改善职工教员生活;5. 严办汉奸;6. 立即撤销禁止集会游行的命令,废除限制思想活动;7. 释放政治犯;8. 严办昆明惨案凶手。

公祭仪式结束,群众高呼:“我们要用游行来纪念死者!”顿时,“我们要游行!我们要游行!”的呼声不断。早已守候在附近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一个队长和警察局的一个官员见状急忙上前“劝阻”。主席团对他们说:“请两位上台来动员,请您们直接向大家宣布。”两人果然登台讲话,但话音未落,就被群众轰下台。大游行浩浩荡荡开始,队伍最前的是“纪念昆明死难师生”的大型横幅,紧随其后的“民主万岁!”“人民不死!”的两面大旗,也醒目开道。游行队伍自戈登路(今江宁路)转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南京东路,过三马路(今汉口路)上海市政府,至外滩公园解散。沿路张贴了大量标语,口号声、歌声连续不断,吸引了上海广大市民。

这场斗争是抗战胜利后上海各界人民的第一次大规模联合行动,揭开了全市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群众运动的序幕。

四、“六二三”反内战大示威

国民党在破坏政协成果的同时,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阴谋正在进行。1946年四五月间,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并逐步将战火引向关内,全面内战危机空前严重。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地下党,全力以赴地动员群众投入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爱国民主运动中,以使广大群众特别是中间群众逐步认清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本来面目;要求上海地下党组织在斗争中和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共同行动,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并注意避免出现“左”的口号与行动。

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在各界群众已经分别组织起来的基础上,成立全市性的群众联合组织。5月25日,上海各界52个社会团体的200余名代表,在南京东路劝工大楼的三区百货业职业工会的礼堂宣告成立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简称上团联)。大会致蒋介石、毛泽东、马歇尔电,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用民主方式解决问题。中共上海市委通过各个系统的党组织加快组织发动工作,要求工人界、学生界、妇女界、教育界等各级党组织全力支持,动员各团体参加上团联。自此,沪西的圣约翰、大同等大学纷纷成立了反内战团体,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反内战活动。6月19日,沪西49个工厂的70多位工人代表集会,成立沪西反内战民主促进会,发表了《沪西工人反对内战民主促进会宣言》。

但是,蒋介石执意要发动内战。他在6月10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说:“今天以前我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可现在我必须放弃政治解决了……我在北伐时决定三年解决统一问题,结果不到三年便告统一,……我决于一年内完成军事,两年内恢复经济。”几天后,他又扬言:“三个月内可击破共军,六个月可完全解决共党问题。”全

面内战的危险已迫在眉睫。

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京局决定，在上海人民已进一步组织起来的情况下，由上海市各界群众团体选派代表赴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请愿，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并举行全市性的反内战示威游行。中共上海市委刘晓和刘长胜即召集张执一、张承宗开会讨论，经研究决定，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发动群众推选和平请愿团赴京（南京），以造声势，扩大影响。经各方协商，推选了9名代表，他们是：马叙伦、盛丕华、胡厥文、包达三、雷洁琼、张絅伯、吴耀宗和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同时各界群众已经分别组织起来，沪西工人请愿队，由汤桂芬负责组织。国民党当局对此十分恐慌，组织御用队伍对人民群众反对内战斗争进行破坏。

双方在沪西的大同大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校方定于6月22日至26日举行期中考试。学生要求延期考试，以便参加请愿活动，遭到校方拒绝。学生自治会召开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反内战委员会，同时决定停课7天，开展反内战宣传活动。21日上午，大同反内战委员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时，遭到校方的捣乱。下午，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亲自出马赶到学校训话，诬蔑共产党“挑动内战，反对政府”，要学生如期参加考试，不准罢课。次日，吴国桢再度赶到大同大学，200多名军警、宪兵以全副武装密布广场，如临大敌。吴在台上再次对学生训话，应者甚少。吴恼怒地指责留在广场继续反内战宣传的学生。学生会主席不畏官方的高压，上台严词驳斥吴的谬论，使吴狼狈不堪，一时无言以答。此时，台下的同学们高呼“爱国无罪！”口号。这时，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圣约翰大学学生陈震中上台准备讲话，即被几个便衣抓进教室进行毒打。另一同学上台抗议，又遭毒打。学生情绪激昂，高呼“释放陈震中！”“严惩打人凶手！”相持许久，吴国桢被群众围着无法下台，只得下令放了陈震中，最后只能灰溜溜地离去，毫无所获。

6月23日，包括沪西在内的5万多工人、学生、教师、职员以及工商、文化等各界群众举着旗帜、标语从四面八方赶到上海火车站，在火车站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马叙伦为团长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



6月23日上海各界云集北火车站广场的欢送赴京请愿队伍

大会通过四项议案：1. 组织上海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2. 以人民的力量为后盾，保证这次请愿“只许成功，不许失败”；3. 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再去；4. 通电美国政府，希望不再助长中国内战。全场高呼“赞成！”一致通过。“要求和平、反对内战！”“人民代表胜利万岁！”口号声响彻了火车站广场的上空。送走代表后，5万各界群众以学生队伍为前队，开始了浩浩荡荡空前规模的反内战游行。

当天下午6时30分，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乘坐的列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代表们刚下火车，就遭到一批特务的围困殴打，马叙伦、雷洁琼和学生代表陈震中等代表被打伤，前往采访的《文汇报》、《大公报》记者也遭毒打，造成震动全国的下关惨案。周恩来亲自到医院探望受伤代表，分别致函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对当局放纵暴行表示严正抗议，提出惩办肇事凶手、追查警宪责任、取消特务机关、保证代表安全等项要求。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均发表社论，揭露了事件真相，要求法办凶手及追查幕后策划者，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而奋斗。

“六二三”运动是抗战胜利以后,上海人民革命力量的第一次大汇合、大检阅。下关事件从反面教育了群众,使全市人民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破坏和平、坚持内战独裁的反动本质,从而将和平民主的希望、建设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第二十章

第二战线的反抗斗争

一、反对冻结生活指数

蒋介石集团执意发动战争,打了一年内战,军事上接连吃败仗,经济上仰仗美国“输血”,生产萎缩、市场萧条,通货膨胀的痼疾日益加重而无法救治。国统区物价不断上涨,人民求生存,反饥饿的呼声日益高涨,大中学生反对美帝暴行的斗争和沪西百货业职工用国货、抵制美货的运动接连发生,进而全市职工争取解冻生活费指数,学生要求提高公费待遇斗争又在酝酿,一场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出现新高潮。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表面还是歌厅舞榭,灯红酒绿,一派繁荣景象。国民党党政接收大员通过炒买黄金美钞、投机倒把,成了暴发户。抗战胜利初期,黄金价格每两1.8万元,转眼间飞升到8万元,原1美元兑换2000多法币,瞬间上涨至1.8万元,官僚们竞相挪用公款,从事投机,发了大财。到了1946年底,黄金每两超过35万元,1947年2月8日猛增到59.5万元一两,闹得人心恐慌,都拚命抢购,交易所被迫“拍停板”,暂停营业。告急电函到南京,惊动了政府头目,应急措施还没有定下来,黄金黑市价格又跳到72万元,到11日,又涨到96万元。外币及其物品也随之猛涨,粮价从12万元涨到16万元一担,职工的收入只够喝稀薄粥汤,农民更为困苦,预征的粮税按推算,已到了他们的第四代。

蒋介石派特使到美国求援,美国垄断企业集团不肯做蚀本的生意,求援落空。蒋介石只能铤而走险,于1947年2月16日抛出《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它的主要内容除了严禁黄金美钞买卖,对企业实行限额配给制度,提高外汇兑率,管制金融业务、进出口贸易外,还禁止私人企业关厂停业,把职工工资生活指数冻结在1月份水平上,严禁怠工罢工。违者格杀不论,由经济警察管理市场。

职工们在测算,1月份的生活指数是6600~7900倍,到2月15日指数已升至1.8万倍,到冻结时生活指数已到2.5万倍,何况物价还在涨。以职工一般底薪40元为计算,按2月份的指数2.5万倍,应得工资数为100万元,但按1月份的指数为7800倍,即使加上6种日用品差额补贴金7.3万元,实际收入还不足39万元,相差数达60%,以隔月补给差价,还要降低几个百分点,这日子没法过。解冻生活指数是职工最迫切的要求,是维护职工生存权利的需要,这个斗争是经济斗争,同时也与政治紧密联系。“冻结生活指数”是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命令,解冻生活指数的斗争,就是同国民党政府的斗争。



丝织工人举行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示威游行

解冻生活指数的斗争开始于2月,中共上海分局指示党内,国民党冻结生活指数是为了搜刮职工血汗,拿去打内战。要求党员通过积极分子在职工中广泛宣传。职工中流行一首歌:《生活指数为什么要冻结》,歌词是:“政府法令太巧妙,杀害百姓不用枪和刀。生活指数为什么要冻结!?快快行动起来,为了我们的生存,争取指数的解冻。”3月3日起始,沪西和全市各区都行动起来,各工人代表组成小型请愿团,赴市参议会、社会局、中纺公司请愿谈判。中纺一厂工人要求解冻生活指数,3

月23日在工会领导下开始罢工,坚持3天,国民党政府派军警镇压,工会要求中纺公司发给罢工期间工资,在同意后复工了,但南纺细纱车间工人坚持要求解冻后才复工。国民党宪兵带了狼犬前来镇压,逮捕15名工人。但是,群众要求解冻指数的斗争仍没有停止,到5月初,累计请愿的群众已达10万人。中共上海工委提出丝织业工人为龙头,首先举行大游行。工委下设的中共上海丝绸厂工作委员会,其中沪西绸厂委员会领导美亚四厂、大诚总厂、中蚕一、二厂和针织业袜厂,还有美亚二厂、璞成、天诚、天源、美康等党组织。5月8日上午,在党组织的发动下,沪西和其他区的丝织业工人分别到胶州等公园集合,拉着“要求无条件解冻生活指数”的横幅,汇集到外滩,经南京路到国民党市政府,后到社会局。一路口号、歌声不断,公交车让路、致敬,法电工人向丝厂女工致敬,并也掀起了大游行。上海解冻指数的工人斗争,很快形成抢米风潮,杭州、无锡、苏州、芜湖、安庆、合肥、绍兴、金华、兰溪、温岭、湖州、嘉兴、成都、永康、寿昌、松江,都发生大小规模不等的抢米风潮。面对上海的要求解冻指数的斗争,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作出《上海市工资调整暂行办法》,宣布生活指数有条件解冻。即底薪在30元以下的,按公布的指数十足发给,30元以上至100元为一级,逐步递减10%,尽管解冻成果有限,但这毕竟是职工经历几个月的斗争的重大胜利。

解冻生活指数斗争,使广大群众进一步认清国民党政府真内战、假和平的嘴脸,认清国民党蒋介石为维护其反动独裁统治而撕毁政协决议,坚持其内战政策,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二、反饥饿,反内战中的“五二〇”惨案

1947年5月,国民党统治区各种危机进一步加剧,广大人民群众在饥饿线上挣扎,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日益增长,群众争取生存和保护各种正当权利的斗争纷纷展开。当时最突出的是广大学生的生活十分贫苦,特别是国立大专院校的公费生,每天的菜金只能买两根半油条或一块豆腐,有时公费生只能以盐水煮菜皮汤就餐,起码的营养



1947年5月19日,上海7000多学生汇集北火车站欢送上海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也不能维持。5月13日,上海医学院学生体格检查,约15%的学生因营养低劣而得了肺结核,一个学生因贫病卖血,后暴病而死。消息传出,上海学生喊出“反饥饿、反内战”口号。17日,上海八所国立大专院校学生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上海国立大学联合会,决定与杭州的学生代表一起去南京参加当地学生向国民党政府的请愿斗争。自此,全国学生运动由分散向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态势已经显现。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蒋介石召开临时国务会议,公布《戡乱时期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声言要对学生“采取紧急处置,作有效之制裁”。5月18日,中共上海学委研究了形势和斗争的发展,决定坚持于5月19日,上海暨大等10所国立大学和大夏大学等4所私立学校的7000多学生在暨大二院集合到北火站,欢送代表赴南京请愿,然后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

沪西大夏大学学生挤满了两辆校车,在遭到特务的阻拦中直向南京路进发,最后才接到全市学生游行队伍的后尾。但是,游行指挥者决定后来的大夏大学校车调头,后队改前队,沿西藏路向南前进。

此刻,国民党政府已调集了武装军警拦截。学生队伍不畏当局的武装阻截,勇猛冲锋前进,军警马队步步倒退,退到大世界、福州路,国民党当局已布控了装甲车、“飞行堡垒”、消防水龙等五道封锁线。一群美国士兵在西藏路路旁中南饭店二楼看热闹。大夏学生当街演出“你这个坏东西”活报剧,并高呼“美国兵滚出去!”美国士兵见状立刻转身溜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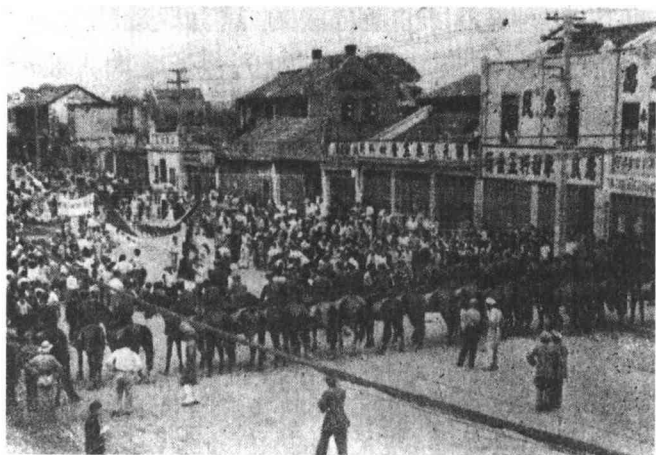


大夏大学两辆校车参加
“五二〇”游行

5月20日,以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学生为主,会同齐集南京的上海、杭州、苏州的学生代表共16所国立专科学校学生6000多人,联合举行了大游行,向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参政会请愿,提出增加学生公费,提高增加教职工待遇及教育经费等5项要求。学生们高呼“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取消‘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等口号。当游行队伍到珠江路口时,遭到武装军、宪、特的毒打和消防水龙的冲击,当场被殴打受伤流血的有104人,重伤19人,被捕28人,遭受各种袭击的500多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五二〇”惨案。同日,

北平、天津学生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多人被捕受伤。此外,沈阳、武汉、长沙、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桂林、广州、南昌、福州等60多个大中城市的学生积极响应,形成了全国性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革命大风暴。

“五二〇”惨案之后,国民党政府继续对学生的反抗斗争加紧镇压,教育部部长下达秘密命令:“通飭各校凡罢课者立即复课,并有滋事学生,严惩为首者,一律除学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为“处理学潮”召开了紧急会议,强调“务必彻底执行,”要“釜底抽薪”,把学校内的共产党“应加清除”。随即,国民党军警武装力量与校内特务,



南京的游行队伍遭军警镇压,学生伤100余人,被捕20多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五二〇”惨案

里应外合,殴打、逮捕学生,全国学生被捕、被打、失踪事件层出不穷。

在上海,镇压学生的血腥暴行到处出现。沪西地域的圣约翰、大同、大夏等大学没有逃脱敌人的镇压毒手。26日,大同大学被军警

包围,先是校内特务学生和复员青年军大打出手。学生自治会主席陈光德身受重伤,眼角破裂,眼球凸出,血流满面。自治会理事被迫四处躲避。这时埋伏在校外的职业打手立即冲进校内,里应外合,捣毁学生自治会办公室,一时操场上,教室里,走廊上,到处都出现了追打学生的恐怖场面。他们对准学生身上的要害部位打。一位女同学头部被三角铁棍猛击倒地后又被乱打一顿。一位同学上前劝阻特务的蛮横行为,也惨遭毒打,小腿裂开,血流不断。敌人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把打人抓人的事件统统说成“互殴”,最后将身受重伤的自治会主席等11位同学全部抓走。30日凌晨,国民党军警特务武装包围大夏大学,到学生宿舍按黑名单抓人,共捕去5位同学,押至静安警察分局拘留所,后转至蓬莱分局,与先前已关押的复旦、交大同学同时拘押在一个拘留所内。见大夏同学也关进来,他们就叫喊“大夏好!大夏好!”大夏同学齐声回敬唱道:“跌倒怕什么,站起来再前进……”一下子把大家的心联结在一起,二三天内,又陆续从别处转来许多同学,总共有57名同学。

5月31日,成立上海市学生联合会,沪西的圣约翰、大同等大学及大同一中、附中、晋元等为主席团成员单位,党在学联设党组,受中共上海学委领导。但成立不久,即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然而,

它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在广大学生心目中是合法的,具有权威性。

三、反抗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斗争

1946年7月起至1947年6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一年的作战中,歼灭大批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国民党军总兵力由全面内战开始时的430万减少到370万,其中正规军由200万减少到150万,而解放军总兵力由127万增加到195万,其中正规军由61万增加到100万以上,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部署了解放战争第二年我军的基本战略任务: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粉碎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的反动方针。从1947年7月至9月,我军转入了全国规模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鲁豫野战军主力相继挺进鲁西南和大别山;华东野战军挺进鲁西南和胶东地区;晋察冀野战军对平汉线北端发起进攻;东北野战军在整个东北发进夏季攻势后,又发动对长春、吉林、四平的季节攻势。

国民党为挽回败局,1947年7月4日,由国民政府提出《戡平共匪叛乱全国总动员令方案》,于7月19日经国务会议通过,规定:“凡怠工、罢工、停业关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秩序之行动,均应依法惩处”,“政府对于煽动叛乱之集会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随之全国出现一片白色恐怖,在蒋介石的亲自部署下,上海被特务列入黑名单的有3000人之多,沪西的大夏、大同等校多名师生被列入黑名单。为适应形势的变化,1947年9月,在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下,成立了中共上海市委,市委委员由张承宗、张祺、张本、陆志仁、钱伯荪组成,张承宗任书记。后又增加了马纯古、吴学谦、梅洛、马飞海为市委委员。市委工委的党组织仍按产业系统实行垂直领导,时有杂委、中纺、民棉、杂纺、机器、绸委等6个组织。是年夏,为与国民党争夺工会的领导权,又建立了中共三区(沪西)工会党团秘密组织。在白色恐怖加剧的形势下,党组织决定相应改变斗争策略,不主动组织大规模

模的群众运动,以小型分散的斗争取而代之,同时注意抓住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开展合法斗争。

1947年9月19日,发生国民党特务在威海卫路的富通印刷公司逮捕上电工会和教师团体干部的迫害事件,内部职工和沪西三区丝织业工会等工会干部数十人被扣押。国民党借机对上海工人运动予以致命打击,对象主要是斗争坚决的上电、法电、机器业、百货业等工会。9月29日深夜,国民党当局借口三区百货区工会编辑出版的《百货职工》是富通印刷所印刷的,与富通有关,分头逮捕了三区百货业的10位负责人。中共上海市委则领导了一场反对镇压工会、迫害工会干部的阻击战,国民党迫于群众压力,只得请杜月笙和社会局等人出面调停,被捕人员陆续被释放,已被开除或被通缉的工人,在1个月内可自动回厂,不愿回厂的厂方发给退职证和救济金,中共上海工委领导的这场反迫害斗争也适时地结束。

1947年10月29日,国民党当局又在杭州制造了杀害学生于子三事件。26日凌晨,国民党秘密逮捕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联络员于子三,妄图从浙大打开缺口,镇压包括上海在内的京沪杭地区以至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学生运动。于子三受到敌人的严刑逼供迫害,但坚持不透露任何机密,29日下午左右在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监狱中再次受刑而死。于子三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当局掩盖真相,编造“畏罪自杀”的谎言,欺骗社会舆论,同时实行新闻封锁。中共地下党组织及时作出部署,在浙江大学校内外广泛宣传惨案真相,控诉特务迫害学生领袖的罪行。中共中央上海局决定抓住时机,扩大斗争,反击敌人。中共上海学委根据上海局的指示布置对敌反击,号召全市学生于11月11日以罢课、素食、鸣钟致哀、捐款、写慰问信等方式来表示对于子三的哀悼和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圣约翰大学地下党总支获悉有学生收到在浙江大学好友来信介绍于子三被害经过,即布置在校园壁报上予以公布,并用《冤存何处》的大幅标题,在校园内展示,掀起全校师生的愤怒和抗议浪潮,各院系学生团体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支援浙大学生的斗争。学生团体干事联合会决定罢课一天,并在大会堂召开于子三追悼会,许多校外学校学生以张贴抗议书、鸣钟默哀、

素食、义卖小黄花、捐款慰问等各种方式投入了这场斗争。晋元中学地下党支部组织积极分子到各班级演讲,揭露反动政府杀害进步学生的罪行,在校内张贴标语,呼吁反迫害、反屠杀、争公理、争人权。大夏大学在思群堂召开大会,抗议国民党当局杀害于子三的罪行,并请圣约翰大学学生阮仁泽讲述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被害经过。大会决定罢课半天,要求当局切实保障学生生命和民主权利。大会刚结束,混在会场内的反动分子大打出手,反动军警也进入校内肆意逮捕学生。地下党进一步发动学生以墙报、标语等形式在校内宣传。校方在反动当局的压力下,以“故犯校规,张贴标语”的罪名,将7名学生除名;以“鼓动风潮破坏学校秩序”的罪名,开除9名学生。后来被开除的薛家德同学,受党组织的派遣,化装更名到四明山参加武装斗争和民运工作,1949年2月,在执行任务时,被敌人逮捕,在浙东解放前夕,他和另外3位战友被敌人活埋,新中国成立后,在当地立了四烈士纪念碑,并以薛家德的化名命名一个合作社为“朱敏生产合作社”,以表达对烈士永远的纪念。

四、救饥救寒运动



美国合众社关于普善山庄在街头收殮冻死者的报道

1947年冬天,寒流接连袭击上海,气温骤降,最低下降至摄氏零度以下,街头每天有饿殍冻尸数十具。据官方的不完全统计,12月上旬街头有冻尸400具,中旬增至500具,其中的一夜之间冻尸达189具。上海约40%的大学生在国立学校读书,靠公费维生,物价飞涨、钞票贬值,和全市贫困百姓一样,也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困

境,他们对上海人民的困苦,有同样的切肤之痛和深切的同情。12月18日,同济大学工学院基督教团的8名学生自发地在校内发起募寒衣,救济贫民。这一举动,立刻得到了工学院、法学院学生的积极响应。同济大学、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等出面发起成立上海市广泛开展救寒衣委员会,并通过上海学联在全市大中学校进行发动救寒工作。19日,同济大学成立劝募寒衣委员会,21日,交大成立救饥救寒委员会,25日,约大、之江、东吴3所教会大学成立联合劝募委员会。学委在各校救饥救寒运动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决定发起全市性的总劝募,将运动推向高潮。

国民党当局对学生的劝募活动十分恼怒,但又不敢公开镇压。市长吴国桢亲自出场发表讲话,声称:冬令救济工作须由官方的冬令救济会统一办理,任何团体在社会上进行募捐必须持有该会印制的收据方属合法有效,否则一律不得进行劝募。同时,各校学生必须要将募捐来的钱物统一交归冬令救济会,学生的行动为非法,要予以制止。对吴国桢的企图,广大学生很快作出反应。25日,美琪食品商店老板捐赠特大蛋糕一盒,作为圣诞礼品慰问为劝募寒衣奔忙的同济大学学生。学生提议“我们义卖给吴国桢!”第二天,2个学生抬着大蛋糕,9个学生胸前挂着“欢迎吴市长义买蛋糕”的纸牌,到市政府门前,点名要见吴市长。吴国桢不得不接见,被迫用200万元买下蛋糕。上海各大报刊纷纷报道,劝募活动须由冬令救济会统一办理的规定和限制,被吴国桢自己的行动和官方报纸打破了,学生的救饥救寒运动取得了实际上的合法地位。

12月28日,由交大、同济、圣约翰、东吴、之江5所大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发出倡议,全市学生同时出动上街劝募,倡议立刻得到各校的积极响应。1947年年底最后一个星期日,正是各校期末考试,给上街劝募带来困难,但进步学生还是坚持要参加劝募活动。28日这天,刚是一夜风雪,整个上海已披上了素妆。全市80余所大中学校将近2万名学生顶着严寒走上街头,为贫民募捐。不少学生手执小旗,上写“大官谈救济,只听楼梯响”、“谁使物价上涨”、“大钞满天飞,穷人饥寒啼”、“要免除饥寒,只有靠自己”、“反饥饿、反冻死”。从浦东到浦



母亲将婴儿搂在怀中御寒

西,从繁华的闹市到街头巷尾,到处听到凄凉的歌声:“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街头。”中共大夏大学地下党组织发动各学院同学组织劝募队伍,参加者计有400余学生。晋元中学地下党发动

和组织同学参加了这一全市性的救济运动。许多同学冒着刺骨寒风走上街头为民劝募寒衣。他们深入到各商店、里弄活动,在劝募活动中,广大市民的热情支持、积极捐款,给学生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

为了巩固运动的成果,继续扩大影响,学委经研究决定,分别在沪西的圣约翰大学、沪东的同济大学等地举行庆功联欢活动。1月3日,3000余大中学生在圣约翰大学举行劝募寒衣庆功大会,会后,到兆丰公园(中山公园)举行了火炬游行。

劝募和发放衣物过程中,广大学生都亲眼目睹了劳苦大众在死亡线上的挣扎,和达官显贵们的花天酒地和吝啬、冷漠,进一步激起了他们对黑暗社会的憎恨和对光明新社会的向往,不少青年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第二十一章

沪西人民在国民党统治崩溃前的抗争

一、国民党统治崩溃前的形势

1948年,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战场连连败退,加速了财政金融的破产。抗战胜利时,中央银行拥有黄金500余万两,外汇7亿美元,到1948年8月,黄金库存仅剩200余万两,外汇资金在年初只有1亿3千余万美元。法币发行总量由最初的4亿5千万元飞速膨胀到1948年8月的600余万亿元,导致前所未有的黄金、美钞和物价狂涨局面。1948年的8个月中,黄金上涨62倍,美钞上涨78倍,物价上涨58倍。财政部长王云五不得不承认:国库收入仅及支出的5%,支出庞大,全靠发行新票支持,军事开支所占比重极大,仅东北军费已占支出总额的40%。人们对法币根本失去信任,竞相抛出,法币流通的区域日益收缩,从东北、华北、华中集中到上海一隅。8月20日,蒋介石不得不以总统紧急命令方式颁布《财政经济处分令》,妄图依靠行政手段阻止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蒋经国走马上任,组织亲信建立一支万余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监督执行八一九限价政策,规定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依照兑换率折合金圆券出售。然而,它首先遭到蒋家王朝达官贵人的抵制,不法商人更是变本加厉的对抗,囤积商品,转手倒卖,从中牟取暴利,限价昙花一现地破产了。后来不得不取消限价,市场物价立刻惊人飞涨。鱼、肉、禽蛋、蔬菜平均上涨10倍,水、电、煤等公用事业价格又增加1倍。金圆券急剧贬值,尽管要2000元

才兑换1两黄金(同时还须存入2000元),中央银行限制每天存兑人数和每人存兑金额,人们还是争先恐后存兑金银,保持币值。12月23日,数万市民争挤存兑申请书酿成惨祸,当场挤死7人,伤数十人。



上海市民在中央银行门前挤兑黄金

国民党政府在推行币制改革中,对广大人民和民族资本家实行最彻底的掠夺。1948年8月国民党当局发行金圆券时,国民党当局以资方代表荣鸿元违反《财政经济处分令》,“私套外汇嫌疑”的罪名,令上海市警察局将其扣押,解交特刑审理。荣家不惜代价,上上下下花钱通路子,设法营救。11月20日开庭,判处“有期徒刑六月,缓刑二年”,交保释放。荣鸿元吃冤枉官司77天,被勒索的财物约合50万美金。以上总计110多万元都是由申新各厂按纱锭摊派出账,申九摊派最多。上海在这次币制改革中,有60余人以“私逃外汇、私藏黄金、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罪名被捕入狱。

据中央银行统计,截至1948年10月底,全国共收兑黄金167.7万余两,银元2356.4万余元,白银888.1万余两,美钞4985.1万余元,港币8609.7万余元,共计价值约2亿美元。仅上海一地就搜刮了黄金114.6万余两,银元369万余元,白银96万余两,美钞3452万余

元,港币 1100 万余元。发行金圆券,改革币制加深了人民对蒋介石专制统治的仇恨,有力地教育了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逐渐摆脱了对蒋介石的依赖和幻想,加速了国民党政府的最后崩溃。

二、申九“二二”斗争

1947 年 10 月,国民党无视上海舞女合法权益要求,实施抽签禁舞令,上海 14 家舞厅 6000 余舞女、舞业职工及家属到社会局请愿,军警阻拦,激怒的舞女冲进社会局,捣毁办公室。舞女的斗争,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焦头烂额的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取消舞禁。12 月 9 日,爆发了以同济大学学生为主的一二九争民主反迫害斗争;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等许多学校,冲破国民党军警马队的封锁线,声援同济大学学生的斗争,69 人受伤,各校有 98 人被捕。整个上海的抗议风潮此起彼伏,然而更大的反抗浪潮又很快在沪西的上海申新九厂掀起。

1948 年 2 月 2 日,全国最大的民营棉纺织厂——上海申新九厂 7 千余名工人,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展开了坚持四天三夜震动全市的大罢工斗争,是谓申九“二二”斗争,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1947 年底比 1946 年上涨了 26.6 倍。而工人生活费指数所计算的工资收入,只及物价指数的 49.4%。这时,官僚资本企业中纺公司和棉纺织业同业公会竟然规定 1947 年底的年奖按照 1946 年标准打八折,分两期发放,而且不按当月生活费指数计算。申新九厂工人除了年奖受到损失外,还被国民党政府征去 4 个月的所得税;连续 5 个月没有领到配给米和煤球;同时,资方制造各种借口,不断开除工人。厂方不履行 1946 年纺织业十八条劳资协议,越到年底,开除工人越凶,目的是为了省下一笔年奖。女工怀孕后,面临开除的威胁更大。十八条协议中第 9 条规定,女工分娩前后,应有停止工作 8 个星期福利,停止工作期间,工资照给。但是,申新九厂有些女工的

产假期得不到任何福利保证,产假期已满后,身体不好的女工,不能享受继续休息待遇,不上班就作旷工处理,“旷工”满三天,就要被开除。贫困不堪的工人面临飞涨的物价,又面临被开除的威胁,实在难以生存下去,大家要求团结起来,为生存而斗争。

中共申新九厂地下党组织,讨论了工人面临生活上实际困难和处境,分析工人要以斗争求生存的愿望,决定顺应工人群众的强烈要求,在1948年春节以前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中共地下党员毛和林先去布机间了解群众对罢工斗争的看法。1月28日,毛和林有意识在布机间车弄旁当着很多工人的面询问车间主任:“米和煤球到底几时发下来?”女工们很关心这个问题,纷纷围上来探听消息,于是无形中许多布机停下来,形成了一次试探性的罢工关车。消息传出后,工人们要求罢工的呼声愈来愈高涨。党组织决定在30日举行全厂性的罢工。30日上午,申新九厂气氛异常紧张,中共地下党员的活动,受到资本家的亲信和黄色工会人员的盯梢监视。中午12点半,中共地下党员杨光明首先指挥铜匠间关车,其他各车间工人在共产党员带领下也纷纷关车。五分钟以后,全厂机器全部停止了转动,罢工开始了。资本家害怕罢工会造成重大损失,立刻派亲信阻止工人罢工,但所有的努力都告失败。住在工厂集体宿舍内的夜班工人,闻讯也纷纷集合起来参加斗争,罢工的队伍又扩大了。资本家亲信企图阻挠夜班工人进车间,关闭了宿舍区的铁门。共产党员戚怀琮立即站出来,勇敢地指挥夜班工人冲出宿舍,冲开铁门,涌向车间,全厂长日夜、甲班、乙班的7千多工人大会师,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投入全厂的大罢工斗争。

为了准备同资方谈判,全厂共选出工人代表140多人,中共地下党员都被推选为代表。在工人代表会议上,讨论通过同资方谈判的七项条件:一、如期发放配给物品;二、年奖按当月生活费指数补发;三、年底前被开除的工人一律无条件复工;四、取消压迫工人的不合理厂规,所有厂规要有劳资双方协商才能有效;五、女工产假期满而身体不好的仍可继续休息;六、补发“五一”劳动节工资;七、反对征收工人所得税。

当天深夜,以中共地下党员杨光明为总代表同资方代表进行谈判。为了保护谈判代表,100多名工人都进入谈判场所。当工人代表提出第一条关于如期发放配给米和煤球的要求时,资方代表蛮不讲理地说:“今年无锡、常州收成不好,等明年丰收再发米,……”,“现在只有一个煤矿在南京,正在开采,等挖出煤来,修好公路,就可以发给大家了。”工人代表对资方代表毫无诚意的谈判态度,十分气愤。这时在谈判场内,发现了两个冒充新闻记者的陌生人,在工人代表的追问下,这两个国民党普陀警察分局派来的密探的真面目,当场被工人揭穿。



申九女工用身躯抵档国民党装甲车

罢工进入第二天,国民党社会局和市党部派了两人到厂调查罢工情况。他们同混进工人代表中的黄色工会人员密商平息罢工的计策,企图破坏工人内部的团结。第三天,这两人同工人代表和100多名工人谈判,根本毫无诚意,反而不断向工人施加压力。临走时,还对工人代表威胁说,“小榔头”敲不下来,要用“大榔头”来敲。致使谈判一直陷于僵局。

申新九厂连续3天的罢工斗争,使国民党当局惶恐万状。近期上海爆发了同济大学学潮,市长吴国桢挨打,舞女怒砸社会局。现在,“学潮”、“舞潮”、“工潮”一起来了,国民党当局决定对申九罢工工人实施武装镇压。2月1日晚上,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召集一帮人,在静安寺百乐门舞厅开会,秘密策划对申九工人罢工实行镇压的具体步骤。

在共产党员带领下,全厂工人坚持三天三夜的斗争,表现出很好的组织纪律性。为了保证有统一的领导,罢工开始后迅速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守护交通要道和机器设备,看管保护棉花原料、棉纱线、布匹等成品和半成品,防止敌人通过破坏设备和财产,嫁祸于工人。共产党员秘密组织工人印刷传单,书写标语,贴到厂内每一个车间、科

室、宿舍。青年女工王慕楣等人带着标语传单,走出厂门,把标语贴到街头、贴到电车上、汽车上、三轮车上。工人还组织了歌咏队,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要配给品》、《你这个坏东西》等歌曲。工人们在一块麻袋布上写了“工人团结起来”六个大字,作为旗帜插上屋顶最高处,他们爬到屋顶,将《告上海工友书》散发到马路上去。这样,申九工人罢工的消息很快传遍沪西和上海各地。

2月2日清晨,一批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突然包围了工厂。厂方指使门警打开大门,军警很快占据了工厂的第一道、第二道铁门。工人发觉后,立刻从车间奔出,涌向通往车间的第三道铁门,纠察队用铁链锁住第三道铁门,又守好其他各处的道口大门,手挽手筑起一堵堵人墙,顶住铁门。共产党员带领工人在饭厅屋顶上筑起防御工事,把砖块、竹片、木棒、桌凳、碗、铁棍、油桶等搬到屋顶,还接上消防龙头,准备对付敌人的强攻。军警看到后大吼:“你们要造反啦!”工人们回答:“你们不开枪,我们也不打。”地下党员戚怀琼带领大家高呼口号:“我们要配给物品!”“警察、工人是一家,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工人们对峙着武装军警,齐声高唱:

“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

别人家配给物品都已发,

只有你,只有你,囤积在家里,

只管你发财肥自己,

工人的痛苦你是不管的。

不发煤球、不发食油、不发食米的都是你,

你的良心和煤球一样的!”

中午,国民党警察局长俞叔平带来一帮大小头目陆续到了工厂,尾随着装甲车、消防车、马队、囚车和1000多名武装警察,他们计划先把罢工领导人和工人代表骗出逮捕,然后驱散工人。国民党当局的大小头目轮番站在吉普车上用喇叭向工人喊话,要工人代表出来谈判。工人们知道他们的阴谋,齐声高呼:“我们要(与)资方谈判!”“答应我们的合理要求!”“警察退出去!”这时,国民党特务对着罢工

队伍,不断地偷拍照片。

下午,俞叔平亲自用喇叭气势汹汹地对工人喊话:“你们好好听我话,要是不回去开车,就会弄得大家都不好看,没有几天要过年了,你们要好好考虑。”工人们在共产党员带领下,继续高呼:“退出军警,解除武装!”“我们要(与)资方谈判,答应我们的条件!”

4 时左右,军警开始对工人下毒手了。他们先用大钳子剪断了大铁门上的铁链,用力将铁门朝外拉,呼啸的装甲车突然出现在工人人墙面前。女工管妙福等许多女工冲到铁门外,站在装甲车前,大声喊:“你们用在战场上的装甲车开到工人身上,我们不怕,你们开过来吧!”面对一个又一个压上来的工人,装甲车不得不停下来,门口发生混战,军警抓走了几个女工,但是铁门还是又被工人关上了,更多的工人继续用身体人墙顶住铁门。就在双方搏斗中,女工王慕楣被挤压倒地,当场牺牲。守在饭厅屋顶上的工人,看到军警这一暴行,怒火冲天,他们把砖块、铁棒、碗片、桌凳,冰雹似的砸向军警。敌人第一次进攻被击退了。



罢工工人登上食堂屋顶与敌人对抗

下午 5 时多,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赶到现场,立刻下达向工人施放催泪弹、开枪武装镇压的命令。顷刻间,重型装甲车向工人

人体护墙冲去。指挥工人罢工的指挥员当机立断,撤去人墙,立刻从厂内开出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卡车开到铁门与装甲车对峙,共产党员许泉福开的卡车严严实实地顶住了铁门。这时,国民党军警吹起了冲锋号,施放催泪弹,工人们在烟雾中头昏眼花,看不清反击目标,逐渐后退。军警又纷纷爬上宿舍屋顶和地面的有利地形,疯狂地向工人开枪射击,装甲车将铁门连同水泥柱子一齐撞倒,工人卡车弹洞累累,玻璃被打得粉碎。女工蒋贞新、朱云仙不幸中弹牺牲。共产党员何宇珍在饭厅屋顶上左腿也中弹,仍坚持战斗,勇敢地从三楼脚手架跳下,前额撞出个大窟窿,在奋战中被军警逮捕。女工俞月琴的手指被枪弹打断。敌人在重型装甲车的开道下,手提冲锋枪,横冲直撞,冲进车间后见人就抓,抓到女工就用枪柄乱打,抓到男工,就拳打脚踢,往死里整,血腥镇压,直到晚上9时,敌人的枪声才停止。



申九“二二”斗争三烈士
(左起蒋贞新、朱云仙、王慕楣)

工人们是为了求生存,才开展了正义的斗争,寻求同资方谈判,以求得到最低生活要求。可是,国民党当局无视人民的要求,出动军警,武装血腥镇压。3位女工王慕楣、蒋贞新、朱云仙英勇牺牲,100余

人受伤,40余人身受重伤,236名工人被捕,国民党法院强行判处其中26人徒刑,中共地下党员、工人总代表杨光明被判了无期徒刑,365名工人被厂方开除。

申九“二二”惨案后,上海社会多界组织申九后援会,如蓝彩红、林福英、陈祥珍、包月芬等女工夜校校友积极组织后援活动,声援申九工人,申九工人徐明哲到沪东各工厂宣传申九惨案,对反动派进行有力的控诉。申九“二二”斗争虽然最终被敌人镇压下去,沪西工人运动遭到重大挫折,但这次斗争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区内规模较大的一次工人罢工斗争,它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工人的狰狞面目,唤醒了上海人民的觉悟。

三、疏散隐蔽、转移阵地、继续战斗

针对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政府疯狂的垂死挣扎,1948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的指示,告诫各地党组织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依靠广大群众,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强调“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将城市中多年积蓄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这是最失策的事”。“尤其是上海,应实行有秩序的疏散。不论党内外,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分子,都应设法离开岗位,首先向解放区撤退”。“凡未暴露而又未被敌特注意的分子,应继续深入隐蔽”。中共中央城工部致电上海局、香港分局:“蒋匪已在各地大批逮捕,且将继续疯狂进行。请即进行紧急措施,即将工人、学生及其他方面有被捕危险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尽量撤退,无法撤退的,即设法疏散,切勿犹豫。”



国民党当局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黑名单

沪西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指示。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地下党组织将已暴露的沪西纱厂委员会书记计淑人和女工夜校教师钱琴等地下党党员安排到台湾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到了1948年申九“二二”斗争后,敌人对虎口脱险的罢工骨干追捕不止,党组织设法将他们转移,有的到解放区,有的去四明山打游击。其中,领导申九“二二”斗争的工运领袖范小凤,因在斗争中暴露,被党组织及时撤离沪西,到其他地方工作。

沪西工人运动领袖汤桂芬、沪西三区的机器业工会顾亮和毛纺业工会惠根宝、申新九厂工会徐明哲等17人被选派到哈尔滨出席全国第六次劳动代表大会。他们化装成跑单帮、学生、商人,千里迢迢穿过敌占区,绕道异国的苏联、朝鲜,再抵达哈尔滨,代表上海50万工人参加大会。

第六次劳动代表大会于1948年8月1日开幕。早年曾在沪西战斗过的李立三,代表党中央致开幕词,回顾了一大到五大期间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战斗历程,他深情地说:“特别是今年2月间,上海申新九厂工人的罢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坦克、机枪的屠杀下,死伤100多人,表现了上海工人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至今仍保持着。”汤桂芬代表上海工人阶级保证完成大会提出的任务:“到上海解放时,工厂、仓库等将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有信心把上海变成最繁荣的城市。”对她的发言,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高呼“打到上海去,活捉蒋介石!”“毛主席万岁!”“工人阶级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会上,沪西的汤桂芬、顾亮等当选第六次劳动代表大会执委。



沪西代表出席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第六次劳动代表大会,此为沪西代表与其他行业代表的合影(后排右一为汤桂芬)

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指示,还决定撤退一批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到华中解放区,大洪山、大别山、四明山、皖西等解放区。他们中有在沪西已被敌人列入黑名单的,有为解放区建设和接管新解放城市的需要而储备的科技、工程、医护等专业技术

人才。市委还将一些骨干转送到香港学习班培训,通过学习,统一思想,积极贯彻中央的指示,在人民解放军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完全有把握摧毁国民党的抵抗,解放上海并不需要采取城市武装起义的直接行动,决心为里应外合、迎接解放、接管上海做好思想准备。香港学习班为准备解放上海作了干部储备,其中有后来安排到沪西区委的施惠珍。她到沪西区与周小鼎、钱希均夫妇两人接上关系,周小鼎为民营棉纺委员会书记,钱希均是委员,不久,施惠珍充实为委员,

增强了民营棉纺委员会的领导力量。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初,真如地区总计有十多名已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由近郊工委三次派党员护送他们撤退到解放区华中党校学习。

第二十二章

里应外合迎接解放

一、适应剧变的形势，新建中共沪西区委

1948 年末，全国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共上海市委为把工作重心转为迎接上海解放的中心任务，为有利于统一领导地区内各系统党的工作，避免敌人分割击破，决定对党的领导形式作一次大的调整，把按系统垂直领导的方式改为按地区实行分区领导的体制。市委决定将原按产业划分的党委改为按地区划分，成立沪东、沪西、沪南、沪北、沪中、新静长、北郊、徐龙、浦东 9 个地区党的委员会，各区都有相应的工作侧重面，其中沪西的侧重面是纺织业。

是年 12 月，在市委领导的主持下，中共沪西区委员会正式成立。书记夏明芳，副书记周小鼎，委员有施惠珍、王关昶。之后，区委委员又增加安中坚、李德鸿，一直工作到上海解放。

沪西区委的上级领导人主要是马纯古，上海工委书记张祺也经常与沪西区委保持联系。为便于直接在沪西工厂集中区领导工人运动，区委机关设置在靠近苏州河南岸的江宁路 1353 弄泰来坊内，机关就是周小鼎、钱希均夫妇的居住地，这是一间朝南客堂楼的二楼，与周围居民住宅混杂，便于隐蔽开展工作。但是，区委副书记周小鼎还是被敌人跟踪，并严重威胁到区委的安全，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将周小鼎和钱希均调至浦东工作。而区委机关则向西转移到苏州河南岸小沙渡药水弄，在药水弄内 62 号购买了一幢二层楼独用房子，并决定区



1948年底中共沪西区委部分委员(右起夏明芳、施惠珍、王关昶)(解放后摄)

委委员王关昶和施惠珍夫妇两人住机关。王关昶对外经常是以老板身份外出联系工作,施惠珍是老板娘,为了掩护更有逼真性,上级领导马纯古决定将施惠珍母亲接来同住,并安排一个年轻女党员做保姆,实际是区委的保卫干部。经过周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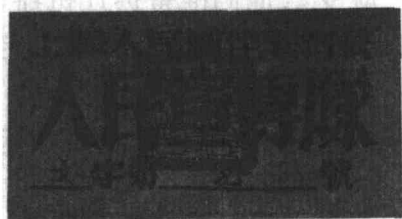
部署,一个合法家庭掩护下的区委新机关建立了。

中共沪西区委建立后,原属工委系统党的组织先后统一归属区委领导。区委下设9个分区委,原属上海工委领导的区级党的组织,调整为中共中纺系统分区委(书记王定中、副书记杭惠兰,委员孙贤德、徐仙玲,下辖11个支部);中共民营棉纺第一分区委(书记李名琦,委员张翼钧、顾新宝,下辖7个支部);中共民营棉纺第二分区委(书记徐佩玲,委员张淑曾、刘敬章,下辖7个支部,另有其他系统领导的民营棉纺基层党组织4个支部);中共沪西杂纺委员会(书记安中坚,委员万忆琴、潘裕德、胡肇昌,下辖1个总支、1个联合支部、22个支部);中共沪西机器业分区委(书记史桂昌,委员杨公保、黄金柱,下辖16个支部);中共沪西卷烟面粉分区委(书记顾松盛,委员何其友、潘云虎、屠传泗,下辖14个支部);原属教委、学委系统领导的沪西区级党组织,调整为中共沪西劳工教育分区委(书记李德鸿,委员梅继范、毛经赐、胡铁民,下辖17个支部);中共学生分区委(书记胡铁民,委员倪善锦、陈俊忻、傅教文、吴妙龄,下辖8个支部)和中共沪西地区分区委(书记陈鲁生,委员许之敏、陈祁、单意基,下辖12个支部)。到1949年5月上海即将解放的前夕,中共沪西区委鉴于沪西地区被苏州河分割为浜北、浜南两块,为便于配合解放军解放浜北地区,决定临时建立浜北分区委(书记顾松盛,委员陈宝明、杨汉品、何其友),以备在浜北发生战斗时,统一领导北岸地区党组织开展斗争。

各个分区委的各个组织之间互通有无,齐心协力,为上海解放做了大量工作。

中共上海市委按照中央关于在大城市的工人及学生中“应采取多吸收积极分子入党的方针”指示,抓紧进行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到上海解放时,沪西区有 1194 名党员。仅从工厂 6 个分区委统计,在 1948 年 12 月底,所有工厂支部党员共有 514 名,到解放前夕已发展到 976 名,增加了近一倍。通过发展党员的形式,不但加强了党的核心力量,也发展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抗战胜利初的工协原是工委对外公开发表宣言声明的代言机构,并无组织的名称。为迎接上海解放,工委拟订了《上海工人协会简章》,明确“本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执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决议,以团结上海职工、保护职工利益、争取职工解放为宗旨”。通过工委所属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各工厂企业都迅速建立起工协组织,发展了一批经过斗争考验对党有一定认识的积极分子,在入会时为他们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各级工协组织由党员负责。在中共沪西区委领导下,沪西工人协会成立,并成立党团组织,杨秉儒担任沪西工协党团书记,组长顾龙桂。沪西的中纺棉纺业、民营棉纺业、丝织业均成立工协分会。还建有沪西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等秘密外围组织。在工厂发展有觉悟、并具备条件的工人参加“工协”;在学校发展具备条件的学生参加“新青联”(也有少数学校经上级党组织的批准,成立性质相同名称不同的类似组织);在地区发展有觉悟的贫民参加“贫民团”;在职员中成立“职协”;在中纺系统的中高级职员中成立“小纺协”;在教师中成立“教协”等等。这些队伍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上海解放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共上海市委的警委领导系统也建立了单线联络的外围组织互保立功委员会,在普陀区警察局内的地下党支部领导下,警察局内部秘密开展了“不抵抗、不撤退、不参与”的三不宣传,警察局内的互保立功运动在秘密进行。

1949 年初,国民党当局要把设备先进、生产实力雄厚的中纺一印染厂的机器设备秘密拆迁到台湾。地下党组织利用中纺公司发布各厂进行护厂的通知,争取到合法护厂的权利,以公开的名义,发动群



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上海市委统一印发的人民保安队、人民宣传队臂章

众抵制搬迁，保护工厂。4月中旬，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将全市各企事业单位已普遍存在的护厂队、护校队、纠察队、消防队、自卫队等组织集中起来，在人民团体联合会的领导下，建立统一的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人民保安队是人民解放斗争中以工人为主体的武装自卫组织。全市成立了人民保安队总部，各区成立分队部。沪西人民保安区分队是以工人为主体的，联合学生、城市贫民、职员

等人员组成的武装自卫组织。人民宣传队主要由学生为主，积极开展迎解放的宣传活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资料，收听新华社和国外电台的广播、中外报刊的报道，进行综合分析，编写宣传材料。上海解放前夕，人民保安队总部为了使解放军攻入市区时，能清楚地识别人民保安队队员，决定突击印制白布红字的“人民保安队”臂章。5月初，沪西区人民保安队指挥杨秉儒，将印刷“人民保安队”臂章任务交沪西中纺系统分区委一印厂地下党组织。沪西一印厂是敌人严密管制的工厂，要在3天内，在敌人眼皮底下秘密完成印制600只“人民保安队”袖章是相当艰难而又危险的任务。党员杨善秘密布置党员、积极分子，在敌人监管的视线内，利用工厂制版、印刷的一切有利条件印制了600只“人民保安队”袖章，并绕过驻厂国民党部队驻军的几个士兵监控，及时把印刷好的袖章交给杨秉儒，并很快送到上级组织保管。5月25日，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解放了，杨秉儒通知包括一印厂地下党在内的人民保安队去海关大楼领取“人民保安队”袖章。沪西人民保安队队员们戴着自己印刷的鲜红的上海人民保安队袖章，配合人民解放军巡逻在工厂及周围的马路上，心头充满着无比激动的喜悦之情。

二、反迁移 反破坏

1949年1月,全国三大战役结束,解放军即将挺进上海。国民党南京政府知道大势已去,下令各地组织“应变”,他们准备拆迁机器、搬运物资、转移资金、破坏工厂,妄图垂死挣扎。中共沪西区委决定针锋相对,制定对策,揭露敌人的阴谋。

为了阻止敌人的破坏活动,区委提出“反对拆迁机器、反对搬运物资、反对转移资金、反对破坏工厂”的口号,号召护厂、护校、护店、保护地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地下党组织要通过这些斗争,达到完整地保护好上海,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接管上海的目的,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起义”,也是最好的“里应外合”。

广大群众渴望上海尽快解放,但又迫切要求了解党的城市政策,地下党员、工协会员和其他积极分子冒着生命危险,采取各种办法秘密印发宣传资料,有的将秘密收听到的解放区电台广播的新闻印成传单散发出去。区委大量散发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统一编印的《新华通讯》、《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六次劳大决议》、《关于工商业政策》等宣传品,及时地宣传形势和党的政策,传播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行将垮台的消息,号召人们以实际行动迎接上海解放。这些宣传材料在沪西的许多工厂出现,人们在车间里、更衣室、厕所及厂门口等地争相传阅。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资本家也得到这些宣传品,他们也高度关注形势的发展。上海天快亮了,人们以难以抑制的喜悦和激动的心情在迎接上海的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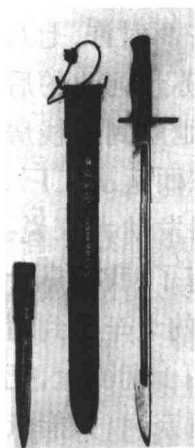
但是,黎明前的黑暗,斗争仍然错综复杂。党组织以更加谨慎的方式领导人民迎解放,采取更加灵活多变的方式进行工作。比如,在党组织掌握一定工会领导权的单位,就利用工会合法身份发动斗争。在没有或没有全部掌握工会领导权的单位,就一个车间、一个部门地逐步开展,通过自下而上的形式发动工人参与。在进行护厂运动中,不少工厂还开展了反拆迁、反搬运的斗争。

中纺公司是国民党政府最大的官僚资本企业,这也是地下党反

迁移、反破坏的必争之地。1948年11月底的一天,上午9时许,七八辆卡车开进中纺一厂(解放后改为国棉一厂),径直向苏州河边的后栈房驶去。这时南织乙班中共党员史小妹警觉起来,她赶到后栈房一看,原来卡车装满了仓库的布匹和木材,正打算将东西运出工厂。面对卡车就要出厂的紧急状况,史小妹马上回到车间发动大家说:“现在有许多卡车在后栈房装布,成品没有了,原棉没有了,我们靠什么吃饭呀!大家赶快到工厂大道去拦车!”当装满货物的卡车驶到南织布房间门口时,闻讯赶来的工人拦住了去路。工人们一拥而上,把车上的布匹都卸下来,扛进了南织布房间。押车人无可奈何,只能灰溜溜地走了。党组织通过护厂运动和适当的宣传,说服了沪西区的一些准备回乡避难的资本家,让他们打消了关闭工厂的打算。大批中小型工厂的资本家和工人们也开始共同努力,设法渡过难关,保护好工厂。

大隆机器厂的资方,早在1948年10月,已做好拆迁的准备工作,要把储存在仓库里的和刚买进的机器全部运到台湾去。如果这些阴谋得逞,不仅经济受损失,而且还要断了工人的生路,保护好机器和材料是工人的生命线,资方拆迁,遭到工人强烈的反对。但是,国民党当局决心要拆迁,想通过厂休日偷运,但还是给工人发现拦住了。他们最后使出了杀手锏,以违反戒严令的罪名,逮捕了11名职工,威胁他们同意拆迁机器就可释放。这些同志坚决表示,宁可坐牢,也不同意拆迁机器。地下党经过合法的和非法的途径,争取保释了8位职工。还有3位同志是在上海解放时,从关押的学院中趁着混乱之际逃出。

中央印制厂上海厂(上海印钞厂)地处沪西曹家渡北岸。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责令中央印制厂大量印制金圆券等货币,以维持反人民的内战。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巨大胜利后,面临彻底失败的败局,国民党企图通过进一步滥发货币来为其兵败如山倒的军队输血,垂死挣扎,挽救其即将倒塌的反动政权。中央印制厂在日夜加班,直到上海解放前夕,该厂仍被催逼着拼命加印金圆券。在这同时,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密令,要秘密将印钞厂的机器



中纺厂工人使用的部分武器

拆迁台湾。国民党直属区分部、工人福利会、三青团等,都在厂内积极进行活动,企图瓦解工人团结战斗的抗争,同时又胁迫工人拼命生产,胁持工人随厂迁往台湾。

工厂地下党支部针锋相对地发动工人与敌人周旋,积极开展反搬迁斗争。工协会员和积极分子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搬机器就是搬掉工人的饭碗”、“机器是工人的命根子,宁死不准搬机器”等口号,把反搬迁和广大工人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发动群众用各种方式抵制和阻止搬迁计划的实施,严密监视偷拆偷运。1948年12月的一天,当多辆卡车进厂,企图突击搬运机器时,许多工人围住了卡车,使汽车无法动弹,最终阻止了敌人搬运机器的阴谋。

1949年的上半年,随着上海的解放越来越临近,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也越来越尖锐。印钞厂党支部进一步开展护厂工作,抓紧对上层人士做统战工作,对中层职员进行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认识,共同参加护厂。对反动组织成员,则是利用他们亲戚、朋友、同乡等各种关系,劝导他们不要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做危害人民的事。地下党通过糜文熔出面,成立了应变委员会,并向中央银行申请到相当数量的黄金和银元,供印钞厂应变护厂之用,还搞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机要工厂,不准驻军,不准散兵入厂”的布告,张贴在厂门口,使护厂工作合法化、公开化。同时,以党员和工协会员为骨干,组织了有200多人的护厂队,日夜巡逻工厂区,控制了驻厂国民党武装警察的武器弹药库,以及变电所、金库、版库、材料仓库和电话总机,还准备了充足的粮食、副食品、帆布床、毛毯等。5月25日,苏州河南岸的沪西普陀全部解放,喜讯很快传遍全厂,人们奔走相告,欢庆解放。这天的中午,忽有自称“中共华中局静安寺总部”的一批人,开着一辆吉普车到厂门,声称要进厂接管。护厂队员高度警觉,仔细盘问,逼其出示军管会证件,很快这些所谓的接管大员露出原形,护厂队当即将他们押送到附近解放军部队,查实是一伙盗窃流氓分子,对其依法

进行了处理。而印钞厂的全体职工很快迎来了真正的人民解放军的进驻。



国际电台真如发讯台

国际电台真如发讯台地处真如,这是国民党进行国际通信联络的大型发报台,设备新颖、齐全,占地面积很大。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电信总局将在东北、京津等地区溃败中的大批电信器材分批南撤搬运、集中到真如、南翔等处的发讯台,准备集中再转运台湾。1948年夏,中共上海郊区地下党组织决定要千方百计地保护好这批具有重大政治、经济

和军事价值的通讯设施,使它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在具体步骤上,党组织决定先在电台周围的农村中建立活动据点,伺机打入电台,组织力量,采取措施,迎接解放。在上级党组织的统一部署下,电台党小组先后绘制了无线电发射铁塔、天线、机房、仓库、发电机组的方位图;摸清了电台行政管理人员的政治表现;调查了电信物资和设备的性能、数量及存放地点。在仓库里工作的吴德祥,更是详细地对库内物资进行登记造册,完整地将这份宝贵的清单交给了上级党组织。

5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罗店、月浦一带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国际电台接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通知,限期拆迁刘行收讯台,逾期即予炸毁。地下党组织想通过拖延时间,保存这批器材,但在13日,刘行收讯台仍被国民党军的大炮炸为一片废墟,紧接的国际电台真如发讯台也很快要沦为被炸毁的单位。此时,敌人开始在真如做撤离的准备,真如发讯台被列为重点炸毁的单位。就在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敌人还在负隅顽抗中,真如地下党领导冒着极大的危险,机智地抢运出30吨器材设备,负责转运器材设备的地下党员顾不上自己家的房屋已被炮弹击中起火的重大损失和及时抢救,坚持把通信器材运往市区安全的隐藏地点。上海即将解放前夕,驻守真如发

讯台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实施炸毁电台,职工则以“需要请示主管”为由,机智地一拖再拖,电台周围郊区的地下党组成人民自卫队日夜守护电台,就在炸毁与守护的反复较量和拖延中,真如地区解放了,电台最终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沪西地区的学校也投入了迎解放的护校斗争。4月初,大夏大学地下党组织利用敌人提出的“应变”口号,发动学生成立“应变自治会”。该会的口号是:“团结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储粮应变,争取生存,争取真正的和平”。学生“应变自治会”为适应形势,组织纠察队、宣传队、服务队等群众性组织。

4月26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出动1万多军警特务包围各大学,进行白色恐怖的大逮捕。是日深夜,“应变自治会”的值班同学听到国民党警察局的“飞行堡垒”警车从中山桥开过来的声音,预感到这是来抓人,急忙鸣钟唤醒沉睡中的学生,大家不约而同地快速到思群堂集合,以全校学生面对国民党军警。不久,集结完毕的军警开始持枪进入大夏大学,对学生宣布要逐一查验学生证,没有学生证的一律抓捕,当即遭到反对。学生“应变自治会”主席查汝出面与军警交涉,当场被捕,其他同学上前争论,相继有22人被抓,这次全市被捕共计有356人。

大夏大学地下党组织积极通过家长、教师及社会知名人士设法营救,一部分学生陆续出狱,有的在上海解放时出狱。

地处沪西大自鸣钟的沪西小学,是共产党人对外活动的据点。4月20日解放军渡过长江,不久,隆隆炮声上海市内已隐约可闻。4月26日,沪西小学地下党支部领导得到当晚解放军将进上海的消息,在没有进一步核实的情况下,通知人民保安队集结待命,伺机与解放军相配合。沪西公社地下党支部书记杨志清冒险出面,通知当天下午4时在沪西小学召开保甲长会议,组织应变,迎接解放。通知发出后,炮声却越来越稀疏,这时大家感觉情况不对,不像有解放军进城的迹象,但通知已发出,已将自己的秘密身份暴露,而此时敌人正在疯狂地地抓捕共产党人,危险直接逼来,沪西小学内的共产党员有可能马上被敌人一锅端。正在大家讨论如何撤退时,突然有一个国民党警

察冲进校门,高声大吼:“你们这里是4点钟开会吗?”“4点钟开会吗!”这个国民党警察在声嘶力竭的吼叫好多声后,就悄悄地隐退不见了。地下党成员立刻预感到,这是在报警啊!大家飞身撤离。两分钟不到,也就是千钧一发的两分钟,国民党普陀警察局的红色“飞行堡垒”警车飞驰而来,从车上跳下十几个如狼似虎的武装特务,将沪西小学围得水泄不通。这是中共地下党组织打入国民党警察局内的同志,以冒着生命危险的通风报信,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免了一场大逮捕、大屠杀。沪西公社地下党同志保全下来了,可是隐蔽在国民党警察局里的地下党同志却在上海解放的前夕被敌人杀害了。

三、黎明前战斗的沪西英烈

1949年5月初,上海即将解放,沪西的一批革命志士在黎明前英勇牺牲。他们依靠对党的革命事业的忠诚和信念,进行秘密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有的置身龙潭虎穴,以各种方式与敌人周旋,保护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有的奉组织之命,潜伏敌特心脏,进行策反工作。他们没有看到胜利的红旗在沪西大街小巷到处飘扬,就倒在敌人的屠刀下而英勇捐躯。



国民党普陀警察局地下党支部书记钱
凤岐(左)、党员刘家栋(右)

国民党普陀路警察分局的钱凤岐、刘家栋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在敌人魔窟里进行秘密战斗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凤岐是沪西国民党普陀路警察分局内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他们以警员的身份,秘密搜集情报,及时向中共上海地下党通报。刘家

栋以分工监察文教和社会秩序的警察身份,秘密从事保护人民的工作。为了在敌人的魔窟中坚持地下工作,钱凤岐以拉胡琴、唱京戏的形式,吸引周边的警察,经常把警员吸引到自己的宿舍里,在闲谈中,

“不慎”流露出国民党在前方惨败和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

中共上海警委是上海主管全市警察系统的市委领导机构,直属市委书记张承宗分工领导,警委书记为邵健。1949年春,“警委”开展互保立功运动,建立互保立功委员会,监视特务及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保护机关档案,掌握要害部门,系统地调查政法部门及警察局的政治情况,适时地向反动头目发出2000余封警告信,并按照地下党整个部署,广泛进行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的宣传,配合各方面进行护厂、护校,保护机关,反对国民党破坏,里应外合,迎接人民解放军,维护地方秩序的工作。钱凤岐、刘家栋根据“警委”的指示,接受分寄任务,迅速将“约法八章”等材料附上警告信,寄到警官和特务分子家中,敦促他们认清形势,起义反正,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在普陀警察局内部引起极大震动。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获知警告信暴跳如雷,连续下了3个训令,要在全市迅速破案,并在警察系统内疯狂搜捕。5月13日,敌人找到地下党发信的破绽,当晚将钱凤岐、刘家栋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埋伏在杨浦警察分局的中共党员钱文湘和进步青年蒋志毅。毛森连夜主持审问,钱凤岐等在一个星期内被审讯几十次,遭到严刑拷打,志士宁死不屈,没有透露一点党的秘密。20日,毛森下令,将钱凤岐、刘家栋、钱文湘、蒋志毅杀害于闸北宋公园,是为警委四烈士。



解放前夕牺牲的
徐海峰烈士

1948年秋,中共华东联络站为配合解放上海的对敌斗争,选派江苏省宿迁乡农会主任、宣传部长徐海峰到上海,以配合江华、扬帆搞地下敌工工作,从事秘密对敌策反工作。徐海峰到上海后,先后在沪西上海被服一厂、三厂、袜厂等单位做工,以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多次叫爱人方秀珍以到国民党军官家中当女佣人为掩护,伺机获取敌人机密文件。徐海峰通过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的人际关系,搞清了国民党江苏省的组织情况和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保存的重要档案20余箱。他在敌人内部积极进行策

反的攻坚战，亲自到住在杨树浦的国民党连长叶叔友家谈话，动员他带领全连官兵起义。上海解放前夕的5月13日，徐海峰、方干卿、方云卿和樊锡瑾等一些地下党同志到杨树浦开会，被策反的国民党连长叶叔友也在场，正在开会之际，他们的行踪却已被国民党特务侦破，开会的同志全部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们施尽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火烫等一切酷刑，他们坚贞不屈个个是顶天立地的无畏战士，视死如归，气贯长虹。5月20日，丧心病狂的敌人将他们全部杀害在闸北宋公园。



郭莽西烈士

大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郭莽西，思想进步，积极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在大夏任教期间，以“京沪铁路局警务处专员”作掩护，在路警中积极宣传进步思想，揭露腐败反动的国民党统治，成为国民党特务重点控制的镇压对象。1949年5月10日，郭教授在寓所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的10天内，受到6次酷刑的迫害，他英勇无畏，以死抗衡，5月20日被杀害于宋公园。

人民保安队战士亦有为人民的安宁献出生命的。如陈仲信烈士，他是省吾中学学生党员，参加人民保安队后担任大队副。这支大队，由爱群夜校联系的工厂职工所组成，由泰利机器厂工人党员鲍雪根任大队长。在执行从中山公园至周家桥一带的社会治安任务时，国民党盘踞在碉堡里的残敌，对准陈射击，子弹射中了他的腰部，顿时鲜血渗透了外衣，他为了党的事业，为上海的解放流尽了自己的鲜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为防止敌特和兵痞的破坏，一印染厂地下党组织进行了周密的护厂斗争。敌人决心对一印染厂地下党组织大开杀戒。5月23日上午，国民党普陀警察局发出通知，要一印厂的工会理事长杨善去警察局谈话。她发觉这是敌人的镇压信号，机智地甩掉敌人的纠缠，隐蔽起来。下午，警察局果然出动警车“飞行堡垒”和近百名便衣武装特务包围了一印厂，到处搜捕杨善，没有结果，特务头子痛骂下属连一



印厂牺牲的三烈士(左起孙方璟、李阶平、张如松)

个共党也管不住,便又到工厂的加工场乱捕了19名工人,第二天(5月24日)特务就把其中的地下党员工协会负责人孙方璟、工会积极分子张如松和李阶平集体枪杀,烈士牺

牲的第二天,沪西(普陀)就解放了。

1950年牺牲在台湾的革命烈士钱琴。钱琴是沪西三和里女工夜校教师,秘密的中共党员。抗战胜利后,她与许广平、雷洁琼等一起从事和平民主运动,并被选为“国大”代表,在上海妇女界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树大招风,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她的活动和行踪被国民党特务所掌握,迫害的魔爪正向她伸来,中共上海地下市委领导为保护钱琴,决定将钱琴转移出上海。

抗战胜利后,台湾的主权从日本手中回归到祖国,共产党需要革命志士到台湾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向被日本帝国主义奴役长达几十年的台湾人民进行华夏文明的宣传和教育,以团结台湾人民。抗战胜利后,台湾地方政府由国民党政府直接主管。从中国革命长远事业的需要,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将钱琴潜伏到台湾,以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临行前,市委工委书记张祺亲自找钱琴和同行的原沪西纱厂委员会书记计淑人谈话,交代任务。为便于在台湾从事秘密工作,钱琴化名为钱静芝,在台湾省邮务工会补习学校当教师。到台湾后,她克服了语言和生活上的困难,团结台湾同胞,运用各种形式宣传革命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在她的秘密宣传教育下,很多同学觉悟提高,有的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壮大了组织,在台湾历次工人运动中,起着骨干作用。

1949年上半年,蒋家王朝在大陆的反动统治已开始崩溃,正在将



1950年在台湾牺牲的钱琴烈士

其余剩余的物力、人力全部龟缩到台湾,为维持其统治,不惜一切代价,加紧对在台湾的革命力量进行血腥镇压。1950年,在台湾邮务工会补习学校秘密从事革命工作的钱琴,被叛徒出卖了。当时的台湾,到处是白色恐怖,敌人要将地下共产党组织一网打尽。敌人捕获钱琴,如获至宝,想要通过她的口,撬开所有地下共产党的秘密,便对她施以残忍的酷刑。她坚贞不屈、严守机密,敌人一无所获。当敌人将死刑的判决书放到钱琴面前时,她神态自若,视死如归。在被敌人枪杀日期即将到来时,她仍利用一切机会,对狱友进行革命气节的教育,教难友唱革命歌曲。这年的10月11日,她和战友计淑人(化名)一起被拉出监狱执行枪决,仍从容坚定,整理好衣服,与难友一一握别,昂首走向刑场,在台北市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

第二十三章

上海战役和沪西(普陀)解放

一、沪西解放的前奏曲

1949年,中共中央从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后开始部署渡江作战,组成渡江战役总前委,成员有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邓小平为书记。5月3日,陈毅等领导相继到丹阳,部署解放上海和确定建立机构和干部配备,成立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确定上海地下党的任务是配合与协助解放军,当上海解放后,地下党的任务即告结束,而应立即在思想上、组织上与解放军结成一体,担负新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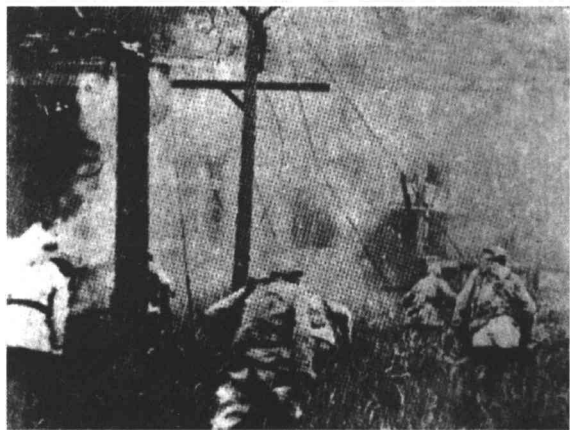
5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于苏州发布淞沪作战命令。苏州河以南及浦东属于第九兵团;苏州河以北及闸北吴淞属于第十兵团,合围解放上海。12日,上海战役拉开序幕。上海战役第一阶段为钳击吴淞口,封锁黄浦江,扫清外围。第十兵团先后攻克浏河、太仓、昆山、嘉定、南翔、安亭。第九兵团先后攻克平湖、嘉善、松江、青浦、金山、川沙、高桥等地。第十兵团的月浦、刘行战斗激烈,遭敌军的重兵顽抗。经过10天的激战,解放军已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上海的国民党军,于是上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的总攻上海市区。23日,三野司令部下达《淞沪战役攻击命令》,各部队同时发起总攻。进入上海战役的各军,严格执行不使用火炮等重兵器射击的规定,采用多路快速前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以保全市民的生命财产,保全市区的建筑物。

二、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血战真如

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为了守住上海,在沪郊纵深四十里的范围内,建筑碉堡、拉丁、派捐、毁田、砍树,电台的安全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4月底,解放大军已逼近郊区。真如是国民党军困守上海的主要阵地之一,是月浦至虹桥重点防御地带的中心,与大场、北新泾互为犄角之势,以国际真如发讯台、真如车站为核心,配以钢骨水泥碉堡,以及大量的铁丝网、地雷带和交通壕。防守这里的国民党军为第54军和第123军。其中,第54军是淞沪守军中未被歼灭的部队,建制完整,实力较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真如是淞沪战役宝山战区中的一次战斗。由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26军77师(代号珠江部队)担任,该部自苏州、常熟出发,5月12日先后攻克昆山、嘉定;22日,解放黄渡、南翔、马陆、广福;开始攻击大场、真如主阵地。23日午夜,发起总攻。25日中午,229团占领绿杨桥,231团抵达李子园,切断大场与真如发讯台联系。



解放军向盘踞在真如国际电台的国民党军猛攻

25日13时,以229团监视绿杨桥、塔水桥国民党守军,并沿铁路南侧经葛家港向前穿插,对真如镇北国民党守军进行分割。230、231团从绿杨桥和李子园出发,以小部兵力配合76师攻击大场,大部兵力攻击真如发讯台。15时,电台守军见势不

妙向东逃窜。231 团迅即占领电台后,迅速南进,包围太平桥、真如镇、倪家桥;双方激战后,守卫的国民党第 55 军狼狈地向吴淞逃窜。20 时,230 团发起对真如车站的强大攻势,守卫国民党军顽抗,双方又展开激烈的战斗,全歼守军 600 余人,而解放军也付出极大代价,许多指战员英勇牺牲。午夜,真如警察局代局长兼义警大队代大队长宣布投诚,231 团进驻真如镇。23 日凌晨,230、231 团合歼真如地区国民党第 123 军残部。至此,真如战斗结束,共歼国民党军 4000 余人。

在人民解放军攻占真如后,真如发讯台的报务员用简便公电“xa”向全世界各地发出了“上海解放”的消息,当时还收到不少电台发来的“xa”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的回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解放真如地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战斗中,由于部队要继续战斗,将牺牲的战士,采取就地埋葬,仅立一竹片,书以姓名,番号。上海解放后,迁葬烈士时,一些竹片已丢失,以至一些烈士姓名、籍贯、番号难以查考。现查考的烈士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6 军 77 师 229 团烈士计 21 人;26 军 77 师 230 团烈士计 30 人;26 军 77 师 231 团烈士 21 人。烈士忠骸后来迁至龙华烈士陵园。

三、普陀区全境解放

1949 年 5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7 军的广大指战员,在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率领下,马不停蹄,人不歇脚,迅速向上海挺进。当时,江南正值梅雨季节,阴雨连绵,为了赶时间,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全军日夜在雨中行军;解放军战士浑身上下都是湿漉漉的,有的跌倒在水田中,一身泥和水,有的鞋子早已破烂,赤着脚在赶路,谁也没有叫声苦。连队里的许多共产党员为了带领新战士一起参加上海战役,尽管自己累极了,但还是抢着帮助他们背背包,扛枪支,甚至扶着他们一起前进。狂风在呼呼刮个不停,雨淅淅地下个不息,但战士们高唱嘹亮的战歌,大踏步地向前进。

27 军部队率先在上海西南方外围作战,先后拿下了七宝镇和泗泾镇。5 月 24 日下午,占领了虹桥机场,接着,便从西面和南面多路

向上海市区攻击前进。当晚9时,从吴淞口方向传来了向国民党守军发起总攻的隆隆炮声,这是我军9、10两大兵团将最后切断汤恩伯集团通往海上退路的胜利炮声!这时,市区战斗的激烈枪声也清晰可闻。聂军长拿起电话,看着作战地图,在问70师师长肖镜海:“部队打得怎样了?”肖师长兴奋地报告:“军长,冲进了,敌人退却了,我们正顺着南京路,林森路(今淮海路)向市里追击。马路上的电灯还给我们照着亮呢!”接着,27军的80、81师都先后打来电话。报告了他们部队冲进市区,正在沪西的中正路(今延安路)、林森路、安福路、康定路向黄浦江边挺进的情况。有的部队已到跑马厅(今人民公园)一线。25日晨2时,81师部已将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以西的国民党军肃清,并控制了苏州河的几座桥梁。26日1时许,81师的241团经由恒丰路桥及麦特赫斯脱路北端搭的浮桥渡苏州河后,向两侧发展,掩护79师攻击苏州河北岸。

27军的首长们以喜悦的心情,分头告诫各部队,不要与敌人逐楼逐房、一街一弄地争夺,一定要尽快甩开敌人,插到市中心去,不给敌人喘息机会。国民党守军已被穿插的人民解放军打得晕头转向,极度混乱,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甚至连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传送战斗命令的吉普车,也稀里糊涂地开到了27军阵地来了。许多被甩在后边监视起来的敌人,尽管有高楼大厦,坚固的工事,有的还配有装甲车和坦克,但在四面楚歌中,只能一批又一批的缴械投降,做了俘虏。

27军的指战员考虑上海是人口众多,工厂林立,建筑物密集的中国特大城市,为避免战火对城市摧残和对市民的伤害,他们采用了“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很快向市区进军。

5月25日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西区突破国民党部队的防线,进入上海市区,苏州河南岸的普陀区首先解放。解放军为了不扰民,露宿街头。凌晨,居民早上醒来打开门都吓了一跳,街的两边,睡满了穿着土黄粗布军服的解放军战士。晚上曾下过雨,有的战士身上的衣服还是湿的,经过一夜的激战,战士们显得很疲倦,一张张充满稚气的脸上满是尘土,有的还有斑斑血迹。当时在战士中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想上海,进上海,进了上海得到两条麻袋布。又是

铺,又是盖,晚上睡觉怪凉快。”



解放军进入市区,严格遵守入城纪律,战士露宿街头

5月25日,苏州河南岸的普陀区域解放了。可是一条苏州河却把解放军凌厉的攻势挡住了,北岸仍在敌军手中。各个部队从拂晓一直攻到中午,也没能攻过河去。我军在上海战役中,指挥机关作

出了特殊规定:部队进入市区后,严禁使用炮火轰击,只许以轻武器作战。但苏州河的地形对攻击部队十分不利。国民党守军凭借北岸的高楼大厦,居高临下组成了严密的火力网,封锁了整个河面与南岸临河的宽广马路。每个桥头上都设有坚固的碉堡,坦克、装甲车流动巡守。因此,在攻击几座桥头时,部队伤亡很大,一再受挫。在桥头倒下的烈士中,有“济南第一团”的连队干部,有最先突破长江天险的第一船战士,有准备解放上海后返家探望母亲的上海兵,有刚刚入伍不久的解放战士。这许多好同志为了解放上海,在苏州河畔牺牲了!

许多指战员被这个挫折激怒了!他们要复仇,急于取胜,纷纷要求解除禁令,启用炮火,砸烂对岸的敌人。只要一声令下,对岸的敌人顷刻之间就会葬身炮火之中。但是,那将有多少楼房和市民的生命财产也会化为灰烬!军部当即重申严禁使用火炮。27军的首长们及时赶到前线,察看攻击过的几座桥头。只见对岸不断闪过敌人活动的影子;窗口间都隐约可见敌人的枪口,桥头的高压电线全被打断,马路上、墙壁间弹痕累累,加之河深岸陡,说明不用炮火摧毁敌人火力点,是难以直冲过桥的。

为了解决苏州河战斗不准使用火炮这一大难题,聂军长、刘政委亲临现场视察,决定调整部署,改变战术,采取正面佯攻,牵制敌人兵

力。晚间,将主力拉出市区,在西郊绕道过河成功,然后沿着苏州河北,由西向东攻击前进,尽快地歼灭敌人。在这同时,加紧做对敌军的策反工作。

苏州河南岸解放后,中共地下党员、上海策反委员会的田云樵等来到81师师部,与师长孙端夫和政委罗维道接上关系,认为解放北岸不能用重炮和炸药,要打政治仗,进行政治攻势。田云樵想到联系人王中民曾任国民党少将部员,与对岸51军副官处长刘凤德较熟,现兵临城下,争取他投诚是有可能的。随即安排参谋送王中民过河做劝说工作。在地下党安排下,罗维道与刘凤德通了电话,刘表示刘昌义愿意谈判。

在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攻势压力下,最终策反成功。中午前,国民党敌淞沪警备副司令兼51军军长刘昌义偕刘凤德、王中民、参谋等几个人乘坐吉普车通过造币厂桥来到西康路劳工医院,军长刘昌义到81师师部,接洽投诚谈判。最后由81师安排,带着刘昌义、王中民等坐车前往虹桥路的27军军部。在军部的聂凤智军长接待下,刘昌义表示了起义的决心,双方商定三项具体内容:

1. 刘昌义命令51军在25日夜12时前将造币厂桥防地(包括大场)交给解放军,51军集中到江湾体育场,并配合解放军打击顽抗的国民党部队(刘提出时间来不及,后同意推迟4小时执行);
2. 令国民党21军、123军残部向大场集中,把苏州河以北所有防地、仓库、物资移交解放军;凡有违抗的,都由人民解放军解决之;
3. 令国民党所属部队在撤离中,要确保交通、通讯、水电等设施完整,不得破坏。

聂军长和刘昌义在协议上签字后,大家分头行动。刘昌义等返回北岸,让军法处长魏震亚留在81师师部,负责双方联络。26日清晨,81师顺利地从造币厂桥等桥上通过,人民解放军接管了刘昌义51军的所有防地,此时,沪西地区全部解放并向江湾地区进发,扫清残敌。

在这同时,沪西区委积极进行策反工作,分化瓦解敌人,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和接管上海,做了大量工作。当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近郊后,盘踞在上海市区的国民党军退守到苏州河两岸的工厂和



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上海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投向人民。图为刘昌义(左一)与人民解放军指挥员接洽

险要地区,妄图负隅顽抗、破坏工厂。沪西区地下党的同志,立即开展策反工作,向敌人讲清利害,动员他们缴械投诚,走新生之路。据守在造币厂桥南同兴被服厂、新裕一厂和桥北造币厂内的国民党军一个团,就是在地下党员对该团团长劝说后,放下武器的。逃窜

到恒丰路桥南福新面粉七厂内的交警总队的200多人,凭借八层高楼的厂房,居高临下地控制了恒丰路桥,其中一个营长,又十分顽固,叫嚷要与工厂共存亡。人民保安队沪西指挥部几次派人与该厂的护厂大队长联系,研究了对策,做好士兵的工作,让他们放弃抵抗。当人民解放军包围了该厂后,由人民保安队带路,绕道破墙而入。当那个反动营长还妄图顽抗时,被他的士兵开枪打倒,全营缴械投诚。

然而,国民党的残兵并未束手待毙,还在负隅顽抗。如驻守大隆机器厂的一个团,就曾几次冲上造币厂桥,企图进行破坏,结果被桥南堍的人民解放军击退。敌军头目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竟利用人民解放军不向市区开炮的命令,强迫一位老人拎着满桶汽油去烧桥。老人匍匐缓行中,被国民党军当场击毙,企图引燃桥面,但燃烧的油桶滚落到苏州河中,没有引发大火。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大隆机器厂的地下党员趁机劝降了驻军警卫,收缴了枪支。旋即,他们又冒险闯入驻军团长住所,陈述利害得失,指明光明出路,最终大部分敌军士兵同意投降,该团头目也迷途知返,当即同意挂白旗投降。谁料,当勤务兵登上屋顶挂白旗时,进驻油脂厂的守敌又开枪阻挠,吓退了那个勤务兵。大隆机器厂的党员机警异常,立即改换地点,让他们扯出白旗。随风飘动的白旗,瓦解了附近所有守敌的军心,纷纷投降。解

放军顺利通过大桥,迅即进驻大隆机器厂,并举行了受降仪式。

上海解放后,中共沪西区委和人民保安队西区总指挥部,立即通知各个区队及其所属各部按照事前划分的地段进入岗位。各区队的分工也很明确,有的维持治安,有的为人民解放军领路,按图索骥,拔除国民党的后卫部队的防守据点。沪西的曹家渡、胶州路、西康路、静安寺以至中山公园等地,到处是张贴的欢庆标语,宣传队纷纷上街宣传,扭秧歌打腰鼓欢唱胜利,大大鼓舞了人心。

5月25日下午,沪西区委的领导王关昶、施惠珍等来到设在西康路劳工医院的人民解放军第27军81师师部,会见师长孙端夫、政委罗维道,经过双方自我介绍后,孙师长、罗政委以感激的心情说,十分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们,十分感谢上海人民,你们使马路上的灯火通明,照亮着我们追歼敌人;你们为我们带路、当向导,使我们很快地分割包围了敌人;你们为我们抢救伤员,看押俘虏,使我们解除了后顾之忧……王关昶、施惠珍同志也满怀激情地说,天亮了!总算把你们盼来了!把上海人民日夜盼望的人民解放军盼来了;当看到你们入城后,秩序井然,热爱人民,不人民宅,露宿街头,怎能不使上海人民心情激动,怎能不更加热爱人民的子弟兵!正说着,沪西区的工人、学生和市民们一群群、一队队地敲锣打鼓,喊着口号,唱着革命歌曲,扭着秧歌来到了设在西康路劳工医院的81师师部,欢庆解放,欢迎解放军进驻沪西区的工厂、学校。这时,人民保安队沪西区指挥部的领导同志,也把精心挑选出来的50名人民保安队员送到81师指挥部。他们告诉孙师长、罗政委,这50位同志都是老工人,人民保安队员,对上海的道路很熟悉,来给解放军带路的。孙师长、罗政委再三表示感谢,并说,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可以说,这次上海战役的胜利,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相互支援、密切配合的结果。

25日夜,人民解放军许多部队就由30多位上海向导带路,跨过了苏州河,追歼河北的残敌!

上海解放后,还有一些敌军在市内流窜,他们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抢劫。大隆机器厂的守敌,有的在投降前已自行逃窜。有一个兵痞打破造币厂的墙壁,进入银库,恣意盗劫银元和银元坯子。造币厂的



1949年5月25日,上海街头出现《上海人民》报号外,刊登上海解放消息和解放军《约法八章》等

党员和护厂队员早有防范,对兵痞扒窃予以打击,齐心协力守卫银库,保护了国家的财产。这类散兵游勇到处皆有,人民保安队根据区委部署,分别在大小道口设立收缴点,拦截兵匪流窜,收缴兵痞的枪支弹药。短短几天内,各收缴点收缴的枪支弹药数量可观,少则可满载四五辆三轮车,多则需用卡车运送,集中移交给人民解放军。与此同时,各单位还扭送一批特务、工福会分子,先将他们集中到胶州路实验民校登记,对有忏悔的分子,经教育释放。对顽固不化的残敌和

“民主联军”之类反动组织成员,一经人民保安队拦住查实,就押送收容站处理。

有些地痞流氓和不法分子乘上海刚解放的机会浑水摸鱼,进行敲诈勒索。如在铁路西站,一伙地痞流氓聚众抢劫木材,强行拆掉铁路两侧的“木城”,甚至还要破坏枕木。这些人对国家财产的破坏极大,直接影响铁路运输安全和恢复。沪西人民保安队得知地痞流氓和不法分子正在西站闹事,立即将保安队开进西站,双方对峙,并中止了流氓的抢劫。保安队遵照区委指示,当众揭露地痞流氓的丑恶面目,耐心劝说受蒙骗者要迷途知返。经过反复宣传教育,绝大多数人归还了公物,迅速离开了肇事现场。聚众哄抢的地痞流氓见势不妙,只得扔下各自抢得的东西,纷纷作鸟兽散,一场哄抢木材毁坏铁

道的风波很快平息。

四、上海解放,沪西(普陀)开始新的征程

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在陈毅市长的主持下,接管国民党监狱,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拘押在监狱里的沪西和其他区的革命同志相继出狱,重见光明。



在陈毅市长的安排下,走出提篮桥监狱的革命同志合影留念

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随即在沪西地区按上海市原行政区划,分别设立普陀、江宁两个行政区接管委员会。6月3日,成立普陀区接管委员会,赵虞任主任委员,驻军团长范国璋和公安分局局长董镇任委员。上海解放,标志着原处于地下的

的中共沪西区委已完成历史使命,行政事务由接管委员会主持。但在军事接管工作期间,沪西区委除了配合协助各系统接管工作外,对于党员的转接组织关系、收缴党费、党员登记等均照常进行。8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设立新的中共沪西区委,管辖普陀、江宁两个行政区党的工作。9月2日,市委正式任命吴亮平为区委书记,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工人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和妇女运动委员会,1950年2月起,分批公开了原地下党的基层组织,沪西开始进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回眸解放战争时期的4年岁月,那是充满着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解放与奴役斗争的年代。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赶走日



中共沪西区委书记吴亮平在基层做报告

本侵略者后，中国又面临两种命运的决战：是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还是开创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光明的新天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顽强奋斗，终于推翻了代表黑暗势力的蒋介石独裁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沧桑巨变，震撼世界。

上海是中国的骄傲，沪西是上海的一块宝地。解放战争时期，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沪西人民在党的

领导下，发动大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在黑暗的反动统治时期，人民积蓄革命力量，形成配合解放军进攻的第二条战线。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从1919年五四运动沪西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来，沪西人民历经30年浴血奋战，终于站起来了，成为国家主人，迎来了新生，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开始了。

【参考文献资料】

- [1]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至四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
-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
-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 [4]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 [5]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6]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编委会编,《二十世纪中国实录》(第一至四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2月版。
- [7]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组织部、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普陀区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上海市普陀区组织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
- [8]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上海市普陀区党史大事记》,内部资料出版。
- [9] 上海市普陀区志编纂委员会编,《普陀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
- [10]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市沪西地区城市贫民革命斗争史资料》,1988年内部版。
- [11] 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 [12] 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主编,《上海工人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 [13]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著,《中共上海党史大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 [14]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1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1926-1927)》,北京图书馆出版

社 1997 年版。

- [16] 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史文件汇集》(内部本)。
- [17] 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
- [18]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 - 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版。
- [19] 《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 [20]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版。
- [21]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 - 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 2 月出版。
- [22]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2 月版。
- [23] 《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24] 《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25]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26] 《何孟雄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27] 《吴亮平传》,中共党史人物传 86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年版。
- [28] 帅孟奇著,《三十年代初江苏省委沪西区委活动片断》,《党史资料》丛刊,1983 年第 2 辑。
- [29]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史》,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2 年版。
- [30] 《1931 - 1945 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31] 张承宗著,《红艳千般》,学林出版社 1990 年版。
- [32] 王尧山著,《王尧山文稿选》,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0 年 7 月版。
- [33] 陆志仁纪念文集编辑组编,《陆志仁纪念文集》,1993 年内部版。
- [34] 张祺著,《上海工运记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 1996 年版。
- [35] 王知津、华校生、陈祥珍主编:《巾幗摇篮》,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 [36] 上海市总工会工运志办公室、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地下军纪事》,1995 年内部版。
- [37] 徐明清著,《明清岁月》,2001 年内部版。
- [38] 《郑超麟回忆录》,郑超麟著,1982 年 8 月内部版。
- [39] 《上海抗日救亡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
- [40] 任建树等编,《现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6 年版。

- [41] 上海真如镇人民政府编,《真如镇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4 年版。
- [42] 中国第二档案馆等编,《“五二〇”运动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43] 中共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学林出版社 1989 年版。
- [44] 上海历史研究所教师运动史组编,《上海教师运动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45]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1991 年版。
- [46] 上海市总工会编,《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史》,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2 年版。
- [47] 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志研究室编,《中共上海警察系统地下斗争史料》(内部版)。
- [48]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等编,《上海战役》,上海党史出版社 1989 年版。
- [49]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接管上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3 年版。
- [50]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编,《中华书局总厂职工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 [51]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编,《大隆机器厂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 [52]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编,《上海第一纺织厂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 [53]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史》,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2 年版。
- [54]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室藏资料”:《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劳动周报》、《向导周报》、《民国日报》、《申报》、《大公报》、《晨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等。

后 记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 90 周年,我们编写出版了《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沪西)历史(1919.5-1949.5)》,以志纪念。

本书由区委党史研究室拟定大纲,报经区委领导同意,并在区委领导关怀和支持下,区委办公室配合,由区委党史研究室启动编写,华校生执笔,其他同志参与,历经 1 年多的艰辛努力,数易其稿,最后区委审定,全书才得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之际出版。

本书筹划和编写过程中,参阅和选用了中央档案馆、上海档案馆、普陀档案馆、一大会址、龙华烈士陵园等单位资料和已公开发表的图片。许多当年亲历上海普陀(沪西)区各个革命时期地下党斗争的老同志以及社会部分热心人士给予热情指导和帮助,并提供了许多地方资料。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领导和曹力奋处长、孙建中党史专家对本书稿的内容、观点、结构、史实和文字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对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鉴于时间仓促,编者的水平、信息、资料有限,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1 年 6 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沪西)历史:1919年5月~1949年5月/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办公室,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编.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6
(上海市普陀区历史回眸)
ISBN 978-7-5087-3588-7

I.①中… II.①中… ②中… III.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史料—普陀区—1919~1949 IV.①D235.5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2362 号

丛 书 名:上海市普陀区历史回眸

书 名: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沪西)历史(1919年5月~1949年5月)

编 者: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办公室、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陈贵红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 话:编辑部:(010)66076941

邮购部:(010)66060275

销售部:(010)66080300

(010)66051698

(010)66080360

传真:(010)66051713

传真:(010)66080880

传真:(010)66063678

网 址:www.shcbs.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青浦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 × 240mm 1/16

印 张:19.125

字 数:240 千字

版 次: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总 定 价:135.00 元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沪西）历史

（ 1919年5月~1949年5月 ）

ISBN 978-7-5087-3588-7



总定价：135.00元